



乔姆斯基文集

海盗与君主

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

【美】诺姆·乔姆斯基 / 著 叶青 /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就其思想的广博性、新颖性、震撼力和影响力而言，乔姆斯基可能是在世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

——《纽约时报书评》

乔姆斯基以无情的逻辑，引导我们仔细倾听领袖们的言论，甄别他们所省略的东西。不管是否同意，我们无法忽略他的观点。

——《商业周刊》

乔姆斯基的作品是理性和激情的混合体。他述说的是我们不愿听，也不愿记住的东西，然而，如果文明要延续下去，这些却是我们必须知道和不能遗忘的东西。

——马库斯·G·拉斯金

ISBN 7-5327-3886-8



9 787532 738861 >

定价：28.00 元

易文网：www.yiwen.com.cn



世纪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www.yiwen.com.cn

海盜与君主

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

【美】诺姆·乔姆斯基 / 著 叶青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美)乔姆斯基著；叶青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

(乔姆斯基文集)

书名原文：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SBN 7 - 5327 - 3886 - 8

I. 海... II. ①乔... ②叶... III. 恐怖主义-研究-世界 IV. D81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074 号

Noam Chomsky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Pluto Press, 2002

Copyright ©Noam Chomsky, 1986, 1990, 1991, 2001, 2002

本书根据普卢托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图字：09 - 2005 - 08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海盗与君主

——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

〔美〕诺姆·乔姆斯基 著

叶 青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29,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 - 5327 - 3886 - 8/D · 077

定价：28.00 元

出版说明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和哲学教授,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数十年来,他一直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批判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伪善,尤其是批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每当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西方知识界往往率先关注他的表现。例如“9·11”事件之后他接受了几乎所有世界著名媒体的专访,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予以严厉的批评。他对时事精辟独到的见解、对美国政治入木三分的批判,一直受到西方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他的著作也在西方知识精英群体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和支持者。

本文集所译介的几部著作分别成书于不同时期,均为乔姆斯基政治评论的代表作,基本上涵盖了作者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探讨了美国自越南战争、海湾战争、“9·11”事件以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于一向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的美国媒体和舆论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进而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热点问题之一——国际恐怖主义——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本文集有助于国内学人及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政策,这也是我们引进这套丛书的初衷。当然,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西方学者,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和提法同我们有一定差距,相信读者是会理解和把握的。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

——代序

陆建德

所有这一切终将导致语言的核心染上致命的疾病，语言最后变成了永远的假面具，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

语言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我是指真正发生过的事实)能否真正的相应？事实是否还能超脱于语言之外，独立、执着、客观而不受语言的描绘所左右？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语仍然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与野蛮的行径作托词。

哈罗德·品特^①

(一)

作为当今美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终生教授诺姆·乔姆斯基也在警惕地关注着英国剧作家品特所说的现象：语言被系统地用来遮掩、扭曲事实，从而服务于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及动辄诉诸暴力的外交政策。在乔姆斯基的政论著作中，形容词“Orwellian”(奥威尔风格的)出现的频率很高。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描写了一种“新语”，它以模棱两可、颠倒黑白为基本特征。乔姆斯基屡屡发现美国政治话语中奥威尔式的“新语”。比如，美国把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数百名战俘称为“敌方战斗人员”。这些数年前就放弃武装抵抗的中亚

穆斯林是名副其实的战俘,但是有了“敌方战斗人员”之名,他们就被美军强行剥夺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所规定的种种权利。

揭开“新语”的假面具,诊断并治疗语言的核心已染上的顽疾,这是乔姆斯基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事业。世有“无多言,多言多败”的古训,但是乔姆斯基早已置个人的得失与安危于不顾,直言无隐。这位洞察时务的不识时务者已 77 岁,著述之余仍时常发表演说,参加辩论,接受采访。他像中国古代的圣哲一样,忙于公共事务,不遑宁处。难怪 U2 乐队的主唱博诺把他称作“永不停息的叛逆者”^②。

奇怪的是,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享有巨大影响力的乔姆斯基在我国只为少数语言学家所知晓。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一起推出他的五部著作,堪称今年人文社科图书出版的一件大事。《恐怖主义文化》(1988)、《反思肯尼迪王朝——肯尼迪、越南和美国的政治文化》(1993)、《宣传与公共意识》(与戴维·巴萨米安合著,2001)、《海盗与君主——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1986,2002)和《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2004)基本上反映了作者政论的主要方面和他一以贯之的立场、渊博的学识、雄辩的风格。

(二)

乔姆斯基半个世纪前在语言学上的贡献对很多传统和新兴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都有重大的理论和

实用意义,据说人机对译系统的开发也得益于他的学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就被普遍认可。在由弗兰克·克莫德主持的“冯塔纳现代大师”系列里就收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约翰·莱恩斯撰写的《乔姆斯基》(1970),这套丛书介绍的“大师”包括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不必说,乔姆斯基在这批现代思想家里是最年轻的。

那么,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是不是与他的政论著作(例如这五本书)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我倾向于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要准确介绍他的语言理论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看他与当时流行美国的行为主义者的差别。乔姆斯基划时代的《句法结构》问世那年(1957),美国行为主义者、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 1904—1990)发表《言语行为》一书。乔姆斯基写了言辞激烈的负面书评。斯金纳当时是哈佛的知名教授,乔姆斯基虽有天才之名,毕竟只是麻省理工的一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教员。斯金纳相信,人的行为可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程序操控,即使是知识的获得,也可由所谓的“学习机”的强化和奖励机制来主导;人与动物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经训练后连鸽子也能打乒乓球),人类自由、尊严之类的语言无助于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基于这种信念,斯金纳把语言行为也解释成对环境或外部刺激的机械反应。然而乔姆斯基把人的语言能力视为心智天生具有创造活力的象征。婴儿的心智在学说话的时候并不是白板一块,因此他(她)不简单重复,创新是他(她)的固有天性,这就是人的本质。行为主义者以科

学的名义贬低人性,驳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他们眼中的心智没有独立性可言,它不是被动的容器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狗。乔姆斯基始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赞赏的是笛卡儿和洪堡的语言观,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潜能,使这种潜能不受拘碍地发展是社会和教育的长期目标。

对行为主义语言观的批判也许使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中某种无所不在的权势力量特别警觉,这股力量靠语言符号控制美国人的思想感情,犹如斯金纳的激励机制训练他的乖乖的动物。美国意识形态的大氛围是不是会像斯金纳设计的护理婴儿的空调柜子那样无微不至地养育并决定美国民众的好恶?

越南战争和美国主流媒体为之正名的宣传更使乔姆斯基意识到,美国普通百姓知道的信息有限,他们掌握的“事实”是经人选择、描述的,于是久处“一张用谎言织就的大网”而不自知,稍稍受到一点点拨和刺激,他们就会作出预料中的理想反应。在冷战、古巴导弹危机和越战过程中,这种旨在操纵人们思想的“新语”都在积极运作。但民众一旦觉醒,也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美国国内的各种反战活动是最好的证明。1967年,乔姆斯基因参加向五角大楼进军被警察拘留,一同被临时关押的是小说家诺曼·梅勒。参与反战的经历触发了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兴趣。《美国权力与新官僚》(1969)和《对亚洲作战》(1970)两本书预示了美国社会一位古代以色列国耶利米式的批判者的诞生。

1970年,罗素逝世。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纪念本院这位杰

出的学生和院士,决定设立罗素讲座并推选乔姆斯基为首位演讲人。罗素晚年发起禁止核武器运动,反对越南战争,他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可以断定,乔姆斯基得到这一荣誉的原因是剑桥学者在他上述两部政论著作中看到 he 继承了罗素和平主义的精神。这次演讲名为《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分两部分,分别为“论解释世界”和“论改造世界”。乔姆斯基说的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就是他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说出真理,戳穿谎言。”在演讲涉及越南战争的部分,乔姆斯基提到“东京湾事件”纯系捏造,这一指控已为 2005 年 10 月 31 日的《纽约时报》证实。^③

(三)

乔姆斯基是出生于美国的犹太裔,父亲是美国颇知名的希伯来语学者。乔姆斯基研究语言学,也算是克绍箕裘了。年轻时乔姆斯基曾在以色列生活学习,他从来未曾因自己的族裔原因而放弃对以色列强硬外交政策的批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方面对巴勒斯坦都是一味袒护。他指出“以一巴冲突”这种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应改为“美/以一巴冲突”。以色列始终以美国为后援(或者说美国外交由犹太院外游说集团所左右),中东和平迟迟不能实现就是因为美以联合起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乔姆斯基的《致命的三角: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是了解中东问题缘起的必读书,也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犹太民族确曾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但令乔姆斯基失望的是,当一些

犹太移民到达巴勒斯坦,成为不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时,种族主义就在他们中间大行其道。很多犹太裔人士(包括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同胞在巴勒斯坦欺压本土阿拉伯人的行为是痛心的,以色列修正学派史学家、海法大学的伊兰·帕泼博士的新著《现代巴勒斯坦史:一块土地,两种人民》(2004)试图从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立国前后的历史,这表明以色列国内也存在批评政府的声音。在《霸权还是生存》一书里乔姆斯基简略地谈到以巴和平进程。他强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说阿拉法特)在压力下不断作出违反巴勒斯坦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让步。当乔姆斯基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时他引用的是来自以色列学界和政界的观点。例如:以色列史学家、后来继列维任以色列外长的什洛莫·本-阿米的话道出实质:“实际上,奥斯陆协议建立在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方的生活永远依赖于另一方的基础上。”乔姆斯基把这种彻底处于依附状况的“巴勒斯坦国”比为南非在实行种族隔离时期政府为黑人族群圈定的“班图斯坦”(黑人家园)。令人遗憾的是以往中国读者只是从美国主流媒体的角度来看这协议,仿佛它是外交解决的典范。

既然提到乔姆斯基严厉批评以色列,还得一提 2005 年 11 月 29 日乔姆斯基和哈佛法学院讲席教授艾伦·德肖维兹就中东和平进程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的公开辩论。如果有人以为乔姆斯基在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上只是业余水平,真正的专家不会重视他的论证,^④那就大大地错了。这位德肖维兹是美国的明星学者律师(曾为辛普森辩护),他的《为以色列一辩》(2003)一书竭力以律师的语

言解释以色列的所作所为^⑤，在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学者中已很难找出比德肖维兹更能言善辩的斗士了。我相信，乔姆斯基敢于就他曾讨论过的议题（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美洲的战争与和平等）与美国有关领域的任何“职业选手”辩论。对纷繁复杂的细节的透彻了解，对各类原始材料的驾驭引用，再加上严密的逻辑和敏锐的识别力，所有这些使他成为被他批评为“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可畏而又可敬的对手。

（四）

有一种宣传是标语口号式的，目的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宣传者强聒不舍，效果恰得其反。另一种宣传作用于无形之中（说得肯定一点就是“润物细无声”），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宣传”的名号。美国多游说集团和公关公司，它们为了取得实效非得小心翼翼地隐瞒真正意图，也不让有些话题背后的推动者露出马脚。一些对所谓“事实”的讨论后面往往潜藏着利益。政府为推动某一政策也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一般不命令受众全盘接受，有关部门会通过隐匿的权力网的徐徐引导之手“制造赞同”。^⑥问题的形成、它之所以被提出来公开讨论，其根源并不是澄澈透明的。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一实例来了解乔姆斯基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揭露所谓“事实”背后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上世纪末，美国媒体不断传来消息：建立于30年代“市场失灵”

期的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破产,政界人物也提出雄心勃勃的拯救计划。该体系的基金管理人预测,到2032年,基金将严重不足,工人保障金只能拿到应得数额的四分之三。乔姆斯基坦然说道,要预测今后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几乎是开玩笑,发出警报的人所依赖的数字本身并不可靠。基金管理者假定的美国今后经济年增长率为1.7%,这数字远远低于近二十年来的平均水平。它居然会被用来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像是别有用心。乔姆斯基乐观预言,将来的美国工资和社会保障税款都将有可观的增长(这已被证实)。“狼来了”的呼声之所以出现,乃因基金管理人和金融资本家想把这笔巨款投入股市,它将成为华尔街的财源。当时投资股市的收益要比购买政府国债高。但乔姆斯基反对把社保基金用来投机冒险。他坚持,如何管好基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反之,它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互相扶助,团结一致。如基金真的遇到麻烦,调高甚至不设社保基金征税最高限额(当时为72600元,年收入中高于此数的部分不必付社保税),就可解决。乔姆斯基作这番分析时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正在疯涨,第二年股市急转直下,当时若动用社保基金购买股票,美国中下阶层受害最大。预言危机者实际上想把美国的公共事业私有化,他们先要说这些事业机能失常,然后交给私营企业去管理。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和媒体对国际问题的报道、评论时,乔姆斯基不断显示出类似的犀利眼光。

我国的拉美研究是较薄弱的,对墨西哥以南、哥伦比亚以北的与我国尚未建交的中美洲各国(有的被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历史文化

与政治我们更是所知不多。乔姆斯基的这几部作品（特别是《恐怖主义文化》）中牵涉中美洲的内容很多，对我们的帮助不言而喻。上世纪80年代，欧美知识分子对中美洲政局议论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甚至还是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奥特加总统的朋友。

1979年7月，独裁统治尼加拉瓜多年的索摩查家族被推翻，美国担心根据门罗主义早被圈定为自家后园的拉美会继古巴之后再出现一个左翼政权，于是就突然对尼加拉瓜的人权与民主状况深表关切。后来美国国会竟直接干预尼加拉瓜内政，表决通过支持该国反政府军的法案，其内容几乎与宣战相去无几。反政府军在美国支持下袭击教育设施和农场，桑地诺政权的社会建设规划无法正常付诸实施。美国一次次制造紧张局势和冲突，但是罪魁祸首总是有碍于它实现霸权的一方。1984年，美国以桑地诺政权拒绝签署孔塔多拉集团诸国提出的和解协议为由，要求欧共体各国向尼加拉瓜施压。不料尼政府出其不意地接受协议，美国羞怒交加，立即另找借口展开新一轮宣传攻势。此事个中细节读来虽然有趣，传达出来的信息却让人寒心：美国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感兴趣。1986年年底，“伊朗门”事件浮出水面，致使里根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出丑（但在美国国内，诺思上校成了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翌年8月5日，亦即国会伊朗门事件听证会结束两天后，里根政府抛出中美洲“和平方案”，以此作为次日召开的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指导性文件。方案要求尼加拉瓜改变政治制度，交战双方都停止输入武器。乔姆斯基如此评

论这一方案：

尼加拉瓜想要接受这些条件，美国就可以很方便地对它是否遵守协定进行监控。此外，华盛顿还能轻而易举地编造出尼加拉瓜不遵守协议的罪名，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过去常常如此。……相反，里根政府对协议是否遵守则完全无从验证……因此，尼加拉瓜应该解除武装、受到严厉制裁；而美国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继续甚至加紧对尼加拉瓜的进攻，不必理会协议有什么规定；实际上，这个协议只要求尼加拉瓜一方遵守。^⑦

幸好这方案在首脑会议上未获通过，但乔姆斯基上面这番经验之谈何其准确地概括了美国将国际条约服务于本国利益的手段。其实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迪安·艾奇逊早就在对美国国际法学会发表演讲时明言，涉及美国利益的时候，合法与否的问题便不复存在，美国的行动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与限制。也许在艾奇逊说这番话的时候美国还需要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精心制作合法性的幌子，近年来则是对外界的反应毫不在意，何时何地使用武力，尽由美国自由选择。乔姆斯基不无感叹地写道，正是通过赤裸裸的炫耀武力，或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没有防御能力的敌人，美国尝到并迷恋上做“人类的老爷”^⑧的甜头：

悲惨的事实是高压发挥了作用；那些向他们的伙伴施以暴行的人获得了服从，从服从中获得了多重好处，如金钱、货物、顺

从以及获得愉悦的权利，凡此种种皆非较为弱势的民族所能享有。

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制裁同样残暴不仁。为了更易一国合法政权，“解放”所谓受压迫的人民，先对该国实行严厉制裁，借饥饿和疾病之手夺去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妇孺的生命，然后将一切灾难归罪于受害国政府及其政策。乔姆斯基追溯了这一符合所谓“法律程序”的毒计的渊源，发现早年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和后来的美国人清除印第安人的手法也讲“人道”。《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写道，美国人“以非凡的巧妙手段，冷静地、仁慈地、在不流血和不违反世人眼中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的情况下”，完成了西班牙人未竟的事业：完全剥夺印第安人的权利，灭绝印第安种族。实际上对印第安人的镇压、征服要比托克维尔所知道的血腥得多，当今的美国史学界已无意为自己国家与生俱来的污点遮遮掩掩。

（五）

比较或对比，这是乔姆斯基在批判美国外交政策中用得特别频繁的方法。他会将两次事件突兀地并列，让读者意识到两者如此类似，然后指出美国政府或舆论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1918年1月，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议会，为此受到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的责难；同年几个月之后，占领海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解散

了海地的国民大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上一些以色列运动员被绑架后惨遭杀害,这次恐怖行为受到广泛的谴责,最近还有电影强化人们的记忆;1976年10月,一架古巴客机在飞行时被恐怖分子安置的炸弹炸毁,机上73人罹难,其中包括获奥运金牌的古巴击剑队全体队员,此事已被人们扔入记忆的空洞。在80年代,波兰一宗教界人士被暗杀,美国不依不饶,波兰政府严惩凶手;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广受教民爱戴的罗梅洛大主教被害(1980年),六位耶稣会教士遭暗杀(1989年),美国不加顾问,歹徒逍遥法外。胜利的人侵者追究萨达姆部下使用毒气的责任;美国自己在越南打了一场化学战,橙剂、脱叶剂的大量使用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并致使很多婴儿畸形;英国于1919年入侵阿富汗时,国防大臣丘吉尔下令使用毒气,在阿富汗人中“散布活生生的恐怖”,借此“迅速结束前线普遍的无序状态”。这样的比较事例,乔姆斯基可以举出很多。现在的国际社会对非法入侵和占领已经习以为常。乔姆斯基指出,如果三十年代的国联默认德国的侵略,我们就会谴责可耻的绥靖政策。易位思维导致惊人的结论:“如果日本法西斯能够虚伪到我们这种程度,他们就会说自己袭击珍珠港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强迫美国纠正国内罪恶的种族主义现象,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真正的民主。”

对类似的问题持不同的态度,这是美国实施双重标准吗?乔姆斯基告诉我们,其实美国有多重标准,所有标准自始至终都为一个宗旨服务:谋求美国利益(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年初的《告别演说》里提醒美国人警惕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利益)的最大化。

使他感触尤深的是美国媒体紧密配合政府,实行自我审查十分积极。长期以来,美国媒体热衷于制造“威胁论”,引起民众恐慌,这或许是维持政府权威的良策。乔姆斯基写道:“白宫只要打个响指,全国的媒体就立即上蹿下跳,狺狺狂吠。”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时常利用媒体“制造共识”,从而赢得大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⑨

美国式宣传的成功来自精心培养的民众心中的“必要的幻想”和“情绪上十分有效的过分简单化”。美国政策往往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这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不能回避的事实。1987年,英国《卫报》驻华盛顿记者布鲁默在评前面提及的美国版中美洲和平方案时说:“全世界都认为里根提出这个方案完全是为了拆美洲各国和平努力的台,惟独美国国内对这个方案推崇备至。这实在让人大感惊诧。”这几本书中有很多分析美国媒体、揭穿美国宣传的内容。乔姆斯基研究媒体的著作还有《媒体控制》、《必要的幻觉》和《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⑩。

尽管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洗脑功能极其警觉,他自己仍不免受害。美国宣传的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例如他在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文章里警告,萨达姆掌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战后将被卖到非正规武器市场,而伊拉克的“核设施”会在战争中遭到抢劫。这些反战理由的前提无意中默认了美国的指控:伊拉克确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了对联合国有关规定的实质性违反。这样一来,美国政府为发动侵略而作出的无端指责反而得到认可。乔姆斯基心目中的萨达姆是美国媒体描绘的萨达姆。根据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性调查报告,伊

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该问的问题是：如果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为维护本国人民最大的利益履行承诺，切实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文件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官员一次次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交代了相关的各种细节，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伊拉克实施的旷日持久的制裁有何合法性可言？

近十几年来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演示了“窃钩窃国”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丛林法则如何不折不扣地贯彻，在这过程中，国际组织也常为强权提供方便。在《海盗与君主》的1986年初版序言里，乔姆斯基转述了一个故事，其主旨与这两条中国成语十分相似。亚历山大大帝曾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说：“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反驳道：“你凭什么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条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被尊为君主。”强权即公理，所以恶人、战犯都是被打败的。只有崇拜权力和胜利的人才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失道多助、得道寡助的事例绝非鲜见。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是一个现实，在他所制定的整体秩序框架里不失尊严地生活还是可以容忍，当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非凡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征讨波斯人的军旗上点缀起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迷人符号，世人不免感到自己的智力受到侮辱，也会挺身而出，好意劝说：“这又何必？”上帝之友来到为战火所蹂躏的别国领土，向当地那些无法正常生活的居民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终获“自由”。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当仁不让地纠正道：“没有机会的自由是魔鬼的礼物。”

(六)

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超级大国,乔姆斯基的这套书将大大加深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同时又提升我们与美国对话的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往我们经常凭一些简单概念、抽象名词来为一个国家定性。说到美国,我们想到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经济”之类空洞无用的套话。其实美国国家政府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乔姆斯基在六十年代末的科研项目大都是为国防部做的,实验室经费来自三个军工部门,而且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预算的90%来自五角大楼。后来,随着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在预算中比例的扩大,名为私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际上成了政府(或公共)机构。国家主导了美国的研究开发系统,那些富有开创性、风险高而且又不会带来直接商业回报的研究领域都在使用国家的资助。计算机、卫星、晶体管都先由公共部门开发,然后转交私人企业。假如研究没有经济回报可言,那么它的成本和风险是社会化的,亦即由纳税人大家来承担。如果研究取得成功,国家机构就会把成果转让给私营公司开发,收益是私有化的。乔姆斯基因此称美国为“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阅读乔姆斯基,我们也得知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绝非始于中国纺织品冲击美国市场之时。里根经济学是所谓放任自由的经济学,然而乔姆斯基指出吊诡的真理:里根政府是最反对市场自主作用的政

府。为挽救本国工业，里根政府大大增高贸易壁垒，市场并未充分向外开放。正是这些措施防止价廉物美的日本产品一拥而入，冲垮美国工业基础。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社会上却流行“消费者选择”一说。也许是出于远见，里根政府一面限制进口，一面将公共资金注入工业和高科技，取得惊人成就，因特网开发的费用最初也由政府提供^①。近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商业活动的干预更无所顾忌，中海油和迪拜港口公司海外业务受控就是明显的例子。

乔姆斯基和他的挚友爱德华·萨义德一样，用战斗性的修辞和不屈不挠的博学对美国的权势中心发出愤怒的声音。但是作为教师、同事和朋友，他却是和蔼温良之人。罗素曾描写的理想的世界也是乔姆斯基追求的目标。那是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创造的精神生机勃勃，“生活是一次充满乐趣和希望的冒险，其基础不是占有欲和控制欲，而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冲动”。这位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也是孜孜不倦的知识和情感的养育者，不少中国学生曾受他亲炙。乔姆斯基相信人类文明的基石是同情、团结和互助，因此激烈反对学校和社会灌输并崇尚竞争意识。他认为争强好胜是社会刺激的结果，而非人的天性。他曾说教育体系不应建立在优良差的分级制度上，这是“极端反社会行为的训练方法”。如果连小学也要以公布考试分数的形式来激励学生，那更是一种野蛮的措施。他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教育制度暗中鼓励幸灾乐祸的心态，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欣赏别人的成就，只喜欢看到别人被比下去，他们相互之间也无法精诚合作。

这种教育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理想不正是他一切政论的出发点吗？

2006年3月15日写毕于东夷小舍

永不停息的叛逆者——代序

- ① 摘自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于1990年5月31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所作的演讲《啊，超人》。该文即将在《世界文学》2006年第3期发表，译者肖静。
- ② 英文是“Rebel without a pause”，由詹姆斯·迪恩主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直译是没有原因或事业的叛逆者)演变而来。
- ③ 《有关知识与自由的问题》(纽约万神殿书局，1971)，第103页。正是这“东京湾事件”导致越战全面升级。乔姆斯基在后来的论著中一次次指出美国发动侵略或实施轰炸的借口都是编造的，即使谎言被戳穿，当局还是若无其事。他引用塔西陀的名言：“罪行一旦被揭露就无所遁形，惟有厚颜无耻。”
- ④ 萨义德曾就此抨击美国那些所谓的“专家”。见《论知识分子》(三联，2002)中关于业余精神的部分。
- ⑤ 美国史学家芬克尔斯坦在《超越无耻》(2005)一书中暗示德肖维兹的著作涉嫌剽窃。
- ⑥ 这是由著名新闻工作者、作家李普曼首先提出来的，也可译成“制

造共识”。

- ⑦ 《恐怖主义文化》，第 15 页。此前（尼加拉瓜 1984 年选举后），美国媒体曾炒作米格战斗机进驻尼加拉瓜的虚假消息。美国对国际协议的态度让我想到拉·封丹寓言诗《褙褙》（远方译）：

对人家，我们的眼睛像野猫，
对自己，我们的目光象鼯鼠。
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对别人却毫无宽恕。
看自己是一种眼光，对别人则是另一样。

最近的所谓“伊朗危机”反而提醒世人注意美国自己是否遵守《核不扩散条约》。

- ⑧ 英国 18 世纪作家哥尔德斯密斯诗作《漫游者》中用语。英国史学家基也南一部出版于 1969 年的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也以此为名。
- ⑨ 在伊拉克受制裁的时期，美国媒体上登载了大量虚构的有关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
- ⑩ 这本书系与爱德华·S·赫尔曼合著，1988 年出版。书中的个案研究写得透彻精湛。赫尔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全美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教授，他还与乔姆斯基合写了《人权的政治经济学》（1979）。他在二十几年前就研究“恐怖主义问题”，著有《真正的恐怖网络：事实上的和宣传中的恐怖主义》（1982）。2005 年 9 月他在《Z 杂志》上发表文章《伊朗“危机”：侵略的前奏》，很值得一读。美国全方位的跨国宣传的效果也十分惊人，详见谢·卡拉-穆

尔扎著《论意识操纵》(2000年),中译本于2004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 ⑪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1969年建ARPA网,后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类似的NSF网,采用了ARPA的一些关键技术,建立因特网,并负责维护网络主干网。



1986年初版序言

圣·奥古斯丁讲过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曾经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反驳道：“你凭什么敢横行世界？就因为我只有一艘小船，人们骂我是贼。但是因为你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你被尊为君主。”

圣·奥古斯丁评论海盗的回答“巧妙而精彩”，它在某种程度上准确地抓住了当前美国和国际恐怖主义舞台上一些次要角色之间的关系，包括利比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各派别以及其他类似的国家和组织。推而广之，圣·奥古斯丁的寓言阐释了当代西方概念中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含义，并且以极具讽刺的方式直指这种在对待恐怖主义事件——那些被挑选出来的正策划中的恐怖主义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癫狂态度的本质，这种癫狂只是西方暴力的一种掩饰。

“恐怖主义”这一术语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主要指的是政府为确保民众顺从所采取的暴力行为。仅就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它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实施者并无大用，因为他们掌握权力，处于能够控制思想和言论体系的地位。因此，这一最初的含义已经被废弃了，“恐怖主义”开始被主要用于指由个人或团体所从事的“小恐怖主义”。^①* 原先这一术语被用于指那些残害自己国民和整个世界的君主，而现在它被局限于指那些骚扰当权者的盗贼，当然这种限制也并不完全，它

* 原文用“wholesome terrorism”和“retail terrorism”分别指代君主和海盗的恐怖主义，本书中意译为“大恐怖主义”和“小恐怖主义”，下文同。——译者

仍然可以被用来形容敌对的君主，它的范围可以根据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进行变换。

让我们从这些用法中抽身出来，我们使用“恐怖主义”这个术语，指的是那些威胁使用武力或真正运用武力去恐吓或强迫的行为（一般是出于政治、宗教和其他类似的目的），不管它是君主还是盗贼的恐怖主义。

海盗的寓言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国际恐怖主义”概念的最新演变，因此有必要加入第二个特点：只有当一种恐怖主义行为是由“对方”，而不是我方所犯下的时候，它才被包括到恐怖主义的标准之中。这一点正是里根政府上台后发动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公关运动的指导原则。它有赖于学术研究的主张，通过显示这样一个所谓的事实，即恐怖主义并不“针对苏联或是任何一个苏联的卫星国或是代理人”，而是“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民主或是相对民主的国家”，以此证明恐怖主义的瘟疫是“苏联唆使”的工具，其目的是“破坏西方民主社会的稳定”。^②

这一论点是正确的，事实上根据定义来说它是正确的，如果“恐怖主义”这一术语是被君主和他身边的人来使用的话。既然只有“他方”所犯下的行为才被算做是恐怖主义，那么随之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事实如何，这种说法必然是正确的。在现实世界中，事实则与此大不相同。过去数十年中国际恐怖主义^③的主要受害者是古巴人、中美洲人和黎巴嫩人，但是根据定义，这些都不算数。当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难民营，杀害平民，甚至经常连“报复”的借口也没有的时候，或是以色

列派部队进入黎巴嫩村庄发动“反恐”行动的时候,他们在其中进行谋杀和破坏,或是劫持船只,将数以百计的人质关进条件极其恐怖的监狱之中,凡此种种,皆非“恐怖主义”。实际上,稀少的抗议声遭到上述原则的忠实追随者的强烈谴责,被斥之为“反犹主义”和“双重标准”,表明他们未能加入到赞美“一个关注人权的国家”(《华盛顿邮报》语)的合唱中,这个国家“崇高的道德目标”(《时代周刊》语)是永不休止的敬畏和赞美的对象,根据推崇者的说法,它“遵循更高的道德法则,正如记者们为它所阐释的那样”(沃尔特·古德曼语)。^④

与此相类似的是,以下行动也不是恐怖主义,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的准军事部队从美国基地出发,炮轰古巴的宾馆,击沉渔船,在古巴港口攻击苏联船只,对庄稼和牲畜下毒,试图暗杀卡斯特罗等,在其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几乎每周都发生。^⑤这些行动和其他许多类似的行动都是属于君主及其代理人这边的,因此不是会议和学术著作讨论的对象,也不是媒体和杂志舆论尖锐评论和攻击的对象。

为君主及其仆从所设的标准在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他们的恐怖主义行为被排除在正统标准之外。第二,针对他们的恐怖主义被认为极端严重,甚至需要采用暴力来进行“自卫以防止未来的袭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点。然而,他们对别人发动的程度差不多或是更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则不应该受到报复或是预防性的行动。如果对方确实反击了,这种反击将引发暴怒和更为可怕的反应。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是如此无足轻重,几乎不需要报道,当然更不用被人记住。假设一下,如果利比亚海军的一支部队对以色列

海法港的三艘美国船只发动袭击,使用东德造导弹击沉其中一艘,击伤其他两艘,美国的反应根本无需加以推测。转向真实世界,1986年6月5日,“一支南非海军部队在安哥拉南部港口纳米贝袭击了三艘俄罗斯船只,击沉其中一艘”,使用的是“以色列造蝎子(即迦伯列)反舰导弹”。^⑥

如果苏联对这种针对商业海运的恐怖主义袭击行为进行反击的话,就如同美国在类似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并且使用美国和以色列的“报复”标准来衡量的话,约翰内斯堡可能会在空袭中化为灰烬。美国完全有可能考虑将核打击作为合法的报复手段去对付共产主义魔鬼。在现实世界中,苏联并没有还击,这些事件被认为是如此的无足轻重,以至于美国的媒体几乎没有提及。^⑦

假设这样一个情景:古巴在1976年末出于反恐自卫的需要入侵委内瑞拉,其目的是在那里建立一个由受它控制的势力组织起来的“新秩序”。在它违反停火协议占领首都加拉加斯期间,打死了操作一个对空防御系统的200名美国人,猛烈轰炸并最终占领美国大使馆达数日之久。^⑧再回到现实世界,1982年以色列以保护加利利地区免受恐怖主义袭击为借口(这是为美国听众编造出来的,正如内部所默认的那样)进攻黎巴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由以色列控制的势力所组织的“新秩序”。在它违反停火协议占领西贝鲁特期间,打死了操作一个对空防御系统的200名俄国人,猛烈轰炸并最终占领了苏联大使馆两天。这些事实只是偶尔在美国国内得到报道,而且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关键的背景被忽略或是加以否认。幸运的是,苏联没有作出反应,否

则我们今天可能无法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面对同样的挑衅和暴力行为,苏联和其他的官方敌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无防御能力)将平静地忍受,而君主及其仆从会在言语上和军事上作出狂暴的反应。

上述和其他不可胜数的事例显示了这种令人震惊的伪善行径(有些例子下面还要讨论),而这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恐怖主义。试举另一不同的例子,考虑一下二战中的各项协议,它们将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分配给了几个同盟国,并呼吁在特定的时候撤军。西方对于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极其愤慨(事实上确实令人愤慨),而事实上苏联这些行为是跟着美国干的,模仿它在那些根据战时协议分配给西方控制的地区(意大利、希腊、韩国等等)的所作所为;西方对苏联拖延从伊朗北部撤军表示愤慨,但同时美国违反了战时协议,没有从葡萄牙、冰岛、格陵兰岛和其他地区撤军,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争辩,并得到美国国务院附和的那样,其根据是,“军事上的考虑”使这种撤军“不可取”。但是,西方过去没有而且直到今天也没有对如下事实表示过愤慨,这些事实包括:西德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被置于莱因哈德·格伦的控制之下,而正是此人在东欧为纳粹实施过类似的行动;或是中央情报局提供人员和补给,帮助那些受到希特勒鼓舞的军队在东欧和乌克兰作战,最晚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此作为由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文件(1950年4月)确定为官方的“推回战略”(Roll-back strategy)的一部分。^⑨如果苏联帮助那些受到希特勒鼓舞的军队在1952年在落基山脉作战,可能会招致完全不同

的反应。^⑩

事例举不胜举,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例之一是1973年关于越南的巴黎协定和它的后续事件。它经常被提出来作为一种终极证明,证明共产主义国家不可信赖,它们不遵守协议。但是真相是,美国一度声明,它将拒绝接受被迫签订的协议上的任一条款,美国随后也这么做了。然而媒体表现出一种超出常理的奴性,将美国版本的条约(违反了所有的基本条款)接受为实际的文本,所以美国的违约反而是与条约“保持一致”,而共产主义国家对这种违约的反应却证明了他们天生的背信弃义。美国现在经常将这一事例作为一种正当依据,反对在中美洲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这证明了一个良好运作的宣传体系的用处。^⑪

如前所述,在里根1981年上台后,“国际恐怖主义”(根据特定的西方含义)被里根政府置于大众关注的中心焦点。^⑫其中的原因并不难被分辨出来,虽然这些原因不仅过去没有,而且现在依然不能在这个教条体系内被表述出来。

里根政府致力于推行三个相互关联的政策,并且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一、将资源从穷人处转移到富人处。二、以传统方式大规模增加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其途径是借助五角大楼系统,迫使公众通过政府保护下的生产高科技“无用之物”的市场资助高科技产业,从而为公共补贴计划和被称之为“自由企业”的私人利润作出贡献。三、大幅增加美国的干涉、颠覆和国际恐怖主义(根据字面意思理解)行动。这些政策不能将它们的真正目的展示给公众,我们出于自卫必

须对付一些妖魔,只有当这些妖魔恰好吓唬住普通民众的时候,这些政策才能得以贯彻。

通常的做法是总统发出呼吁,以对付他所谓的致力于征服世界的“无情的整体阴谋”所带来的威胁。肯尼迪总统发起类似计划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⑬里根总统则提到“邪恶帝国”的威胁。但是与帝国对抗是件危险的事情,而与那些被指定为是邪恶帝国代理人并且没有防御能力的敌人战斗则要安全得多。这种选择很好地遵守了里根议程上的第三条安排,之所以追求这一条是出于一些比较独立的原因,即确保华盛顿治下的全球领域内的“稳定”和“秩序”。下述“恐怖主义”是较为容易对付的对象,它们或是由海盗所发动的,而这些海盗是经过适当挑选的;或是由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农民之流的敌人发动的,他们胆敢出于自卫而反抗国际恐怖主义的攻击。并且,此类“恐怖主义”可以通过一套有效运作的宣传体系被加以利用,以在国内民众中恰到好处地诱导出一种恐惧和动员的气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取代人权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灵魂”。人权作为一种运动的组成部分曾经获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运动旨在逆转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道德和知识界风气上的令人瞩目的进步,而这种进步被冠之以“越南综合征”;这种运动还旨在克服可怕的“民主危机”,它爆发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当时民众中很大一部分开始被组织起来,以进行政治行动,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即精英决策、人民认可的体系受到了威胁。^⑭

在下文中,我将关注现实世界中的国际恐怖主义,将注意力主要

集中在地中海地区。根据美联社的民意测验，“中东/地中海恐怖主义”被编辑和播音员们，主要是美国的编辑和播音员们选为1985年的头条新闻。而这项测验是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于12月遭袭击之前进行的，这两项袭击足以打消原来还存在的一些怀疑。^⑤在1986年的前几个月，对中东/地中海恐怖主义的担忧达到了高潮，其顶峰是美国4月对利比亚的轰炸。官方的说法是，这一旨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首要从事者的勇敢行动实现了其目标。卡扎菲和其他主要的犯罪分子现在龟缩在他们的碉堡中，被捍卫人权和尊严的勇士制服了。然而，尽管对黑暗力量取得了伟大胜利，发源于中东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保卫文明社会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对此作出的适当反应仍然是一个被关注和讨论的首要问题，而这从不胜枚举的书籍、会议、文章、社论和电视评论中获得例证。就可以接触到的任何普通大众或是精英群体而言，这些讨论都严格地遵守了上述刚刚阐释过的原则：注意力被局限在盗贼的恐怖主义上，而不是君主及其代理人的恐怖主义。局限在他们的罪行上，而非我们的罪行。但是我将不遵守这一规矩。



2002 年版导言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暴行,其影响是如此地压倒一切,以至于刚才给出的证明成为多余的,“9·11”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得到普遍认同的是,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变化,这个时代就是“恐怖的时代”。毫无疑问,“9·11”将在恐怖主义的大事记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尽管我们应该仔细思考究竟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任何熟悉过去和当前历史的人都知道,令人遗憾的是,其原因并不在于这些罪行的程度,而在于对无辜的受害者的选择。未来的后果将会怎样,主要取决于富人和强者如何解读这种引人瞩目的示威行为,即那些他们经常加诸于他人之上的罪行,他们自身同样无法再免受其害;未来的后果将会怎样,同样取决于他们选择以何种方式作出反应。

在此种联系上,考虑以下诸因素是有益的。(1)“恐怖的时代”并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2)9月11日所宣布的“反恐战争”并不是一个创新,这种战争在最近的过去所进行的方式对今天并不是全无指导意义。

对于第一点而言,虽然没有人能够预测“9·11”这种特殊的暴行的形式,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发达工业世界很有可能丧失其对暴力近乎垄断的控制,人们对这一点早有了解。就在“9·11”之前,人们认识到,“一个经过周密计划的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走私进美国的行动至少有90%成功的可能性。”^①在当代的这些威胁中,包括“小型核武器”、“脏弹”以及各种各样的生物武器,将之付诸实施并不需要超常的技术熟练度或组织形式。并且,恐怖的来源很难加以鉴别,因

此难以对付。“9·11”以及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更为恐怖的“炭疽恐慌”发生9个月后，^②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对于“9·11”袭击的起源和策划仍然只是一些怀疑，基本上就是那些在开展调查之前曾经所作的一些猜测，虽然这一调查肯定是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次国际调查，但是他们承认，调查所获甚微。同样，虽然在调查上投入了巨大资源，尽管病毒的来源已经被锁定在美国国内的联邦实验室中，但是联邦调查局在鉴别发动炭疽恐怖的罪犯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转向第二点，重要的是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反恐战争”并不是由乔治·W·布什在9月11日宣布的，实际上它是被重新宣布了一次。这场战争是20年前由里根-老布什政府宣布的，使用的是类似的言辞，而占据显要位置的是同一批人。他们发誓要摘除这些会导致社会“回到中世纪野蛮状态”的“癌瘤”。他们找出了“恐怖主义邪恶之源”的两大中心：中美洲和中东/地中海地区。在当时那十年的外交政策问题中，旨在根除这两个地区的这一瘟疫的运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中美洲为例，这些运动很快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众动员。这种大众动员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并且在开展的运动中开创了新的局面。在美国介入印度支那半岛战事期间，正如先前西方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撒野那样，很少有人会想到去那里的一个村子中居住，去帮助那些受害者，并且通过他们的存在，为受害者提供某些最基本的保护，免受外国入侵者及其本土仆从之害。关于里根的“反恐战争”也有大量的文献，它在一些大众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这些运动追求对抗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但是这些文献基本上仍然不

在主流中被提及,因为根据一般的规矩,只有他人的罪行才可以被提起注意,并且引发热烈的谴责。下文大部分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探讨这一主题的文章,^③我相信,它们对当前的问题有重大意义。

华盛顿在中美洲对抗这一瘟疫的基地是洪都拉斯。在暴力最盛的那段时期内,主管其事的官员是约翰·内格罗蓬特大使,他在 2001 年获得小布什总统的任命,去领导这场在联合国被两度宣布为“反恐战争”的外交部门。在中东局势最残酷的时期,担任里根政府中东特使的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他领导着这场运动的新一阶段的军事部门。其他华盛顿的主要策划者也将他们在第一阶段的经验带到新的“反恐战争”中。

在这两个地区,里根政府犯下了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暴行,大大超过他们号称要对付的任何恐怖主义。在中东,远胜于其他的最严重的暴行可以追溯至美国和它在当地的代理人身上,他们留下了一连串的流血和毁灭事件,特别是在四分五裂的黎巴嫩社会中和处于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土地上。中美洲在华盛顿的恐怖主义指挥官及其走狗手上遭受了更为惨重的灾难。其中的一个目标是一个国家——尼加拉瓜。当一个国家遭受袭击之时,按照法律和庄严的条约的要求,它能够采取如下的行动:向国际各权力机构求助。国际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尼加拉瓜的判决,裁定美国“非法使用武力”和违反条约,命令华盛顿终止国际恐怖主义罪行,并作出实质性的补偿。美国轻蔑地拒绝了国际法院的裁决,其官方解释是其他国家并不与我们保持一致,因此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决定哪些事情处于我们“国内司法管辖”范围

内。在这个例子中,指的是针对尼加拉瓜的恐怖战争。在两党共同支持下,美国马上将这些罪行升级。尼加拉瓜上诉到安理会,但是美国否决了支持国际法院裁决和呼吁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决议,还单独投票(与一个或两个附庸国一起)反对联合国大会的类似决议。美国将袭击升级,损害了中美洲各国总统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的努力。当民众最终屈从之时,美国的媒体在承认采用了恐怖主义手段的同时,并不试图掩饰其狂喜,向世界告知,对此次“美国式的公平竞赛的胜利”,美国人正“团结在欢乐之中”(《纽约时报》语)。

在中美洲的其他地方,人民没有军队保护他们自己,因此,由美国以及其他参加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国家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军队所犯下的罪行也远比在尼加拉瓜要严重得多,而他们在尼加拉瓜所犯下的罪行就已经够恐怖的了。这些罪行的野蛮和残忍无法用言语形容,美国的战争在这些支离破碎的国家里造成了大约 20 万人的死亡和数百万的难民与孤儿。“反恐战争”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天主教教堂,由此犯下了滔天罪孽。教堂放弃了服务于权势和财势的传统作用,其主要部门转而采取了“偏向穷人的策略”。牧师、修女和义工努力将那些生活在悲惨境地的人们组织起来,以便他们能够部分掌握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们就成了必须被清除的“共产主义分子”。这一残酷的十年开始于对一名成为“沉默大众的声音”的保守派大主教的暗杀,终止于对 6 名耶稣会的主要知识分子的残忍谋杀。这两项罪行都是由华盛顿支持的代理人所犯下的,它们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华盛顿)那些负责此事的官员多少兴趣,甚至很少

有人知道那些被暗杀的知识分子的姓名。这与敌国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他们不仅仅是被监禁或是流放,而是脑袋被克里姆林宫培训和武装起来的特种部队炸掉,而这是所有可怕的恶行中最严重的一种,人们可以想象这些负责人的反应。

基本的事实是可以理解的。美洲学校*骄傲地宣称:“解放神学……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被击败了。”对它向雇佣国的军官们所提供的培训应该表示出很大的谢意。

“美国式公平竞赛的胜利”在一场生态灾难中留下了一路的残肢断臂和被毁灭的生命。当美国于1990年重新接管之后,尼加拉瓜沦为西半球仅次于海地的最穷困的国家。巧合的是,海地也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进行干预和动用暴力的首要目标,并且和古巴一道遭受着持久的、毁灭性的美国禁运。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

联合国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例如停止价格补贴,提高销售税的措施恶化了穷人的境况。在4个遭受旱灾的中美洲

* 美洲学校(The School of Americas)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以培训中美洲亲美势力军人的训练营。1946年,美国政府和军方为了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培植自己的势力,打着“帮助拉美和加勒比海各国军人实现职业化”的幌子在巴拿马组建了所谓的“美国陆军加勒比海训练中心”,招纳拉美和加勒比海各国军人到此接受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技能训练和“民主思想”灌输。1963年冷战达到顶峰的时期,美国政府为了加大在拉美各国和加勒比地区培植“冷战代理人”的力度,肯尼迪总统又提出了所谓的“发展联盟计划”,“美国陆军加勒比海训练中心”因此改名为“美洲学校”。1984年,美国和巴拿马政府签署了运河协议。根据协议内容,驻巴拿马美军机构陆续撤回美国本土,“美洲学校”因此被迫迁往佐治亚州哥伦布城附近的本宁堡陆军基地,但这并不妨碍它继续大规模“招收培训”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各国军人。迫于压力,现已改名为“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译者

国家,每年的社会支出仅为每人 100 美元,是拉丁美洲平均水平(也并不光彩)的六分之一。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星期(2002 年 6 月 11 日)在罗马召开的年度会议编写的统计数字表明,中美洲长期遭受饥饿的人口数在过去十年里几乎上升了三分之一,在 2 800 万人口中从 500 万上升到 640 万。^④

联合国的各个机构正在寻求补偿措施,“但是离开有效的土地改革,这些措施只能获得有限的影响”。可能会在土地改革和其他有利于绝大多数贫困者的措施方面发挥示范作用的大众组织被华盛顿的“反恐战争”有效地摧毁了。形式上的民主被建立起来,但是它影响的是理论家。在遍及这一半球所作的民意调查揭示,对民主的信心不断下降,部分是因为社会基础为了实现有效的民主而被摧毁,部分的原因很可能是伴随形式民主的机制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减少了民主参与的空间。

在对“将民主带到拉丁美洲”的计划进行回顾时,曾经为里根政府的“民主强化计划”服务过的托马斯·卡罗瑟斯总结道,这些政策是“真诚的”,但也是一种特殊的系统的“失败”。在受华盛顿影响最小的地区——南部的锥形地区,尽管里根政府努力进行阻止,但是成功依然是最大的。而在华盛顿影响最大的地方,成功反而最少。卡罗瑟斯总结其原因是因为华盛顿寻求维持“……相当不民主的社会的基本秩序”,以及避免“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寻求)只是有限的、自上而下式的民主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会产生颠覆传统

的权力结构的危险,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与这种权力结构结盟”。他驳斥了对这种方法的“自由主义批判”,因为它存在“永久的弱点”:没有提供可替代方案。允许人民在管理他们自身事务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的选择并未置于议事日程上。^⑤

在恐怖主义的主导文化中,除了策略上的考虑外,对“反恐战争”的罪行以及它们的后果的关注几乎不能被表达出来。这些事实被人权组织、教会和其他组织大量地报道出来,有时候甚至被媒体报道出来,但是绝大多数被无耻的辩护所打消。这种文化并没有教给我们什么是“反恐战争”。事情的大部分被从历史中割裂出来,甚至被欢呼为“我们时代民主胜利之启示”。(《新共和》语)随着有意义的民主和极度需要的改革被淹没在血泊中,整个地区倒退回早年的黑暗之中,那时候多数人在沉默中痛苦挣扎,而外国的投资者和“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结盟的传统权力结构”则越来越富有。

这种贯穿始终的反应对于目前流行的说法很有意义,借用黑格尔对下等人的比较文雅的说法,它认为受害者是“纯粹的物”,他们的生命“没有价值”。如果他们试图“抬起头来”,就必须用国际恐怖主义予以迎头痛击,国际恐怖主义将成为一种高尚的事业。如果他们在沉默中忍受,他们的苦难可以忽略不记。历史很少如此清晰地将教训教给我们。

尽管中美洲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其他的恐怖主义仍然在政策日程上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在击败了解放神学后,美国军队转向了新的任务。在西半球,海地和哥伦比亚成为关注的焦

点。在海地,贯穿整个 80 年代(就像以前一样)美国向海地的国家暴力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但是 1990 年出现了新问题,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海地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借助于过去在被人们忽视的贫民窟和农村地区开展的大规模的大众动员,一名民粹主义的牧师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民选政府很快被军事政变推翻。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默许支持下,政变集团马上恢复了残暴的恐怖活动,以摧毁大众组织。民选总统最终复职,但条件是他须遵循美国支持的候选人提出的严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名候选人在 1990 年的选举中赢得了 14% 的选票。海地沦入更悲惨的境地,然而华盛顿再次为它对自由、公正和民主的具有启示意义的奉献而欢呼。

对美国政策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哥伦比亚,以前那些可怕的罪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急剧上升,与一贯的模式相一致的是,哥伦比亚成为西半球接受美国武器和培训最多的受援国。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政治谋杀事件大约一天 10 起(根据哥伦比亚人权组织的统计,此后可能翻了一番),背井离乡的人数上升到 200 万,每年还以 30 多万的数字向上增长。美国国务院、兰德公司与人权组织一致认为,大约 75% 至 80% 的暴行是由军队和准军事化武装犯下的。后者是如此紧密地与军队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权观察”组织将它们称之为军队五个正规师之外的“第六师”。由这六个师所犯下的罪行的比例在整个十年中保持得相当持久,只是随着恐怖活动被私人化,暴力活动开始由军队向准军事组织转移。最近几年,塞尔维亚、印尼和其他恐怖主义国家采用了类似的手段,为他们的罪行寻找“看似可信的推诿的

理由”。美国采用了类似的技巧,将对暴行的训练和指导以及它的执行私人化,就如同在进行化学战的行动(“烟熏除虫”)中那样,这些行动在可笑的反毒品战的借口之下对农业社会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⑥这些行动正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私人军事公司(如 MPRI, Dynacorps)手中,它们受华盛顿资助,雇用美国的军官,这是一种很管用的方法,可以避开国会对直接卷入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有限监察。

在 1999 年,随着暴力的升级,哥伦比亚取代土耳其成为美国第一大军援接受国(经常性军援,对以色列-埃及的军援除外)。作为一个占据战略位置的盟友,土耳其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就接受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培训。但是当土耳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动了一场针对被残酷压迫的库尔德人的镇压运动时,这种援助急剧上涨。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升级,成为这个血腥 10 年最恶劣的一些罪行。普遍的酷刑,无法用言语表述的野蛮伴随着这些行动的执行过程,它们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从被毁灭的乡村中赶走,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剩下的人口被圈禁在一个虚拟的牢笼中,甚至连最基本的权利也被剥夺。^⑦随着国家恐怖主义的升级,美国对这些罪行的支持也在升级。克林顿向土耳其提供了 80% 的武器;仅仅 1997 年一年,美国-土耳其军火的交易量就超过了整个冷战时期到镇压运动开始之前的总和。^⑧

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在关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的大量评论中,最眼下并且是最相关的历史无人注意。对于以下这个事实,也无人表示过担忧。这个事实是,领导第二阶段的国家是惟一一个曾经因为搞

国际恐怖主义而被最高的国际权威机构谴责过的国家，正义同盟将一个引人瞩目的恐怖主义国家组合聚集在一起：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迫切地想加入其中，以便从发誓将邪恶赶出世界的全球领导人那里为他们自己的恐怖主义罪行获得授权。当把保护喀布尔免受恐怖主义的责任从一个恐怖主义国家(英国)手上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土耳其)手上时，没人表示惊讶。根据国务院和媒体的说法，土耳其之所以具备承担这一职位的资格是因为它在与恐怖主义作战方面具有“实际的经验”。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解释说，土耳其已经成为“华盛顿在新反恐战争上的关键盟友”。在最近几年，它“与恐怖分子的暴力进行了斗争”，“因而在帮助塑造旨在消灭这一威胁的新的全球努力中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⑨

正如所引的几个少数例子(例子不胜枚举)所证明的那样，在“反恐战争”两个阶段之间的这段时期，华盛顿在国家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中的作用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对它的反应也是如此。

正如整个“反恐战争”第一阶段所经历的情况一样，大量关于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最近的“功绩”的信息同样可以从主要的人权组织和其他高度可信的资源中获得。当这些国家希望讲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可资利用的故事的时候，他们追寻这些信息，但是在这里则明显并非如此。事实因此被忽略了，或者如果无法忽略，则被斥之为小缺陷或是我们正义道路上的一次粗心的方向偏离。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表演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有必要压制美国和它在土耳其、哥伦比亚、东帝汶、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友的作用，与此同时赞颂华

盛顿,因为它的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崇高的阶段”,具有“神圣的光辉”。那些“致力于结束非人道状态的理想主义新世界”的领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他们自己献身于“原则和价值”,热切地维护人权和自由。足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滚滚阿谀之词毫不脸红地倾泻而出,即使以下的事实也无法加以阻止:这批圣徒正是这十年来某些最恶劣罪行的关键参与者。这甚至会使乔纳森·斯威夫特式的人物也哑口无言。^⑩

“反恐战争”在中美洲第一阶段的成功被映射到人们关注的第二个主要地区:中东/地中海地区。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的难民营被美国支持的恐怖行动所摧毁,而黎巴嫩社会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大约2万人丧生在以色列1982年对黎巴嫩的人侵行动中,更多的人丧生在以色列国防军及其帮凶随后几年在占领黎巴嫩期间的暴行中,这种暴行伴随以色列间歇式的人侵。这些人侵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将成百上千的人赶离家园,使数百人丧生。黎巴嫩政府的报告称,1982年人侵之后,有25 000人被杀。正如以色列政府自己承认的那样(除了针对美国的宣传之外),这种自卫的借口很难取信于人。从头至尾,美国的支持是一贯和决定性的。

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恐怖和镇压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增加。以色列禁止在被占领土上进行发展,拿走了有价值的土地和许多资源,与此同时他们组织定居点项目,从而将本地居民置于孤立和无助的境地。这些计划和项目极其依赖于美国的军事、经济、外交和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这三十五年军事占领的早期，摩西·达扬——最同情巴勒斯坦人困境的以色列领导人之一——建议他内阁中的同僚们，以色列应该告诉巴勒斯坦人，他们将“活得像狗一样，谁愿意离开就可以离开。”^①类似于其他许多相似的举动一样，占领的特征就是对那些“阿拉伯佬”（类似“黑鬼”和“犹太佬”的蔑称）进行羞辱和贬低，用标准的术语来说，必须教会他们“抬不起头”。二十年前，当对早期定居者/以色列国防军进行的一次暴力活动进行回顾时，政治学家约拉姆·佩里悲哀地观察到，100万以色列年轻人中的四分之三从军队服役中学到了这点，即“军队的任务不仅是在战场上保卫国家，反抗外国军队，而且是摧毁无辜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上帝许给我们的土地上的阿拉伯佬”。因此那些“两条腿的畜生”（以色列总理贝京语）只会“像瓶子里服过药的蟑螂一样到处乱窜。”（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语）埃坦的上司阿里埃勒·沙龙在刚刚完成了对黎巴嫩的人侵和对萨布拉与沙提拉的大屠杀后，曾建议说，对付示威者的方法是“割掉他们的睾丸”。希伯来主流媒体曾报道过“以色列国防军和定居者在被占土地上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详细记录”。而这种记录曾经由政府要员，包括主要的鹰派人物递交给贝京总理。这些记录包括经常的羞辱举动，如强迫阿拉伯佬在另一个人身上小便或是排泄，或是强迫他们在地爬的同时高喊“以色列国万岁！”或是在地上舔，或是在大屠杀纪念日，在自己的手上写上数字“以纪念死亡集中营中的犹太人”。类似的行为一直使大部分以色列公众感到愤慨，在沙龙发动2002年4月的人侵期间，类似的行为再次发生，也使他们再次感到愤慨。

受人尊重的人权活动分子和法律专家雷亚·谢哈代(Raja Shehadah)二十年前这样写道,对于生活在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来说,选择甚少:“在类似的情况下生活,你必须时时抵御这样的双重诱惑:要么在一种麻木的绝望中对监狱看守的计划习以为常,要么在对监狱看守和作为囚犯的你自己的仇恨中变得疯狂。”其他的惟一选择是成为“萨米定”中的一员,即那些默默忍受、控制自己愤怒的人。

以色列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博阿兹·埃夫龙简洁地形容了占领的技巧:“用短皮带牵住他们,”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鞭子就在他们头上”。这比屠杀更有意义,因为这样的话,文明人才能“平静地接受这一点”并询问:“什么事这么恐怖?有人被杀了吗?”

埃夫龙尖刻的批评正中要害。它的准确性被反复地得到证明。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事件发生在2002年4月。那时沙龙犯下的最新的战争罪行被亲以色列的院外集团干净地转化成为一种证明:在美国之外,世界正被一种无法根除的反犹主义所统治。其证据是,前段时间对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担忧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发生的一切只是杰宁难民营、纳布卢斯老城、拉马拉的文化中心和其他民事机构被摧毁,以及对平常人的令人作呕的羞辱、对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残酷的集体惩罚,以及其他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许多以色列人能够“平静接受”的琐事。当然,如果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以色列或是美国采取类似的行动,除了一些歇斯底里的反伊拉克种族主义者之外,也没有人会反对。

单独的个案往往能够比整体更形象地揭示出对待恐怖主义的主

流态度。1985年10月,在“阿奇里·劳罗号”游艇被劫持事件中,一个坐轮椅的瘸脚美国人利昂·克林霍弗被残酷杀害,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事件更能鲜明和持久地成为“恐怖主义邪恶之源”的象征了。恐怖主义分子声称此次劫持是为了报复一个星期前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对突尼斯的轰炸,在缺乏可信借口的情况下,那次轰炸炸死了75名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尽管如此,恐怖主义分子所犯下的劫持罪行并不会丝毫得到减轻。当英国的记者在沙龙袭击后的杰宁难民营里发现了“一个被炸平的轮椅的残骸”时,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它被彻底摧毁了,平得就像装在纸箱里,”记者写道:“在废墟的中央躺着一面破碎的白旗。”卡迈勒·瑞格哈耶,一个瘸脚的巴勒斯坦人“在他试图推着轮椅向前的时候被子弹打死。以色列的坦克肯定碾过了他的身体,因为当(朋友)发现尸体时,一条腿和两个手臂都不见了。而且他朋友说,他的脸被劈成了两半。”^⑫在美国,这显然根本不值得报道。即使它被报道了,它也会在一片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声中被予以否认,最终很有可能对此表示道歉或是收回报道。即使这种罪行被承认下来,它也会被当成是合法的报复过程中一个不经意的错误。与对“阿奇里·劳罗号”游艇犯下的罪行极为不同的是,卡迈勒·瑞格哈耶不会像利昂·克林霍弗那样进入恐怖主义的年鉴中。

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美国的盟友必须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阿拉伯佬区别开来。就如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数世纪以来人不能与“纯粹的物”混淆在一起。

前以色列情报部门的首脑什洛莫·加齐特(Shlomo Gazit)是早

年以色列军队中一个高级军官,他将 1985 年的占领称之为“成功的经历”。当地人口没有造成任何问题。他们是不会扬起头来的“萨米定”。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防止被占领土上的居民参加塑造该领土政治未来的活动”或是“被视为与以色列打交道的伙伴”。这要求“绝对禁止任何政治组织,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一旦政治行动主义和政治组织得到许可,它们的领导人可能会成为政治事务的潜在参与者。”同样的考虑要求“摧毁被占领土居民的所有倡议和任何努力:可以成为谈判的管道或是成为连接领土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渠道的倡议和努力”。这一指导原则在 1972 年被杰出的以色列外交官哈伊姆·赫尔佐格(后来他成为以色列总统)予以详细阐发:“我并不否认巴勒斯坦人在所有事务上的地位或是立场或是观点……当然我也不准备在有关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方面将他们视为伙伴,这片土地是数千年来上天赋予我们民族的神赐之地。对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来说,不可能有任何伙伴。”^⑬

对这些原则的发起者来说,只有当服过药的蟑螂由于“仇恨变得疯狂”以至于仰起它们的头,甚至转向监狱看守之时,问题才会出现。在那种情况下,惩罚是严厉的,达到了极度残忍的程度。只要他们的主子同意,这种罪行可以被豁免。直到 1987 年 12 月第一次西岸起义爆发之前,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被极大地征服了。当他们最终在被占土地内仰起头之时,以色列国防军、边防巡逻队(类似于准军事组织)和定居者来了一场恐怖和野蛮的大发作。^⑭

美国对此的报道非常稀少。媒体和评论员还是大体上保持忠实,

但是华盛顿勇敢地装作“没有看到”巴解组织和其他人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最后,当此事成为国际嘲讽的对象之后,华盛顿在一个幼稚的借口(知识界和媒体却对此深信不疑)下,同意和巴解组织对话,这个借口是巴解组织屈服了,并温驯地同意接受美国坦率的立场。在第一次会议(埃及和以色列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没有报道)上,华盛顿要求巴解组织呼吁停止发生在军事占领土地上的“骚乱”,“我们将其视为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为,”目标是“削弱其安全和稳定”。“恐怖主义”并不是占领军所犯下的,就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而言,他们的暴力是合法的,就像在黎巴嫩一样。那些敢于扬起他们的头来的人才是有罪的。拉宾总理告诉“现在就和平”运动*的领导人,美国和巴解组织“低层次”谈判的目的是为了给以色列以充裕的时间,用“严厉的军事和经济压力”粉碎西岸起义,并向他们保证巴勒斯坦人“很快就会被击破”。

正如通常情况那样,暴力起作用了。当他们“被击破”,并回到“萨米定”的状态之后,美国国内的担忧也消退了,就如同在其他例子中那样,这再次证明了前面所引的埃夫龙的分析的准确性。

因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事态就是这样发展的,现在已纳入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框架。在加沙地带,数千犹太定居者过着豪华的生活,有游泳池、钓鱼的池塘以及高度成功的农业,这要感谢他们对该地区可怜的水资源的侵占。10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悲惨中,仅仅能

* 现在就和平(Peace Now)以色列国内一个著名的和平组织。——译者

够生存下来,他们被监禁在大墙背后,通往大海或埃及的通道被堵住。他们经常被迫步行或是游泳绕过以色列国防军的路障。这些路障在安全上基本不起作用,但是能够强加严厉和令人耻辱的惩罚措施。如果他们试图在这个地牢内移动的话,他们经常面对真枪实弹的射击。著名的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尔内亚这样写道,加沙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惩罚殖民地”,它的“阿尔卡特拉斯岛”,一个魔鬼岛”。

正如中美洲一样,横贯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情况持续恶化。^⑮ 2000 年夏戴维营的克林顿-巴拉克建议被过分地赞美为是“宽宏大量的”和“慷慨的”建议,惟一公正的说法只是它的确提供了一个改善的机会而已。当时,巴勒斯坦人被局限在西岸 200 多个飞地内,而且绝大多数都很小。克林顿和巴拉克宽宏大量地提出,愿意将数目减少到 3 个大的区域,并将它们有效地互相分离开来,而且与巴勒斯坦在东耶路撒冷的生活、文化和通讯中心相分离。巴勒斯坦实体将因而变成一个“新殖民主义的依附”,而且是“永久的”。正如在描述奥斯陆进程的目标时,巴拉克的外交部长重新引诉了摩西·达扬三十年前所作的观察,占领将是“永久的”。对于加沙模式,一堵墙在 2002 年夏天被建立起来以监禁巴勒斯坦人民。其内部设有路障,如果人民想要去医院,或是走亲访友,或是上学,或是找工作,或是运输产品,只有在忍受了长时间的骚扰和故意的羞辱后,他们才会被予以放行。要么,他们

* 阿尔卡特拉斯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的一岩石岛屿,位于圣弗朗西斯科湾。1859 至 1933 年间它是一座军事监狱,1963 年以前为联邦监狱。现为一旅游胜地。此岛长期以来被称之为“岩石”。——译者

只能在地牢的范围内求生。如果这些措施恢复了华盛顿的附庸政权过去曾经享受过的对暴力和恐怖的垄断的话,那么在西岸的政策就会被认做是一个成功。

2002 年中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捐助国提出要求,要求它们支持其向 50 万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提供食品的计划。粮食计划署警告说,“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越来越多的家庭被迫减少进餐次数或是食物摄取量。”它预测,随着以色列禁止货物在它在“惩罚殖民地”内所建的 8 个区域内自由流动,情况将进一步恶化。^⑩

如同其加沙模式,西岸的墙也是“半透过”式的。以色列国防军、犹太定居者和外国的旅游者能够向任意方向自由流动,但是那些“纯粹的物”却不可以,他们的生命对统治者来说“没有价值”。

只要那些生命是有价值的人继续免于罪责,他们的牺牲品的命运是可以被忽略的。如果他们扬起头,就必须教给他们服从的教训。暴力是典型的第一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操纵的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如此流行的一种瘟疫。如果暴力失败了,就必须考虑其他的方法。在第一次西岸起义期间,出于以色列自身代价考虑,即使是那些以色列恐怖活动的极端支持者也开始呼吁部分撤军。在第二次西岸起义初期,尽管以色列对数百名巴勒斯坦人进行屠杀和实施大规模的集体惩罚,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美国)向以色列运送新一批的直升机和其他恐怖武器。但是随着西岸起义逐渐失去控制,并触及以色列自身的时候,新的步骤是必要的。布什总统甚至开始谈起他对最终的巴

勒斯坦国的“设想”，非常值得赞美的是，就如同他接近（从下面）四十年前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立场一样，他们不仅具有一个黑人管理国家的“设想”，而且实际上将其付诸实施。

最终的国家会怎样以及位于何处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众议院多数派领导人迪克·阿梅伊注意到，“有好几个阿拉伯国家”拥有大量的“创造一个巴勒斯坦国所需的土地、财产和机会”，所以以色列应该“攫取整个西岸”，“并且巴勒斯坦人应该离开”。他的对手也能够反唇相讥，在纽约、洛杉矶也有大量的犹太人，而且对于全世界最富的国家来说，再多吸收几百万也没有问题，如此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在相反的另一端，安东尼·刘易斯赞美“不为情绪所动的老战士”伊扎克·拉宾，一个具有“纯粹的理性的诚实”的男人，他愿意签署奥斯陆协议。但是与拉宾不同，以色列的右翼“反对任何会给予巴勒斯坦人一个可行国家的方案，即使这样的国家很小，被解除武装，受以色列控制，但是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事情的核心”。如果拉宾的高尚设想失败了，和平进程也会死亡。^{①7}

与此同时，国家恐怖主义仍然是被认可的控制手段。在西岸起义的最初那段时间里，以色列使用美制直升机攻击民用目标，打死打伤数十人。克林顿对此的反应是向以色列运送了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批军用直升机。而且随着以色列开始使用这些直升机进行政治暗杀和其他形式的恐怖活动，这种输送在继续。美国坚持反对国际观察员的进入，他们的存在可能会减少暴力。2001年12月，在否决了安理会另一项要求派遣观察员的决议的同时，布什政府采取了进一步

的行动去“加强恐怖”(按照总统的说法,是阿拉法特的罪行),其方法是削弱旨在终止以色列“严重违反”日内瓦第四公约行为的国际努力。总统对巴以冲突发表的主要政治宣言(2002年6月24日)很好地表达了总的态度:指导原则是只有“不向恐怖主义妥协的领导人”才能被接受到美国的外交进程中。阿里埃勒·沙龙自动达到了这一条件,这一事实没有引起任何评论,尽管当布什总统宣布他是“追求和平的人”时——就如同他从事恐怖主义暴行五十年的记录所展示的那样,有些人不能苟同。根据定义,没有一个美国领导人会作出如此的妥协。惟独那些必须满足主子要求的人才能成为巴勒斯坦领导人,他们的暴力和镇压只可以针对其他的两腿野兽,就像在过去那样,他们的这些举动在奥斯陆的岁月里赢得了美以联盟的支持和赞赏。如果他们偏离了这一使命,或是失去控制,就必须消灭他们或是用其他更为可靠的傀儡加以取代,最好是通过大选,如果合适的人赢得了大选,那大选就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的”。

一些诚实的政治家较为坦率地概括了关于恐怖的基本原则,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其中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告知国会说:

我们并非是拥有清白记录、遗产匮乏的年轻人,我们为自己垄断了……世界财富和交通中不成比例的份额。我们获得了所有我们想要的土地,我们要求无忧无虑地享受庞大和辉煌的财富,这主要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很大程度上依靠强力维持的。相

对我们,这种要求对于其他人来说,经常看起来没有什么道理。

随着美国和英国在 1945 年胜利地崛起,丘吉尔从他现实主义的观察中得到了合适的结论:

世界政府必须委托给心满意足的国家,它们除了自己所拥有的之外,不再奢求其他。如果世界政府是处于饥饿国家的手中,那会发生危险。但是我们中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想要追求更多的东西。和平应该依靠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雄心勃勃的人来维持。我们的权力将我们置于其他人之上。我们就像那些在自己的住所里和平生活着的富人一样。^⑩

其他已经获得“庞大和辉煌的财富”的人并没有非常优雅地很好理解丘吉尔的原则。肯尼迪和里根政府被看作是美国政治图谱的相反两极,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倒很类似。他们都认识到诉诸恐怖的需要,以确保那些希望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享受自己财产的富人得到别人的服从。仅仅在其就职几个月后,肯尼迪命令“尘世的恐怖”必须降临到古巴直到菲德尔·卡斯特罗被消灭为止。在肯尼迪在任期间,大规模的恐怖活动一直在继续。在他遇刺前 10 天,他批准了一些新的主要的恐怖行动。理由非常清楚和明确。古巴人抬起了他们的头,更糟的是,他们提供了一个“榜样和普遍性的刺激”,可能会在拉丁美洲的其他部分“鼓励愤怒和极端的变化”,在那些地方,“社会和经济状况……召来了对统治阶层的反抗。”卡斯特罗做了些什么并不重要,其实,肯尼迪的智囊认识到,“正是这一政权的存在……代表了一种对美

国的成功挑战，一种对几乎半个世纪来我们整个西半球政策的否定”。这种政策的基础是对北方庞然大物的意志表示服从的原则。肯尼迪的顾问们警告将要上台的总统，卡斯特罗带来的威胁是“卡斯特罗关于将事情掌握到自己手中的思想的传播”，更严重的危险是当“土地和其他形式的国家财富的分配极大地有利于有产阶级的时候……被古巴的榜样所激励的穷人和下层社会现在要求获得过体面生活的机会。”^⑩

即使在没有好榜样的威胁的情况下，“对美国的成功挑战”也不能被容忍。相当普遍的是，“保持可信性”是治国之道的一个首要原则，是政策的标准官方理由。如果世界正好被恐吓住了，那就是一种净利润。里根政府的谋士们警告欧洲，如果它们不以适当的热情参加华盛顿的“反恐战争”的话，“发疯的美国”可能“将事情掌握到自己手中。”媒体赞扬了这种勇敢的立场，它成功地将欧洲的“懦夫”们拉了进来。克林顿的战略司令部（STRATCOM）建议，应该将“我们表现出的这种国家性格的一部分”作为一种“非理性和惩罚性”力量，其中的某些因素“很有可能‘失控’”。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些杰出专家已经提出警告，美国已被许多人视为一个“无赖的超级大国”并且已对他们的生存形成严重威胁。但是如果它导致恐惧和服从，那也完全是一件好事。

当今的政策制定者们（许多是里根政府时期的老人马）非常直接地采取这种立场。当沙特王储阿卜杜拉 2002 年 4 月访问美国的时

候,他敦促华盛顿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所遇到的某些困难引起某些注意,这些困难是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和镇压行动而引起的。但是他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他的担心无关紧要。“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他认为我们在执行沙漠风暴行动的时候是强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则是十倍地强大。”一位官员说,“这让他部分地了解了我们的力量有多强,正如在阿富汗所显示的那样。”

杰伊·法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的中间派智库——中的一名指导特别项目的前国防部高级官员,概括了国防部最高层的想法:如果美国是“坚定和强硬的,并且行动坚决,尤其是在世界的那一地区,那么世界其他地区会跟随(我们),因为我们的强硬而尊重我们,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②①}

简而言之,迷失方向了。正如总统所说的,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们。如果你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会被彻底粉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轰炸阿富汗那样的国家:让那些顽抗者明白,如果有人挡道的话,我们能够做什么。恐怖主义的后果只是次要的,实际上,美国的情报机构得出结论:对阿富汗的轰炸可能会因为打散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和滋生其他类似的组织而使威胁增加。并且,正如前面提到的,在“9·11”对美国的袭击事件9个月后,美国的情报机构对它的起源仍然所知甚少,只是“相信”最初的主意可能是在阿富汗策划出来的,但并非在阿富汗予以规划和执行。^{②②}在通行的规范(对有财有势者而言)之下,仅此就足够成为轰炸无辜百姓的合法理由了,并且引出种种关于我们的领导人尊重道德和国际法的最高准则的雄辩言辞。

迹象显示,新的“反恐战争”将与前一次类似,国家恐怖主义的许多其他事件将不被归于归入到官方的“奥威尔主义”的范畴之下。但是,其中存在关键的差别。对于目前这场战争,它是被再次宣战的战争,是对真实的、非常严重的恐怖主义暴行而非编造出来的借口的回应。但是各种机构仍然保持稳定,从中发出的政策倾向于采取类似的形式,以适应新的条件。其中一个稳定的特点是丘吉尔主义:即有财有势者享有一切要求保持和平以享受他们所获之物的权利,经常是通过暴力和恐怖;只要其他人在沉默中忍受痛苦,他们就可以被忽略;但是如果他们扰乱了那些凭借权利统治世界的人的生活,“尘世的恐怖”将随着正义的怒火降临到它们身上,除非权力在内部被加以限制。

本书前五章将关注里根-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战争”的第一阶段。序言和前三章构成了最初一版的《海盗与君主》(克莱尔蒙特出版社,1986)。第一章用于提出分析框架,这些问题和相关的问题将在支配性的理论体系内被提出来。第二章提供了真实世界中中东恐怖主义的一个例子,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还有一些对辩解方式的讨论,这些辩解用于确保它会被毫无障碍地运用下去。第三章转向那一时期的利比亚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第四章出现在1987年版的《海盗与君主》中(布莱克-罗斯出版社,蒙特利尔);它是我在1986年11月15日在阿拉伯大学毕业生协会大会上的主题发言稿。第五章(1989年7月)发表在亚历山大·乔治编辑的《西方的国家恐怖主义》(1991)。

第六章转向“9·11”后再次宣战的“反恐战争”第二阶段。它是建

立在2001年12月8日在塔夫茨大学举行的“9·11之后：通往和平、公正和安全之路”会议上的一次讲话的基础之上，这次会议是由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和塔夫茨大学的和平与公正研究计划以及和平联盟三家联合举办的。第七章和第四章一样关注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它是罗恩·凯里的《新的西岸起义》(2001)的导言。

第一章中的部分发表在1986年2月—3月的*Utne Reader*上，以及《审查索引》(伦敦,1986年7月)和《宣言报》上(罗马,1986年1月30日)。第二章的节选发表于《种族和阶级》(伦敦,1986年夏),它的另一版本发表于迈克尔·斯普林克编辑的《否定：假学术和巴勒斯坦问题》(verso,1987)。这一章还刊登在爱德华·赛义德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编辑的《指责受害者》(verso,1988)上。第三章是对刊登在《秘密行动信息布告》1986年夏季版的一篇文章的修改和扩充。这些文章的早先版本刊登在《新政治家》(伦敦)、《封底》(诺丁汉)、《国家报》(马德里)上，以及在意大利、墨西哥、乌拉圭以及其他地方。第二和第三章的部分还被包括在我的论文“国际恐怖主义：形象和现实”中，这篇论文在1986年4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会议上发表，刊登在1987年第27—28期的《犯罪和社会公正》上，这期杂志广泛地回顾了这些题目。

这些章节已经经过了编辑，以消除那些不再相关和重复之物。从头至尾，“目前”和“最近”之语指的是出版之时。我并没有对注释进行更新，没有包括出版后出现的一大堆高度相关的材料。

目 录

1986年初版序言/1

2002年版导言/1

第一章 思想控制:中东的例子(1986年)/1

第二章 中东恐怖主义和美国的意识形态
体系(1986年)/28

第三章 美国黑名单上的利比亚(1986年)/89

第四章 美国在中东的作用(1986年11月15日)/121

第五章 国际恐怖主义:形象和现实(1989年)/142

第六章 “9·11”事件之后的世界(2001年)/178

第七章 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2001年5月)/199

注释/229

第一章

思想控制： 中东的例子（1986 年）

相比较而言，美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之少虽然不能说是独一无二的，但至少是非比寻常的。同样不同寻常的是美国在限制思想自由方面所采用的各种方法的范围和有效性。这两个现象相互联系。自由民主主义的理论家们长久以来观察到，在一个民众的声音可以被听到的社会里，精英集团必须确保这种声音表达的是正确的事情。在保护有效地主导这种声音的精英集团的利益方面，国家使用暴力的能力越小，它就越有必要创造一些技巧。这些技巧，用六十多年前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的话来说，是“制造共识”；或者用美国公共关系行业的创始人之一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所偏爱的用语，是“策划共识”。

在 1933 年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是这样解释“宣传”这个条目的，我们必须服从“那些关于人是其自身利益最佳评判员的民主教条”。我们必须找到能确

保他们对由他们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表示赞同的各种方法。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很早以前就吸取了这一经验，公共关系产业的兴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当服从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时候，统治者倾向于一种“行为主义”的概念，即只要人民服从就行了，至于他们想什么不是太重要。当国家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之时，控制人民的思想就显得同样重要。^①

这种态度在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中都很普遍，当环境要求他们转换派别的时候，这种态度通常仍然会得到维持。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一位高度受人尊敬的道德家和政治评论家提供了一个版本。他在1932年写道，当时他还是从基督教左派的角度出发，鉴于“普通人的愚昧，”“冷静的观察家”有责任提供一种产生信念的“必要的幻想”，而这种信念必须被灌输到那些天赋较差的人的头脑中。^②这种教条一般也适用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由主义的评论。考虑一下美国1986年4月对利比亚的轰炸。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这次行动是美国在公关上的一次胜利。它“在皮奥里亚很受欢迎”^{*}，它的“积极的政治影响”将“加强里根总统在军事预算和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等问题上处理与国会关系时的力量。”按照学术界领军的公众舆论专家埃弗里特·拉德(Everett Ladd)博士的说法，

* play in Peoria. 直译为“在皮奥里亚很吃得开”，意思是在穷乡僻壤的地方受欢迎。皮奥里亚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城市，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及其助手看来，这里与沿海城市不同，远离大众媒体的中心，因此判断事情较客观公正。该语为尼克松执政时白宫助理约翰·恩里克曼在1968年所创。——译者

“这种公众教育运动是治国之术的精髓。”他还补充说，一名总统“必须致力于策划民主共识”，也就是在公共关系和学术圈中常见的、富有启发的奥威尔主义所指的用于理解有意义的民主在参与塑造公众政策中的作用的方法。^③

当国家的政策站不住脚，并且严重到了问题本身也变得很严重的程度之时，“策划民主共识”的问题就开始以一种异常尖锐的形式出现。中东问题的严重性毋庸置疑，尤其是阿以冲突。它合乎情理地被普遍认为是最有可能引发一场终极核大战的“火药桶”，如果地区冲突卷入超级大国的话。这种情况在过去已经非常接近，使人不安。并且，美国的政策在物质上帮助维持了军事对抗的状态，这种政策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前提之下，这些前提无法公开宣示，否则将不被容忍。在大众态度和政府政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当问题在民意调查中被提到的时候，大众的态度是基本上支持一个巴勒斯坦国，而政府的政策则明确地禁止这一选择。^④但是，只要人口中那个政治上活跃并能够表达自己的部分维持适当的纪律，这种差异并不太重要。为了保证结果，有必要实施被美国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历史策划”的行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用自己的才能帮助威尔逊政府“制造共识”，这可能是“制造共识”最早的实践之一。有许多方法可以达到这一结果。

一种方法是设计一种合适的官方宣传用语，关键的术语都有脱离其通常意义的专门意思。例如考虑一下“和平进程”(peace process)这个词。在其专门的意思上，如同美国国内的媒体和学术界

通用的那样,它指的是由美国政府推进的和平方案。右翼人士希望约旦加入和平进程,也就是说,接受美国的独断。“大问题”是指巴解组织是否会参加和平进程,或者是否被容许加入这一盛事中。伯纳德·格韦茨曼在《纽约时报》上对“和平进程”的评论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巴勒斯坦是否做好了追求和平的准备?”^⑤根据“和平”一词的通常含义,答案当然是“是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所有人都追求和平;以希特勒为例,根据他所使用的术语,他在1939年肯定是在追求和平。但是在思想控制的体系下,这个问题意味着别的意思:巴勒斯坦人是否准备好接受美国意义上的和平?美国所使用的术语恰好否定了他们的民族自决权,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就证明巴勒斯坦人不追求和平,这里的和平是在专门的意义上。

注意,格韦茨曼并不需要问美国或是以色列“是否做好了追求和平的准备”。对美国来说,根据定义不问自真。负责任的新闻业的惯例要求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表现良好的附庸国来说也必定是真。

格韦茨曼进一步断言,巴解组织(PLO)一直拒绝“任何与以色列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对话。”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在存在“必要的假象”的世界中又是真的。这种世界是由“档案记录报”^{*}和其他负有责任的报刊杂志一起构建的,它要么压制了相关的事实,要么将它们驱逐到奥威尔有用的记忆空洞中。

当然,也有关于阿拉伯的和平建议,包括巴解组织的和平方案,但

* 即《纽约时报》。——译者

它们不是“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因而，在“中东寻求和平的二十年”一文所作的评论中，《时代周刊》驻耶路撒冷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将阿拉伯方面(包括巴解组织)主要的和平方案排除在外；以色列的和平方案也没有被列入，因为它没有提出过正式的，但是对这一事实没有进行讨论。^⑥

官方的“和平进程”和被排除在外的阿拉伯方案的特点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澄清另一个专门的术语：“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奥威尔主义的用法上，这个术语独指那些否认以色列犹太人民族自决权的阿拉伯人或是那些拒绝接受以色列“生存权”的阿拉伯人的立场。这是个新奇和天才的概念，通过展示一部分人的“极端主义”来阻止巴勒斯坦加入“和平进程”。那部分人拒绝接受在他们看来是对自己祖国掠夺的公正，他们坚持传统的观点：在国际秩序内，国家是得到承认的，而抽象的“生存权”却并不得到承认。这种观点也同样被美国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和除了以色列之外的所有国家的通行国际实践所接受。

在阿拉伯世界内存在着适用“拒绝主义”这个术语的部分：利比亚，巴解组织内部的少数派拒绝阵线以及其他。但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在官方用语中，这个术语是在严格的种族主义意义上使用的。在摒弃这些假定之后，我们发现在原来的巴勒斯坦内要求民族自决权的有两个集团：原住民和犹太定居者，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赶走和取代了原住民，有时候使用了相当的暴力。可以假定，原来的居民应享有相当于犹太移民的权利(有些人认为这远远不够，但是我将这问题

放在一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拒绝主义”一词可以被用于指否定相互争夺的族群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的民族自决权。但是这个词的使用在美国的教义体系内不可能带有其非种族主义的意义,否则美国和以色列马上会被看作是领导着拒绝主义阵营。

作了这些澄清之后,我们可以转向问题本身:什么是“和平进程”?

官方的“和平进程”是明确的拒绝主义,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国内主要的政治集团。实际上,他们的拒绝主义是如此地极端,甚至不允许巴勒斯坦人选择他们的代表参加决定他们命运的最终谈判,正如他们在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下同样被否定了参加市镇选举和其他民主形式的权利一样。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上是否存在一个非拒绝主义的和平方案呢?在美国的教义体系中,根据定义,回答当然是“不”。在真实世界中,情况则不同。和平方案的基本条款是相似的,反映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成立一个与以色列相邻的巴勒斯坦国,还包括以下这个原则:“必须确保这一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安全和主权。”

所引之话来自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2月举行的苏共大会上的讲话,它表达了苏联的一贯立场。勃列日涅夫的发言被节选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但是这些关键部分被省略了,(与此相比)《真理报》对里根在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所作的删节却引起了很大的、但是完全有道理的愤慨。1981年4月,勃列日涅夫的声明得到了巴解组织的一致赞同,但是这一事实却没有在《时代周刊》上得到报道。官

方教条所持的立场是，苏联一贯只关心如何制造麻烦，阻碍和平，因而支持阿拉伯的拒绝主义和极端主义。媒体非常尽职地履行了分配给它们的任务。

人们还可以引用其他的例子。1977年10月，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终止战争状态，并建立正常的和平关系”。巴解组织对这一声明表示支持，但是在以色列以及其在美国的院外集团的愤怒反应下，卡特将其撤回。1976年1月，约旦、叙利亚和埃及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一项建立两个国家的方案。这项决议包括了联合国242号决议(相关外交活动的核心文件)中的基本措词，保证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地相处”。这一提议得到了巴解组织的支持；根据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格(当时的驻联合国大使)的说法，它是由巴解组织“准备”的。它得到了几乎整个世界的支持，但是被美国否决。^⑦

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从历史、新闻和学术中抹去。在塞思·蒂尔曼(Seth Tillman)所著的《美国和中东》(印第安纳,1982年)一书中，他的回顾异乎寻常地仔细，但是1976年的这项国际倡议甚至没有被提及。史蒂文·施皮格尔(Stevon Spiegel)在其被高度评价的学术著作《另一种巴以冲突》(芝加哥,1985年,第306页)中提到了这项倡议，并作了一些有趣的评论。施皮格尔写道，美国“否决了亲巴勒斯坦的决议”，从而“证明了美国愿意听取巴勒斯坦人的渴望，但是不会接受会威胁以色列的要求。”美国和以色列对拒绝主义的态度表现得几乎不可能再明显了，而且美国国内也认为这种责任相当合适，因

而予以接受。同样接受的是这样一个原则,它要求人们接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威胁是完全合法的,而且是值得称道的。官方的“和平进程”的术语就是一个例子。在公众讨论中,这种事只和教条有关,这种教条认为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永远不会改弦易辙,不会转变其拒绝的态度,永远不会与以色列打任何形式的交道。萨达特和他 1977 年对耶路撒冷的访问除外。对于一个良好运行的“历史策划”体系来说,事实不能有任何的尴尬,甚至不能让人感到轻微的不适。

以色列对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对抗国家”支持的“1976 年和平方案”的反应是对黎巴嫩的轰炸(除了面对联合国安理会之外,甚至连一个“报复”的借口也没有),杀害了 50 多人,并宣布以色列将不在任何政治问题上和任何巴勒斯坦人打交道。这是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领导下的鸽派的工党政府的政策。拉宾在他的回忆录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极端主义”:贝京政府的极端主义和“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主要是巴解组织)提出的建议,(这种建议)“也就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只有工党风格的拒绝主义才远离了“极端主义”,美国的评论家同样持这一观点。^⑧

我们注意到新闻用语的另一套概念:“极端派”和“温和派”,后者指的是那些接受美国立场的人,而前者是那些不接受的人。因而根据定义,美国的立场是温和的,如同以色列的工党联盟(一般而言)的立场一样,因为它的论调倾向于接近美国。就这样,拉宾在使用“温和派”和“极端派”两词时与被认可的做法相符合。与此类似,在对“极端主义”和它的崛起作痛苦的评论时,《纽约时报》驻以色列记者托马

斯·弗里德曼将那些赞成根据国际共识达成一个非种族主义的解决方案的人也归入此类。根据这一定义，人们可以加以补充，将那些同样在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中登峰造极的、拒绝主义阵营中的西方领导人归入“温和派”。弗里德曼写道，“极端主义分子在利用媒体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他说得非常对。以色列和美国对这门艺术的掌握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娴熟，正如他自己的文章和新闻报道所显示的那样。^⑨正如刚刚所显示的那样，他出于方便而使用的历史版本及其报道的概念框架提供了许多例子中的一些，证明了极端分子在“利用媒体”上的成功。（这里使用的是术语字面上的意思。）

在采用了一种旨在把对事实和问题的理解排除在外的概念框架之后，《新闻周刊》追随了类似拉宾的以色列模式，这种模式通过大体遵照美国政府的要求而获得了“温和派”的地位。当弗里德曼回顾“在中东寻求和平的二十年”之时，被美国和以色列拒绝的主要和平提议被略去了，因为它们对于历史记录来说是不合适的。与上面相对应的是，弗里德曼这么做完全是自然的。同时，以色列的领导人由于他们“健康的务实主义”而得到《时代周刊》编辑们的赞扬，而巴解组织因为挡住了和平之路而遭受谴责。^⑩

有一种观念认为，媒体对美国和以色列非常苛刻，而在容忍阿拉伯极端分子方面则过于友善。无独有偶，这种观念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部分。发表上述看法甚至不用担心被人嘲笑，这一事实是这种灌输体系异乎寻常地成功的另一个表现。

回到官方的“极端分子”上面。1984年4月到5月，亚西尔·阿

拉法特发布了一系列声明,呼吁(进行)通向相互承认的谈判。全国性的媒体拒绝刊登这些事实,《时代周刊》甚至禁止刊登与其相关的信件,但同时继续谴责“极端分子”阿拉法特阻碍达成一项和平的解决方案。^①

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例子证明,的确存在得到广泛支持的非拒绝主义建议。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得到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苏联、不结盟国家、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的主流派和美国公众舆论的大多数(根据少数几个现存的民意调查判断)的支持。但是这些建议并不是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因为美国政府反对它们。引用的例子因而被排除在《时代周刊》的回顾“追求和平的二十年”之外,也被相当普遍地排除在新闻甚至是学术文章之外。

还有其他的事件也不够格成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因而,《时间周刊》的回顾并没有提及安瓦尔·萨达特(Sadat)1971年2月提出的在国际承认的边界(与美国当时的官方政策相一致)内达成一项全面和平条约的建议。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拒绝了。注意,这个建议是拒绝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给巴勒斯坦提供任何东西。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了他当时的想法:“在一些阿拉伯国家表现出脱离苏联的意愿,或是苏联准备放弃其最终的阿拉伯计划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修改我们的僵持政策的理由。”在某种专门的意义上讲,苏联是极端分子,支持正好成为美国官方(虽然不是实际操作)政策的路线,这一政策与“最终的阿拉伯计划”没有什么关系。在谈到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拒绝“离开苏联”时,基辛格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似

乎也没有意识到，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沙特和苏联并没有外交关系，从来没有过。这种令人惊讶的阐述逃过了评论，这一事实揭示了媒体和学术界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律性。类似的是，没有责任的评论家有可能指出基辛格“幸运的”愚昧和坚持，他认为军事对抗是导致1973年战争的首要因素。^⑫

萨达特的和平努力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了。^⑬ 标准的故事是，萨达特是一个典型的阿拉伯暴徒，只对杀害犹太人感兴趣，尽管在他的1973年摧毁以色列的企图失败后，他认识到其方法是错误的。在基辛格和卡特友善的指导下，他成为一个追求和平的人。因而，在萨达特遇刺后的两页讣告中，《时代周刊》不仅压制实际的事实，而且明确地否认它们，声称：直到1977年耶路撒冷之行之前，萨达特并不愿意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⑭《新闻周刊》甚至拒绝刊登一封更正信，更正其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在这件事上犯下的明显错误，尽管研究部门私下予以承认。这是通常的做法。

“恐怖主义”和“报复”这些术语在教义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含义。“恐怖主义”是指各种海盗，特别是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行为。君主和他的代理人的恐怖主义行为被称为“报复”，或者是“防止恐怖主义的合法的先发制人打击”，这相当游离于事实之外，下面的章节将讨论到这点。

“人质”一词，正如“恐怖主义”、“温和的”、“民主的”和其他政治言论的术语一样，在主导的教义体系内也具有奥威尔主义意义上的专门含义。从这些词汇的字典的意义上讲，尼加拉瓜人现在正成为一次

大规模恐怖行动的人质，这项恐怖主义活动受远在华盛顿和迈阿密的国际恐怖主义中心所指挥。这一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引发尼加拉瓜政府行为的变化：关键是停止将资源分配给穷苦大众的项目，并回归到有利于美国的商业利益和美国在当地的附庸的“温和的”和“民主的”政策。这是美国针对尼加拉瓜的恐怖主义战争的中心原因，对此可以作出强有力的证明。这个例子没有被否认，但是也没有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⑮这是恐怖主义中一种异常残酷的实践，不仅仅因为它的规模和目的，而且因为其所使用的手段远远超出“小恐怖主义”分子的常见情况。“小恐怖主义”分子的战绩已经在文明世界引起了相当的恐慌，利昂·克林霍弗和娜塔莎·辛普森被恐怖分子杀害，但是他们之前并没有受到野蛮的酷刑、伤残、强奸和其他行为的（伤害）。而这些都是美国和它的代理人训练和支持下的恐怖分子的标准做法。尽管通常被回避掉，但是历史记录已经将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美国的政策是为了保证恐怖主义袭击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政府屈服或被推翻，与此同时君主的奴才发出有关“民主”和“人权”的令人舒服的言论。

在首选的专门用法上，“恐怖主义”和“人质”等词被限定在特定的某一类恐怖主义行为上：海盗的恐怖主义，它针对的是那些将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和劫持人质视为其特权的人。在中东，造成伤亡的轰炸、掠夺、劫持人质、对无防御能力的村庄的袭击等等并不在恐怖主义的概念之内。当这些行为被华盛顿或者它在以色列的代理人实施的时候，它们会在它们的教义体系中被恰当地予以解释。

关于恐怖主义的欺骗性的记录对于西方文化的本质具有高度的启发性的意义,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谈到这种记录。在当前条件下,与此相关的是,一套适用的历史和得体的话语形式被发明出来,恐怖主义是巴勒斯坦人的专利,而以色列实施的是“报复”,或者有时候是合法的“先发制人”,偶尔这种反应会过于严厉和令人遗憾,但是任何国家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都会作出这种反应。设计这种教义体系是为了确保这些结论按照定义来说是正确的,而无论事实如何,这些事实要么不被报道出来,要么以一种与教义必要性相一致的方式被报道出来,偶尔也会得到诚实的报道,但是随后就被放逐到记忆空洞中。鉴于以色列是一个忠实的、非常有用的附庸国,在中东发挥着“战略资产”的作用,并愿意承担类似于支持在危地马拉进行的近乎种族屠杀行为的任务(当美国政府被国会禁止参加类似必要的活动的时候),因此不管真正的事实如何,以下情况都是正确的,即以色列献身于最高的道德价值观和“军队的清白”,而巴勒斯坦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野蛮主义的典型。关于在权利和恐怖主义活动之中都可能存在某种对称性的看法被社会主流愤怒地驳斥为仅仅是伪装的反犹主义。一个对君主和海盗的恐怖主义的规模和目的给予准确的描述和分析的理性评估被先验地加以排除,实际上基本不能被人理解,与人们接受的正统观念相距甚远。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基辛格接过对中东政策的制定权之后,美国致力于维护军事对抗和基辛格式的“僵局”,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一项“战略资产”的作用有助于解释这一点。^①如果美国

愿意根据国际共识允许达成一项和平的解决方案,以色列将逐步融入这一地区,美国也将损失一个有价值的附庸国,以色列有军事能力,科技先进,但是是一个被人蔑视的国家,完全依赖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援而获得生存,因此一旦美国需要,以色列是可以依赖和可以利用的。

所谓的“犹太院外集团”在维持军事对抗方面也有它们自己的利益,正如杰出的以色列记者丹尼·鲁宾斯坦(Dany Rubinstein)在1983年访问美国时所认识到的那样。^①在会见主要的犹太组织(“约言之子”、“反诽谤联盟”、“世界犹太人大会”、“哈达萨”、“各派拉比大会”等等)的代表时,鲁宾斯坦发现他的有关以色列当前局势的发言引起了相当大的敌意,因为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以色列面临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因它对被占领土的接管所引起的“政治、社会和道德上的毁灭”那么严重。“我并不感兴趣,”一名官员告诉他,“我不在乎这种论调。”在许多类似的交换意见中,鲁宾斯坦发现,

根据犹太人机构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重要的是反复强调以色列所面临的外部威胁……美国的犹太人需要以色列只是作为残忍的阿拉伯进攻的受害者。对这样的以色列来说,可以获得支持、捐赠和金钱。怎么可能筹得到钱去对付人口比例失控的危险?谁会捐出哪怕是一美元去对付被我称之为“兼并的危险”?……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的“犹太联合募捐协会”所募集捐赠的官方总数,虽然以色列的名字被用于吸引募捐,但是大约一半

的数目并没有流向以色列，而是流到了美国国内的犹太人机构那里。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讽刺？

鲁宾斯坦进一步观察到，这个募捐协会，

被管理成为一种严格和有效的生意，它与以色列国内鹰派的立场有共同语言。另一方面，与阿拉伯人进行交流的尝试，与巴勒斯坦人实现相互承认的努力以及温和的鸽派的立场都不利于这种募捐的生意。它们不但减少了汇给以色列的金钱数额，更关键的是，他们减少了用于资助犹太人社区活动的金钱数量。

以色列院外集团是思想的警察，他们热衷于发现可能实现和解和达成一项有意义的政治解决方案建议的最细微的迹象，热衷于将愤怒的文章和信件投向媒体，以摧毁这种异端思想，热衷于传播对这种异端者进行诽谤的编造材料等等，鲁宾斯坦恰好遇到的这种问题会被观察这些经常性活动的人所理解。

鲁宾斯坦的评论使我们注意到另一种奥威尔主义，“以色列的支持者”通常被用来指那些不被以色列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的毁灭”（从长远来看，非常有可能是生存毁灭）所困扰的人，事实上，正如以色列的鸽派人士所警告的那样，他们对以色列采取的“无情的不妥协姿态”的支持是“盲目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而这种支持促使了上述后果的产生。^⑬

类似的观点被以色列的军事史学家、退役上校梅厄·帕伊尔所重复，他谴责了美国犹太人社团对一个犹太人堡垒国家的偶像崇拜，

并警告说,靠着这种拒绝主义,他们“已经将以色列国转换成一个类似于神话中战神一样的战争之神”,这样的一个国家将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结合了南非的种族主义国家结构和北爱尔兰的充满暴力和恐怖的社会构造”,是“对 21 世纪政治科学编年史的一项原创性贡献:一个独特类型的犹太国家,它对于所有犹太人都是一种耻辱,无论他们身处何地,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①9}

按照同样的联系,我们也许会发现一种有趣的方式,“锡安主义”^{*}一词根据这种方式被心照不宣地定义为那些扮演捍卫教义纯洁性的卫道士角色的人。例如,我的个人观点经常被谴责为“好斗的反锡安主义”,谴责的人清楚地意识我那些被反复和清晰表达出来的观点的意思。这些观点包括,以色列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权利应该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保持一致,既不多也不少;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内,歧视性结构应该被废除,这种歧视性结构在法律和实践上赋予公民中的某一部分(犹太人、白人、基督徒等)以特殊地位,给予他们其他人无法享受的权利。这里我将不进入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即什么样的事物应该被适当地称之为“锡安主义”。我只是要指出将上述这些观点称为“好斗的反锡安主义”的后果:锡安主义因而被看作是这样一种学说,即以色列必须被赋予超出其他任何国家的权利;它必须维持对被占领土的控制,从而禁止任何一种有意义

^{*} 锡安主义(Zionism),又译“犹太复国主义”,一种主张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运动。19世纪末由一批欧洲犹太人提出。锡安山,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古以色列国大卫主神庙所在地。——译者

的巴勒斯坦自决的方式；它必须仍然是一个建立在对非犹太公民进行歧视的基础上的国家。可能有些意思的是，那些宣称自己是“以色列的支持者”的人坚持承认宣布锡安主义为种族主义的“臭名昭著”的联合国决议的合法性。

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抽象和理论的。歧视的问题在以色列很严重，举个例子，在以色列，根据复杂的法律和政府实践的规定，90%的土地被置于一个组织的控制之下，这个组织致力于实现“属于犹太宗教、种族或出身的人”的利益，因此非犹太公民被有效地排除在外。对歧视行为的信奉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这一问题甚至不能在议会中被提及，新的法律禁止提交任何“否认以色列国作为犹太人的国家存在”的议案。这种立法因而将任何可能在议会上对国家的歧视性性质提出的挑战认定为非法而予以消除，并有效地禁止了任何致力于实现有关“国家是其公民的国家”的民主原则的政治派别。^②

这项新的立法与一项“反种族主义”议案一同被推出（实际上，四张反对票反对这种做法）。令人瞩目的是，以色列的媒体和绝大多数受过教育者的舆论似乎都认为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奇怪。《耶路撒冷邮报》的头条是这样报道的：“议会禁止种族主义和反锡安主义议案”——不无讽刺的是，新的立法就是这样解释“锡安主义”一词的。在美国阅读《耶路撒冷邮报》的读者们看起来也认为，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不值一提，就如同他们毫无困难地将这种版本的锡安主义的深刻的反民主特点和他们对美国（民主在此得到实现）的民主特征的热情歌颂调和起来一样。

同样引人瞩目的是对“反犹主义”这个概念的天才运用。例如，反犹主义可以被用来指那些“反帝国主义的蠢人们”（反犹主义的一种），他们由于反对以色列在第三世界的作用（出于为美国服务的需要）而表现出他们的愚蠢，危地马拉就是一个例子。也可以被用来指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拒绝接受有关他们的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安置定居和部分遣返”的方式解决。如果杜阿玛（Doueimah）村（在1948年以色列军队一次土地清理行动中，可能有数百名该村居民被屠杀）的幸存者，或者生活在索韦托般的加沙地带上的居民反对重新安置和“遣返”，那证明他们受到了反犹主义的鼓动。^②人们可能只有回到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中才会发现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在美国国内受过教育者的话语中，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与以色列有关的例子并不鲜见。尽管以色列的鸽派成功地察觉到和谴责了这种可耻的表现，但是这些例子在美国并没有引起注意。

这种“自由名义下的洗脑”系统的首要武器在可能是最自由的国度内以一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被发展起来，它鼓励对政策问题进行辩论，但是（被限制）在一个框架内，这个框架的前提将党派路线的基本教义包含在内。辩论越是热烈，这些前提就能越有效地灌输下去，出于对自己的勇气的敬畏和自我吹捧，参与者和旁观者都被征服了。因而，在越南战争这件事情上，意识形态的机制允许“鹰派”和“鸽派”进行辩论。不仅允许辩论，而且在1968年还得到鼓励，当时美国商业中相当多的部门开始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代价过于高昂，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鹰派人士坚定和执着地认为，美国能够成功地“在共

产主义的侵略面前保卫南越”。鸽派人士提出反驳,质疑这种崇高努力的可行性,或是对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过多使用武力和暴力表示悲哀,或是对其中的“错误”和“误解”感到痛心,它们误导了我们,导致我们的“正义和无私的仁慈的滥用”(费正清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美国亚洲研究的泰斗,学术界著名的鸽派人士)以及“行善努力中犯下的错误”(安东尼·刘易斯,可能是头牌的媒体鸽派人士)。或者有时候,在教条体系的最边缘,他们会询问这样的问题:是否北越和越共真的是犯下了侵略的罪行。他们提出,这种指控可能被夸大了。

用足够简单的话来说,关于这场战争的中心事实是,美国并不是在保卫一个“基本上是美国创造”的国家。^②相反,美国一直在进攻这个国家,1962年之后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在美国破坏了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任何可能性,并扶植起一个杀害了成千上万南越人民的代理人政权之后,美国空军开始参加对南越的轰炸,化学武器(落叶剂和摧毁农作物的药剂)被引入战场,作为将数百万人赶进营地的行动的一部分,以便“保护”他们免受南越游击队之害,(但是事实上)他们自愿支持那些游击队(正如美国政府私下承认的那样)。贯穿这场战争始终,美国的主要进攻针对的是南越。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止,它成功地摧毁了南越的抵抗,并且将战争扩散到印度支那半岛的其他地区。当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侵略。当美国进攻南越的时候,它则是“防御”,是对“内部侵略”的防御,正如阿德莱·史蒂文森1964年在联合国声称的那样。用肯尼迪总统的话来说,针对的是“来自内部的进攻”。

美国参加了对南越的进攻,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这种想法不能被表达出来,甚至想也不能想。在主流媒体和学术中,甚至在绝大多数和平运动的出版物中,人们找不到任何“美国进攻南越”的迹象。^②

围绕北越的侵略以及美国是否在国际法下拥有“集体自卫对付武装进攻”的权利以反抗侵略这一问题,曾经发生过辩论。很少能有例子比这场辩论更鲜明地展示出在自由的名义下的思想控制体系的威力。一本本巨著被写出来以支持相互对立的各种立场,用不太夸张的话说,这场在被和平运动打开的公众舞台上进行的辩论,成就是显著的。只要辩论集中在越南人是否犯有侵略越南的罪行这一问题上,就不会再讨论美国对南越的侵略是否真的像事实本身那样。如果一个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的人加入辩论,我能够说的只能是,(他)对国家暴力的反对会陷入一个极其有效的宣传体系之中。对于那些批评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人来说,有必要成为一个了解印度支那事务复杂性的专家。这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因为这一问题是美国的事情(尽管一直避免被这么看待)。就如同我们要反对苏联的侵略不一定要成为一名阿富汗专家一样。人们有必要从头至尾进入辩论的舞台,辩论那些由国家和精英所设定的为它们服务的术语。尽管人们可能明白,这么做的结果是对这种灌输体系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另外一种选择是说出简单的真理,但是这么做等于在说外国话。

当前对中美洲的辩论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美国在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战争并不是体面人讨论的话题,它根本就不存在。美国“遏

制”尼加拉瓜的努力是被允许讨论的话题,但只在非常狭隘的范围之内。我们可能会问,使用武力“切除癌瘤”(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语)以及防止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输出他们的“无边界革命”是否是正确的做法。这种说法是国家宣传体系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创造,是那些采用了官方言辞的记者和其他评论家的一种编造。但是我们不会讨论这种想法,即这个“癌瘤”之所以必须要被切除是因为“一个好榜样的威胁”,它可能会将“瘟疫”传播到整个地区乃至地区以外。这个事实有时候只是被间接地承认,例如美国的政府官员解释说,美国的代理人军方成功地“迫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稀缺的资源从社会项目转移到战争上。”^④

在1986年的最初三个月,围绕即将举行的国会投票的辩论日趋激烈,这次投票决定是否援助美国的代理人军方(正如它最热情的支持者私下所形容的),促使它从其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基地出发进攻尼加拉瓜,全国性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时报》)发表了85篇关于美国对尼加拉瓜政策的文章,有些是专栏作家所写,有些是约稿。所有文章都批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从严厉批评(占大多数)到比较温和的批评。这就是“所谓的公众辩论”。在美国的战争使其所有努力夭折之前,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在初期几年实施了成功的社会改革,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基本没人提及。在85篇专栏文章中,只有两段文字提到了存在社会改革之一事实,而没有人提到这是美国进攻的基本原因(算不上什么大的秘密)。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那些所谓的“辩护者们”受到严厉的谴责

(以匿名方式进行,以确保他们没有机会进行回应,虽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可能性都是最小的),但是没有有一个罪犯被允许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人提到乐施会(Oxfam)的结论,它认为尼加拉瓜在76个发展中国家中是一个例外,只有它致力于实现政治领导的“改善人民条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发展进程”的承诺。并且,在乐施会生活过的4个中美洲国家里,“只有尼加拉瓜真正努力解决土地所有权不平等,向穷困的农民家庭提供健康、教育和农业服务。”但是反政府的战争结束了这些,并迫使乐施会将它的努力从发展项目转移到战争救济。很难想象全国性的报刊会允许讨论这样的看法,即美国致力于切除这一“癌瘤”,这种努力绝对处于其历史使命之内。辩论可以围绕对付这一邪恶帝国前哨阵地的恰当方法进行,但是不能在全国性的论坛上超越许可的边界。^⑤

在独裁或是军管的“民主”中,政党路线是清楚、公开和明确的,要么由真理部加以宣布,要么通过其他途径表明。它必须公开地得到服从,不服从的代价包括恶劣条件下的监禁和流放,如同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内的情况一样,一直到酷刑折磨、强奸、伤残和大规模屠杀,就如同在萨尔瓦多这些典型的美国附庸国内一样。在自由的社会中,不能使用这些手段,而使用更为微妙的方法。政党路线并不阐明,而是预先设定好的。那些不接受的人不会被监禁,或是在被酷刑折磨和致残后被丢在沟里,但会保证不与大众发生接触。在主流范围内,即使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当这些异端言论能够被人所闻的时候,他们的话甚至不能被人理解。中世纪时期,人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异端,

去理解它,然后用理性的讨论与它斗争。时至今日,仅仅指出异端就够了。整整一大套概念被编造出来用于鉴别异端:“道德平等”、“马克思分子”、“极端的”……因此根本不用进一步的争论和评论就可以否定它。这些危险的、实际上无法表达的教条甚至成为“新的正统教条”^⑥,必须遭到那些主导着甚至近乎于完全控制着公众舆论的严阵以待的少数派的迎头痛击(更为准确的是,将它们区分开来,并惊骇地予以否定。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异端仅仅被忽略掉,而激烈的辩论只发生在那些接受确定信念的教条的人之间,围绕狭隘的和一般是边缘的问题展开。

当我们转向目前的话题——中东,很多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会辩论是否应该允许巴勒斯坦人进入“和平进程”,但是不允许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和以色列领导着拒绝主义阵营,一贯阻碍任何真正的“和平进程”,有时候甚至使用大量的暴力。至于恐怖主义,一名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警告说,我们必须避免“过度简化”,并且应该“考察当今中东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根源”,它们提出了“难以处理但是现实的问题”;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是什么导致恐怖分子继续他们邪恶的道路。^⑦对恐怖主义的辩论被完全区分开来:在一个极点,将其仅仅视为邪恶帝国及其附庸的阴谋;在另一个极点,我们找到更为平衡的思想者,他们避免这种“过度的简化”,继续调查阿拉伯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国内根源。在中东存在恐怖主义的其他根源——君主及其附庸在整个场景中也插了一手——的想法被先验地予以排除。它并没有被否认,但却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个相当大的

成就。

自始至终,通过牢固地设定可以想象的思想的边界,温和派和自由主义的鸽派在保证这种灌输体系的适当运转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他本人的杂志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在其他地方曾经解释说,他从来不浪费时间读报)写道:

不需要有核查媒体许可证的法律,是法律就行了,而且就它本身来说,绰绰有余。实际上,整个社会走到一起,对什么样的意见应该被表达出来达成一致,同意达成一个纲领,谁不同意谁就被开除,一千人中也没有一个人敢于表达不同意见。

他的陈述并不是很准确。哲学家约翰·多兰(John Dolan)观察到:“不是人民缺乏表达超出许可范围之外思想的勇气,相反,他们被剥夺了有这样思想的能力。”^⑧这是关键的一点,是推动“策划民主共识”的动机。

在《纽约时报》上,伍德鲁·威尔逊中心的沃尔特·赖克在提到“阿奇里·劳罗号”游艇劫持事件时,要求对那些“犯下恐怖主义谋杀罪行”的人施以严厉的司法标准,不论是其计划者还是实施者:

恐怖分子相信他们是被剥夺的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自由战士,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理由减少对(恐怖分子)的惩罚,就会由于接受了恐怖分子的辩护,即只有他们关于公正和权利的概念以及他们的苦难才是正当的,而破坏公正的基础……巴勒斯坦人

以及众多采取恐怖主义的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该放弃恐怖主义,找到其他的方法去实现他们的目标,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包括妥协。西方民主国家必须拒绝这样的辩护,即任何借口——即使他们是被剥夺的——都可能“减轻”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的责任。

如果严格禁止实施严厉的惩罚性行动的命令能够适用于自身,适用于君主及其附庸的话,那么崇高的话语应该得到认真对待。如果不能的话,这些责难不过与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其他共产主义前线组织制造出来的针对阿富汗抵抗组织所犯下暴行的高调同等价值。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雅菲战略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马克·赫勒(Mark Meller)解释道:“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是低强度的战争,因此它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在内有权使用其所支配的一切手段进行还击。”随之而来的是,“低强度战争”和“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其他受害者也“有权使用其所支配的一切手段进行还击”。君主及其附庸的受害者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萨尔瓦多人、尼加拉瓜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人。^⑨

只有当我们接受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适用于别人的标准同样适用于我们自身(如果严重的话,甚至应该适用更严格的标准)——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些后果。但是这一原则以及由于采纳这一原则而产生的后果很少在知识界的流行文化中得到理解,也很难发表在那些要求对其他人的罪行进行严厉惩罚的报刊上。实际上,如果任何人从这些原则中推导出这些逻辑后果,并清楚地将它们表达出来,那么

他会因为煽动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领导人的暴力行动而受到指控。

美国国内最怀疑的声音也同意：“卡扎菲上校对恐怖主义的公开支持是一种明显的邪恶”，“没有任何理由使谋杀者逃脱惩罚，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始作俑者的话。（原文如此）同样，以下考虑也不应该成为决定性因素，即报复会杀害某些无辜的平民，或是犯下谋杀罪行的国家从来不怕报应。”（安东尼·刘易斯语）^⑩这一原则赋予世界上很多人以暗杀里根或是轰炸华盛顿的权利，即使这种“报复会杀害一些无辜平民”。在这里所举出的例子和其他许多例子中，只要这一简单真理无法被表达出来的，或是超出了理解的范围，如果我们还相信我们参加的是民主政体的话，就是在自欺欺人。

媒体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围绕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海盗和小偷们表达他们自己的要求和感受。例如，国家广播公司由于对那名被指控策划了“阿奇里·劳罗号”游艇劫持事件的人进行了采访而遭到了强烈谴责，因为它使恐怖分子得以不受反驳地自由发表意见，从而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是一种可耻的背离，背离了一个运行良好的自由社会所要求的一致性。那么媒体是否应该允许罗纳德·里根、乔治·舒尔茨、梅纳赫姆·贝京、西蒙·佩雷斯以及其他代表君主及其附庸的声音不受反驳地发表讲话，鼓吹“低强度战争”、“报复”或是“先发制人”呢？是否允许恐怖分子指挥官的言论自由，从而服务于“大恐怖主义”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旦它被提出来，只会被厌恶或恐惧地予以摒弃。

在美国基本不存在文字审查,但是思想控制是一项繁荣的事业,实际上,对于一个建立在精英决策、公众批准或是被动接受这一原则基础上的自由社会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章

中东恐怖主义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 (1986年)

1985年10月17日,里根总统在华盛顿会见了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佩雷斯告诉里根,以色列准备在中东迈出“勇敢的步骤”,并且向约旦伸出“和平之手”。大卫·希普勒在《时代周刊》上评论道,“佩雷斯的访问正值美以关系异常和谐之时”,他引用了国务院一位官员的讲话,那位官员称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异常地接近和牢固”。佩雷斯被当成是一名和平人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因为他直接致力于“放弃战争努力以承担和平的代价”,(他本人的话)而受到赞扬。里根总统说,他和佩雷斯先生讨论了“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恐怖主义已经使许多以色列人、美国人和阿拉伯人沦为受害者,并给许多其他人带去了悲剧,”他还补充说,“我们都同意,恐怖主义一定不能减少我们在中东实现和平的努力。”^①

恐怕需要乔纳森·斯威夫特*式的天才能够公平对待世界上两个首要恐怖主义指挥官之间的交流。在原巴勒斯坦土地上要求获得民族自决权利的是两个群体,但是这两名领导人关于和平的共有观念进一步将其中一个群体,即原住民完全排除在外。约旦河谷是“以色列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佩雷斯在1985年巡视那里以色列定居点的时候宣布,这与他毫不动摇的立场保持一致。例如,“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圣经是决定我们土地命运的决定性文献”;以及一个巴勒斯坦国将“威胁以色列的生存本身”。^②他对一个犹太国家的观念由于比较温和而在美国获得很大的赞扬,但是这种观念不仅威胁,更消灭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斜体为原文所加)。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这一后果很重要,最多也就是这个不完美世界中一个小缺陷而已。

尽管鸽派倾向于将居住着大量阿拉伯人口的西岸土地从犹太国中排除出去以避免被他们委婉称之的“人口问题”,但是无论是佩雷斯还是任何一名以色列领导人都没有从现任总统哈伊姆·赫尔佐格在1972年的立场上移动分毫,他的立场是巴勒斯坦人永远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成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伙伴,对我们人民来说,数千年来这块土地一直很神圣”。所有继续接受什洛莫·加齐特的判断,即“破坏所有倡议”——主张政治行动、民主或是谈判的倡议——的政策是“成功的实践”,应该继续推行。1976年1月,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支

*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著有《格列佛游记》。——译者

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该决议呼吁达成一项建立两个国家的和平解决方案。当时总理伊扎克·拉宾的立场是,以色列将拒绝任何与巴解组织的谈判,即使它承认以色列并谴责恐怖主义,以色列也不会进入“与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谈判”,不管是否是巴解组织。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的立场依然保持了拉宾总理(现在是国防部长)的立场。尽管佩雷斯和里根知道,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人中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就如同1947年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那样具有很大的合法性,但是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考虑由巴解组织提出的明确的建议,即通过谈判达成在两个国家的方案下实现相互承认,这些建议与广泛的国际共识相一致,但是多年以来,这种共识每一次都被美国和以色列所阻碍。^③

这些关键的政治现实为任何对“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的讨论提供了必要的框架,根据美国舆论话语中的种族主义术语,这种邪恶之源指的是阿拉伯人而非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正如“和平”意味着赋予犹太人而非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的解决方案一样。

佩雷斯抵达华盛顿以与他的犯罪伙伴讨论和平和恐怖主义,这刚好发生在他派出轰炸机袭击突尼斯之后。这次袭击杀死了20名突尼斯人和55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记者阿姆农·卡佩利奥克从现场发回了报道。袭击目标是不设防的,“是一个拥有十几座房子的度假胜地,度假村和巴解组织办公室并列,并且它们是如此地交错在一起,即使从近处也很难区分开来”。使用的武器比在贝鲁特使用过的要更加先进,显然是“智能炸弹”(Smart Bomb),它们将目标化为

灰烬。

房子中的人被炸成无法辨认的碎片,他们向我展示了一系列死者的照片。他们告诉我,“你可以保留它们”。我将照片留在办公室里。世界上没有一家报纸会刊登这么恐怖的照片。他们告诉我,一个在巴解总部附近卖三明治的男孩被炸成碎片。他的父亲凭他脚踝上的一个伤疤认出了他。“一些伤者被从废墟下抬出来,看上去很健康,没有受伤,”我的向导告诉我,“半个小时后,他们在痛苦的扭曲中昏倒,随后死亡。很显然,他们的内部器官被爆炸的力量所摧毁。”^④

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的入侵中,大约 20 000 人被杀,国家大部分被毁。在巴勒斯坦人被赶出贝鲁特后,突尼斯在里根的要求下接受了他们。“你们是在用锤子打苍蝇”,“一名五角大楼中的显赫人物,同时也是一名熟悉以色列国防军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军队的将军”告诉以色列的军事记者泽夫·希夫,“你们对许多平民的袭击是没有必要的,你们对待黎巴嫩平民的态度使我们震惊。”以色列士兵和高级军官也有这种感觉,袭击和对待平民及囚犯的野蛮程度使他们感到震惊,^⑤但是以色列国内对侵略和对贝京-沙龙组合的支持与这些暴行同步增长,在 8 月对贝鲁特进行恐怖的轰炸后,这种支持达到了最高峰。^⑥西蒙·佩雷斯,一个追求和平的人以及在社会党国际中受到尊重的人物,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以色列付出的代价因为战后的萨布拉与沙提拉大屠杀事件而增加。随后,黎巴嫩抵抗力量使以色列付出

更多代价,这破坏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建立“新秩序”的计划,即由以色列控制南部的大块地区,而以色列的盟友长枪党和它挑选出的穆斯林精英则统治其余地区。(见本章的注释⑤⑤)

卡佩利奥克的结论是,阿拉法特毫无疑问是这次袭击的目标。他被带到巴解组织办公室中,办公室中有一张阿拉法特站在废墟中的照片,照片下还有说明:“他们要杀死我,而不是与我谈判。”“巴解组织希望谈判”,他们告诉卡佩利奥克,“但是以色列拒绝任何讨论。”这是一个对事实的简单陈述,但是在美国被有效地遮掩起来,或者更糟的是,鉴于具有导向性的种族主义前提,它被否定为是无关紧要的。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是这次袭击突尼斯的同谋。美国甚至没有警告受害者——它是美国的盟友,杀人者已经上路了。美国的借口是第六舰队和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大量监视系统无法发现在地中海上空加油的以色列飞机,相信这种借口的人应该要求国会对美国军队彻底的无能表现进行调查,这种无能肯定会使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袭击面前。“新闻报道现在引用政府的说法,称美国的第六舰队毫无疑问地已意识到这次袭击,但是决定不告诉突尼斯的官员。”《洛杉矶时报》报道称。但是“那项非常重要的声明并没有在东海岸两家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得到报道,同样没有被刊登在美国的其他报纸上,也没有被美联社和合众社在对海外进行报道时所采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中东记者戈弗雷·詹森写道,他还补充说,“绝对肯定的是,美国被动地参加了同谋。”⑦

马哈茂德·穆格拉比是突尼斯轰炸事件中的一名受害者,他1960年生在耶路撒冷,在16岁之前就被拘留了12次。在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对以色列的酷刑进行调查(1977年6月19日)时,他是一名知情人。根据他的以色列犹太朋友所写的纪念性文章,他“在军事占领下的持续恶化的条件下,在越来越边缘化的情况下生活数年后,成功地逃到了约旦”。但是在以色列的军事审查下,这篇文章一再被拒绝刊登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报纸上。^⑧当然,这些事实在美国毫无意义,仅仅因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所作的异常仔细的研究大部分被排除在媒体之外。虽然自由主义的《新共和》杂志提到了这项调查,但是同时对这种针对阿拉伯人的酷刑进行了明确的辩护,而公众对这样的辩护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⑨

美国将以色列对突尼斯的轰炸视为对“恐怖主义袭击”的“一种合法反应”而加以赞同。国务卿舒尔茨在给以色列外长伊扎克·沙米尔的电话中确认了美国的支持,并告诉他,总统和其他人“相当同情以色列的行动”。^⑩在全球作出相反反应后,美国撤回了这种公开的支持。但是与通常一样,它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谴责时弃权,安理会谴责这种“武装侵略的行动”“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行为准则”。美国国内的学术和文化气氛被反映在如下的一个事实上,即美国的弃权被挖苦为“亲巴解组织”和“反以色列”的又一例子,是拒绝对恐怖分子——经过仔细挑选的——进行猛烈打击。

有人可能会提出,以色列的轰炸不应该被归入到国际恐怖主义之中,而应该被归类为更严重的罪行——侵略,正如联合国安理会主

张的那样。也有人会认为,将由其他人定义的“国际恐怖主义”加诸于以色列是不公平的。为了反驳后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它自己的学说,正如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大使在国际恐怖主义大会上所表达的那样。他解释说,恐怖主义的标志性因素是“旨在引发恐惧的蓄意和系统地谋杀以及伤害平民”。^①很明显,以色列对突尼斯的袭击以及多年来的其他袭击属于这个概念的范畴,但是绝大多数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则不属于,包括那些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马洛特事件,慕尼黑惨案,为1978年入侵黎巴嫩提供借口的海岸公路惨案等等),甚至劫持飞机或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劫持人质(恰好是他所参加会议的主题)也不属于这一范畴。

对阿拉法特的巴解总部的袭击号称是为了报复发生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的三名以色列人被杀事件。罪犯已经被抓住并面临审讯。“西方的巴解问题外交专家”怀疑阿拉法特是否知道这项筹划好的行动。“以色列人也同样放弃了最初认为阿拉法特先生卷入其中的主张”。^②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进行辩护的人对这一点不感兴趣,他们使我们确信,“以色列对突尼斯的攻击目标正好是那些对恐怖主义活动负责的人”。他们解释说,不管事实如何,“这些罪行的更大的道德责任……完全要由阿拉法特承担”,因为“他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巴勒斯坦暴力活动之父”。在对以色列的院外集团美国-以色列公众关系委员会的演讲中,总检察官埃德温·米斯声称,美国认为阿拉法特很大程度上要“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负责”。而真正的事实似乎无关紧要。^③因此,任何“反对巴解组织”的行为——正如历史记

录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目录——都是合法的。

对突尼斯的袭击与以色列建国初期以来的做法保持一致:报复针对的是弱者,而不是那些罪犯。对巴解组织的标准谴责是“巴勒斯坦人不去直接袭击那些像以色列一样重视安全的敌人,而是袭击那些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其他地方的比较薄弱的以色列目标”,^④这是他们卑鄙和懦夫本性的又一个标志。以色列的类似行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规模也大得多,但是在对美国所偏袒下的盟友的英雄主义、军事效率和“纯粹的军事性”的普遍赞扬中,以色列的这些行动逃脱了人们的注意。“报复”的概念同样提出了好几个问题,我们将直接转入这一话题。

当198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媒体回顾了“血腥的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年”的记录,包括9月25日在拉纳卡的谋杀,10月7日“阿奇里·劳罗号”游艇劫持事件,其中一名瘸腿的美国游客利昂·克林霍弗被杀。以色列10月1日对突尼斯的袭击却未被列入其中。在冗长的对恐怖主义的年底回顾中,《时代周刊》简要提到了对突尼斯的袭击,但不是作为恐怖主义的例子,而是作为报复的例子,将它称之为“一次绝望的行动,对巴勒斯坦的暴力活动基本没有影响,并引起其他国家的一片喧哗”。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艾伦·德肖维茨谴责意大利与国际恐怖主义勾结,因为它释放了“被指控策划了(“阿奇里·劳罗号”游艇)劫持事件”的人,他还观察到,美国“将引渡任何对其他国家的公民实施暴力的以色列恐怖分子”,例如,阿里埃勒·沙龙、伊扎克·沙米尔或是梅纳赫姆·贝京。这篇文章正好出现在华盛顿设宴招待佩雷

斯,并赞扬他致力于实现和平的当天(对突尼斯轰炸后不久)。在通行的文化气氛下,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⑮

在主流社会中,人们以明显严肃的态度报道和讨论里根对恐怖主义的声明,但是偶尔也有一些批评者对他们的伪善进行评论,即这些人在猛烈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却将他们的代理人的军队派遣出去,在尼加拉瓜进行谋杀、伤害、施以酷刑和进行破坏。在萨尔瓦多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在萨尔瓦多的行为较少被人提起,因为它们被看作为一个巨大的成功——他们下决心努力避免一个具有重要意义成功的民主所带来的威胁。在关于和平和恐怖主义的里根-佩雷斯言论发表后不久,一个由 120 名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从业人员组成的团体结束了一项对尼加拉瓜的调查返回美国,这项调查得到了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他们报道说,由于医院和诊所被毁,卫生从业人员被杀,农村的药店被洗劫,导致药品严重短缺,并中断了一项小儿麻痹症的接种计划。这些破坏只是位于华盛顿和迈阿密的国际恐怖主义中心所组织的暴力运动的一小部分;^⑯在挖掘和核实反政府组织的暴力的大量证据方面,《时代周刊》驻尼加拉瓜的记者的热情经常可以和他们在阿富汗的《真理报》同行们相媲美。但是,上述报道,就像许多其他例子一样,被“档案记录报”(即《纽约时报》)所忽略。

对突尼斯近郊的袭击产生了对伪善的一种衡量标准,它一向不容易把握。假设尼加拉瓜对华盛顿进行轰炸,目标是里根、舒尔茨和其他国际恐怖分子,“意外地”杀死了大约 100 000 人。如果拉纳卡-

突尼斯一例中 25 比 1 的比例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按照美国的标准,这是一种完全正当和合法的报复。为了更精确,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补充:在这个假设中,至少报复针对的是罪犯本身,而且对谁首先发动了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也无疑问。考虑到相对的人口规模,恰当的死亡人数可能还要翻几倍。里根总统曾宣布,“恐怖分子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必须受到惩罚”,^{①7} 这为任何类似的报复行为提供了道德基础,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即使主流媒体中对里根最严厉的批评家们也对此表示完全一致。

佩雷斯已经标榜自己为追求黎巴嫩的和平的人。^{①8} 在他成为总理后,以色列强化了在被占领的南黎巴嫩土地上针对平民的“反恐”计划,它在 1985 年初的铁拳行动中达到了野蛮的顶点。柯蒂斯·威尔基评论道,这一行动具有“拉丁美洲死刑队的特点”,其他现场记者的报道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在扎里亚(Zrariya)村,以色列国防军对其当时的战线的北部发动了一次行动,在对扎里亚村及其周围的三个村子进行了数小时的猛烈炮击后,以色列国防军押走了所有的男人,杀死了 35—40 人,其中一些死在被以色列坦克碾碎的汽车里。其他的村民被打或被杀。一辆坦克向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开火,警告他们走开。官方将(这次行动)称之为与具有强大武装的游击队的一场枪战,不可思议的是,以色列军队竟然毫无伤亡。前一天,12 名以色列士兵在靠近边境的地方死于一次自杀式袭击,但是以色列否认对扎里亚的袭击是报复行动。美国的评论家忠实地将以色列的否认作为一个事实发表出来,他们解释说,“情报部门认定,这个镇子已经成为

恐怖分子的一个基地……在一个小村子中,有超过 34 名的什叶派游击队员在枪战中被杀,100 多人被带回讯问”,(埃里克·布赖因德德语)这证明了什叶派恐怖主义网络的规模。现场的报道者观察到,由于没有意识到官方的路线,以色列士兵在小镇的墙上用阿拉伯语涂上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报复”的标语。^①

在其他地方,以色列的枪手向学校和医院开枪,带走“嫌疑分子”,包括那些躺在病床和手术室里的人,以进行“审讯”或是送到以色列集中营,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暴行,一个经常在这一地区旅行的西方外交官形容这些罪行达到了“蓄意野蛮和任意谋杀”的新高度。^②

以色列国防军驻黎巴嫩联络部队司令什洛莫·伊利亚说“对付恐怖主义的惟一武器是恐怖主义,在已经使用过的那些‘讲恐怖分子听得懂的话’(的手段)之外,以色列还有其他选择”。这种概念并不新鲜,盖世太保在被占欧洲上的行动也是“以对付‘恐怖主义’的名义为其提供合法理由”,克劳斯·巴比*的一个受害者被谋杀后,他的胸前被发现别着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恐怖对付恐怖”。凑巧的是,这是一个以色列恐怖主义组织使用的名字,也是《镜报》报道美国 1986 年 4 月对利比亚轰炸的封面故事的标题。一项呼吁谴责“以色列对付黎巴嫩南部平民的行为和措施”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被美国否决,理由是它“采用了双重标准”;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解释说,“我们不相信一个不平衡的决议会结束黎巴嫩的苦难。”^③

* 著名的纳粹战犯。——译者

当抵抗力量迫使以色列军队撤军的时候,以色列的恐怖行动在继续。当以色列部队和它的附庸南黎巴嫩军 1985 年 12 月 31 日“袭击了南黎巴嫩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村庄库宁(Kunin),迫使大约2 000人的全体居民离开”的时候,他们为这个“血腥的国际恐怖主义之年”画上了一个句号。在袭击中,他们或是将房子炸上天,或是将其焚毁,并围捕了 32 名年轻人。据报道,老人、妇女和儿童逃散到了以色列“安全区”外的一个小镇上,在那里联合国部队有个指挥所。^②

这个报告发自贝鲁特,来自一名记者的亲眼目睹,并被黎巴嫩警方所引用,这名记者属于一家保守的贝鲁特报纸《日报》和什叶派的“阿迈勒”运动。乔尔·格林伯格从耶路撒冷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它不是建立在任何经过证实的消息来源的基础上,而是根据一个简单的事实:“两名南黎巴嫩军士兵在村子里被杀后,害怕南黎巴嫩军报复的村民们逃离了什叶派村子库宁。”^③

这种对比很常见,很有启发性。由于媒体压倒性地依赖于驻以色列的记者的通讯报道,以色列的宣传从中获益很大。这产生了两个关键的优势:第一,“新闻”是通过以色列官方的眼光展现在美国的读者和听众面前的;第二,除了极少数美国记者进行独立的调查,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与他们合作的东道主之外,以色列的宣传系统和它众多的美国分支能够痛苦地进行抱怨:阿拉伯的罪行被忽略了,而与此同时,由于对以色列报道的密集程度,以色列的任何微不足道的瑕疵都受到详细的审查。

如果不能够按照通常的方式管理新闻,有时候会产生问题。例

如,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当以色列无法控制驻黎巴嫩记者的目击报道的时候。这引起(美国舆论)一片大哗,抗议(世界舆论)兜售暴力,捏造事实,发动了针对可怜的小小以色列的“大规模的大众精神战”,这是世界舆论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的又一显示。以色列变成了受害者,而非侵略者。容易得到证明的是,种种指控都是虚假的,经常是滑稽可笑的。并且可以预料的是,媒体会屈服,倒退回到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对于记者来说,试图在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轰炸中生存下来,并非易事。来自以色列的证据经常比在美国媒体中得到报道的要严厉得多,出现在美国新闻报道中的经常只是一个比记者实际感知到的大大弱化的版本。^{②4}但是这些指控往往得到认真对待,尽管它们明显很荒唐,而对媒体的准确批评——批评它们屈从于美国——以色列的观点,并压制不可接受的事实——则被忽略。有一项关于“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媒体报道中的公开出版的分析”的研究,典型的是,它包括了媒体对所谓反以色列立场的大量谴责以及对这些指控的少数辩护,但是甚至没有一项提到了对恰好与之相反现象的大量的、相当准确的批评性分析。^{②5}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学术氛围的狭隘限制内,只有前面一种评论才能被听到。这是相当典型的一个现象,很容易通过它与印度支那战争、中美洲战争等之间的联系得到证明,它被用作是思想控制的另一个工具。

被以色列的指挥官满意地称之为“恐怖主义”的铁拳行动(参见前面所引的伊利亚将军的评论)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根据约翰·基夫纳(从黎巴嫩)的说法,是“通过提高支持游击队的代价,使人

民转而反对游击队”；简言之，使人民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人质，直到他们接受以色列试图通过武力强加给他们的协议。第二个目的是激化黎巴嫩的内部冲突并在种族冲突之后实施总人口的更换，自1982年以来，占领者已经以典型的方式煽动起了大量冲突。驻黎巴嫩记者吉姆·缪尔评论道，“存在着大量的证据证明以色列帮助鼓动和激起了基督徒和德鲁兹派穆斯林（在舒夫（Chouf）地区）的冲突。”在南部，一名国际援助组织的高级官员说，“他们那个采用肮脏伎俩的部门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以激起麻烦，但就是不奏效。”“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这个观点“为整个国际救援界所共享”。“当地目击者报道说，以色列的士兵经常从附近的基督教区向巴勒斯坦营地射击，试图煽动巴勒斯坦人反对基督徒”，基督教派村庄的居民则报道说，以色列的巡逻队迫使基督徒和穆斯林在枪口下互相厮打，这是各种“奇怪的羞辱”方式中的一种。这种战术最终起作用了。以色列的基督教盟友们，在西顿附近袭击了穆斯林，他们所采用的袭击方式肯定会引来更强大的武力还击，从而开始了一次血腥的暴力循环，最终会导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逃离，许多人逃到南部以色列控制下的地区，同时成千上万的什叶派则被佩雷斯的铁拳行动赶到北部。^②

美国国内的借口是，以色列一直在计划撤军，只是什叶派的恐怖分子一直沉迷于阿拉伯人通常对暴力的乐趣之中，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原因，因此延误了以色列计划中的撤军。但是正如吉姆·缪尔正确评述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袭击和袭击所造成的伤亡，以色列现在不会撤军，这是一个不存在重大争议的历史事实。”而撤军的程度将由抵

抗的激烈程度决定。^⑦

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解释说,铁拳行动的受害者是“恐怖分子的村民”。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南黎巴嫩军的武装分子屠杀了13名村民,而正是这一事件引发了这种评论。西罗亚(Shiloah)研究所(以色列的一个战略研究所)的约西·奥尔默特评论道,“这些恐怖分子在当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下展开活动。”一名以色列指挥官抱怨说,“恐怖分子……在这里有很多耳目,因为他生活在这里。”而《耶路撒冷邮报》的军事记者称他们是“恐怖分子的雇佣军”或是“狂热分子,他们所有人都冒着在对付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中丧生的危险,充分献身于他们的事业”,他在解释他们作战时所要面临的问题时认为,必须在被占的黎巴嫩南部“维持秩序与安全”,尽管“当地的居民将为此付出代价”。他表达了他对“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方式的敬意”。

利昂·维泽尔蒂尔认为,反对占领军的“什叶派恐怖主义”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一样,都是邪恶的阿拉伯人本性的一种表现,他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巴勒斯坦的凶手想要杀人,而什叶派的凶手愿意赴死”,他们“在一种信徒式的要求激发下”采取行动,“要求的不仅仅政治上和军事上得到满足的世界”,并不是将占领军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那么简单。自1975年建立以来,“阿迈勒运动”就把自己“神圣地奉献”给了“摧毁以色列”的事业,这种发现比以色列宣传系统(哈巴拉委员会)所编造的故事还要好得多。^⑧

同样的关于恐怖主义的概念也在美国的官员和评论家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因此,媒体在不加评论的情况下报道说,在1983年驻黎巴

嫩的美军海军陆战队遭到自杀性袭击后,国务卿舒尔茨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关注开始变为“他的热忱”。毫不意外的是,大部分的当地居民将这些部队视为外国的军事力量,被派来将以色列占领所建立的“新秩序”强加在他们头上。巴里·鲁宾写道,“黎巴嫩国内叙利亚支持下的恐怖主义的最重要的用处是迫使以色列军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军”,伊朗和叙利亚都支持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极端团体”的“恐怖主义行为”,例如对“以色列支持下的南黎巴嫩军”的袭击。对国家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而言,对占领军及其当地附庸的抵抗是恐怖主义,应该予以严厉地还击。《时代周刊》的以色列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习惯地将黎巴嫩南部针对以色列军队的袭击称之为“恐怖主义的爆炸”或是“自杀式恐怖主义”,他使我们确信,这些袭击是“心理脆弱或是宗教狂热”的产物。他进一步报道说,那些违反了占领军制定的规定的以色列“安全区”内的居民将“当场受到枪击,然后再加以询问,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无辜的旁观者”。但是这种行为不是国家恐怖主义。他还提道,以色列“尽力限制新闻从这个地区传出去”：“不允许记者报道自杀袭击的后果,基本上没有任何消息被发表出去。”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他充满信心地报道那些被占领者称之为“恐怖分子”的背景、心理状态和精神上的混乱。^②

当里根和佩雷斯在那些值得尊敬的听众面前互相祝贺对方反对“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的原则性立场时,媒体报道了南黎巴嫩的另一起恐怖主义事件:“恐怖分子杀死了6人,摧毁了南黎巴嫩一座属于美国的基督教广播站”,当天的头条是这样写的。^③黎巴嫩的恐怖分子怎

么能够摧毁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管理的“希望之声”？这个问题很少被提起，让我们根据经过澄清的关于恐怖主义和报复的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个原因是这个广播站“为南黎巴嫩军代言”，^①南黎巴嫩军是以色列为了威吓“安全区”内的人口而建立的雇佣军。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广播站的位置，它靠近希姆(Khiam)村。希姆的历史在以色列和黎巴嫩都很有名，虽然在美国不是那么有名，泽夫·希夫在提到佩雷斯的铁拳行动的时候影射了这段历史。他评论道，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的时候，希姆村“空无一人”，但是现在有10 000名居民，黎巴嫩小镇奈巴提亚(Nabatiya)当时只有5 000人，而现在有50 000人。希夫解释道，“这些人和其他居民将被迫再次逃离他们的家园，如果他们允许他们社会中的极端分子或是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定居点的话。”^②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如果他们敢于效仿以色列国防军的所作所为的话，包括袭击黎巴嫩的村庄，随意杀害平民和进行破坏，以防止“从来没有消失过的恐怖主义”，因为“以色列士兵每天都在南黎巴嫩遭到骚扰”。^③

对那些作为警告对象的黎巴嫩人以及对于他的以色列听众中至少消息比较灵通的那部分人来说，希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奈巴提亚的人口在1982年之前减少到5 000人，而希姆则一个人也没剩下。70年代初期以来的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轰炸将希姆的居民全部赶走，其中还杀害了数百人。留在希姆的一小部分人在1978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人侵中被杀光。他们是在以色列精锐的格兰尼(Golani)旅的

眼皮下,被以色列的“哈达德”(Haddad)武装分子所杀。“追求和平之人”是这样解释的,它“成功地在这地区建立了相对的和平,防止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重返”。^④

希姆还是一个“秘密监狱”的所在地,“由以色列及其在南黎巴嫩的盟友——当地的武装分子(所维持)——据以前关押的囚犯和当地的国际救援官员的说法,被拘留者被置于可怕的条件,遭到毒打和电击的折磨。”红十字会报道说,“以色列管理着这个中心”,以色列国防军禁止外人进入。^⑤霍洛维茨证实了这些报道,补充说,以色列吸取了“安萨尔(Ansar)(以色列管理的集中营)的教训”,因此安排南黎巴嫩雇佣军来管理希姆这个酷刑集中营以转移批评。以前的囚犯所做的大量有关酷刑的报道在美国不被人理会,但是在其他地区并非如此。保尔·凯斯勒(来自法兰西学院,是法国苏联犹太人问题医师委员会的共同创始者)引用了上诉证据,他评论道,囚犯中的绝大多数是“被当作是嫌疑人在搜查活动中被挑出来的,或是那些因为拒绝与占领方合作,特别是拒绝加入以色列领导的‘南黎巴嫩军武装组织’的村民”;无人被起诉或是受到审判,尽管有些人被拘禁了一年多。希姆是主要的中心,但不是惟一的中心。凯斯勒报道了南黎巴嫩军看守系统地使用酷刑的情况,他们是在“以色列军官的指导下”管理囚犯的。^⑥

如果类似的事情可以和其他具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使用价值的恐怖主义行为一起,被认为适合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那么对于“狂热分子”1985年10月17日对希姆的恐怖主义袭击,可能有更多的话可以说。

奈巴提亚也有更多的故事可说。60 000 人口中的 50 000 人逃离家园，“主要是害怕(以色列)的炮击”，两名《耶路撒冷邮报》的记者对此进行了报道，当时他们正在黎巴嫩南部游历，试图发现巴解组织恐怖主义的证据，但是基本上没有找到，而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及其影响的证据大量存在。^⑳类似的一次轰炸发生在 1977 年 11 月 4 日，当时奈巴提亚“处于来自(以色列支持下的)黎巴嫩马龙派阵地的猛烈炮火之下，这种猛烈炮火也来自以色列在前线两边的炮兵阵地，包括黎巴嫩境内的六个坚固据点”。袭击持续到了第二天，在死者中有三名妇女。11 月 6 日，法塔赫游击队发射的两枚火箭在纳赫里亚(Nahariya)杀死了两名以色列人，它引发了一场炮战，随后的第二次火箭袭击杀死了一名以色列人。“随后以色列发动了空袭，杀死了大约 70 人，几乎都是黎巴嫩人”。^㉑

这场以色列发起的交火很可能导致一场大战，埃及总统萨达特将它作为数天后访问耶路撒冷的一个理由。^㉒

这些事件以不同的形式进入历史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新闻界，而且在学术界。“为了中断通往和平大会的运动”，爱德华·黑利写道(没有引用任何证据)，“巴解组织于 11 月 6 日和 8 日向以色列北部的村子纳赫里亚发射了喀秋莎火箭，杀死了 3 人”，并且在 11 月 9 日引发了“以色列的必然还击”，在“南边的蒂尔(Tyre)和其他两个小镇内和附近”超过 100 人在袭击中丧生。^㉓作为一项规则，“净化过”的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恐怖主义，以色列随后进行了报复，虽然报复可能过于严厉了。在真实世界中，真相往往与此不同，

其对于中东恐怖主义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

奈巴提亚的磨难极少在西方媒体中提到,但是也存在少数几个例外。以色列的一次袭击发生在1975年12月2日,当时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一个小镇,使用了杀伤性武器、炸弹和火箭,杀害了数十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④不同寻常的是,这次袭击被报道了出来,但是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和关注,也许因为它看起来是一次“报复”:也就是说,对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报复,它刚刚同意举行一次会议,用于讨论得到叙利亚、约旦、埃及和巴解组织支持的和平方案(第一章讨论过)。

故事继续在发展,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1986年初,当世界的目光集中在阿拉伯世界那些疯狂的恐怖分子所制造的恐怖之时,媒体报道称以色列的坦克向黎巴嫩南部的斯雷法(Sreifia)村倾泻炮火,目标是三十所房子,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反抗他们军事行动的“武装的恐怖分子”从这些房子里向他们开火,他们声称他们当时正在搜索两名在黎巴嫩的以色列“安全区”中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报告很大程度上被美国媒体隐而不发,报告称以色列部队在这些行动中“真的发疯了”,封锁了整个村子,禁止联合国部队给那些受到“审讯”——意味着以色列军队亲自动手,或是他们在当地的雇佣军在以色列部队旁观的情况下对男人和妇女的残忍折磨——的村民送水、牛奶和橙子。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离开了,带走了包括孕妇在内的很多村民,其中一些人被带到了以色列,这更进一步违反了国际法;他们摧毁了房屋,洗劫和破坏了其他(设施)。而与此同时,西蒙·佩雷斯说,以色列对被绑架士兵的搜索“表达了我们对人类生命

和尊严价值的态度”。^②

一个月后的3月24日,黎巴嫩电台报道,以色列的部队——不管是以色列国防军还是南黎巴嫩雇佣军——轰炸了奈巴提亚,打死3名平民,打伤22人,“在破晓时分当人群聚集起来开始交易的时候,炸弹猛烈地轰到了镇中心的市场上”。这次袭击据说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雇佣军所受到的一次袭击。什叶派“阿迈勒运动”的一名领导人发誓:“以色列的定居点和基地将处于抵抗力量的打击范围之内。”3月27日,一枚喀秋莎火箭击中了以色列北部的一所学校,打伤5人,并引发了以色列对西顿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打击,打死10人,打伤22人。但是,以色列的北部军区司令在以色列军队电台上声称,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确定究竟是什叶派还是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发射的火箭。4月7日,以色列飞机轰炸了同一个难民营以及附近的村子,打死2人,打伤20人,(以色列人)声称恐怖分子从那里出发,试图杀害以色列平民。^③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只有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才值得电视台进行痛苦报道,以及值得人们对“恐怖主义邪恶之源”的普遍愤慨。虽然,由于一场反对尼加拉瓜“入侵”洪都拉斯的集体歇斯底里正在被组织起来,这种愤慨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当时尼加拉瓜军队行使的是合法的追捕权利,要将那些被他们的美国主子派出的恐怖主义团伙从其领土上赶出去,他们之所以被派出是为了赶在国会对援助反政府武装进行投票之前展示力量。回想一下,在这个恐怖主义国家中,惟一一个正在严肃辩论中的问题是代理人军队是否能够完成他

们的主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④形成对比的是,以色列在炮击和轰炸小镇和难民营时也不在行使合法的追捕权,它的“大恐怖主义”行为和对黎巴嫩的直接入侵也不在这一权利的概念之下。但是作为一个附庸国,以色列从君主那里继承了恐怖主义、酷刑和侵略的权利,而尼加拉瓜作为敌人,就缺少在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下保卫自己领土的权利。因此,很正常的是,以色列的行动被忽略了,被视为合法的报复行为。与此同时,国会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图谱,谴责“尼加拉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他们再次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以色列 1982 年 6 月对黎巴嫩的侵略也按常规地以一种被适当“净化过”的形式被报道出来。西蒙·佩雷斯写道,“为了加利利的和平”行动是为了“保证加利利地区再也不会遭到喀秋莎火箭的轰炸”。埃里克·布赖因德尔解释说,“当然,以色列 1982 年侵略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加利利地区……免遭喀秋莎火箭袭击以及其他来自黎巴嫩的炮击”。《时代周刊》的新闻版告诉我们,侵略在“巴解组织游击队对以色列北部的定居点的袭击后”开始,并且以色列领导人“说他们希望结束对以色列北部边界的火箭和炮弹袭击”(杂志对此未予置评),这一目标“在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渡过的三年时间里已经得到了实现”。亨利·卡姆补充说,“有将近三年的时间,谢莫纳村(Qiryat Shemona)的居民不用再睡在防空洞里,当孩子出去上学或是游玩的时候,父母也不再需要担心。苏联制造的喀秋莎火箭多年来一直间隔不定地袭击这个靠近黎巴嫩边界的小镇,但是自从以色列 1982 年 6 月入侵黎巴嫩以来,火箭再也没有落下来过”。托马斯·弗里德曼评论道,“当

在黎巴嫩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如果火箭仍然如雨点般落在以色列的北部边界上,以色列的公众将会陷入暴怒之中。”“……眼下并无火箭落在以色列北部……如果对以色列边界的大规模袭击重新开始的话,少数派(赞成在黎巴嫩保留军队)又会再次成为多数派。”“为了加利利的和平行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最初”是为了保护平民免受巴勒斯坦枪手之害,弗里德曼在一篇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中写道,这种关于以色列人的苦难历程的故事数不胜数。政治人物经常详细阐述同一个教条。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写道,“叙利亚增加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巴解组织为了袭击以色列而利用黎巴嫩,这些导致了以色列(1982年)的入侵。”罗纳德·里根则显示了另一种道德懦弱,他要求我们“回忆一下,当(侵略)完全开始的时候,由于它自己的北部边界被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侵犯,以色列已经铺平了通往贝鲁特的道路”,在那里“有10 000名巴勒斯坦人(!),正是他们将毁灭带到贝鲁特”,而不是他所支持的那些轰炸者。^④

这些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例子——许多生动地描述了遭到喀秋莎火箭随意轰炸的加利利人民的苦难——帮助创造了一幅被认可的苏联武装下的巴勒斯坦狂热分子的图画。它是以俄国为基础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中心组成部分,它迫使以色列入侵和打击巴勒斯坦难民营和其他目标,以保护人民免受残酷的恐怖主义袭击,任何国家都会那么做。

真实世界再一次有所不同。大卫·希普勒写道,“在以色列上一次对黎巴嫩的入侵(1978年)和这次入侵(1982年6月6日)之间的四

年中,以色列北部一共有 29 人死于从黎巴嫩发动的各种形式的袭击”,但是在 1982 年入侵前的一年时间里,“边界是平静的”。^⑥这一报道是不同寻常的,至少它接近了一半的真相。虽然巴解组织在以色列入侵前的一年避免开展跨边界行动,边界仍然远非平静,因为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在继续,杀害了许多平民。只是在美国话语的种族主义意义上,边界才是“平静的”。此外,不管是希普勒还是他的助手都无法回想起,尽管自 1978 年以来,以色列北部只有 29 人被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却杀害了数千人,这些袭击在美国国内几乎不被提及,在偶尔提起的时候,也被认为是“报复性的”。

1978 年以来的轰炸是戴维营“和平进程”的关键部分,可以推断的是,随着主要的阿拉伯遏制者(埃及)现在逐渐远离冲突,以及美国迅速增加了对它的军事支持,以色列获得了在袭击北部边界的同时扩展对占领土地的接管和压制的自由。威廉·昆特进一步评论道,“以色列针对巴解组织的入侵黎巴嫩的行动计划(1981—1982 年)似乎与埃以和平条约的巩固巧合。”应该注意的是,戴维营协议显而易见的意义(尽管在当时以及以后几乎无法在美国国内得到表达)被称职的美国记者所理解。因而在以色列的一次采访中,大卫·希普勒说:“在以色列方面,我似乎觉得这项和平条约为黎巴嫩战争做好了准备。随着埃及不再是一个对抗国家,以色列觉得可以放手在黎巴嫩发动一场战争,这可能是以色列在订立和约之前不敢做的一件事……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没有和约,黎巴嫩战争可能不会发生。”这很难说是一种讽刺,而只是这一进程的固有组成部分。^⑦根据我的了解,在他

作为《时代周刊》驻以色列记者的五年时间里(结束于1984年6月)或是在这之后,他并没有在《时代周刊》上这么写。

希普勒补充道,“我认为,如果不是这同一个和平协议的话,在以色列人中间不会对战争有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当时他就在以色列,他不会不了解这种“对战争的强烈反对”是一种事后的宣传,它被编造出来用于恢复“美丽以色列”的形象。在战后的萨布拉与沙提拉屠杀发生之前(那时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者也放弃了这艘沉船,开始编造关于“初期反对”的欺骗性历史,非常类似于印度支那战争时候的情况),以及后来占领的代价开始上升之前,事实上反对意见微不足道。^④

转向真实世界,首先考虑一下“为了加利利的和平”行动的直接背景。巴解组织遵守了1981年7月美国安排的停火,尽管以色列反复进行挑衅,试图挑起巴解采取的某些行动,以便使以色列有借口进行计划中的入侵。这些挑衅包括1982年4月末的轰炸——杀死20余人,炸沉了渔船——等等。(巴解组织没有遵守停火的)惟一的几次例外包括5月份在以色列轰炸之后的一次小报复,对以色列6月份对黎巴嫩的猛烈轰炸和地面进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一次还击。这些以色列袭击都是为了报复阿布·尼达尔组织(巴解组织的死敌,它在黎巴嫩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对以色列驻伦敦大使的一次暗杀企图。又是“报复”这个熟悉的说法。正是这次暗杀企图被用于经过长期筹划的侵略的借口。

《新共和》告诉我们,联合国的调解人布赖恩·厄克特的成功是

“次要的,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遗忘的:例如,他在1981年和巴解组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原文如此)”。^{④9}严格遵守官方路线的报刊倾向于“忘记”事实,这并不让人奇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便的记忆错误非常流行。

1981年7月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奉行同一个模式。5月28日,泽夫·希夫和埃胡德·亚里写道,梅纳赫姆·贝京总理和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采取了另一项步骤,使国家非常接近(发动)一场在黎巴嫩的战争,还策划了一项实际上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轰炸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集中营”(这个术语一般用来指以色列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破坏了停火。海上和空中的袭击持续到了6月3日,希夫和亚里继续写道,“巴勒斯坦人小心翼翼地作出反应,担心激烈的反应只会引来以色列毁灭性的地面攻势。”又一次停火被达成,但是在6月10日再次被以色列打破,它进行了新的轰炸。这次巴勒斯坦作出了反应,用火箭进行了袭击,在加利利的北部造成恐慌,随后以色列对贝鲁特和其他平民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到6月24日宣布停火的时候,大约450名阿拉伯人,他们几乎全部是黎巴嫩人,以及6名以色列人被杀。^{⑤0}

在这一事件中,所有被记住的是加利利北部地区所遭受的苦难,它遭到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随意的喀秋莎火箭轰炸,轰炸最终引发了以色列的报复,它于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甚至那些并不只是为官方宣传提供渠道的严谨的记者有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爱德华兹·沃尔什写道,“1981年反复的火箭袭击将(谢莫纳村)再次围困了

起来”，他描述了1981年那些“心烦意乱的父母”，以及“临近的巴勒斯坦基地发出的炮火和火箭的密集轰炸”所造成的恐怖，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文字说明正在发生的事情。柯蒂斯·威尔基是美国在中东的记者中感觉比较敏锐、比较持怀疑态度中的一位，他写道，谢莫纳村“1981年处于巴解组织的毁灭性炮火之下，苏制喀秋莎火箭的攻击在某一点上是如此密集以至于那些没有逃离的居民被迫在防空洞中连续呆上八日八夜”；同样，没有进一步的文字说明这种“毁灭性炮火”的原因，也没有说明贝鲁特和其他平民区域内的人民的情绪，在那些地方几百人死于以色列的致命轰炸中。^⑤

这些例子对理解“恐怖主义”和“报复”这些概念提供了进一步的洞察力，正如它们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内被解释的那样，也为那些前提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洞察力，这些假设用常见的理由理所当然地将那些主要受害者的苦难排除在外。

官方的说法是，“对以色列北部边界的火箭袭击和炮击”的停止应该归功于“为了加利利的和平”行动（《纽约时报》；见上文），这是一种双重错误。首先，除了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袭击和挑衅之外，在入侵前一年，边界是“平静的”。主要的火箭袭击活动发生在1981年7月，是对以色列恐怖主义的反击，以色列的仅仅一次袭击所造成的伤亡就几乎是巴勒斯坦反击所造成的100倍。第二，与此前的一段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针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在入侵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从1983年初开始，并一直持续下去。一群（对官方立场）持异议的以色列记者报道说，在1985年9月的两个星期内，加利利遭到了14枚

喀秋莎火箭的袭击。此外,在战后的几个月内,西岸的“恐怖主义袭击”增加了50%,并且从黎巴嫩战争开始到1983年底之前,增加了70%,到1985年之前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这是对巴勒斯坦平民社会和政治体系所犯下的野蛮暴行和破坏的结果,这一点并不让人吃惊。^②

1982年侵略的真正理由并不像粉饰过的历史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对付加利利北部的威胁,相反,正如以色列国内的首席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希伯来大学教授耶霍舒亚·波拉特(根据以色列的说法,他是一个“温和派”,支持工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约旦方案”)在侵略开始后不久令人信服地解释的那样,发动入侵的决定“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停火得到了遵守”。对于以色列政府来说,这是“真正的灾难”,因为这对它逃避政治解决的政策产生了威胁。“政府的希望,”他继续写道,“是受到打击的巴解组织在缺少后勤和土地基础的情况下,将回到它原先的恐怖主义道路上;它会在全世界进行爆炸、劫持飞机以及谋杀许多以色列人”,因而会“丧失它所获得的部分政治合法性”,并“削弱与巴勒斯坦代表谈判的危险”,因为谈判会威胁两大主要政治阵营所共同支持的政策,即保持对被占土地的有效控制的政策。^③

以色列领导似乎有理地假定,可以依赖那些塑造美国——它是惟一一个可依靠的国家,现在以色列已选择成为一个服务于其雇主利益的附庸国——公众舆论的人去抹去真正的历史,并将那些由于以色列侵略和暴行所导致的恐怖主义行为描述为一些随意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应该归咎于阿拉伯特性和文化的缺陷,如果不是种族上

的缺陷的话。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后续评论比较准确地实现了这些期待,这是耶路撒冷和华盛顿的国家恐怖主义分子的一场重要的宣传政变。

一些基本要点也在以色列国内得到了充分的理解。伊扎克·沙米尔总理在以色列电视上宣称,以色列进入战争是因为有“一个可怕的危险……政治上更大于军事上”。这促使杰出的以色列讽刺作家B·迈克尔写道,“军事危险或是对加利利的危险这些站不住脚的借口不存在了”,以前我们依靠先发制人“消除政治危险”;现在,“感谢上帝,没有人再这么说了”。专栏作家阿隆·巴卡尔评论道,“很容易理解以色列领导人的语气。阿拉法特曾被指控为稳步地向与以色列达成某种政治和解的方向移动”,“在以色列政府的眼里,这是最严重的威胁”,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政府。记者和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评论道,“巴解组织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没有在北部边界上采取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不对以色列的行动(专门是为了在北部挑起巴解组织的火力)作出反应。”他继续写道,对于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来说,“战争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这一点,即巴解组织作为对以色列及其对占领土地的控制的一种威胁的存在”,因为“被占土地内外的巴勒斯坦人希望民族主义的渴望能够瓜熟蒂落,这种希望依赖于巴解组织,并以它为中心”。与所有健全的评论家一样,他嘲笑关于被缴获的武器和巴勒斯坦军事威胁的歇斯底里言论,并预测“西贝鲁特的什叶派——他们中的许多人是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前几次轰炸的难民——可能会在很长时间内牢记以色列7—8月间的围困

(1982年)”,这将对“针对以色列目标的什叶派恐怖主义”产生长期的反响。^④

在右翼中,利库德议员埃胡德·奥尔默特评论道,“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威胁并不存在于它的极端主义中,而是存在于阿拉法特成功表现出来的虚假的温和立场中,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最终目标,即毁灭以色列”。(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正确的,在同一个意义上,大卫·本-古里安掌权时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目标,即将“锡安主义渴望的极限”扩张到包括邻国很大部分地区的土地上,有时甚至扩张到从尼罗河到伊拉克的“圣经所说的边界”之内,而本地居民将以某种方式被转移掉。)前西岸地区行政长官梅纳赫姆·米尔森教授宣称:“认为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威胁根本上是一种军事威胁的看法是一个错误;相反,它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威胁。”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就在入侵之前解释说,“西岸的平静”需要“摧毁黎巴嫩国内的巴解组织”。他的极右派同伙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此后评论道,战争是一个成功,因为它严重削弱了巴解组织的“政治地位”以及“巴解组织争取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斗争”,同时增强了以色列“阻止任何类似目的”的能力。在对这些看法发表评论的时候,以色列军事史学家乌里·米尔施泰因(工党“约旦方案”的一个支持者)评论道,沙龙-埃坦概念里的侵略目的包括:在中东和黎巴嫩“建立一个新秩序”,^⑤“推动几个阿拉伯国家内的萨达特化进程”,“保证将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西岸)并入以色列国”,以及“可能(达成)一个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

议员阿姆农·鲁宾斯坦因为其自由主义和鸽派立场在美国备受

尊敬,他写道,即使停火“或多或少”地得到遵守(翻译一下:得到巴勒斯坦遵守,而非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人侵也能“被证明是正当的”,因为存在着潜在而非实际的军事威胁:黎巴嫩南部的部队和武器弹药最终将被用于反对以色列。即使我们认真看待关于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的说法,考虑一下这种看法在其他情况下的影响吧。^⑤

值得注意的是,鲁宾斯坦预见到了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教条。1986年4月,里根政府出于“预防未来袭击的自卫”目的对利比亚进行轰炸,里根政府在对袭击进行合法化的时候阐明了这种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提到它。

以色列暴行的美国支持者们偶尔同样也承认这些真相。就在入侵之前,《新共和》编辑马丁·佩雷茨响应了沙龙和拉斐尔·埃坦的说法,敦促以色列给予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次类似黎巴嫩的“持久的军事挫败”,这“将向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表明,他们争取一个独立国家的斗争已然遭受了多年的挫折”,因而“巴勒斯坦人将成为类似库尔德人或是阿富汗人一样另一个被打散的民族”。民主社会党人迈克尔·沃尔泽认为,解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包括那些以色列境内的)的方案在于迁移那些“国家中的边缘人”(基本上就是种族主义者拉比卡亨的立场,见第一章注释⑦)。战后他在《新共和》上解释说:“我当然欢迎巴解组织的政治失败,我相信,造成这种失败所必需的有限军事行动可以用正义战争的理论加以辩护。”^⑥

观察以色列的极右派和美国的左派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趋同有一定的意思。

简言之,战争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被占领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在黎巴嫩建立“新秩序”是另一个。关于保护边界免受恐怖主义袭击的故事只是一种宣传鼓动,如果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能够复活,那更妙。如果我们不能指责阿拉法特,至少可以将他诬蔑为“当代巴勒斯坦暴力之父”(《新共和》语),那么就可以回避他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努力。

但是,回避政治解决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巴勒斯坦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而结束——虽然曾经是这样希望的,因此仍然有必要保持警惕,与这种威胁进行斗争,并保卫教义的真理:即美国和以色列追求和平,但被阿拉伯拒绝主义所阻止。1984年4月至5月,阿拉法特在欧洲和亚洲发表一系列重要声明,呼吁与以色列进行通往相互承认的谈判。这个提议马上遭到以色列的拒绝,美国则不予理睬。合众社将关于阿拉法特建议的一篇报道作为封面特写登在《旧金山考察家报》上,但当地的重要媒体并没有对这些事实进行突出报道。全国性的媒体直接压制了报道,只是几个星期之后才略微在《华盛顿邮报》上提了一下。《纽约时报》甚至禁止刊登提到这些事实的信件,继续(和其他报纸一起)谴责阿拉法特不愿意寻求外交路线。总体而言,报刊越是有影响力,它就越是坚决地压制这些事实,鉴于美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完全自然的。^⑧

有见识的以色列人当然知道阿拉法特的立场,前军队情报部门首脑耶霍夏帕特·哈尔卡比将军(退役)是一个阿拉伯问题专家,许多年来一直是个著名的鹰派人物,他说:“巴解组织希望达成一项政治解

决方案,因为它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选择会很可怕,会导致完全的毁灭。”“像侯赛因国王和西岸的阿拉伯人一样,阿拉法特害怕这样一种后果,即如果达不成一个解决方案的话,以色列会迅速扩张,祸及所有邻国,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因此,“阿拉法特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⑤

这些评论强调了以下几点:(1) 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恐怖主义的话,必须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背景下去理解恐怖主义;(2) 构成“恐怖主义”的是别人的罪行,而不是我们与此相当或是更恶劣的罪行。在当前的例子中,是指巴勒斯坦而不是以色列或美国的罪行;(3) “恐怖主义”和“报复”等概念被当作是宣传术语而非描述性术语加以运用。关键的是,被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恐怖主义行为——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不管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什叶派,还是利比亚人或叙利亚人,甚至是伊朗人(出于上述目的,他们自1979年以来也被算作是阿拉伯人)——所煽动起来的歇斯底里的目的是实现某些特定的政治目标。进一步的调查加强了这些结论。

再考虑一下报复的问题。1981年后什叶派对谢莫纳村的首次火箭袭击发生在1985年12月,这是在三年极其野蛮的军事占领之后。这种军事占领在1985年初西蒙·佩雷斯领导下的铁拳行动中达到顶峰。但是,对占领者野蛮行径的偶尔几次报道未能表现出故事的全貌,因为它忽视了日常的现实。对以色列在占领土地上的暴行的偶尔几次报道也是如此,它未能展现出一副真实的画面,包括诸如野蛮羞辱、压迫、剥削廉价劳动力(包括童工)、严格控制文化生活、阻碍经济

发展(等行为)。朱利亚·弗林特提供了一幅更有启发性的画面,她叙述了“在此次火箭袭击前一周什叶派在黎巴嫩南部一所村庄里生与死的故事”。根据官方的历史(见本章注释^{③7}),在它只是受到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袭击的那段时间里,靠近奈巴提亚的朗梅恩村(Kfar Roummane)曾经是一个“繁荣的8000人农镇”,但在它从巴勒斯坦统治下被“解放”出来之后(《纽约时报》的说法),它被“以色列人和其黎巴嫩代理人——南黎巴嫩军建立的两个巨大的要塞”所包围,这两个要塞经常对外射击和炮击,“有时候从黎明到黄昏,有时候只是几个小时”。它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导致6000人逃离,在这座“死亡村庄”里,小镇的四分之三不适于人居住。而那里并没有任何抵抗活动的迹象,在这块仅仅是平坦的山腰的开阔地上,远离政治的农民也极少有可能进行抵抗。^{③8}

即使将佩雷斯-拉宾的铁拳行动的谋杀性暴行置于一边,那么对谢莫纳村的轰炸到底是“未经挑衅的恐怖主义”还是“报复”呢?

看一下恐怖分子的生活,它也具有指导意义。《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对恐怖主义的5篇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一个恐怖分子接受了采访,他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被挑选出来的。他正在以色列的监狱内服18年的刑,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是被关在从伦敦到科威特监狱里的恐怖分子的典型”。“在他的生活中,个人的悲剧(他父亲死于1946年耶路撒冷的一次炸弹爆炸中)与对一种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发现相结合,将他推入到一个冷血的政治谋杀的世界中”。“他父亲和其他90多人是被梅纳赫姆·贝京领导下的锡安主

义地下组织伊尔贡设置在当时的英军总部(现在的大卫王宾馆)的炸弹炸死的”。^①“他说,(被占西岸土地上的)巴勒斯坦营地内的条件‘现实’使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被占土地上的“现实”——不仅仅是在营地内——是相当真实的、是痛苦和残酷的,但是不能进入全国性媒体的版面。而在那些版面上,我们认识到,占领是“未来合作的样本”,是“阿以共存的试验”。^②这样进行解释并不是为了将其合法化,而是让由于轻易使用“报复”等术语而产生的问题简单明白地显现出来。

或是考虑一下苏莱曼·哈提尔吧,他是一名埃及士兵,1985年10月5日在西奈海滩上杀害了7名以色列游客。埃及的媒体报道说,他母亲说她“对这些犹太人的死感到高兴”,一名在他所在的拜赫·巴克村村的医生将这次枪击视为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虚幻和平”的一个警告。为什么对这种可怕的罪行会有这种令人震惊的反应?也许几天前对突尼斯的轰炸提示了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1970年,在“消耗战”期间,以色列飞机轰炸了拜赫·巴克村,杀死了学校里的47名孩子。在那段时期内,以色列进行了大范围的轰炸,有时甚至深入埃及境内,将150万人赶离苏伊士地区。当苏联飞行员驾驶的米格飞机在保卫埃及内陆时在埃及领空被以色列新获得的鬼怪式战斗机击落时,有发生一场大战的危险。^③

当《时代周刊》驻以色列记者无动于衷地报道说,哈提尔“在民族主义和反以色列的动机驱动下采取行动”^④的时候,似乎缺少了什么。但是如果情况正好颠倒过来的话,是决不会有这种缺失的。

大卫·赫斯特注意到,“国际恐怖主义(在西方的意义上)的主要

的、真正重要的中心在黎巴嫩。它或是繁衍自己的恐怖分子,或是为那些输入的恐怖主义提供一个合适的家园”,不管是那些“除了轰炸、谋杀、大屠杀和致人伤残、散播仇恨、恐惧和不安全感之外所知甚少”的巴勒斯坦人,还是那些黎巴嫩人——他们的社会遭到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侵略及其后续行动的最后一击。“……一种信念植根于这些团体中的年轻人的头脑中”：“在里根总统——他将他的国家与以色列的传统伙伴关系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的领导下,美国是整个现存秩序根深蒂固的维护者,这种秩序是如此地让人无法忍受以至于任何摧毁它的手段都是正当的。恐怖主义的冲动可能在巴勒斯坦人之中最为强烈,但也可能是黎巴嫩人,或是阿拉伯人,或是作为其最惊世骇俗的表现形式的什叶派。”

耶霍夏帕特·哈尔卡比说出了根本一点：“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个尊重他们自决权利的体面的方案：这才是解决恐怖主义的方案。当沼泽消失之时,蚊子不再孳生。”^⑥

美国和以色列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和侵略肯定有助于形成赫斯特所描述的情况(见上文),这是可以预计的,可能也是他们有意为之。这两个恐怖主义国家大概对这一后果表示满意,这种后果为他们坚持恐怖主义和暴力路线提供了合法的理由。此外,由他们所促成的“小恐怖主义”可以被加以利用,以引起一种恰到好处的恐惧感,并使群众动员起来,而这正是更普遍的目的所要求的。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这样一个教义体系,它在需要的时候会发出齐声的鼓噪,并压制任何对美国的倡议以及这些倡议的模式、源泉和动机的理解。在这一点

上,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政策制定者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恐怖主义行为被他们的实施者富有特色地称之为“报复性的”(或是,在美国和以色列的例子中,是“先发制人的”)行动。因此,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对突尼斯的轰炸是对发生在拉纳卡的谋杀的所谓报复,但是这根本连借口也不算,因为突尼斯轰炸中的受害者和拉纳卡罪行没有任何联系。后者同样以“报复”作为他们的合法性理由,是对以色列劫持塞浦路斯开往黎巴嫩的船只这一行为的反应。⁶⁶前一个理由被美国视为合法而予以接受,后者则被置之不理或遭到嘲笑,这种区别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奉基础上的,作为规范也是如此。

先将为恐怖主义暴力所作的合法性辩护搁在一边,并遵循事实的记录,毫无疑问,以色列多年来一直在海上进行着劫持和绑架行动,但是对这项罪行在美国很少受到注意和关注。而同样的罪行,如果犯罪者是阿拉伯人的话,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和愤慨。这样一个事实——以色列的高等法院实际上批准了这些做法——甚至被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报道。在一个案例中,一名阿拉伯人就其监禁的判决提出上诉,其理由是他是在以色列领海以外被捕的。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审判和监禁的合法性不受嫌疑人被带到以色列领土的方式的影响”,并再一次坚持,如果认定某人在以色列之外的行为有罪,以色列的法院能够因此而审判此人。在这个例子中,法院宣称:“安全理由”使上诉者必须继续呆在监狱里。⁶⁷

转向历史记录。根据议员马蒂亚胡·佩莱德(退役将军)的说法,以色列海军在1976年开始夺取属于黎巴嫩穆斯林的船只,将它们交

给杀死这些穆斯林的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基督教盟友。这么做的目的是终止通往和解的步伐,因为当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已经开始就这种和解作出安排。拉宾总理承认这些事实,但是他说,船只在这些安排作出前就已经被收缴了,而国防部长佩雷斯则拒绝进行评论。在1983年11月的一次囚犯交换之后,《时代周刊》的一篇头版报道在第18段提到,37名阿拉伯囚犯——已经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安萨尔囚犯营——“最近在从塞浦路斯前往的黎波里(贝鲁特北部)途中被以色列海军抓获”。这一报道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都不值得引起评论。⁶⁸按照同样的逻辑,英国军队可以在1947年派遣特工前往美国或是在公海上绑架锡安主义分子,在缺乏指控或是无法对他们支持恐怖主义进行定罪的情况下,将他们投入囚犯营中。

1984年6月,以色列劫持了一艘于塞浦路斯和黎巴嫩之间运营的渡船,用机关枪向它扫射,迫使它开往海法,9人被带走扣押起来,其中8名是黎巴嫩人,一名是叙利亚人。在经过审讯后,5人被释放,4人被继续扣押,包括一名妇女和一名从英国回贝鲁特度假的学生。两个星期后,两人被释放,而另外两人的命运则没有被报道出来。这件事被认为是如此地无关紧要,以至于即使为了了解被绑架乘客的命运,也只能在报纸的后面几页的小条目中仔细寻找。伦敦的《观察家报》提出了一种“政治动机”:迫使乘客们乘坐由马龙派的朱尼耶(Jounieh)港发出的渡船,以代替穆斯林的西贝鲁特港,或是向黎巴嫩人发出一个警告,他们是“无权的”,必须与以色列打交道。黎巴嫩谴责了这次“海盗行为”,戈弗雷·詹森将其形容为以色列“长长的国际

暴行清单”上的“又一项”。“为了维持这种海上恐怖主义的谎言，”他补充说，“以色列随后轰炸了的黎波里旁边的一个小岛，它被说成是巴解组织海上行动的基地。”他将这种说法斥之为“荒唐”。黎巴嫩警方报道说，15人被杀，20人受伤，另外20人失踪，全部都是黎巴嫩人，包括渔夫和一个逊尼派童子军营地中的少年，后者是受到“最严重打击”的目标。^⑥

在对以色列“拦截”(更准确地说，劫持)渡船的报道中，《时代周刊》评论道，在1982年战争之前，“以色列海军定期拦截开往和离开南部的蒂尔和西顿两个港口的船只，搜查游击队员”，与通常类似，它接受了以色列表面上的理由。叙利亚在类似情况下对民用以色列船只的“拦截”则可能会被区别看待。相似的是，以色列在1986年2月4日对一架利比亚民航客机的劫持则被同样平静地予以接受，如果有批评的话，也只不过说是在错误的情报基础上的小差错。^⑦1985年4月25日，几名巴勒斯坦人在运营于黎巴嫩和塞浦路斯之间的民用船只上遭到绑架，并被送往以色列境内的一个秘密地点。当其中一个被以色列电视台采访之时，这一事件(在以色列)被公开，导致有人向最高法院提出要求获得有关信息的上诉。可能还有其他不被人所知的事件。^⑧

所有这些事情没有引起任何的兴趣和关注，绝大多数只是由于偶尔的评论才被人们所知，就如同那种一笔带过的报道也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和关注一样：即与叙利亚交换囚犯时释放的阿拉伯“安全犯”实际上是“居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兼并部分的

德鲁兹派的村民”。^⑭任意劫持船只和进行绑架被认为是以色列的特权,其中还包括对被它称之为“恐怖分子目标”进行轰炸,这都得到了美国公共舆论的赞成,而不管事实如何。

我们可以在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北部的黎波里附近的小岛这件事上稍微停留一会,在这次袭击中丧生的有黎巴嫩的渔民和一个营地里的男童子军,很少有人对此表示关注。但这是这种定期的以色列恐怖主义暴行的常事,而它远不是最严重的。对巴勒斯坦发动的袭击的态度就不同了。没有什么能够比1974年马洛特(Ma'alot)惨案让人回忆起更多的恐怖,在摩西·达扬不顾莫迪凯·古尔将军的反对,拒绝恐怖分子要求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谈判之后,一个准军事青年组织里的22名年轻人在交火中被杀。^⑮有人会问,为什么对黎巴嫩男童子军的谋杀是一种较轻的罪行?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一种罪行,仅仅因为它是被一个可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具有“高度道德目标”(《时代周刊》语)的“关心人类生命的国家”(《华盛顿邮报》语)所犯下的。^⑯

在马洛特袭击发生两天前,以色列喷气机轰炸了黎巴嫩的凯夫尔(El-Kfeir)村,杀死4名平民。根据爱德华·赛义德的说法,马洛特袭击“发生在以色列使用凝固汽油弹对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持续数星期的轰炸之后”,其中超过200人被杀。当时,以色列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开展大规模焦土轰炸行动,出动飞机、大炮和炮舰进行袭击,实施突击队行动,使用了炮弹、炸弹、杀伤性武器和凝固汽油弹,可能数千人被杀(西方并不会为此费神,因此这里没有准确的数

字),成百上千的人被往北赶到了贝鲁特周围的贫民窟中。^⑤这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并得到报道。没有一项被收入到恐怖主义的大事记中,在被净化过的历史中,它甚至就没有发生过。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谋杀性的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袭击则受到愤怒的谴责(当然是公正的),并且它被当作是一种证据,证明巴勒斯坦人不能成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伙伴。与此同时,媒体经常受到谴责,因为它们公开批评以色列,甚至有些“亲巴解组织”,这是具有相当纪念意义的宣传政变。

我们应该注意一下被誉为温和派的以色列领导人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以伊扎克·拉宾为例,在 1978 戴维营谈判前以色列对黎巴嫩施暴最严重的那段时期,他是驻华盛顿的大使,他的解释是:“我们不能忽视南黎巴嫩地区平民的不幸处境……帮助这一地区的人民,防止他们被敌对的恐怖分子灭绝是我们的人道主义责任。”^⑥回顾拉宾的回忆录的人发现,这些话并无差错。一个意识形态上可以利用的历史是如此有效地被建构出来,西方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是如此地根深蒂固!

还应该注意的是,以色列在享受海盗和劫持的权利方面并不孤独。塔斯社的一项谴责 1985 年 10 月“阿奇里·劳罗号”劫持事件的报道指责了美国的伪善,因为两名劫持苏联航班的犯人——杀死一名乘务员,并打伤机组其他成员——在美国获得避难,美国还拒绝了引渡的要求。^⑦

确切而言,这一事件并不出名,有关伪善的指控似乎有一定的道

理。这一事情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亚伯拉罕·索费尔是国务院的法律顾问,他评论道:“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美国强烈反对劫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拒绝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党政权要求遣返那些为了逃跑而劫持飞机、火车和轮船的罪犯的要求。”索费尔认为,当“劫机达到了流行的程度”,并造成了“过于严重的问题,并对无辜乘客的安全形成了过于巨大的威胁以至于无法容忍”时,美国才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重新审视了其政策”。^⑧空白被填补了,劫持行为开始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因而也被归入到恐怖主义的目录下,不再是抵抗压迫的英雄行为。

有人也会提到中东发生的第一起劫机事件,它也并不为人所熟悉。它是以色列于1954年12月实施的,当时一架叙利亚民航客机遭到以色列战斗机拦截,被迫在利达(Lyddá)机场着陆。总理摩西·沙雷特在他的私人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总参谋长摩西·达扬的目的是“扣留人质以便我们在大马士革的囚犯获得释放”。以色列的囚犯是在叙利亚境内执行间谍使命时被捕的士兵。我们可以回想起来,正是这个达扬在20年后下达了营救的命令,最终导致马洛特的以色列少年的死,这些少年被扣为人质以换取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的释放。沙雷特私下里写道,“我们没有夺取飞机的任何正当理由”,并且他“没有理由置疑被美国国务院由事实证实的真理,即我们的行动在国际实践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是这一事件从历史上消失了,所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现在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评价家)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指责巴解组

织“发明”了劫机乃至杀害外交人员，而无需担心会遭到反驳。⁷⁹

关于杀害外交人员，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 1948 年对联合国特使福尔克·贝纳多特的暗杀，这次暗杀是内塔尼亚胡的顶头上司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领导下的恐怖主义团体所实施的。沙米尔是下达暗杀命令的三名指挥官之一，第二名指挥官现在已死，生前和第三名指挥官一样是以色列媒体的一名受人尊重的资深评论员。大卫·本-古里安的一名密友私下承认，他就是暗杀者中的一个，但是本-古里安将此事保密，以色列政府安排那些有干系的人逃离监狱，并出国。在他的目击证明中，锡安主义历史学家乔恩·金齐写道，“并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要求抓获罪犯的大声疾呼或是决心”，并且“也没有太多的道德上的愤慨”。“大多数人的态度是，犹太人的又一个敌人倒在了路边。”暗杀“遭到了谴责，被表示遗憾和哀悼，这是因为以色列遭到了指责，并且使其外交人员的工作更加困难，而不是因为采取暗杀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⁸⁰

赞誉那些参加民族斗争的恐怖分子是相当通常的做法，当然在美国也是一样。但是在努力挑选后的记忆中，只有敌人的行动才能在“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中找到位置。

在为了报复对突尼斯的轰炸而劫持“阿奇里·劳罗号”游艇之后，劫持船只问题成为西方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路透社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1961 年以来只有少数几起劫持船只事件”，它给出了穆斯林实施的一些例子，但是以色列的劫持事件不在名单之上。⁸¹

劫持并不是逃脱这一目录的惟一一种恐怖主义形式，如果它是

由我们的朋友所采取的话。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解释说,法国特工将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抗议船只“彩虹勇士号”炸沉并造成一人死亡的事件不是恐怖主义。“我想说的是,法国明显不是要袭击平民和旁观者,并不是要致人残废、进行折磨或是杀人”。其他恐怖分子也可以轻易发出这一呼吁。《亚洲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以“密特朗的最佳时刻”为题,写道:“绿色和平运动根本是暴力和危险的……法国政府准备动用武力对付‘彩虹勇士号’……表明政府有直接处理这些紧急事务的优先权。”在《纽约时报》上,大卫·豪斯戈评论了关于此事的一本书,批评法国“莽撞”和“犯了大错”;“不需要”将船炸了,法国本可以“以少得多的负面公众影响达到同样的目的”。这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使用更为严厉的语言可能更为适合。鉴于这些“莽撞行为”,豪斯戈下结论说,“要为不对埃尔尼先生(国防部长)起诉找出合法理由非常困难,也很难因为囚禁了法国军官而指责新西兰人。”^②豪斯戈将它和水门事件进行了比较,但是漏掉了主要的相似之处:在水门事件中,媒体中充斥着大量关于“莽撞”和小过失的喧嚣以及媒体的自得,而国会和媒体都忽视了尼克松政府和他的前任们在同一时候被揭示出来的更严重的罪行,视其无关紧要。^③君主被免于恐怖主义和其他罪行的指控,而他的盟友们常常分享了同一特权。最多他们也就是犯下了“莽撞的过失”。

在这一方面,乔治·舒尔茨也许应该获得伪善奖。当他敦促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积极的”的推动之时,他将有关“某人的恐怖分子

是另一人的自由战士”的说法称之为是“阴险的”：

自由战士或是革命者并不会将载有非战斗人员的公共汽车炸上天。恐怖主义的凶手们则会。自由战士不会暗杀无辜的商人或是劫持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恐怖主义的凶手们则会……阿富汗的抵抗战士们不会摧毁村庄，或是杀害无助者。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不会将校车炸上天，或是大规模屠杀平民。

实际上，舒尔茨指挥下的尼加拉瓜恐怖分子们，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恰恰专长于对平民发动致命的袭击，附带着酷刑折磨、强奸、致人伤残。关于他们恐怖行为的令人作呕的记录已被很好地记载下来，尽管被忽视或是很快地被忘却，甚至被恐怖分子的辩解所否认（见本章注释⑩）。阿富汗的抵抗战士们也犯下了残忍的暴行，如果（在阿富汗的）进攻者是美国或是以色列军队（那时他们就会被称之为是进行“自卫”的“解放者”）的话，这些罪行会在西方引起强烈的谴责。就在他讲话数月前，舒尔茨的安盟（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朋友们正好在吹嘘，他们击落了数架民航客机，造成 266 人死亡；以及他们释放了关押达 9 个月之久的 26 名人质，其中有 21 名葡萄牙、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外交使节。美联社报道称，他们还宣布开始“一场新的城市暴力运动”，报道提到，当一辆装满炸药的吉普车在首都罗安达市内爆炸时，杀死了 30 人，造成 70 多人受伤。他们还抓获了欧洲人的教师、医生以及其他人员。美联社报告说，大约 140 名外国人，包括 16 名英国技术人员“被扣为人质”。若纳斯·萨文比宣称，“在撒切尔首相

给予他的组织以某种承认之前不会释放他们”。类似的行动经常持续发生。例如,1986年4月的一次旅馆爆炸炸死了17名外国平民,造成多人受伤。萨文比“是我们时代少数几个真正的英雄之一”,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保守政治行动”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称。在这次会议上,萨文比“在他发誓要攻击他的国家内的美国石油设施后,受到了热情的鼓掌欢迎”。他杀害美国人的计划并没有促使美国启用“为防止未来袭击而进行自卫”的教条,美国曾使用这种教条去证明轰炸“疯狗”卡扎菲的合法性。相似的是,当南非雇佣军于1985年5月在安哥拉北部被抓住的时候,当时他们正在执行一项摧毁这些设施和杀害美国人的使命,约翰内斯堡也没有遭到轰炸。恐怖主义国家必须作出微妙的判断。^④对于舒尔茨、柯克帕特里克和其他领衔的恐怖主义指挥官和支持者来说,萨文比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一名自由战士,是因为“安盟是南非的各个代理集团中得到最广泛支持的一个,而这些集团被用于破坏其邻国的稳定”。^⑤

对于舒尔茨的反政府军而言,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使尼加拉瓜的所有老百姓在残酷成性的恐怖主义威胁下成为人质,迫使政府放弃满足大多数贫困者的需要的任何承诺,而优先考虑那些“温和”和“民主”的政策,这些政策考虑的是美国商业及其当地附庸的超乎寻常的需要,就如同其他在美国保护下的表现比较得当的国家里一样。在这种恐怖分子的指挥官和辩解人蓬勃发展的文化气氛中,舒尔茨的这些声明和其他类似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引起一点的惊讶。

劫持人质清楚地被归入到恐怖主义的名目之下。那么毫无疑问，当以色列在从黎巴嫩撤退途中违反国际法将大约 1 200 名囚犯——大部分是黎巴嫩什叶派——带回以色列的时候，就犯下了一项非常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以色列的解释是，他们将“根据一项由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局势决定的未定的时间表”来释放囚犯，也就是说，以色列清楚地表明，这些人将作为人质，（命运）取决于南黎巴嫩“安全区”及其周边地区内处于以军及其雇佣军监控下的当地居民的“良好表现”。正如玛丽·麦格罗里所评论的——这种评论少有人地偏离了一般遵守的规定——这些囚犯是“以色列监狱中的人质”；“他们并不是罪犯，他们被抢先集中起来作为当以色列最终放弃黎巴嫩时防范袭击的保证”。实际上，以色列并不打算放弃南黎巴嫩，在那里以色列维持了它的“安全区”，甚至这种部分撤军也是黎巴嫩抵抗的成果。在安萨尔囚犯营被关闭（正如最终的结果表明的那样，只是暂时的关闭）之后，140 名囚犯于 1983 年 11 月被秘密带到以色列，这违反了它与红十字会达成的一项有关在交换囚犯的过程中释放他们的协议。这个囚犯营是一个充满残忍暴行的所在，经常被那些在那里服过役或是访问过它的以色列人形容为是一个“集中营”，看守们的野蛮行径使他们作呕。直到 1984 年 7 月以前，以色列甚至不允许红十字会访问这些囚犯。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纳赫曼·沙伊宣称，直到 1985 年 6 月仍然在押的 766 名囚犯中的 400 名是因为“恐怖主义行为”——意味着抵抗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被捕，“沙伊先生指出，其余的人因为其他形式的暴力较轻的活动被捕，包括政治行动主义或是组织旨在削

弱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存在的活动”。^⑥

以色列答应在6月10日释放这批人质中的340人，“但是在最后一刻因为安全原因撤销了释放的决定，而这些安全原因从来没有得到过完整的解释”。^⑦4天后，黎巴嫩的什叶派分子——据报道称是以色列所扣押人质的朋友和亲戚^⑧——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847航班。他们劫持人质，试图使以色列扣押的人质获得自由。这在美国引发了新一轮经过精心策划的歇斯底里发作，它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并对媒体进行了大量的谴责，因为媒体给予劫持者一个少有的解释自己立场的机会，因而妨碍了一项在自由社会内部被视为是合适的纪律。以色列的绑架者不需要进入美国媒体的特殊通道，美国媒体乐于为他们传达信息，经常是以“新闻”的形式。

媒体因为允许恐怖分子表达自己的立场被普遍谴责为“支持恐怖主义”，但是无人提及的是，罗纳德·里根、乔治·舒尔茨、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和其他首要的恐怖主义的指挥官和支持者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他们可以在不受反驳和评论的情况下发表他们的意见，为新闻报道和评论提供了一种概念和前提的框架。

新闻界对环球航空公司TWA847号航班的劫持者的声明嗤之以鼻，他们希望释放以色列扣押的人质——在美国的用法上，他们不是人质，因为他们是被“我们这边的”扣押的。什叶派分子的借口的荒唐性被轻易地予以揭露。杰出的评论家福洛拉·刘易斯解释道，“什叶派武装分子赞美殉道，毫不犹豫地取走他人性命，但是如此关心释放囚犯的时机则不是他们的作风”。关于这种有用概念的另一个版本

是,下等人感觉不到痛苦。在没有引用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声称:“以色列上个星期(也就是劫机前几天)计划安抚怨恨的什叶派分子,但是由于驻黎巴嫩的联合国芬兰部队的一些士兵遭到绑架而被拖延了”;在一条90个字的新闻条目中,《时代周刊》提到了这件毫不相关的事件中芬兰提出的指控,“以色列的军官看着黎巴嫩武装分子毒打被绑架的在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中服役的芬兰士兵,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当时“他们正被南黎巴嫩军的成员用铁棒、水龙带和步枪击打”。“那里存在着大量的罪行”,《时代周刊》狂怒地写道,谴责着劫机犯和希腊政府(因为他们的松垮作风),甚至谴责美国,因为它“未能因为伊朗庇护了去年在一次劫持中杀害了2名美国人的凶手们而惩罚伊朗”。(见本章注释⑦)但是以色列的扣押人质行为则不属于这些罪行。⑧

普林斯顿大学的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毫不含糊地断言(他的学术声望使得证据变得无关紧要),“劫机者或是他们的指使人肯定非常明白地知道,以色列已经计划释放这些什叶派和其他的黎巴嫩俘虏。这种形式的公开挑战只会延迟,而非加速他们的释放”。他们能够进而“挑战美国,羞辱美国”,因为他们知道无能的媒体会“给他们提供无限的公开报道,可能甚至是某种形式的支持”。记住这是一名有名望的教授在一家有名望的杂志上发出的声音,这个事实再一次为看穿这种处于统治地位的知识界文化提供了某些洞察力。《新共和》的编辑们将什叶派要求释放以色列扣押的人质的呼吁斥之为“十足的废话”：“劫持、绑架、谋杀和大屠杀是什叶派和黎巴嫩其他派

别从事政治活动的方式，”并且“每个人都知道”，以色列扣押的囚犯都是排定日期要被释放的——当以色列准备好的时候，如果的确存在这样的時候。里根总统将这种歇斯底里的声调继续拔高一度，他解释说，恐怖主义的“真正目标”是“将美国驱逐出世界”，至少是如此。尽管指出使用武力可能导致了美国人质的死亡，诺曼·波德霍雷茨仍然谴责里根未能“为保卫国家荣誉而冒生命本身(也就是别人生命)的风险”。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克呼吁轰炸黎巴嫩和伊朗，而其他人则摆出了恰当的英雄姿态。^⑨

与此同时，仔细的读者会发现，被“埋葬”在有关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下的是这样的事实，2 000 名黎巴嫩什叶派，包括 700 名儿童在以色列的南黎巴嫩军的炮击下逃离家园。南黎巴嫩军还击中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吉普车，同时“联合国一名发言人宣称，以色列军队和基督教武装分子组成的联合部队今天横扫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村子，抓获了 19 名什叶派男子”。^⑩

劫持发生之后，以色列开始根据它自己的时间表释放人质，可能速度还有所加快，因为环球航班的劫持事件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比它自己更为严重的绑架行动上。当 7 月 3 日 300 人被释放后，美联社报道了他们的证词，他们说他们遭受了酷刑，并且忍饥挨饿。但是《时代周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听到的只是，“以色列人待我们不错……”里根给西蒙·佩雷斯写了一封信，“写的是贝鲁特的人质危机增强了两国的关系”；对另一个“人质危机”则一字未提，它已经被从官方的历史中被删去了。^⑪

如果以色列不是扰乱世界的君主的代理人的话,以色列的行动完全够格被称之为扣押人质,现在以色列从这个指控中获得豁免。但是重要的是要强调,反复强调当代政治话语中奥威尔主义概念的本质,其中“恐怖主义”和“人质”这些术语被如此这般地加以诠释,以至于一些最为极端的例子被排除在外,例如在尼加拉瓜和黎巴嫩南部的例子中,所有的居民都被当作人质,以确保对外国主子的服从。

对于中东而言,我们应该承认,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者很好地予以理解。以色列外交家阿巴·埃班(他被认为是鸽派的一名领军人物)解释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对黎巴嫩南部进行野蛮袭击的理由:“受到影响的人民会施加压力,要求停止敌对活动,这种合理的预期最终得到了实现。”将其翻成大白话:南黎巴嫩人民被当作向他们施加压力的人质,迫使巴勒斯坦人接受埃班所代表的工党政府指定给他们的条件,他宣称巴勒斯坦人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不能发挥作用”。^⑨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在1978年解释说,“30年来……我们与生活在乡村和城市中的人口作战。”他指出,以下的事件——包括对约旦城市伊尔比德(Irbid)的轰炸、通过轰炸将约旦河谷成千上万的居民赶走、将150万平民从苏伊士赶走以及其他例子——都是这项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将平民扣为人质,以防止(人民)对以色列通过武力强加的政治方案进行抵抗。随后进而维持这种方案,同时拒绝其他政治方案的可能性,例如,萨达特在1971年提出的在国际承认的埃以边界基础上达成一项全面和平协议的建议。以色列针对没有防御能力的平民目标——这些目标与恐怖分子行为的

根源无关,而这些行为本身经常是对早些时候的以色列恐怖主义的报复,如此这般,通过熟悉的恶性循环——的定期“报复”行动也反映了同一个概念,是对20世纪50年代初本-古里安早期信条的一个背离,这一信条是,“反击是无效的”,除非它正好集中全力:“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我们必须)无情进行打击,妇孺包括在内。”^④

古尔对以色列的战争的理解在军事指挥部内得到广泛赞同。在1985年初的铁拳行动中,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警告说,如果必要的话,以色列会采取“焦土政策,如同在与埃及进行的消耗战中的约旦河谷一样”。他补充说,随着什叶派的恐怖分子使欧洲陷入恐怖之中(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前,他们出于没有解释的原因并没有这么做),“黎巴嫩成为比1982年时更严重的恐怖之源”,所以以色列必须在南部保持一块“我们可以干涉”的地带。老资格的伞兵指挥官杜比克·塔马瑞曾命令通过空中和地面轰炸夷平巴勒斯坦的埃因-希尔维(Ain el-Hilweh)难民营,以“拯救他指挥下的部队的生命”(对编造出来的“军队清白”的又一运用),他为其行为进行合法化辩护的时候评论说,“以色列国自1947年以来一直在杀害平民”,“故意杀害平民”是“许多个目标中的一个”。^⑤

塔马里将1953年对克比亚(Qibya)的袭击作为一个例子,当时沙龙的101部队声称为了报复,将70名阿拉伯村民杀害在家中,而这些村民与他们声称进行报复的恐怖主义袭击没有丝毫关系。本-古里安在以色列电台上伪称,这些村民是被阿拉伯恐怖主义激怒的以色列平民所杀,这些以色列人“绝大多数是难民,来自阿拉伯国家或是纳粹

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将声称以色列武装力量卷入其中的“荒诞指控”斥之为一种厚颜无耻的谎言，它进一步将以色列的定居点置于对这种冷血屠杀进行报复的威胁之下。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克比亚大屠杀之前的一个月，摩西·达扬派遣 101 部队将阿扎马（Azzazma）和塔尔宾（Tarbin）部落的 4 000 名贝都因人赶过埃及边境，这是自停火后不久的 1950 年就开始进行的驱逐行动的又一步骤。1954 年 3 月，11 名以色列人在内格夫东部阿扎马部落成员对公共汽车的一次伏击中丧生（未经挑衅的恐怖主义）；它引发了以色列对与此完全无关的约旦纳赫林（Nahaleen）村的袭击（报复），9 名村民被杀。1953 年 8 月，沙龙的 101 部队在加沙地带的布略格（al-Brueig）难民营杀害了 20 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是对（巴勒斯坦人）渗透的“报复”。^⑥

“报复”（以色列实施的）和“恐怖”（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的循环可以一步步追溯到很多年前，它将很快地揭示出，这种术语属于宣传范畴，而非实际的描述。

这里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历史是如何有效地被重新建构成为一种更有用的形式。因此，托马斯·弗里德曼回顾了“以色列的反恐”战略，他写道：“第一阶段从 1948 到 1956 年，最好可以被描述为‘通过报复反恐’，或是消极反馈的时期，”但是“至少其中一次报复极具争议，涉及平民伤亡，”这里指的可能是克比亚。关于恐怖主义的学术记录也基本没有什么不同。^⑦

以色列军队 1985 年初在黎巴嫩南部的铁拳行动也是在埃班所概

括的逻辑指导下进行的。平民在恐怖的威胁下成为人质,以确保他们接受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和被占土地上主宰的政治安排。这些警告继续有效,人民仍然是人质,而资助这些行动以及阻止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解决方案的超级大国对此毫不在意。

当包括扣压人质在内的“大恐怖主义”行为是由一个得到认可的发起者实施的时候,它可以免于审查,同样免于审查的是一些规模较小的行动,正如我们已经展示过的那些例子一样。再提一些其他的例子,1983年11月至12月间,以色列“清楚地表明,只要以色列俘虏的命运依然未定,它将不允许阿拉法特的部队从城市(即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市,当时这些部队正在该城遭到叙利亚支持的部队的袭击)中撤出”,它阻止将阿拉法特的拥护者撤出的希腊船只离开。德鲁兹派的发言人报告称,在对贝鲁特东部“被称之为是巴勒斯坦基地”的地区轰炸和扫射期间,一家医院被击中;而在的黎波里,“一艘内部已经破损的载货船被直接击沉”,并且“一艘货船被击中后爆炸成一团火焰”。^⑧

在这里,当地人口以及外国船只都被当作是人质,用来确保释放在以色列侵略黎巴嫩过程中被俘的囚犯。在美国,对此种进一步的暴行没有评论。

在黎巴嫩和地中海,以色列在得到豁免和放任的情况下实施了这些袭击。1985年7月中旬,以色列战机轰炸和扫射了靠近的黎波里的巴勒斯坦营地,杀死至少20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包括6名12岁以下的儿童。“在下午2时55分的袭击之后,大片烟尘吞没了作为

25 000 名巴勒斯坦人家园的黎波里的几个难民营达数小时之久”，以色列声称这是为了进行报复，报复与叙利亚结盟的一个组织几天前在以色列在南黎巴嫩的“安全区”内发起的两起汽车爆炸袭击。两个星期后，以色列的炮艇在赛达港外一英里处袭击了一艘在洪都拉斯注册的货船，按照其希腊船长的说法，它是运送水泥的货船。炮艇用 30 发炮弹点燃了船只，随后对海岸进行了轰炸，在武装分子进行还击的时候炸伤了平民。主流媒体甚至都不愿费工夫去报道下面的事实：即以色列的炮艇在第二天击沉了一艘渔船，击伤其他三艘，与此同时赛达的一名议员呼吁联合国停止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海盗行径”。媒体确实报道的是 1984 年 1 月被以色列称之为针对“恐怖主义设施”的一次“外科手术”袭击，它发生在贝卡谷地附近的巴勒贝克 (Baalbek)，杀死了大约 100 人，绝大多数是平民，400 人受伤，包括被轰炸的学校校舍里的 150 名儿童。这些“恐怖主义设施”还包括被袭击的三个黎巴嫩村子和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一座清真寺、一所旅馆、一家饭馆、几家商店和其他建筑物。贝鲁特的新闻报道称，一个牛市场和一个工业园区也遭到袭击，几十所房子被毁。路透社的一名记者在被轰炸的村庄中说，第二轮轰炸发生在第一轮的 10 分钟之后，“增加了伤亡人数”，因为人们正在开始将死者和伤者从建筑物废墟中拖出。他看见医院里有“许多儿童”，同时目击者称男人和女人冲向学校，疯狂地寻找他们的孩子。黎巴嫩什叶派领导人谴责“以色列的野蛮行径”，将这些“对无辜平民、医院和礼拜场所的”袭击描述为“恐吓黎巴嫩人民”的企图。但是这一事件在无人评论的情况下悄然逝去，

丝毫没有影响到以色列作为“关心人类生命的国家”(《华盛顿邮报》语)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再次得出结论,这次外科手术式轰炸的受害者低人一等。^⑨

有人可能会再次想象,如果是巴解组织或是叙利亚对特拉维夫附近的“恐怖主义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袭击”,杀死100名平民,造成其他400人受伤,在其他平民受害者中包括150名在被炸平的校舍里的儿童,那么西方包括那些“亲阿拉伯”媒体的反应会是怎样呢?

美国国内的标准版本是,以色列的暴力——虽然有时候可能过滥——是对阿拉伯暴行的“报复”。以色列与美国一样,主张获得更为广泛的权利:为防范针对它的潜在行动而采取恐怖主义袭击的权利,正如前面所引的鸽派议员阿姆农·鲁宾斯坦为黎巴嫩战争所作的合法性辩护那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巡逻之时,采取被他们称之为“预防性开火”的行动,用机关枪进行扫射,导致爱尔兰的维和部队堵塞道路以示抗议。相当常见的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袭击被称之为是“预防性,而非惩罚性”,例如,1975年12月2日30架以色列喷气机对巴勒斯坦难民营和附近村庄的轰炸和扫射明显是一种报复,报复联合国安理会对一项最后被美国否决的和平建议进行辩论的决定。但是这一事实被相应地从历史中阉割出去。^⑩相似的是,当以色列的空中和两栖部队1973年2月进攻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的时候——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说法,这次袭击杀死了31人(主要是平民),摧毁了教室、诊所和其他建筑物,以色列将其合法化的理由是“旨在先发制人地预防几项计划好的针对海外以色列人的恐怖主义袭击”。^⑪

这种模式是惯常的，其辩解的理由被视为合法的而予以接受，这再一次反映了以色列作为一个有用的附庸国的地位以及其受害者的低人一等的地位。

最后提到的一个例子发生在以色列击落一架利比亚民航客机的当天，机上 110 人遇难，这架客机当时飞往开罗，在离开罗还有两分钟的时候在一场沙暴中迷航。美国在官方上表达了对这些受害者家庭的同情，但是新闻发言人“拒绝与记者讨论政府对这次事件的感受”。以色列指责了法国的驾驶员，《纽约时报》忠实地紧跟于后，接受了以色列的说法，即驾驶员知道他被命令着陆，但是仍然采取了“高度可疑”的规避动作——这也是苏联击落韩国航空公司 KAL007 的理由^⑩——所以以色列的行为“在最坏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冷漠的行为，即使早先的阿拉伯的残忍行径也不能从中找到借口”。

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表示了以色列的官方反应：“以色列政府对那么多人丧生深表悲痛，并对利比亚驾驶员（原文如此）未能对根据国际惯例向他提出的警告作出反应表示遗憾，”而西蒙·佩雷斯补充说：“以色列按照国际法行事。”以色列伪称驾驶员并没有被授权驾驶这架喷气机。阿米拉姆·科恩在一项对以色列反应的详细分析（是在 KAL007 惨案发生后所作）中评论道，“新闻界被禁止刊登被毁飞机、死者和伤者的照片，”并且“记者不允许访问在贝尔谢巴的医院幸存者”，这都是“封锁信息”努力的一部分。国际上的反应被以色列的新闻界斥之为是在欧洲“蓬勃兴起的反犹主义精神”的又一证明。当有人敢于提到或是批评以色列的罪行的时候，美国国内同样基本

上是一种反射式的反应。以色列的新闻界坚持：“以色列没有责任，”并且“人们必须指责(法国)驾驶员。”科恩观察到，这是“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新闻界”，坚定地支持以色列行动的正当性。在经过无数次编造后，以色列确认存在“判断错误”，同意“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予受害者家庭以额外的通融补偿，但同时否认任何的“罪责”或是以色列的责任。^⑬

这一事件在美国很快就过去了，对犯罪者甚少有所批评。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在4天后抵达美国，她被新闻界提出的少数几个尴尬的问题为难了一下，但是带着新的礼物即军用飞机(合同)回到了国内。当俄国人1983年9月击落KAL007的时候，反应稍微有所不同，^⑭但是可以与华盛顿的安盟朋友在同一时候声称击落两架民航客机时的反应相提并论。要鉴别出“国际恐怖主义”的标准并不困难。

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记录可以回溯到建国之初，实际上早在那之前，其中包括1948年7月在利达(Lyddā)和赖姆莱(Ramle)对250名平民的大屠杀，并将其他70 000人残忍地驱逐出去；1948年10月在靠近希伯伦的不设防的杜阿玛村对数百人的大屠杀，作为为数众多的“清理土地行动”中的一次，而同时以色列的国际宣传机构宣称——正如它现在仍然是那么做的那样，阿拉伯人是在他们领导人的呼吁下逃离的；还包括1956年占领加沙地带后以色列国防军对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的谋杀；在克比亚、卡萨姆村(Kafr Kasseem)以及其他一连串被蹂躏的村庄的屠杀；1948年战争后不久将成千上万的贝都因人从非军事区驱逐出去，将更多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从西奈的东北

部驱逐出去的行动——他们的村子被摧毁,以为犹太定居点开放地区——等等。这些受害者,根据定义,是“巴解游击队员”,因此就是恐怖分子。因而,以色列《国土报》受人尊敬的编辑格肖姆·肖根能够这样写道,阿里埃勒·沙龙“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为自己建立起与巴解游击队作战的无情战士的名声”,这里指的是他在1953年(巴解组织存在之前很久)在布雷格和克比亚对平民的杀戮。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的受害者也是“恐怖分子”,必然是这样的,否则他们不会被以色列所杀,因为以色列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如此地致力于实现“军队清白”,并且被“亲阿拉伯”的美国新闻界用“更高的法律”加以约束。

恐怖分子的指挥官们获得了荣誉。当美国当代恐怖分子的领军人物1981年接管总统职位之时,以色列的总理和外长都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指挥官,与此同时,犹太社*中最高中的一个位置被这样一个人占据,在1948年另一次的清理土地行动中,他杀害了被他监管在黎巴嫩一个小镇清真寺内的数十名平民。所有的犯罪痕迹很快被从记录中消除,以便他能够很快得到大赦。他被赋予了律师的证书,理由是他的行为不应该沾上“任何污点”。^⑤

即使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也是可以容忍的。以色列在1954年对美国在埃及的设施(也包括公共场所)进行了恐怖主义袭击,试图恶化美埃关系,中断当时双方正在进行的秘密和平谈判,但是这些袭击被

* 犹太社(Jewish Agency),又译“犹太代办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国际团体,1929年成立,总部设在耶路撒冷。——译者

美国忽略了,而且现在也很少被记起。在这方面与此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是另一事件,1967年以色列的轰炸机和鱼雷艇试图在公海击沉美国间谍船“自由号”,甚至对水上的救生船进行射击以保证没有人能够逃脱。34名船员被杀,171人受伤,这是美国海军在本世纪的和平时期的最严重的灾难,但是被当作是一个“错误”加以打发——明显的荒唐理由——并且此事基本不为人知。^⑩相似的是,以色列军队在西岸和黎巴嫩南部对美国人施以酷刑,但是媒体基本对此不予提及,以色列的否认被强调,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证实被忽略。^⑪按照现行的标准,受害者都是阿拉伯裔美国人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被当作是合法化的理由。

这一记录也包括了从最早的时候开始的大量针对犹太人的恐怖主义,它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它绝没有损害以色列在美国的名声,即它的道德标准在历史上无可比拟。每一项新的恐怖主义行为,如果它被提到的话,很快就会被否认和忘记,或者被称之为是一种暂时的背离,只能用以色列敌人的邪恶本性来解释这种背离,因为是敌人强迫以色列背离它正义的道路,哪怕只是一会儿。同时媒体经常因为“双重标准”遭到谴责,因为他们忽视了阿拉伯的罪行而用不可能的标准来约束以色列。有声望的学者们清醒地告诉我们:“西方的许多公众人物,甚至是一些西方政府(很自然,都没有标出它们的名字)鼓励巴解组织摧毁以色列。”^⑫在美国,横贯整个政治谱系,以及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主导的教义是:巴勒斯坦人及其阿拉伯盟友的恐怖主义(在克里姆林宫的敦促下)、持续不懈地献身于杀害犹太人和摧毁以色

列的事业以及他们拒绝考虑任何的政治解决方案,所有这一切正是无休止的阿以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以色列是阿以冲突中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对这一教义的态度令人惊奇的一致,只有少数几个处于最边缘的例外。对于美国来说,它正在与“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进行勇敢的斗争,从中美洲到黎巴嫩直至更远的地区。

除了的开明的西方舆论那里享受到豁免权之外,犹太民族主义运动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国家并没有在他们的恐怖主义暴行记录上开辟什么新的天地。对于美国来说,回想起以下这点就足够了:“阿道夫·希特勒选择赞扬美国……‘解决了土著种族问题’”,^⑩那些在今日中美洲按照希特勒规则行事的人也在美国的支持下做到了这点。但是“文明国家”内最近关于“恐怖主义”的评论充斥着伪善之味,只能成为正派人蔑视的对象。



第三章

美国黑名单上的利比亚（1986年）

在美国的教义体系内，没有人能够比穆阿迈尔·卡扎菲这个阿拉伯世界的“疯子”更典型地代表了“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利比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恐怖主义国家的真正典范。

将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称为恐怖主义国家被看作理所应当的。在回顾大概可以归咎于利比亚的主要的恐怖主义行为时，大赦国际最新的报道列出了整个1985年被这个恐怖主义国家杀死的14名利比亚公民的名单，其中4人在国外。^①在这种为了其他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歇斯底里发作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指控被制造出来。但是这项记录证实了一名高级情报官1986年4月所做的一项声明：直到“数星期前，卡扎菲使用他的人马主要是为了暗杀利比亚的持不同证见者”。^②“几个星期之前，”这名情报官员继续说，卡扎菲“下定了明确的决心，将目标对准美国。”他所断言的这项决定展示出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的光环，尽管并没有可信的证据将其具体化。这发生在锡德拉

湾事件之后,当时一支美国海空舰队在利比亚海岸附近击沉利比亚船只,许多人丧生。此外,在这样一种教义之下,这种所谓的利比亚决定可能完全是合法的,的确是值得称赞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姗姗来迟的。这种教义是美国行政当局所承认的,并且得到了有名望的评论家的支持。前文已经引述了这种教义的部分,而后文将会直接转到它的其余部分。

大赦国际报告说,利比亚的恐怖主义杀戮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吉米·卡特总统正在关注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战争的升级,随着何塞·拿破仑·杜阿爾特的加入,他成为保证武器流向杀人犯的掩护。当利比亚正在杀害本国的14个公民以及少数几个其他人的时候,美国的代理人萨尔瓦多政权杀死了50 000名本国公民。接替被暗杀的罗梅罗大主教的里韦拉·y·达马斯主教在1980年10月,也就是7个月的大恐怖之后,将整个过程形容为是“针对毫无自卫能力的平民的种族灭绝战争。”^③几个星期后,实施这些必要的例行公事的安全部队受到了杜阿爾特的欢呼,欢呼他们“站在人民一边反对颠覆的勇敢贡献”,但同时他承认,在卡特-杜阿爾特联盟领导下的这种活动时,“大众站在游击队一边”。当他宣誓担任这个军事集团的总统之后,他赞扬了这些杀害了许多人的杀人犯。他宣誓就职是在四名美国女信徒被杀后,试图获得一些合法性。这一举动被普遍认为是不合适的,但是即使是对这种罪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亚历山大·黑格仍然给出了合法化理由。同时媒体使我们确信:“1980年估计有10 000名政治犯遇害,其中绝大多数是政府军队或是与其有联

系的非正规部队的受害者,对这一点不存在真正的争论。”(《华盛顿邮报》语)但是后来媒体又悄悄地承认,当时卡特政府的官员告诉媒体:“安全部队要对暴行的百分之九十负责,”而并非新闻界所报道的“‘无法控制的’右翼分子”。^④从卡特-里根政府在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早期开始,杜阿尔特的首要作用是保证杀戮活动不受阻碍,同时否认那些被明确记录下来的罪行,或是用受害者都是“共产分子”为理由将这些罪行合法化。当针对平民人口的野蛮袭击获得了其预想中的效果的时候,他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美国越来越多的掌声。这种效果是摧毁了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的威胁,这种民主伴随着以教会为基础的自助团体、农民协会、联盟和其他“大众组织”的崛起而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伦敦《旁观者》杂志保守的驻中美洲记者评论道,死刑队“的确做到了人们推测他们所做之事:他们使工会和群众组织群龙无首,”并迫使幸存者“要么逃离国家,要么加入游击队,”做到这一点后,美国针对农村人口的战争进一步升级,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恐怖行动和屠杀。《新共和》的编辑们曾经敦促里根继续杀戮行动,而无需关注人权(美国有更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也“不管有多少人被谋杀了”。很自然,他们现在以满意的目光看待萨尔瓦多的成就,它是“我们的半球内支持推动民主的一个真正的典范”。被“美洲观察”、“大赦国际”以及极少数情况下被媒体记录下来的持续的恐怖活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⑤

发生在萨尔瓦多的屠杀并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国家恐怖主义,而且也是国际恐怖主义,因为它得到了这个半球的统治者的组织、供应、

培训和直接参与。同一时期发生在危地马拉的大约 70 000 人被屠杀,对于这一事件,情况与萨尔瓦多类似。尽管有必要召集美国的附庸们——阿根廷的新纳粹主义将军们、台湾和以色列——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屠杀,但是与普遍的断言相反的是,当时流到杀人者手中的美国武器接近常规的水平。作为补充,美国政府还在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非法指导下,建立了一条包括比利时和其他勾结者在内的输送武器的管道。同时,当恐怖活动达到其野蛮顶点的时候,里根和他的助手们赞扬了那些杀人犯和酷刑实施者们改善了人权,并“完全献身于民主”,将有关暴行的大量文献斥之为“不公正的判决”。^⑥

美国在萨尔瓦多的国际恐怖主义被作为重要成就而予以欢呼,因为它为它所偏好的“民主”版本奠定了基础:为美国的需要服务的集团统治。由于本可以为有意义的民主提供基础的大众组织遭到“断头”和大批屠杀的命运,公众的作用被降低为偶尔批准精英所做的决策。1982年和1984年,美国为了安定国内阵线,组织了被爱德华·赫曼和弗兰克·布罗德黑德称之为“示范选举”的活动。按照英国议会人权小组的观察员的话来说,它们是在“恐怖和绝望、死亡的流言和可怕现实”的气氛下进行的,但是美国的评论家称赞了这种致力于民主的示范。^⑦出于相似的理由,危地马拉也被看作是一个成功。当受到美国支持的暴力的适当折磨之后,一半的人口几乎是列队前往投票站。但是“开明的”评论家们陶醉于这种新的实证,证明我们对民主的热爱。虽然死刑队杀害人数在增加,虽然新当选的总统公开承认,鉴于实际权力的根基在军队和寡头集团手中,他将无所作为,并且

民选政府纯粹是“管理破产和悲惨命运的经理人”，^⑧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给那些评论家带来丝毫的困扰。

这两个例子只是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国际恐怖主义中的作用，这一可怕的记录可以回溯到很多年前。

两名评论家在回顾大赦国际关于国家恐怖主义的报告时评论道，“利比亚暴行的显著特征在于，惟有这些罪行的数量非常有限，并且所有个案都可以被一一列举。”这与君主干涉下的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中美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⑨

简而言之，利比亚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但是在国际恐怖主义的世界里，它只是一个小角色。

有些人相信，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的粗俗行为以及为大屠杀和恐怖主义所做的辩护不会出现在有声誉的西方出版物中。但是这些人可能会因以下原因从这些幻觉中醒悟过来：考察一下中美洲在恐怖主义最严重的时期的无数例子，^⑩或是转向新保守主义的杂志《国家利益》，在一篇批评《华盛顿邮报》对待利比亚立场软弱的文章中，人们可以读到：“毫无疑问，以萨尔瓦多的何塞·拿破仑·杜阿尔特政府或是土耳其最近任何一届政府为例，如果他们在任何地方处死人的数目接近卡扎菲，那么《邮报》会提供非常详细的细节，并会报道说那里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对力量。”^⑪

不仅“恐怖主义”是按照意识形态上的可利用性来加以定义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而且证据的标准也是如此加以设定的，以便实现君主的目标。即使是最不可信的证据，甚至是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

况下,也足以证明利比亚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为了给一次在利比亚杀死 100 人(根据当时在场的新闻报道)的恐怖主义袭击提供合法性理由,《纽约时报》一篇社论的标题是:“为了拯救下一个娜塔莎·辛普森”,这里指的是一个 11 岁的美国小女孩,她是 1985 年 12 月 27 日发生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航站楼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之一。《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庄严地宣称,这些受害者使我们有权轰炸利比亚的城市“以阻止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利比亚涉及到这些行动,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小问题。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宣布,恐怖分子是在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地区接受的训练,并且假道大马士革前往目的地,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的重申。4 个月后,在对美国提出的有关利比亚卷入了维也纳袭击的主张进行回应时,奥地利内政部长宣布:“不存在将利比亚牵连在内的最微小的证据”,他再次引述了有关叙利亚是其中联系的观点,并补充说,华盛顿从来没有向奥地利当局提交它许诺提供的有关利比亚参加同谋的证据。他还补充了一点评论,这点评论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在美国表达出来,即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恐怖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失败,这种失败导致绝望的人民转向暴力,这种结果可能是美以恐怖主义所希望达到的,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一样。^⑫

几个月后,意大利内政部长在与美国签署一项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协议时,重申了意大利“自 1 月以来”表述的立场,即他们怀疑叙利亚是罗马和维也纳袭击的源头。《时代周刊》报道了他的声明,但是

感到没有必要对针对利比亚的正义报复进行评论,而他们在4月份曾对这一袭击表示过喝彩。^⑬

如果一名与恐怖主义行动有染的人曾经访问过利比亚,或是被指控在过去接受过利比亚的培训和资金,仅此就足以谴责卡扎菲,必须被根除。那么同样的标准也可以将中央情报局与古巴流亡分子的杀人功绩牵连在一起,还可与其他大量的事件牵连在一起。只要看看1985年,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珍宝客机在靠近爱尔兰的地方爆炸,329人遇害,这是当年最严重的一起恐怖主义事件,其中的一名嫌疑犯很明显在阿拉巴马州一个培训雇佣军的训练营中受过训。美国总检察长米斯在9个月后访问印度时,发表了一个几乎没有在美国得到报道的声明,即美国正在采取步骤“防止恐怖分子获得美国的培训和资源”,这里指的是印度所指控的培训锡克族极端分子的私人军事训练营。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米斯的许诺,也没有任何调查。^⑭在中东,夺走人命最多的一次恐怖主义行动是3月份发生在贝鲁特的一次汽车爆炸,80人被杀,数百人受伤,它是由中央情报局培训和支持的一支黎巴嫩情报部队发动的,目的是杀死一名什叶派领导人,他被相信卷入了在贝鲁特“针对美国设施的恐怖主义袭击中”;^⑮“恐怖主义”一词被外国军队普遍用于指那些当地人口反对他们的行动,那些当地人将这些军队视为占领者,认为他们试图通过入侵强加一个被他们所厌恶的政治方案。在这个例子中,指的是以色列的“新秩序”。根据在利比亚这个事例中所使用的证据的标准,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我们将按教义体系没有资格列入的“大

恐怖主义”排除在外,美国在 1985 年也将再次成为世界领头的恐怖主义力量。

接着看 1986 年,到本文写作时为止,在中东/地中海地区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之中,除了以色列继续在南黎巴嫩进行恐怖活动外,还包括美国对利比亚的轰炸和叙利亚境内的数次爆炸。在叙利亚事件中,根据黎巴嫩电台的报道,黎巴嫩总统阿明·杰马耶勒的长枪党在 4 月份杀害了 150 人。叙利亚指责是以色列间谍所为,但是没有可以报道的证据,然而这些证据不会比类似的美国对任何正好成为当代无赖的指控更不可信。碰巧的是,这些事件都没有归入到“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之中。^⑮

美国当然不承认对它所培训的恐怖分子的行为负有责任,包括古巴的、黎巴嫩的、类似危地马拉的里奥斯·蒙特的杀害大众的刽子手以及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无数的其他人。以黎巴嫩爆炸为例,中央情报局否认卷入其中,但是这种否认“遭到一些政府和议会官员的置疑,他们说在爆炸发生时情报局与这个组织在一起工作”,《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也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个调查认定,在这次没有得到中央情报局授权的爆炸发生后,华盛顿取消了这项秘密行动。^⑰即使我们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说法,即它没有给这次行动授权,并且它再也不卷入它所训练的恐怖主义组织之中,政府的这些借口也很容易被同样的标准所驳斥。不管是在政府还是媒体中,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辩护的人都在官方的敌人身上用过这些标准。回想一下,“对于暴行的更大的道德责任……全部都应由阿拉法特负责”,因为“他曾

经是,而且继续是当代巴勒斯坦暴力之父”,因此美国认定阿拉法特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负责”,不管他是否卷入其中。^⑩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必然得出结论:在已经提到的和其他许多例子中的“更大的道德责任全都是华盛顿的”,不管直接卷入的事实如何,它都必须为此负责。

正如在序言中提到的,里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运动是这一教义体系进一步深化其基本工作议程的自然选择,这些基本议程包括扩张国家经济部门、将财富从穷人处转移到富人处,以及实施更为“行动主义的”外交政策。如果用一些威胁要摧毁我们的可怕敌人来恐吓住公众,使他们顺从的话,这些政策的推行就会顺利得多。但是要避免与大撒旦本身发生直接冲突,因为那太危险。邪恶帝国的附庸们的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明显的候选对象,政府的公共关系专家们马上转而承担起这样一个工作,编造由一半真理和谎言组成的适当的网络,期待这种骗术能够被人们当真。

利比亚绝妙地符合了这一需要。卡扎菲很容易被人憎恨,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蔓延着反阿拉伯种族主义背景下,以及政治阶层和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知识界献身于美以拒绝主义的背景下。他创造了一个可怕的、压制的社会,而且确实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但从它表现出来的情况来看,主要是针对利比亚人的。卡扎菲处决利比亚持不同政见者是他主要的被记录下来的恐怖主义行为。根据美国和以色列情报分析员的看法,本来这些事情可以防止发生,但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后果,即暴露了利比亚的密码(看起来相当容易识别)已经被破解。

“一名以色列分析员更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要为了某些利比亚人而暴露我们的资源和手段？’”^⑩

此外，利比亚是虚弱的，无力自保的，所以可以对它炫耀武力，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在得到豁免的情况下对利比亚人进行谋杀。在格林纳达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也服务于这一目的，它是毕绍普政府扬言要考虑穷苦大众的需要之后，卡特-里根政府对其敌视和侵略的累积结果。国外很容易认识到这一点。美国记者唐纳德·内夫在一份关于1986年3月的锡德拉湾事件的英国出版物上评论道：

与其说这是一种兰博式的行动，还不如说是街上小霸王选择打架的一个示范。对里根来说，这很典型。在他任职的五年时间里，他一再成功地对弱小者作威作福。这一次，他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种懦弱的和小打小闹式的定期展示似乎激起一片反响，有时候在国外也是如此。正当“没有主见的”人对美国轰炸利比亚的“恐怖主义基地”（指平民目标）有所疑问之时，英国评论家保尔·约翰逊谴责了“这种空气中令人厌恶的纯粹的懦弱之气”。他流露出对“牛仔的力量”的崇拜，这个牛仔依靠派遣轰炸机去杀害无自卫能力的平民来展示他的勇敢。^⑪

里根政府中的公共关系专家们理解利比亚这个敌人的作用，并不遗余力地对付这个不祥的敌手。利比亚曾被赋予了这样的角色，即被当作是苏联鼓动下的“恐怖主义网络”的首要代理人。1981年7

月,中央情报局一项在利比亚内通过准军事行动推翻并可能杀死卡扎菲的计划被泄露给新闻界。^②

我们要附加申明的是,按照美国的标准,这个计划赋予了卡扎菲实施反美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利,以进行“防止未来袭击的自卫”,此话是白宫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对轰炸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官方理由。弗农·沃尔特斯和赫伯特·奥肯在联合国重申了同样的理由。政府还进一步申辩说,这种立场——如果被其他暴力国家采纳的话,会将全球秩序和国际法的仅有残余撕成碎片——是与联合国宪章相一致的。没有一种法律上的诡辩形式可以跨越这个差距,但是美国政府认为“它在皮奥里亚很受欢迎”,或是至少在剑桥、纽约和华盛顿。在政治图谱所能允许的最激进的自由左派一端,《纽约时报》的法律专家安东尼·刘易斯适时地对里根进行了辩护,称他依靠“合法的主张:用于对付反复实施暴力的罪犯的暴力可以被合法地称之为自卫行为。”

美国轰炸利比亚的合法理由是“建立在先发制人袭击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可以被看作是自卫而非报复行动的一种形式”,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是这样解释这个理由的,他指出,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使用武力,但是自卫是个例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接到了认为自己成为突然的和压倒性的武装袭击的受害者的国家提出的正式要求之后,以及联合国采取行动之前的自卫活动。当这种“法律证据”在国内受到尊重的时候,它在国外遭到了普遍的否定,国际上很少有人会不同意前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乔治·伊格纳季耶夫——加拿

大首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现在是多伦多大学校长——的意见，他反对诉诸于联合国宪章中的自卫权，认为它毫无法律依据。^②

1981年8月，反卡扎菲的信息“通过在锡德拉湾为利比亚设立圈套得到强化”，这个圈套“是美国精心计划的”，目的是造成一场可以击落利比亚喷气机的冲突，正如所愿，爱德华·黑利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在一项关于美国和利比亚关系的研究中观察到的，在研究中他持强烈的反卡扎菲的立场。黑利似乎很有道理地指出，一个特定的目标是“利用‘利比亚的威胁’以获取支持，支持政府在执行国务卿黑格的反苏‘战略共识’时希望采取的步骤，并将它作为创建一只快速部署部队所必需的各种安排中的一个要素”，这种部队是主要针对中东地区的干预部队。

11月，政府编造了一个滑稽的故事，即利比亚的打手们在华盛顿的街头游荡以暗杀我们的领导人。这引起了狂热的媒体评论，同时也有一些怀疑，但是在当时相当有限。当被问及此事时，里根宣称：“我们有证据，而且卡扎菲也知道。”^③当它的目的达到后，此事逐渐淡化。新闻界也具有足够的纪律性，并没有将一些被曝光的事实报道出来。事实是，在被泄露到英国的美国官方名单上的“暗杀者”都是（强烈反利比亚的）黎巴嫩“阿迈勒运动”的头面人物，包括其领导人纳比·贝里和年迈的什叶派宗教领导人。^④

其他令人瞩目的事件包括利比亚穿过600英里沙漠入侵苏丹的威胁（美国和埃及空军竟毫无办法阻止这种狂暴的行为），以及一项在1983年2月推翻苏丹政府的阴谋。这项阴谋被公开之时正值政府的

反对派选民们指责政府战斗性不够的时候,它是如此地难以捉摸以至于埃及和苏丹的情报机构都对此一无所知,而不嫌麻烦地跑到喀土穆去进行调查的美国记者们却很快就发现了。美国对此项可怕阴谋的回应是大肆炫耀武力,这使得被指责为过于懦弱的国务卿舒尔茨在电视上展示出英雄的姿态,他宣布卡扎菲“缩回到他原来的盒子中去”,由于里根对这个世界秩序的威胁“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再次展示出“牛仔的力量”。一旦达到了目的,这一插曲也很快被人忘却。存在着一系列的相似例子。媒体一般总是扮演被指定的角色,偶尔才会有几个持异议者。^⑤

1986年3月到4月的事件也符合类似的模式。为了激起沙文主义的歇斯底里,3月份的锡德拉湾行动时机正好被设定在对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议案进行关键性的参议院投票之前,也正好与编造出来的尼加拉瓜对洪都拉斯的“入侵”同一时间。这是一次富有灵感的公关行动,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表现在国会内鸽派和媒体较为一致的狂暴反应上,也表现在参议院的投票中(见第二章)。这一编造还使政府获得向洪都拉斯提供2000万美元军事援助的许可,洪都拉斯官方坚持说,它没有提出援助的请求,毫无疑问它被方便地“遗失”在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营地中,这是华盛顿无法无天的团伙逃避国会对他们害人勾当的软弱约束的另一种途径。^⑥

在锡德拉湾的挑衅至少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它使美军击沉了几艘利比亚船只,杀死50多名利比亚人,很可能美国希望由此能够挑动卡扎菲像他随后宣称的那样,采取反对美国的恐怖行动。这种努力据

说在华盛顿导致了相当程度的挫败感,因为卡扎菲没有上钩,没有实施恐怖主义的暴行,使得美国无法将其作为借口,发动对利比亚的第二阶段的恐怖主义运动。^⑳

当美国军队成功地杀害许多利比亚人时,单凭他们却无法营救幸存者。这项任务看上去似乎不是不可能的。美国袭击中的16名幸存者在救生船上被一艘西班牙油船救起。^㉑

美国军事行动的官方目标是在锡德拉湾确立自由通行权。派遣一支海军舰队并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或者是合适的手段:一项声明就足够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采取进一步的步骤被认为是必要的,合法的手段随手可得。如果一个人与其邻居围绕某项财产权发生争议,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将事情提交法院,二是拿起枪,杀了邻居。第一种选择在锡德拉湾事件上肯定是可取的,因为很简单,事情并不紧迫,有可能诉诸法律来确立无害通行权。但是一个不守法的和暴力的国家自然会遵循不同的优先顺序。当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将问题提交国际法院时,国务院海洋法和政策办公室主任布赖恩·霍伊尔说,这个案子“会花上很多年的时间,我认为我们对此无法忍受”。^㉒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作为一个国家生存的话,美国海军舰队明显有必要马上在锡德拉湾进行活动。

根据更狭窄的理由,美国的立场更加令人置疑。新闻界一直在说“海洋法”,但是在诉诸于这个规则时,美国基本上没有坚实的依据,仅仅因为里根政府拒绝(签署)《海洋法公约》。此外,利比亚向美国飞机而不是船只射击,“空中法”还远没有建立起来。各个国家在这个方面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例如,美国要求 200 英里的空中防御识别区,在这个区域内,它有权对它判断为具有敌意的入侵飞机行使“自卫权”。毫无疑问,美国的飞机肯定处于利比亚领土的 200 英里内——五角大楼声称是 40 英里——而且它们是有敌意的。因此,根据美国的标准,利比亚处于拦截它们的权利范围内。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的保守派法学家艾尔弗雷德·鲁宾提到过这一点,他评论说,在“没有必要的挑衅中”,^⑩“通过派遣飞机,我们超出了海洋法下我们可以得到明确授权的行为”。但是对于一个流氓国家而言,这种事无关紧要,并且这种行动是一次成功,至少在作为它目标的国内圈子内。

五角大楼发言人罗伯特·西姆斯清楚地表达了锡德拉湾挑衅事件的范围和意义,他说“美国的政策是,只要美国在这一地区进行海军演习,美国会射击任何进入锡德拉湾国际水域的利比亚船只,不管它离美国的军舰有多远”。“鉴于利比亚在试图击落美国战机时表现出来的‘敌对意图’”,西姆斯宣称,任何利比亚军用船只都是“对我们军队的威胁”。^⑪简而言之,美国保持了出于“自卫”向任何靠近利比亚海岸接近其海军舰队的利比亚船只开火的权利,但是利比亚不享有在靠近自己海岸的空域进行自卫的权利,即使只是在美国宣布的一部分也不行。

本故事还有更多的情节。英国记者大卫·布伦迪采访了在的黎波里修理俄罗斯安装在那里的雷达系统的英国工程师们。一个人说,他一直在通过雷达显示屏监视整个事件的始终(与五角大楼说法相反的是,这些雷达并没有瘫痪)。他报告说,他“看见美国的战机不仅

仅穿越了利比亚的 12 英里领海,而且还进入了利比亚的领土上空”。他说,“我看到这些飞机大约飞入了利比亚领空大约 8 英里”。“我认为利比亚别无选择,只能进行还击。按照我的观点,他们不愿意这么做。”这名工程师补充说,“美国战机使用了一条正常的民航路线进入,而且紧随一架利比亚班机之后,这样它在雷达上的光点可以在利比亚雷达上掩盖住美国的飞机。”^②

根据我的了解,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一信息会出现在美国媒体上。亚历山大·科克伯恩的信息丰富的报道不在此列,他通常发挥着个人解毒剂的作用,以对付媒体的顺从和歪曲。布伦迪的文章并没有在美国的新闻界中神秘消失,它被《时代周刊》的约瑟夫·莱利维尔德所引用,但是其关键内容被省略了。^③

锡德拉湾行动的一个很有可能的后果——可能是被热切等待的后果——是引发利比亚报复的恐怖主义行为。那时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在美国,并且走运的话,同样也在欧洲诱发出一种恐怖主义气氛,以便为下一轮的升级做好准备。4月5日,西柏林的“拉贝拉”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一名美军黑人士兵和一名土耳其人死亡。^④利比亚马上受到指责,随后把它用作4月14日轰炸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借口,其中许多利比亚人被杀,很显然,绝大多数是平民(根据西方媒体大约是100人,根据利比亚官方报道是60人)。轰炸的时间被巧妙地定在预计中的众议院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援助进行投票前一天。万一听众们错过了这一点,里根的演讲撰写者也会把它明确表达出来。在4月15日对美国商业大会演讲时,里根说:“我将提醒本周

投票的众议院,这个恐怖分子魁首将把4亿美元、大量的武器和军事顾问送入尼加拉瓜,将他国内的战争带到美国。他吹嘘说,他帮助尼加拉瓜人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与美国人战斗。”^⑤

这真是个绝妙的想法:通过向正在遭受美国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军队进攻的国家提供武器,“疯狗”将他国内的战争带到了美国。这种想法没有引起任何值得关注的评论就悄然逝去。尽管轰炸利比亚的确燃起了沙文主义的热情,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归功于流行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以及对以前的一些事件缺少理智的反应,这些事件“制造”出对卡扎菲的真实的和所谓的罪行的歇斯底里发作。但是这种公共关系运动没有一次能够完全成功地压倒国会。

4月14日的袭击是历史上第一次为电视的黄金时段准备的轰炸。对轰炸袭击仔细进行了计划,以使它能够正好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晚上7点开始;^⑥那一时刻正好是所有三家全国性广播公司的电视频道播出其主要新闻节目的时候,它们被预先设计好以便被激怒的新闻主持可以切换到的黎波里,直接收看对这些令人兴奋的事件的报道。从伦敦飞过去7个小时的路程对于后勤来说绝非小成就。袭击一停止,白宫马上让拉里·斯皮克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言,随后是其他的大人物,以确保在最初的那段关键时间里完全主导信息系统。

有人可能会说,政府是在这场透明的公关行动中赌博,因为记者可能会询问一些容易看透的问题。但是白宫有信心,不会有麻烦事发生,并且它对媒体自律的信任也是有保证的。

除了时机和提前通知之外,还会有其他问题冒出来。只需要提其中一个,斯皮克斯宣称,美国在4月4日就得知,驻东柏林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通知的黎波里,明天柏林会发生一次袭击。随后它还通知的黎波里,“拉贝拉”迪斯科舞厅爆炸按计划发生了。因而,美国在4月4—5日就知道——白宫宣布,它确信——利比亚对迪斯科舞厅爆炸负有直接责任。那么,有人就会问,为什么从4月5日到袭击发生之前,美国和西德的调查报告前后一致地宣称,它们最多只是怀疑利比亚卷入了此事?事实上,每个聆听政府故事的记者在他或她手中放着一份美联社发自柏林的报道——除非我们怀疑新闻发布室极其不称职——这份报道在东部标准时间下午6时28分被电报传过来,这是轰炸之前半个小时,报道称:“(西柏林)的联军司令部报道说,有关迪斯科舞厅爆炸案的调查没有任何进展”,以及“美国和西德官员说,利比亚——可能是通过其在共产党统治的东柏林的大使馆——被怀疑卷入了对‘拉贝拉’夜总会的炸弹事件中”(斜体为作者所加表示强调)。^⑦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就在袭击发生前几分钟,美国和西德最多也只是怀疑利比亚的卷入——就和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样——然而10天之前的4月4日至5日,他们已经有了确实的了解,这怎么可能?但是令人尴尬的问题没有被提出,并且相关的事实大部分遭到压制。

里根在4月14日的傍晚声明说:“我们的证据是直接的,它是精确

* 利比亚的官方称呼,相当于大使馆。——译者

的,它是不可辩驳的。”就如同“我们有证据,而且卡扎菲也知道”一样(利比亚的打手在华盛顿的大街上闲逛的例子)。更不用去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被卷入到毒品买卖以及他们有关“无边界革命”的声明的例子,也不要去看赫尔穆特·科尔和贝蒂诺·克拉克西对袭击利比亚的支持(被德国和意大利“震惊的”官员们愤怒地予以否认)^⑧以及这个政府所制造出来的无数其他例子。这个政府已经大大超出了欺骗的通常标准,并且继续“致力于任何罪行,致力于说谎和欺骗”这是这个有头衔的领导层提到其官方敌人时的原话——以实现它的目的。这个政府有信心,事情过去之后在小媒体上的偶尔曝光不会阻止这种经常性的连串谎言设定辩论的用语和改变被牢牢灌输的适当的印象。

但是,超出国界之外,这一纪律不再盛行。在德国,在华盛顿宣称它在10天之前(也就是4月4日—5日)就确信利比亚对迪斯科舞厅爆炸负责之后的一个星期,4月21日的《镜报》报道说,臭名昭著的电话截听似乎并不存在,并且西柏林的情报部门只是怀疑利比亚的卷入,还怀疑“毒品贩子的竞争团伙”也在其他可能性之中(有些人怀疑包括三K党或是新纳粹团体;黑人美国大兵和第三世界的移民经常到这个迪斯科舞厅去)。华盛顿的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手段,”《镜报》继续报道说,“只要敌人是像格林纳达和利比亚一样的小国,并且对手是像卡扎菲这样理想的无赖”;编辑鲁道夫·奥格施泰因补充说,没有一个欧洲领导人会有这样的幻想:如果美国决定将国际暴力活动升级,即使是到了最终世界大战的程度,它会考虑欧洲的担心和利益。^⑨

在4月28日接受美国军方杂志《星条旗报》的一名记者采访时,

柏林国内安全部门首脑以及调查迪斯科舞厅爆炸的 100 人小组的组长曼弗雷德·甘朔宣称：“当事件发生两天后你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没有证据表明利比亚与此次爆炸有联系，现在我也没有更多的证据。”他同意，这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案子”，并暗示对“政治家们”正在说的和将要说的话有相当大的怀疑。^④

美国的新闻界隐瞒了德国媒体和调查组所表达的疑问，但是随着据说与叙利亚和其他方面有联系的嫌疑人遭到调查，以及华盛顿在 4 月 4 日—5 日声称的“确切的消息”被冠之以“据报道”和“据说”等限定词，^⑤有鉴别力的读者能够从继续进行的调查报告中察觉出这些疑问。犹豫不定、资格限制、从原来确信的断言中倒退、间接引用削弱政府主张的证据等等，这些都是媒体使用的手段，以表明它们明确地意识到，它们被呼吁集结到大旗之下以热情支持的事情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

在《纽约书评》中，沙乌尔·巴赫什断言，约旦的欣达维兄弟应对“西柏林夜总会的爆炸负责”，并且“现在有新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叙利亚所招募的（并不是人们可能从当时一些官方声明中所认为的利比亚）”。^⑥除了大大超出已有的证据这一点之外，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陈述。并不是因为从“一些官方声明”中“人们可能认为”利比亚卷入了此事，而是因为所有的官方声明在问题被解开之前都是以这种确定的和无条件的方式提到这件事的（斜体为作者原加），而且以这种方式在媒体不断重复，这些声明都信心十足地认定利比亚的责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为轰炸和杀害利比亚平民提供了合法

化理由。并且,不管是媒体的变卦还是这种声明都未能得出这个直接的结论:如果里根政府在有关它的“直接的”、“精确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上撒谎的话,那么轰炸就完全是一种未经挑衅的国家恐怖主义(而不是有借口的国家恐怖主义),它被忠实的媒体所掩盖,媒体在他们热情支持这次袭击的时候避免提出显而易见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提供荒唐借口(例如,《时代周刊》编辑们关于“下一个娜塔莎·辛普森”的故事)为他们在恐怖主义中的同谋进行合法化。

这次公共关系的运动当然是一个成功,至少是在短期内以及在国内。就像新闻界所说的,“在皮奥里亚很受欢迎”,因此也是“策划民主共识”的一个成功例子,它“加强了里根总统在类似军事预算和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等问题上对付国会的力量。”^④

就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当使保罗·约翰逊之流痴迷的“古怪的牛仔领导人”在“疯狂”中行事,组织“割喉党”袭击尼加拉瓜,并在其他地方疯狂轰炸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巨大恐惧的对象。这是加拿大的一家主要杂志说的话,虽然这个杂志总体上相当克制,并且具有相当的亲美倾向。^⑤里根政府正在培育这些恐惧,利用了理查德·尼克松的“疯子”战略。在5月举行的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东京峰会上,美国政府传阅了一份意见书,这份文件宣称,欧洲会明智地加入美国十字军的一个理由是“需要有所作为,以便疯狂的美国人不会再次将所有的事情置于自己手中”。这种威胁成功地导致了一项只提及利比亚名字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声明。^⑥当评论家们高兴地看到,对利比亚的轰炸成功地使欧洲的“懦夫们”最后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对付

利比亚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时，这一明确的威胁被忽略了。

对轰炸利比亚的反应在国内和国外截然不同。有十二个成员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呼吁美国避免“将这一地区军事紧张状态升级，以防止所有的内在危险”。几个小时之后，美国的战机开始进攻，当时西德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正在前往华盛顿解释欧共体立场的路上。他的发言人宣称：“我们希望做一切力所能及之事以避免军事升级。”轰炸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引起了大范围抗议，包括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引发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论谴责。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国家报》谴责了这场袭击，它写道：“美国的军事行动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严重威胁了地中海的和平，而且是对欧盟盟友的一种嘲笑，它们在星期一的会议上没有找到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制裁的动机，尽管在这之前曾经有过要求采取制裁的压力，但是没有获得成功。”香港的《南华早报》写道，“里根总统解决‘中东疯狗’的药方也许证明比疾病本身更致命”，并且他的行动“可能也会在这一地区点燃更大范围大火的导火索”。在墨西哥城，《宇宙报》写道，美国“无权将自己树立为世界自由的保卫者”，敦促通过联合国诉诸合法手段。还有许多类似的反应。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新闻界是压倒一切地持赞成态度。《纽约时报》写道，“即使是最严谨的公民也只能赞成和赞美美国对利比亚的袭击”，将它称之为是一个正义的判决和审判：“美国小心、适当和正义地起诉了卡扎菲”。利比亚对迪斯科舞厅爆炸负有责任的证据“现在被明白地展现在公众面前，”至少是令编辑们感到满意，尽管他们认为不合适将它们发表出来。“随后是相当于陪审团的欧洲政府，

美国独自向它们派出许多使团,以共享证据,并敦促它们采取反对利比亚领导人的协调行动。”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是,陪审团基本上没有被说服,并发布了一项呼吁行刑者避免采取任何行动的“法令”。同样无关紧要的是,社论无需对后来默认为的这样一个事实作出评论,即证据没有什么价值。

绝大多数政府也谴责了这一行动,尽管不是所有的政府。英国和加拿大独树一帜,尽管公众的反应截然不同。在当时里根热的气氛下,法国也表示了支持。政府控制下的南非广播公司说,这次袭击“强调了西方世界领导人对采取积极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美国袭击卡扎菲是正当的,“他的名字基本上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同义词”。在以色列,西蒙·佩雷斯总理宣称,美国的行动可以明白地用“自卫”将其合法化:“如果利比亚政府发布命令,在贝鲁特,在深夜时分冷血地谋杀美国士兵,你能指望美国政府做什么呢?高唱哈里路亚?或是采取保卫自己的行动?”关于美国是在对两年半之前其驻贝鲁特的部队遭到的袭击进行“自卫”的想法是一个引人兴趣的创新,即使是将早些时候那次行动的状况排除在外。^④

在美国,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是这个国家内少数几个无愧于“保守主义”这个荣誉称号的政治人物,他在一封给《时代周刊》的信中谴责美国的轰炸攻击的是“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参议院议席”。几个主要的基督教教派领导人谴责了这次轰炸,但是犹太领导人总体上表示了称赞,其中有美国希伯来社团联盟主席亚历山大·辛德勒拉比,他“说美国政府‘适当和强有力地反击了’卡扎菲的‘盲目恐怖主

义””。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奈说,里根不得不“对柏林事件的冒烟的枪作出反应,对于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你还能做什么呢”?就如同中美洲和南黎巴嫩美国支持的恐怖主义一样,在那些地方“冒烟的枪”有更明显的证据。尤金·罗斯托支持这次轰炸是“不可避免和迟到的”,是“反对苏联扩张进程的更积极防御”的一部分。“使用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他解释说,“在现存国际法的规则下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卡扎菲“公然和持续地违反这些规则”。“事实是,所有被利比亚的行动伤害过的国家有权单独或者与其他国家一起使用任何合理必要的武力以结束利比亚的非法举动。利比亚在法律上居于野蛮海盗的地位”。^{④7}他敦促北约“发布一项声明,要求各国对在它们国土上犯下的非法行为负责”。^{④8}

更有理由的是,北约应该谴责君主,而不仅仅是海盗。根据罗斯托的理论,从印度支那到中美洲到中东的各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国家应该组织起来使用任何必要的力量来进攻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恐怖主义国家。

对从现场报道了轰炸及其后续情况的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查尔斯·格拉斯来说,一个7岁女孩的亲笔信代表了整个事件,这封信从她家的废墟中被挖出,而他曾经访问过这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家庭。这封信写道:

亲爱的里根先生:

为什么你要杀死我惟一的姐姐拉法和我的朋友拉沙,她只

有9岁,还有我的洋娃娃“草莓”。因为我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你就要杀死我们全部。你要杀死卡扎菲,因为他希望帮助我们回到我父亲的家园和土地。这是不是真的?

我的名字是金达。

原件的一份复印件交给了美国国内的媒体,被当作一封信交给了编辑,但是被认为不适宜发表。它被亚历山大·科克伯恩发表出来,并给里根夫妇提了一个建议,既然他们“喜欢阅读来自小孩子的信件,那么他们可以考虑在下一个合适的场合发表这封信”。^④

其他人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此事。迈克尔·沃尔泽与那些批评这次对利比亚的轰炸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例子的欧洲人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宣称,这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它针对的是特定的军事目标,在飞行员努力击中那些目标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也冒着同样的风险”。他就好像从五角大楼的秘密简报中了解到一样。如果对城市的夜间轰炸正好击中了黎波里人口密集的居住区的话,杀死拉法、拉沙和许多其他平民就像是饼干粉碎一样。^⑤可能这正是我们从被很有声望的道学家和正义战争的理论家那里所可以预料到的,他们使我们确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可以在这个概念下得到辩护,即以以色列在南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平民伤亡比例适当的战争的一个良好典范”。并且如果平民在以色列轰炸贝鲁特的时候“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这种危险的责任在巴解组织身上”。^⑥

媒体在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中的同谋行为并不仅限于轰炸发

生时的爱国主义行为,爱国主义是对前些时候政府选择编造的任何故事表示赞成的一个自然结果。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轰炸成功地抑制了利比亚的恐怖主义,正如它为以下的事实所证明,即轰炸之后归咎于卡扎菲的恐怖主义行动消失了。为了确立这个主题,有必要压制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早先提到的例子之外,在轰炸之前也不存在确凿的恐怖主义行动,这一事实很明显是无关紧要的。这样的问题不会干扰手边的任务。

《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赞扬了对利比亚的轰炸,其依据是“没有新的可以归咎于卡扎菲上校的恐怖主义活动”,他现在已经被降格为一个“屈服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其对西方盟友的影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需要一种震动”,由“显示决心、情报的无可辩驳的精确性、随后表现出来的利比亚的孤立以及并非毫不重要的旅游业的下滑的范例”所传递出来的震动,更不用说由“疯狂的美国人”可能在其他某处地方胡打一气所带来的威胁,当美国在同一时间向距苏联海岸线几英里之遥的黑海派遣军舰时,这一威胁被强化了。^⑤值得注意的是,编辑们仍然发现可能要提到“情报的无可辩驳的精确性”,虽然报刊杂志有大量的理由可以对此表示置疑,甚至以后会进而受到驳斥,正如已经被提到的那样。大卫·伊格内修斯写道,这次轰炸“在反对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方面令人惊讶地奏效”,实现了“在利比亚、地中海和欧洲的令人震惊——并且是非常有益的——变化”。它证明,卡扎菲是“虚弱、孤立和脆弱的”,“事实上是如此地脆弱以至于美国的战机能够在它严密防御下的空域自由活动”。这的确是一个光辉的胜

利,是对利比亚这个庞然大物的最惊人的发现。为了展现“这种允许卡扎菲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进行胁迫的心理状态”,伊格内修斯没有引用任何行为——因为不存在确凿的例子——仅仅宣称,即使“卡扎菲再次从事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也不会比他们在今年初所采取的规模大”,当时“美国的情报部门了解到,利比亚命令它的‘人民办事处’在大约十几个城市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作为一个非常称职的记者,伊格内修斯知道,政府关于情报部门已经“了解到”某些东西的声明是毫无价值的;他证明了这种行动在终止传说中的计划方面的“成功”,这种证明只是以一种狡猾的迂回方式说出:结果是无法被证实的。^③

相似的是,乔治·莫菲特指出利比亚的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完全停止了”,也就是说,它们从接近于零降低到接近于零,这是“积极的发展”之一,这些发展“似乎支持了里根政府的军事报复政策”。他的同事约翰·休斯成功地观察到:“自从针对利比亚的惩罚性空袭以来……已经没有针对美国的由穆阿迈尔·卡扎菲指导的重要的恐怖主义袭击”,正如就目前所知,以前也并不存在一样。^④

这句话对在华盛顿的国家恐怖主义者的寓意是明确的:当你们编造了一个你们声称是胁迫了世界的恐怖主义敌人的记录的时候,当你们为了惩罚你们构造出来的罪行而采取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时候,并且当你们宣称作为你们的英雄主义的结果,可怕的怪物已经屈服的时候,我们会听从你们的命令。单纯的事实永远不会阻止我们提供顺从的服务。

看看记录，“在袭击利比亚发生之后三个月，在西欧和中东发生了大约 18 起反美的恐怖主义事件，相比而言袭击发生之前三个半月只有 15 起”，而“就整个世界而言，反美的恐怖主义的比例看起来与上年相比并无不同”，《经济学家》观察到（同时赞扬了里根的勇气行为）；兰德公司的恐怖主义问题首席专家评论说，袭击发生之后的恐怖主义袭击维持在与以前基本相同的水平上。^⑤

在完成这项纪录之时，联邦调查局 7 月 3 日发表了一份 41 页报告，回顾了 1985 年美国国内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它列举了 7 起，其中 2 人被杀。在 1984 年，有 13 起恐怖主义活动。自 1982 年以来这个数字一直在下降，1982 年有 51 起恐怖主义事件被记录下来。^⑥

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得到了某些报道。《多伦多环球邮报》刊登了一个美联社的报道，其标题是“犹太极端分子被指责杀害两人”。第一段写道：“联邦调查局昨天报告说，犹太极端分子犯下了 1985 年美国国内 7 起恐怖主义行为中的 4 起，杀死 2 人。”这项报道继续提供了“归咎于犹太极端分子的事件”和其他事件的细节，“报道说，（它们）杀死了 2 人，打伤 9 人”。《纽约时报》没有报道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但是几个星期后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第 11 段提到了这个报告：“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年度恐怖主义报告，1985 年 7 次国内恐怖主义事件中的 4 次被相信与‘犹太恐怖主义团体’有关。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也没有由此产生任何起诉。”第二家国家级报纸《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关于联邦调查局报告报道，标题是“联邦调查局报道显示，国内恐怖主义去年下降”。文章内提到：（在报告的 7 起事件中），“所有死亡人数和 9 名

受伤人数都要归咎于犹太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行为”；在后来一次关于联邦调查局对阿列克斯·乌达谋杀案的调查的报道中又重复了这一点，提到“犹太极端分子团体是嫌疑犯”。^⑤

这三句话概括了全国性媒体对联邦调查局关于1985年国内恐怖主义根源的报道。我注意到，没有社论或是其他的评论呼吁美国轰炸特拉维夫或是耶路撒冷以切除“癌瘤”，制服将“邪恶的恐怖主义之源”带到我们自己海岸的“疯狗”。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呢。十分得体的做法是，以色列否认对“犹太极端分子”的行动负责。它也谴责了恐怖主义行动，正如以色列议员卡亨拉比所做的那样，他过去在犹太保卫联盟的同事被联邦调查局怀疑实施了这些行为。在没有什么保证的情况下，华盛顿拒绝对它训练和鼓励的恐怖主义行动承担责任。但是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根据我们对穆阿迈尔·卡扎菲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们也谴责恐怖主义行动，并否认对它们负责——套用的标准，美国的这些借口等于零。再次回想一下这个教条：“对暴行的更大的道德责任……全部由阿拉法特负责”，因为“他过去是，而且仍然是当代巴勒斯坦暴力之父，”因此美国认定阿拉法特“对国际恐怖主义负责”，在一般的意义之上，不管他卷入与否。^⑥根据同样的逻辑，锡安主义极端分子行为的“更大的道德责任”全部都是以色列的（斜体为作者原加）。

新闻界经常对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行动的谴责不屑一顾。只要提一个关键的例子即可，1982年的6月3日，阿布·尼达尔（他与巴解组织敌对，并在几年前被后者宣判死刑）领导的恐怖主义

组织试图在伦敦暗杀以色列大使什洛莫·阿尔戈夫,这个事件触发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人侵,被美国政府、媒体、受过教育者的舆论认为是合法的“报复”。《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暗杀阿尔戈夫的企图对于巴解组织来说是一种“尴尬”,它“声称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但是……倾向于有选择地接受某些巴勒斯坦暴力行为的责任”。^⑨如果按照这些理由,一个与巴解组织作对的巴勒斯坦组织采取的恐怖主义对巴解组织来说是一种“尴尬”的话,那么很简单,锡安主义极端分子在美国杀死2人、杀伤9人的恐怖主义行为对以色列来说也是一种“尴尬”。根据法律,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它并不是其公民的国家,其公民的六分之一是非犹太人),包括那些离散的犹太人。因而根据美国政府、著名的评论家和广泛意义上的媒体的逻辑,美国当然可以被授权——如果不是负有义务的话——轰炸特拉维夫,以进行“防止未来袭击的自卫”。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反应,如果美国国内大多数的恐怖主义行动及其附带的伤亡是由阿拉伯裔美国人所犯下的话,而 they 与巴解组织内的极端分子有联系,或是被怀疑是利比亚政府某位成员成立的恐怖主义团体的一部分。

美国轰炸利比亚与“恐怖主义”无关,即使是在这个词具有讽刺意味的西方意义上。实际上,非常清楚的是,锡德拉湾的行动和对利比亚城市的轰炸会引发这种“小恐怖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欧洲那些可能成为其目标的国家恳求美国避免采取这种行动。

这几乎不是第一次了:采取暴力行动是期待这些行动会引发“小

恐怖主义”。美国支持的以色列 1982 年对黎巴嫩的人侵是另一个例子,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讨论过的。对利比亚的袭击迟早会激起恐怖主义行为,这能够用来动员国内和外国舆论以支持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计划。如果美国人的反应是普遍的歇斯底里,包括害怕前往任何欧洲城市旅行,其实它们比任何美国城市都安全,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好处。

美国袭击利比亚的真实原因与对付“恐怖主义袭击”的自卫无关,正如西蒙·佩雷斯可能会说的那样,这些袭击是指 1983 年 10 月针对美国驻贝鲁特部队的(汽车炸弹)袭击,或是任何可以被正确地或是错误地归咎于利比亚的任何其他行为,或是“防止未来袭击的自卫”,它与得到国内很多喝彩的里根政府所主张的教义相一致。利比亚的恐怖主义是个小小的刺激,但是卡扎菲挡住了美国在北非、中东和其他地方开展计划之路。他支持美国反对的苏丹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团体,与摩洛哥组成违反美国意愿的同盟,干涉乍得(在法国派出外籍军团、顾问和飞机之后,但是法国的干预值得赞赏,因为法军帮助“为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商维护了西非的安全”,并在其他地方也提供了相似的服务),^⑥并且在总体上干扰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形成一个“战略共识”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地区的努力。这些都是真正的罪行,必须受到惩罚。

此外,对利比亚的袭击具有为美国在国内国外进一步的暴力活动进行舆论准备的目的和效果。初步的反应可能是负面的,但是一旦它被吸收之后,期望的程度会得到强调,美国的行政部门能够在必要

的时候继续进一步升级。

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宣传运动的讽刺意义被暴露在那些美国的异己舆论可以影响的听众面前，但是运动本身就是一次令人瞩目的公关成就，未来成功的前景也依然是非常大的，这归功于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部门不加鉴别的和忠实的反应。受过教育的阶层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这种服务促成了大规模的苦难和残忍行径，并且在更长的时期内，附带着导致超级大国对抗和终结性核战争的危险。但是与保证不出现任何对“稳定”和“秩序”的威胁和任何对特权和权力的挑战的需要相比，这些考虑几乎不作数。

这里很少有让任何诚实的历史学者感到吃惊的东西。



第四章

美国在中东的作用（1986年11月15日）

对我来说，最合适的做法是在开始向你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证明我在这方面的资格，因为仅仅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或是甚至只依赖于此种介绍性的评论是不公正的。让我先来读一封针对我的劝告信，这封信被寄往英国的一本小杂志《审查索引》，我在那本杂志上有一篇短文，是关于我们目前讨论话题的某些方面。^①

亲爱的丹：

请原谅我忍不住再次给作为《审查索引》编辑委员会成员及主任的您写信。在贵刊的最新一期杂志上，也就是1986年7/8月号，有一篇真正让人震惊的文章，从第二页开始，篇幅很长。这篇文章是诺姆·乔姆斯基对美国、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新闻界的攻击。

你可能了解乔姆斯基：他是巴解组织的疯狂辩护人，他在关

于中东的许多文章中为学术的不诚实和个人私怨设立了新的标准。鉴于他惊人的记录,在美国真的没有任何人——在与政治无关的情况下——会将乔姆斯基认真当回事。因此我发现无法解释的是,他使用了整整三页篇幅持续攻击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界。很明显,给予他如此大的空间对他这种声名狼藉的努力负有一定的责任。你们的编辑们是否完全不知道乔姆斯基是谁,并且不熟悉他的记录?或者他们完全熟悉他,但是仍然决定给予他这块阵地?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

署名为“埃利奥特”,也就是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美国负责美洲国家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86年7月29日写在国务院官方的信纸上。因此我认为,这可以被当作是公众信函(某些私人评论被省略了)。

我引用这封信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自然会珍视它,正像我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珍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顾问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们在第三世界禁我的书(如同他们多年来在苏联所做的那样)^②,并拒绝我惟一一次申请前往东欧的签证。委员们的反应经常表明,此事(他们反对的事)可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在此之外,这封信与我们的题目密切相关。它提供了一种揭示真相的洞察力(并不是非典型的)来看待里根政府以及以色列院外集团的思维方式。我应该提到的是,艾布拉姆斯的信只是一次不寻常的猛烈攻击的一部分,这种袭击是由信仰的卫士们发动的,针对的是敢于发表被认为是

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不利的评论的杂志。^③这些现象你们中的许多人私下里都很熟悉,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这个事实也与我们的题目密切相关。

这篇文章明显缺乏讽刺味,让我们将它先放在一边。记住这是一份致力于审查的杂志,它现在遭受攻击是因为它允许简短地表达不符合委员们口味的事实和分析。这封信揭示的是里根政府里的头面人物思维方式中的极权主义倾向:即使是对不可接受想法的最微小开放也必然不能得到允许。我不想说它已经处在美国政治谱系之外。不幸的是,它并没有。但是在它的实践、风格和承诺上,里根政府确实代表了这一个谱系的一个极端,一种反动的沙文主义的极端——盗用了光荣的术语“保守主义”——以一心一意地撒谎、无视法律、增强国家权力和暴力、攻击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权为标志。所有这些发展都是不祥之兆,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前景非常重要。鉴于美国实力具有的可怕规模,因而对于中东乃至世界的前景也都非常重要。

里根政府的这些特点并非不为人注意,自然地会在本土和国外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之中引起关注,政府和媒体中甚少有本土的保守主义者。三年前,伦敦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戴维·瓦特在《外交》季刊上评论说:

在目前美国对世界的看法和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之间的裂缝……可能以色列、南非、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以及中南美洲少数几个右翼政府例外,(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相信),里根政府对苏联

威胁反应过度了,因而扭曲了美国(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加速了军备竞赛,歪曲了它自己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判断,进一步用狂热的言论贬低了国际交往的语言。

他补充说,“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是对最有经验的美国人也几乎不可能传达这样的信息,即这种批判的观点已经变得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和普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好像是为了证实这种判断,在一篇有关当前国际局势的参考文章中,《外交》季刊的编辑威廉·邦迪写道,至于“来自苏联威胁的程度……里根政府的广阔视野对这名观察者来说,似乎比其他主要国家宣称的乐观和狭隘的立场要更接近现实”。^④

瓦特实际上夸大了这种“裂缝”。欧洲的精英们并不像他指出的那样远离里根似的歇斯底里,并且“例外”超出了那些他所提到过的例子,尤其是法国,许多巴黎的知识分子已经将里根似的狂热当作一种时尚予以采纳。此外,正如邦迪的评论所显示的,瓦特所描述的代表了美国的精英观点,并不局限在里根政府。邦迪写的是接近精英谱系另一端的观点。瓦特描述的是针对由越南战争引起的问题,精英总体反应中的极端看法,这些问题包括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和给它的工业化国家对手的好处、国内和第三世界内部秩序的崩溃、要求采取严厉的国家行为的因素的出现,因而诉诸于始终有用的苏联威胁,这种威胁经常在这样的情况被引发出来。但是,瓦特的中心观点是足够准确的。

美国从此之后日渐孤立了,正如联合国在广泛的各种问题上的投票所揭示的那样。就在最近几个星期内,联合国大会以124票对1票赞成南大西洋和平区的议案,并以94票对3票呼吁美国遵守国际法院要求其停止对尼加拉瓜进攻的裁定。在后一个例子中,两个附庸国站在美国一边,它们是萨尔瓦多(从波兰独立于苏联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独立”的)和选择成为美国的武装雇佣军的以色列。美国在中东问题投票上的孤立是臭名昭著的,但是这个现象要普遍得多。单单从1980到1985年,美国在安理会中27次求助于否决权,与此相比,在联合国较早的历史上(自1966年以后)只有15次,而20世纪80年代苏联只用了4次。^⑤

反应是相当有趣的。在联合国早期,当时它是牢牢地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并被用于冷战的目的。美国对这个组织一般持非常赞同的态度,并且对于是什么导致了苏联——当时几乎是孤立的——如此消极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热心。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因为使用了包婴儿的襁褓布,它加强了“消极主义”,少数几个怀疑者将这种理论称之为“尿布学”。当美国的全球统治从它非凡的战后顶峰开始衰落以及联合国成员国的独立性开始增加时,对联合国的态度越来越具有批判性,到现在变得极其的敌视。我们再也读不到关于俄国人的令人好奇的消极主义的论文,读到的论文是关于同样令人好奇的事实:世界已经开始步调不一了,正如《纽约时报》的驻联合国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所深思熟虑解释的那样。^⑥

欧洲的舆论调查显示了相似的结果。美国新闻署最近一项分类

调查显示,除法国以外的欧洲舆论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信任远胜于里根,在英国是4比1,在德国是7比1。^⑦

里根政府对国际孤立毫不在意。他们已经表现出对暴力和胁迫的功绩的敏锐理解。与他们的一些前辈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榜样一样,他们充分地意识到,如果人民被危及到他们生存的严重威胁恰到好处地吓唬住的话,对弱小的、无防卫能力的敌人的廉价胜利可以被用于引起国内沙文主义情绪和大众的热情。浮现在脑海中的过去的例子包括:希特勒的关于德国被下决心摧毁它的敌对国家包围的警告,捷克“匕首指向德国的心脏”,捷克人和波兰人的侵略性和恐怖,最重要的是国际犹太人阴谋的威胁。里根主义者相当好地理解了H·L·门肯所说的“实践性政治的整个目的”：“保持公众处于警惕状态(因而可以被呼唤着引导到安全的地方),方法是用无休无止的怪物来威吓他们,所有的怪物都是想象出来的。”对世界其余地区来说,美国的文化霸权足够强大,以至于出于国内目的编造出来的教条会被予以采纳或是认真对待,不管它们是多么的滑稽可笑;如若不然,在美国盟友依然不妥协情况下,暴力升级的威胁以及潜在的代价将依然非常可信,并且已经被有效地加以利用。

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宣传运动是在国内和国外熟练运用这些技巧的一个例子。里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知道,如果指控他们在今天的恶魔(不管是哪种怪物)面前软弱和战斗精神不足的话,国会和媒体内的自由主义分子会轻易地退缩,因此他们会顺从地列队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十字军”。他们还知道,他们号令下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暴

力资源允许他们蔑视世界舆论。实际上,他们经常利用对他们暴力的忧虑,正如在轰炸利比亚之后的东京峰会上,里根主义者通过警告将西方精英们集结在身边,并警告说,除非他们同意站到这边,否则谁也不知道“疯狂的美国人”下一步会干什么。^⑧

对国会的蔑视态度同样也暴露在每一次事件上。例如,上个月在关于军事授权法案问题上,国会两院坚持有关要求行政部门出于国家安全利益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措词。数星期后,政府宣布,它将进而超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限制。政府的一名发言人解释说:“国会已经散会,而在冰岛举行的峰会已经过去。并不指望(戈尔巴乔夫)会到这里来一段时间。那么是什么在阻止我们呢?”^⑨用其他话来说,警察正看着另一条路,那为什么不抢劫商店呢?事实上,即使国会在也等于不在,政府对此很明白,对街霸们来说,残暴地骑在可怜的反党派身上并不困难。

在里根政府的一名官员所称之为的“大规模的精神战行动”中,对公众的态度也被揭示出来。这种行动被用于设定对尼加拉瓜的讨论日程——一个被称之为“真理行动”的制造假信息的运动。戈培尔和斯大林会为此发笑。^⑩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制造假消息就已经成为一项政府的专长,尽管当一个新的案例被曝光时,媒体和国会总是表现出震惊。近来的一次是在1986年制造有关利比亚的假消息运动期间(见第三章)。在这个例子中,这种暴怒的惊讶的表现使一个轻微的健忘症病例成为必然。早在1981年8月,《新闻周刊》报道了政府的一项“旨在为难卡扎菲及其政府的制造假消息的计划”,同时还报道了美

国在利比亚国内试图“证明卡扎菲正遭到一支本土政治力量反对”的各种恐怖主义行为。在军备竞赛和许多其他事情上还有广泛的制造假消息运动,感谢媒体的合作,它们都相当成功。^⑪

我们可以从当前被揭露的一些情况中获得进一步的洞察力,它们揭露了一项复杂的计划,目的是在向袭击尼加拉瓜的恐怖主义代理人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方面逃避国会的限制。按照政府和忠实的新闻界的用法,这是“抵抗”,由西半球实施强制者组织起来的“抵抗”,他们从建立在尼加拉瓜边界之外的基地出发袭击尼加拉瓜(与之相反,“代理人军队”一词在白宫内部文件上使用,并且秘密报告中也没有隐瞒它的恐怖主义)。举一个例子来展现隐藏在恐怖主义行动之后的仔细策划过程,考虑一下1981年里根政府向沙特出售空中预警机(可能是相当无用的)决定。这是一项政治上相当不受欢迎的举动,在当时并不清楚为什么政府如此有决心追求这个目标。现在一些可能的理由已经出现了。里根的策划者们明显预见到资助代理人军队时遇到的潜在困难,当国会为了回应公众压力,随后寻求限制针对尼加拉瓜的恐怖主义战争的时候,沙特被要求偿还其债务,并为向反政府军运输武器提供资助,这些武器显然是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入侵黎巴嫩期间缴获的苏联武器。^⑫

这些都是具有全球视野的老练的国际恐怖分子的阴谋诡计。现在他们已经在那些最容易压制的地方最终压制住了这一点,部分的曝光引出了这样的借口,即里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是不称职的蠢材;精英们对国家计划失败的反应永远是集中在所谓的个人能力不

足上,以避免这样一种威胁,即公众会开始了解政策的系统性本质,精英圈子内对政策的普遍支持(策略除外)以及这些承诺的机制性根源。但是没有人会被蒙蔽到相信,我们所见证的是蠢材和笨蛋的行动;他们组织有效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从中东直到中美洲,乃至更远。

另一项需要记在头脑中的关键事实是:当前的丑闻是20世纪60年代及其之后的大众运动的一项伟大产物,它们迫使国家诉诸于秘密行动以掩盖其恐怖主义和暴力,这些行动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它们最终能够完全被保持在公众视野之外。如果公众保持沉默、漠不关心,正如在早些年那样,里根可能会效仿约翰·F·肯尼迪的做法:在1961—1962年期间,肯尼迪直接派出美国空军在南越展开大规模的轰炸,并启动了用化学武器破坏农作物的行动。或是效仿林登·约翰逊,当时他将南越的陆空入侵升级,并将其扩展到北部,还派出23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以阻止那里的民主威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1965年初,当时很少有抗议活动。秘密的行动有被暴露和削弱政府在舆论上姿态的风险(例如,关于“反恐”的言论)。这至少可能在一定时候阻止住恐怖分子的指挥官。这些事实旨在显示,即使是在像美国这样基本上去政治化的社会中——在狭隘的以商业为基础的精英共识之外并不存在政党或是主要的媒体——重大的公众行动仍然是相当有可能的,并能够对政策产生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影响,正如在越战岁月中以及自此之后的时间里所表现的那样。这些是需要记住的重要事实,与中东也有关系。

美国组织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一个要素是世界反共产主义联盟,它是一个由纳粹分子、反犹分子、死刑队刺客以及一些世界上最坏的杀手和暴徒所组成的集合,他们被里根政府动员起来形成了一个谋杀犯和酷刑犯组成的世界规模的有效网络。上一个月,这个联盟在尼加拉瓜的哈森弗斯事件中受到注意。《纽约时报》在像往常一样把政府的宣传当作事实进行报道时声称,当辛格布在20世纪80年代接管这个联盟时,它那些比较臭名昭著的分子已经被清洗掉了。世界反共产主义联盟刚刚在欧洲结束了其年度大会(就我所知,没有在媒体上进行报道)。主要的纳粹分子都出席了,当他们的领导人——希特勒时期的纳粹杀手们——走向讲台向听众讲话的时候获得了表达敬意的掌声。拉美死刑队的领导人据说在1984年已经被驱逐出去了,但是再次出现在美国分会——一个免税的“教育”机构——主办的会议上。这个联盟继续包括纳粹分子、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分子和杀手。它得到了美国和其数个代理人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台湾和韩国,但是据报道说也得到了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它的工作得到了这里的以色列院外集团的遮掩。在对最近一本关于这个联盟的书的介绍中,斯科特·安德森和约翰·安德森评论说,“约言之子”的反诽谤联盟——国内以色列院外集团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拒绝向他们提供有关这个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分子组合的信息,这些反犹主义分子总体上支持里根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现正为其中的一个有用目标服务。^⑬

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揭示了一种复杂的理解,理解如何

在很少有历史先例的规模上从事国际恐怖主义。

世界反共产主义联盟的肮脏记录提醒我们,尽管里根政府的暴行是不同寻常的,它在美国的历史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紧接着二战的结束,美国转而承担起压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任务,这通常有利于法西斯分子及其同谋。这项全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招募像克劳斯·巴比这样的纳粹匪徒,他是“里昂屠夫”,对发生在法国的许多可怕罪行负责,并且罪有应得地受到指控,被指控帮助美国的情报部门对法国进行间谍活动。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子是莱因哈德·格伦,他在希特勒时期负责对东欧的情报活动,很快他在中央情报局和西德情报部门被分配了同一个任务。他的组织负责对苏联和东欧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提供美国的支持,这些行动与受到希特勒鼓动的军队有联系。根据约翰·洛夫特斯——他为美国司法部调查这些事情——的说法,这些行动受国务院内乔治·凯南办公室的指挥。随后,当许多这样的有用之人无法在欧洲得到保护,美国当局在梵蒂冈和曾是法西斯分子的教士的帮助下将他们带回这里或是拉丁美洲。他们继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用盖世太保发明的手段训练施行酷刑的人,帮助在拉丁美洲建立新纳粹的“国家安全”的国家,在美国培训的安全部队的框架内建立死刑队的设施,如此等等。^⑭

如果我们忽视了相关的历史背景,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这种历史在官方的教条中被普遍地忽视或是压制。

当我们直接转向中东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考虑一下现在新闻中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它的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被挖空了。正如历

史在传授不方便的经验时,事情经常也是如此。里根政府争辩说,最近报道的通过以色列渠道向伊朗运送武器的事情是与伊朗内部“温和”分子建立联系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说明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进入通常的官方用语的领域,“温和派”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完全服从于美国的命令和要求的分子,与它相对的是“极端派”,被用来指那些不完全听从命令的人。注意,除了其关键的定义性特征之外,这个术语与这些组织是否致力于进行暴力和恐怖无关,或是甚至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目标无关。因此在印度尼西亚杀死人民大众的刽子手苏哈托是个受人尊重的“温和派”,但是萨尔瓦多那些由教会组织的农民自助团体是“极端派”,因而必须被由美国的雇佣军实施的波尔布特式的恐怖主义加以灭绝。

在伊朗,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一次政变恢复了“温和派”的权力。《纽约时报》(1954年8月6日)将其称之为对“拥有丰富资源的不发达国家”的一次“反面教训”,这是一个“反面教训,其代价必须由他们之中痴迷于狂热的民族主义的人所付出”。这些人试图掌握他们自己的资源,因而成为了“极端派”。伊朗在1979年国王倒台前一直是“温和派”,然而它在这段时期写下了世界最恶劣的人权记录,正如大赦国际和其他的人权团体定期记录在案的那样。但是这不妨碍将伊朗国王归入到“温和派”之中,或是妨碍美国精英对他的喝彩。伊朗国王得到了卡特政府的支持,直到他的血腥统治的最后一刻。随后美国看起来在考虑一次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成功。从那时起,向伊朗的武器运送一直在继续,部分是通过以色列,以色列在过去和

伊朗国王及其军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注意,在尼加拉瓜的索摩查这个例子中,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卡特政府也支持他到最后,由以色列提供武器(这肯定得到了美国的默认支持)。而与此同时,他在最后一次的疯狂发作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卡特试图在索摩查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强加国民卫队的统治。此后不久,国民卫队的残余在美国的代理人(如阿根廷,当时处于新纳粹将军们的统治下,因此是一个有用的“温和派”代理人国家)的援助下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重新建立起来,并被美国直接接管,组织成为一个恐怖主义的代理人军队,致力于防止尼加拉瓜的社会改革所带来的威胁。

与此同时,美国的精英们经历了一次魔术般的转变;他们开始第一次深深地关注起尼加拉瓜和伊朗的人权和“民主”,这是一种突然的道德觉醒,它非常应该受到鄙视,但是没有。^⑮

让我们回到伊朗问题上,根据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摩西·阿伦斯的说法,1982年10月,在伊朗国王倒台之后,以色列向伊朗提供武器的活动“与美国政府相协调,……几乎处于最高的水平上”。其目标“是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找到某些与伊朗军方联系的领域,以推翻霍梅尼政权”,或是至少“与那些可能在将来某天在伊朗掌权的军官们建立联系”。这是亚科夫·尼姆罗蒂在1982年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对这项计划的描述,他是以色列的军火商和情报官员,并且曾经是巴列维时期以色列驻伊朗的秘密武官。工党成员、以前以色列事实上的驻伊朗大使乌里·卢布拉尼在同一个广播节目中进一

步补充了细节：

我非常相信，一支小型的、有决心的、无情的和残忍的军队能够接管德黑兰。我的意思是，将要领导那种部队的人不得不在感情上适应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们不得不杀害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就这样证明他们是所谓的“温和派”，在专门的意义上的温和派。戴维·金奇表达了一些类似的想法，他是以色列对外办公室主任和前摩萨德副局长。金奇和尼姆罗蒂现在被媒体认定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项目的发起人之一，美国通过以色列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这一项目与美国人质和“寻找温和派”有联系。但是，对这些项目——早在人质存在之前很久就存在——表示担忧的以色列人的公开观点遭到压制。在同一时期——1982年初——这些计划基本上得到赞同，虽然对它们的可行性有不同程度的疑虑，例如理查德·赫尔姆斯（前任中情局局长以及前美国驻伊朗大使）、罗伯特·科默（他是应该在20世纪60年代末受到战争罪审判的主要候选人以及卡特时期一名五角大楼的高官，他还是快速部署部队的设计师之一，他曾经建议，可以将这一部队用于支持军事政变后的“温和派”）以及其他^{①⑥}所有这一切现在也遭到了压制。

基本上，同样的这些事实在更近的时期也得到了报道，虽然它们被忽视了，而这远在这些丑闻败露之前。例如，以色列外交部资深发言人阿维·帕茨纳在一次采访中证实，1982年，以色列在美国的批准下，向伊朗运送了军事装备，包括美制喷气式战斗机的零备件。^{①⑦}

通过以色列(以及也许其他的一些途径)流到伊朗的武器非常可能维持在这样一种水平上,即它们足以与伊朗军队中合适的那一部分保持联系。但是,美国反对向伊朗输送足以使它赢得两伊战争的武器。如若不然,对美国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政策将是一个灾难。因此美国去年4月阻止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一项大宗武器交易,逮捕了一些人,其中有一名以色列的前将军。^⑮

正如前面提到的证据所显示的那样,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是到1986年后期才发现的。1982年,现任的《纽约时报》编辑莱斯利·盖尔布在一篇封面文章中报道说,运到伊朗的武器的一半是“以色列提供或是安排的”——美国肯定是知道的,并且至少是得到美国暗中授权的——“余下的自由军火商中的一部分也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有联系,”与此同时中情局正从其在东土耳其的基地开展反霍梅尼政权的秘密行动。^⑯阿伦斯的揭露连续几天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得到突出报道,其他的一些例子也得到了报道。在最近几个月里,正好在“丑闻”曝光前,更多的信息浮出水面。因而在五月,帕特里克·西尔报道说,“以色列和欧洲的军火商匆忙向伊朗提供战争供应品,”而以色列现在放弃了“通常的迂回的武器供应路线”;“例如,现在海上一艘满载25 000多吨以色列的火炮、弹药、枪管、飞机零件和其他战争供应品的船只”被命令直接开往伊朗,而不再通过扎伊尔转运。^⑰对于目前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大惊小怪,我们很难非常当真。

请再一次注意美国在对待伊朗和尼加拉瓜政策上的连续的相似之处。同样很难对目前这种大惊小怪的表现当真,即里根政府绕开国

会立法,更不用说国际法院的裁决(与恐怖主义国家无关的)以及可以回溯到18世纪中立法案的法律,正积极为其代理人军队安排军事支持。

我们可以通过注意最近的历史更多地了解这些事情。首先要注意的是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模式是一个典型,这是在当今的评论中被回避的一个关键事实。例如,美国和印尼的关系三十年前开始变得非常敌对,以至于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中情局在1958年援助了一次失败的军事叛乱。在这段敌对时期,美国继续向苏加诺政权提供武器。1965年后期,亲美的苏哈托将军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导致数十万人被屠杀,绝大多数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还摧毁了印尼惟一一个大众性的政治组织——印尼共产党。印尼就这样回归到了自由世界,向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公司开放以供它们抢掠和剥削,惟一可以阻止它们的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将军们自身的掠夺,他们给印尼强加了一种腐败和野蛮的独裁统治。

这些发展在西方开明的舆论界受到热烈的欢迎,并被看作是对美国侵略南越(在宣传体系内被称之为“保卫南越”)的一种辩护,它提供了一种“庇护”,鼓励那些将军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清洗。在大屠杀发生后的参议院作证中,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被要求解释在两国处于强烈敌对时期向印尼提供武器的理由。当他被问及提供武器是否具有“已付的红利”时,他同意说,的确有:包括大约70万具尸体,这是按照他的印尼朋友的说法。国会的一份报告声称,培训军官和与军官保持通讯从推翻苏加诺上获得了“大量的红利”。类似的是,根据五角

大楼方面的说法，“美国对当地指挥官的军事影响力被广泛认为是1964年废黜巴西左派总统若昂·戈拉特的政变的其中一个要素。”^①政变建立了一个充斥着酷刑、压迫和外国投资人利润的“国家安全国家”，同样得到了肯尼迪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的肯定。数年后同样的故事在智利上演。在阿连德政权时期，美国继续向它提供武器，同时尽其所能推翻这个政权。最终这种努力在皮诺切特的政变中得到回报，美国再次表示了欢迎。

对伊朗的行动符合一种常见的政策计划模式，它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是现实主义的。人们能够轻易地理解为什么它在1982年得到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其他人的公开支持。

在这方面，必须重新回忆一下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国和伊朗关系的性质。当时分配给伊朗的中心任务是在尼克松主义指导下控制中东，它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美国没有能力在所有地方强制实施它的意志，因此必须依赖当地“步调一致的警察”（正如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所说的），或是用亨利·基辛格当时的话来说，依赖那些会承担美国维持下的“秩序的总体框架”内的“地区责任”的当地代理人。一个三边联盟（部分是私下的）被建立起来以在美国的保护下将沙特、伊朗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致力于“保卫”美国对世界主要能源储备的支配地位，并将这些国家从他们的首要敌人那里保护下来，敌人指的是当地的人口，他们可能会被“极端”思想——即人民应该分享正好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土地之上的资源——传染。凑巧的是，这只是世界性模式的一个例子。^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同样发展起来。195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注意到,对抗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这个词的专门意义上)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推论”“是支持作为近东惟一一个亲西方强国的以色列。”根据为大卫·本-古里安作传的迈克尔·巴尔-祖海尔的说法,当时以色列在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鼓励下,与伊朗、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完成了一项“长时期的”“周边协定”。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情报部门将以色列看作是阻止反沙特的“极端民族主义”压力的一道屏障,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于1967年获胜之后,特别是以色列采取行动阻止了叙利亚对1970年在约旦遭到屠杀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支持之后(当时美国出于国内原因无法直接干预),以色列作为一项“战略资产”的概念在美国政策中定型。巴列维国王的倒台增强了以色列作为“战略资产”的作用,它成为增强美国在本地区利益的一个基地。同时,以色列越来越多地为美国在南非、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利益提供辅助性服务。^③

大约在1970年,在对待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上,一种分歧开始在美国精英内部发展起来,代表性事件是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亨利·基辛格之间的争议。前者赞成一项按照当时的国际共识达成阿以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的计划,后者争辩说,我们必须维持“僵局”,这是他支持以色列拒绝萨达特1971年2月提出的一项符合美国官方政策的总体原则的全面和平解决方案的理由。基辛格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从那时起,他反对一项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对抗主义强硬立场主导了美国政策,这种政策倾向于看到作为“战略资产”的以色列通过

威胁使用武力在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中发挥它的作用。这解释了美国为什么继续致力于阻碍政治解决方案,因为它很可能会导致以色列被融入到这一地区中。^④

美国一贯追求维持军事对抗状态,以及保证以色列仍然是一项“战略资产”。根据这个概念,以色列将被高度军事化,在科技上保持先进。以色列将成为一个下等国家,除了高科技生产(经常是与美国保持一致)之外,很少有发展独立经济的机会。它完全依赖美国,因此也是值得依靠的,可以作为一个本地的“步调一致的警察”为美国的需要服务,可以作为一个为美国在其他地方目标服务的附庸国,例如支持在危地马拉的接近于种族灭绝的行为,而当时华盛顿被国内因素所阻无法完全以其喜欢的方式参与其中。^⑤

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又如何呢?首先,美国会采取行动确保它控制阿拉伯半岛的主要能源资源: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原则,二战后一直如此。美国因此会支持“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例如沙特的统治精英们,他们以“温和”闻名。沙特也被要求列入到对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名单之中,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对被揭示出来的以下事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它与它私下的盟友以色列一样深深地卷入到向伊朗提供武器的事件中,它还深深卷入到美国在中美洲以及可能其他地方(如南非)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在同一时候,美国一贯反对挡在美国实现其目标路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利比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虽然美国似乎支持卡扎菲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高石油价格的努力,“目的是增强‘温和派’的地位,如伊朗、科威特

和沙特，”^⑥但是利比亚越来越成为美国目标的一个障碍，并自里根政府的最初那段时间开始就被当作是“国际反恐战争”背景下的一个首要目标。^⑦

在这种联系上，我们要记住的是，里根政府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与许多错觉相反的是，它的那些主要政策总体上相当不受欢迎。与以往一样，人民继续支持社会开支而不是军事开支，反对增强国家权力并将国家转化为一个比以往更变本加厉的为富人服务的福利国家的项目，这是五角大楼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它在一个被称之为“自由企业”的“公众补助而私人营利”体系中为高科技产业提供了一种强制性的公众补贴。公众总体上也反对被欢呼为“里根主义”的进行颠覆、干预、国际恐怖主义和侵略的“行动主义”的外交政策。有一种典型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使不情愿的人民接受他们反对的政策：引发恐惧，这与前面所引的门肯的格言相一致。因此，我们必须与致力于毁灭我们的邪恶帝国对抗，它是致力于阻碍我们的全球善意和摧毁我们的“庞大的、无情的阴谋”，这是用约翰·F·肯尼迪的话，他的时期在美国历史上与里根相类似。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与邪恶帝国对抗过于危险。对我们来说，可能代价太高，因此承担不起。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是创造邪恶帝国的“代理人”，可以免受惩罚地攻击它们，因为它们是虚弱的，没有防御能力。利比亚是完成这个作用的绝妙对象，尤其是在美国国内盛行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的背景下，以及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总体背景下。它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瘟疫，根据意识形态机构所实施的各种“真理行

动”，华盛顿的恐怖主义指挥官们必须保卫我们免受其害。当我们保卫自己，反对“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时，可以相当轻易地杀死许多利比亚人而不用我们付出代价。的确，这在国内得到了许多喝彩，包括那些开明的自由主义舆论。

随后的两年可能是危险的。里根分子希望在美国政治上留下永久的印记，不管下次大选的结果如何。他们想要证明的是，暴力得到了回报。他们想要克服“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病态的禁律”（诺曼·波德霍雷茨语）。宣传体系编造出一系列的妖魔：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他们是必须加以摧毁的“癌瘤”（乔治·舒尔茨语）；卡扎菲，“中东的疯子”；阿拉法特，“现代恐怖主义之父”；卡斯特罗，“他为苏联所用威胁要接管西半球”；不一而足。如果他们能够被暴力所摧毁，对于美国文化的长期影响将是深远的。不会再有达成条约和进入谈判的“懦夫”，不会再关心政治解决方案、国际法以及类似的废话。相反，政治体系将被缺乏“病态禁律”的人们所主导，他们派出他们的雇佣军队和暴徒小组，对那些无法还手之人进行折磨，这在当代官方用语中被称为“保守主义”。



第五章

国际恐怖主义： 形象和现实（1989 年）

研究恐怖主义有两种方法。有些人采取文本法，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或是采取宣传法，将恐怖主义建构成一种可以被加以利用以服务于某种权力体系的武器。在每一种方法中，如何进行研究都是明确的。遵循文本法，我们可以从决定何为恐怖主义入手。我们可以寻找这个现象的例子——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应该集中在那些主要的例子上——努力确定原因和补救方法。宣传法规定了不同的途径。我们以这样一个命题开始，即恐怖主义是官方确定的某些敌人的责任。随后我们指定恐怖主义行为就是“恐怖主义的”，正如同它们可以被归咎于必要的来源（不管是否有理）那样；否则，它们将被忽略、压制或冠之以“报复”或是“自卫”。

毫不奇怪的是，宣传法普遍地被各国政府采用，并且在极权国家内被它们的代理工具所实施。更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对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内的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媒体和学术界而言，情况很大

程度上也是如此,正如它们被以详尽的细节记录下来那样。^①

“我们必须承认,”迈克尔·斯托尔评述说,“根据惯例——必须强调,也只有通过惯例——大国使用或是威胁使用武力通常被称为强制外交而非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尽管它通常包括“威胁使用暴力,经常是动用暴力,这些行为如果不是由追求完全相同的策略的大国所为的话,可以被认为是为了恐怖主义目的”。^② 只有一个限定条件必须被加上:“大国”一词局限于友好的国家内;在这里讨论的西方惯例中,苏联没有被授予这种修辞上的许可。事实上,它们可以用最不可信的证据,即苏联的镜中映像,对苏联加以指控和定罪。

恐怖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主要的公众议题。里根政府就职时,宣布它献身于消灭被总统所称的“恐怖主义的邪恶之源”,它是“文明本身的堕落”在“现代时期回归野蛮状态”时传播的瘟疫(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语)。这个运动集中对付的是这一瘟疫尤其恶毒的形式:国家指导下的国际恐怖主义。其中心主题是将责任归咎于以苏联为基础的“旨在破坏西方民主社会稳定的世界范围的恐怖网络”,这是克莱尔·斯特林的话,他那本受到高度赞扬的书《恐怖网络》成为政府的圣经和新的学科恐怖主义学的开山之作。它被拿出来以提供“大量的证据”,说明恐怖主义“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民主社会或是相对民主的社会”出现(沃尔特·拉克尔语),因此对于这一瘟疫的起源没有什么疑问。这本书很快就被揭发为是一本无用的宣传性小册子,但是这个主题仍然保持原样,主导着主流的报道、评论和学术研究。

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在美联

社的调查中,中东/地中海的恐怖主义被编辑们挑选出来作为 1985 年的年度新闻。一年之后,随着美国人由于担心阿拉伯的恐怖分子在欧洲城市里肆虐而远离欧洲,欧洲的旅游业崩溃了。这一瘟疫随后消退了,按照被认可的说法,这个怪兽被“牛仔的力量”驯服了。

转向文本法,我们首先来定义恐怖主义的概念,随后调查它的具体应用。顺其自然,让我们看看这种方法会引向何方。

恐怖主义的概念

政治话语中的概念基本上不大可能成为明晰的典范,但是对于什么构成了恐怖主义,还是存在着基本一致的看法。作为出发点,我们可以采用美国官方法律的用法:“‘恐怖主义行为’意味着一种活动

(甲)包括一种暴力行为或是危及人的生命的行为,它或是违反了美国或是任何国家的刑法,或是一旦犯下的话,在美国或是任何国家的司法管辖范围内将是一种刑事犯罪;以及(乙)看上去意欲(1)胁迫或是强迫平民;(2)通过胁迫或是强迫行为对一个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或是(3)通过暗杀或是绑架影响政府的行为。”^③

这个概念并没有精确地划定界限。首先,国际恐怖主义和侵略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看看这种模糊给美国和它的代理人带来什么好处。如果它们反对它们在某一国际暴力行

为上受到的侵略指控,我们可以将它归入到较轻的恐怖主义暴力下。在对恐怖主义和报复或是合法抵抗进行区分上,也存在分歧,我们会回到这一点。

美国的资料来源也提供了对“恐怖主义”更简要的定义。美军一份反恐手册将它定义为“为了达到实际的政治、宗教或是意识形态目标而有计划地使用暴力或是暴力威胁。这个目标通过胁迫、强迫或是灌输恐惧来实现的”。一个更为简单的定义是由五角大楼委托的著名恐怖主义问题专家罗伯特·库帕曼在研究中概括的,恐怖主义是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以在没有全面投入资源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目标”。^④

但是,库帕曼并不是在讨论恐怖主义,更确切的是,他讨论的是低强度的冲突,这是里根政府的一项中心学说。注意:正如这种说明所显示以及实践所证实的那样,低强度冲突——许多方面类似它之前的概念“反叛乱”——几乎就是国家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委婉说法,也就是说,依靠的武力尚未达到作为战争罪行的侵略的程度。

这一点在学术界内得到了承认,尽管在教义上常常有所变化。以色列在这方面的一名领先专家约纳·亚历山大教授评论道:“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是低强度冲突的一种形式,当国家发现可以方便地加入‘战争’而不需要为他们的行动负责时,它们会采取这种形式。”^⑤亚历山大将他的注意力局限在克里姆林宫用“代理人集团”扰乱西方的阴谋上,他提供了以下这些例子,如“一项广泛的巴解组织培训项目……被提供给尼加拉瓜。”在这个事例中,“与莫斯科保持着特殊关

系的巴解组织”为它的苏联主人服务，向尼加拉瓜传递它从苏联那里获得的在恐怖主义方面的“专业化培训”，尼加拉瓜因此得以对美国及其利益实施低强度冲突。他还建议了几种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东方阵营的真诚性必须得到检验”；例如，“显示出停止将美国及其盟友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宣传运动的意愿。”

正如这些例子所证明的，只要教义纯粹性得到保持，那么这种打破兄弟情谊的想法是如此的奇特以至于需要丰富的想象才能想得出来。

恐怖主义和政治文化

世界上有许多恐怖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在这一点上却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全是冠冕堂皇地从事国际恐怖主义，并且在规模上让其对手相形见绌。伊朗当然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正如西方的政府和媒体所正确声称的那样。它对国际恐怖主义为人所知的主要贡献在伊朗门事件的调查中被揭示出来：也就是，伊朗可能不经意地卷入到美国的代理人针对尼加拉瓜的战争之中。这个事实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也不为人所注意，尽管美国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中牵涉到伊朗的部分是在对伊朗恐怖主义进行猛烈谴责的时候被揭露出来的。

同样的调查还揭示出，在里根主义的指导下，美国开创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新途径。一些国家运用个别的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来实施国外的暴力行动。但是在里根时期，美国更进一步，不仅建造了一个

半私人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而且依靠一系列的代理人和雇佣军国家——阿根廷(在军人统治之下)、南非、以色列、沙特和其他——来资助和执行它的恐怖主义行动。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一进展在人们对这种瘟疫最愤怒的时期被揭露出来,但是并没有进入到讨论和辩论之中。

美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介入甚至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例如,进攻尼加拉瓜的代理人军队受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指挥官们的指导去袭击“软目标”,也就是基本不设防的平民目标,不要去和军队“硬碰硬”。国务院特别授权对农业合作社的袭击,这种行为,如果实施者是阿布·尼达尔的话,正是我们所特别痛恨地予以谴责的行为。媒体的鸽派对这种立场表达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赞同。作为主流评论界的极自由派,《新共和》编辑迈克尔·金斯利争辩说,我们不应该过早地否定国务院为袭击农业合作社的恐怖主义行为所作的合法性辩护:一个“敏感的政策”必须“经过成本-效益分析的测试”,它分析的是“将会涌现的伤亡和惨剧的数量,另一方面是民主出现的可能性”。可以理解的是,美国的精英们有权进行这种分析,并且一旦分析通过测试,他们有权推行这一项目。^⑥

当载有一名美国雇佣军的反政府军的一架运输飞机在1986年10月被击落时,要隐瞒中情局向代理人军队提供非法空运的证据已经是不可能了。伊朗门听证会随之进行,主要的注意力被集中在这些话题上。在它们结束后几天,中美洲的总统们签署了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美国一度要破坏这个协议。这项协议确定了作为“在

这一地区实现稳定和持久和平的不可缺少的要素”的因素,也就是结束由“地区或地区外”政府向“非正规部队或是叛乱运动”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美国一度将对尼加拉瓜的软目标的袭击升级,以对此作出反应。国会和媒体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的目光转移开去,不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中情局的空运供应增加到一天数次。同时,它们与白宫进行合作,支持它破坏这项不为美国所喜的协议的计划。这个目标最终在1988年1月得到实现,尽管还要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推翻中美洲总统们在1989年2月达成的一项后续协议。^⑦

当向代理人军队提供供应和侦察的航班增加的时候,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暴力和恐怖活动也在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为人注意,尽管偶尔有一些报道。《洛杉矶时报》在1987年10月报道说,“西方的军事分析家们说,反政府军最近藏匿了几吨新近空投的武器,同时避免激烈战斗……与此同时,他们加大了对容易的政府目标的袭击,例如帕特里奥塔(La Patriota)农业合作社……在那里几名武装人员、1名老妇人和她1岁的孙子在黎明前的炮击中丧生。”在那些被认为是不值得注意的例子中,让我们几乎是任意地选择一下吧。11月21日,150名反政府军士兵用88毫米迫击炮和火箭助推弹袭击了南部里奥·圣胡安省的两个村子,打死6名儿童,6名成年人,打伤其他30人。即使是拒绝携带武器的宗教和平分子的合作社也被美国的恐怖主义军队摧毁。同样在萨尔瓦多,美国武装和培训的军事力量袭击合作社,杀害、强奸和绑架其成员,此外还有其他例行的恐怖主义暴行。^⑧

国际法院 1986 年 6 月谴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和非法经济战的决定被斥之为“敌对论坛”的一项无关声明(《纽约时报》语)。当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命令和呼吁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决议,并否决了联合国大会一项具有同样效果的决议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在 1986 年美国和以色列与萨尔瓦多一起反对;在 1987 年,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和美国一起反对)。同样被忽略的是国际法院的一项裁定,它认定,所有提供给反政府军的援助都是军事的和非人道的;但是,在媒体上它继续被冠之以“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指导性原则似乎是,美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恐怖主义国家,并且这是正确和公正的,不管世界怎么想,也不管国际机构宣布什么。

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这样一种教义,即任何国家都无权保卫自己免遭美国的进攻。当里根政府的宣传部门定期散发关于尼加拉瓜计划获得喷气式截击机的消息的时候,对这种令人瞩目的教义的广泛的默认态度被揭示了出来。尽管对媒体不加鉴别地轻信这种虚假信息有一些批评,但是更为重要的事实被忽略了: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的是,尼加拉瓜的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当这种故事被编造出来以将人们的视线从尼加拉瓜 1984 年的大选中转移出去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在其他主要的鸽派人士的支持下警告说,如果尼加拉瓜获得了过时的 50 年代的米格战斗机的话,美国将不得不轰炸尼加拉瓜,因为“这些飞机也有能力对付美国,”因此是对它安全的一种威胁。^⑨这种威胁好像与美国部署在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处于警备状态的核导弹所产生的威胁不同,后者并不是一种威胁,因为

它们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人们明白,喷气式截击机可能使尼加拉瓜有能力保卫它的领土,防止中情局空运供应品和为地面上的美国代理人军队提供支持,并阻止其侦察飞行,这种飞行的目的为他们提供有关尼加拉瓜政府军部署情况的实时信息,以便安全地进攻软目标的侦察飞行。明白归明白,但是很少被提及。^⑩似乎主流社会无人揭开这个公开的秘密,即如果不是美国向它的盟友施加压力,禁止它们提供武器援助,使我们不至于在“苏联供应下的桑地诺分子”面前恐惧地退缩的话,尼加拉瓜会愉快地接受法国的飞机,而不是米格飞机。

同样的问题在 1988 年 8 月再次出现,当时国会中的鸽派热情洋溢地支持“援助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的伯德修正案。三天前,反政府军袭击了“和平使命号”客船,打死 2 人,打伤 27 人,全部都是平民,其中包括来自新泽西的一名浸礼会牧师,他正率领着美国一个宗教代表团。这一事件在参议院讨论伯德修正案时未予提及。相反,国会中的鸽派警告说,如果尼加拉瓜军队对犯下这些恐怖主义暴行的罪犯实施“未受挑衅的军事袭击”或是“任何其他的敌对行动”,那么国会将会予以强有力和正义的还击,重新对它们进行新的军事援助。媒体的报道和其他评论并不认为这一立场有什么古怪,也不值得注意。

传递的信息是清楚的: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面前,无人有权自卫。美国是一个天赋权利的恐怖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不容挑战的教义,它是被如此牢固地树立起来,以至于在负责任的话语中它甚至不允许进行讨论,只能作为先决条件予以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另一个信条:美国对南越的袭击是“保卫南越”免遭“内部侵略”。某

些鸽派逐渐开始相信,这也许是不明智的。

因此,组织一支恐怖主义的代理人军队去征服顽抗的人民是一项合法的任务。右派中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解释说,“对另一国事务的强力干预”既非“不可行”也非“不道德”——仅仅是非法的,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在纽伦堡和东京被吊死,同时还响亮地宣布,这并不是“胜利者的正义”,因为正如罗伯特·杰克逊法官所宣称的那样,“如果某些特定的行为和对条约的违反是罪行的话,那么不管是美国犯下的还是德国犯下的,它们都是罪行。我们并不准备建立这样一种统治,即它可以对其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而我们则不愿意接受它反过来对付我们。”^①

为了反驳任何类似的想法,欧文·克里斯托尔解释说,“来自国际法的主张缺少一切可信度。”的确,“一个大国不应该经常地干预一个较小国家的国内事务,”但是这个原则可以被克服,如果“另一个大国率先违反了规则”。因为“毫无争议的是”,通过在“军民两个领域”提供武器和技术人员,“苏联已经干预了尼加拉瓜”,所以美国有权派出它的代理人军队去进攻尼加拉瓜。根据同样的观点,苏联有着进攻土耳其或是丹麦的充分权利——相对尼加拉瓜对美国的威胁,它们是对苏联的更大的安全威胁——因为“毫无争议的是”,美国向它们提供了援助,并且如果苏联按照克里斯托尔的逻辑行使了侵略权的话,美国的援助肯定会大大超出目前的水平。

但是,克里斯托尔可能也会诉诸一个关键的区别来反驳这种看法。他在其他地方谈到有关美国的强制干预权的时候曾作过这种区

分：“无关紧要的国家，就如同无关紧要的人民一样，会很快体验到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很重要，”他解释说。当他们的确这么认为的时候，必须用武力将这种错觉从他们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实际上，‘炮舰外交’的日子从来没有结束过……炮舰对国际秩序来说是必要的，就如同警车对于国内秩序来说是必要的一样。”根据这种看法，那么美国就有权对尼加拉瓜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国家使用暴力，尽管苏联在土耳其或是丹麦缺少这种权利。^⑫

虽然精英们普遍反对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战争，但是这不应该掩盖美国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所获得的压倒性支持。到1986年之前，民意调查显示，80%的“领导者”反对向反政府军提供援助，媒体和国会中对这个计划都存在着激烈的辩论。但是重要的是留心这种辩论所使用的术语。作为持不同意见者中的极端例子，《纽约时报》的汤姆·威克评论道，“里根先生支持反政府军的政策是个明显的失败，”所以我们应该“默许某种可以被尼加拉瓜的邻国们强制实施的通过谈判达成的地区性安排”，——如果它们可以从对本国人民的屠杀中抽出一些时间的话，屠杀本国人民是这些恐怖主义国家的特点，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对有罪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强制实施一种地区安排，尽管几乎不能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作出什么可以与之相当的可信的指控。在表达同样想法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视反政府军为一个“有缺陷的工具”，因此必须寻找其他工具来“使尼加拉瓜重新回到中美洲模式”，并强制它“根据地区标准理性地行动”，这种地区标准是华盛顿下属的恐怖主义国家的标准。参议院多数党组织秘

书艾伦·克兰斯顿——鸽派的一名领军人物——认识到，“遗憾的是，反政府军的努力不足以实现……尼加拉瓜的民主”（无论事实如何，这是教条许可的美国目标），所以美国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孤立”“应受谴责的”尼加拉瓜政府，“让它自我腐烂”。对华盛顿那些谋杀人命的代理人而言，则没有这种责难。

简而言之，基本没有偏离迈克尔·金斯利的“敏感政策”的基本术语。这些问题与效益有关，与原则无关。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权使用被认为是适当的暴力。^⑬

在尼加拉瓜问题上诉诸国际恐怖主义的动机得到了坦率的解释。高级行政部门的官员评论道，进攻的目标是“迫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稀少的资源转移到战争上来，并将它们从社会项目上转移出去”。这是得到政府支持的1981年中情局计划的基本要点。正如前中情局分析员戴维大卫·麦克迈克尔在国际法院上所做的证词所概括的那样，这个计划的目标包括：使用代理人军队“引发尼加拉瓜军队的跨边界袭击，以此证明尼加拉瓜的侵略本质”，向尼加拉瓜政府施加压力以“限制尼加拉瓜国内公民的自由，逮捕反对派，以证明所谓的固有的极权主义本质，并因此增加国内的不满”，削弱它已经崩溃的经济。1988年2月国会在理论上取消了中情局庞大的供应行动（代理人部队大部已逃离）。此后在讨论在尼加拉瓜维持一支恐怖主义力量的战略时，一名国防部的官员解释说，

那支2000人的骨干分子队伍能保持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某

些压力,迫使他们将经济资源用于军事,阻止他们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并且那将是一种额外的好处……任何对桑地诺政权施加压力、唤起人们对它缺乏民主的注意、防止桑地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的事情都是一种额外的好处。

卡特政府时期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瓦伊伦·瓦基评论说,为恐怖主义袭击辩护的主要观点是:“一场较长的消耗战会削弱这个政权,引发严厉的镇压行动,并从不满意的尼加拉瓜人口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凡此种会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这个政权迟早会被大众叛乱所推翻,通过内部政变或是领导层分裂自我毁灭,或是干脆投降以亡羊补牢。”作为一名鸽派人士,瓦基认为这种概念“有缺陷”,但是绝不是错误的。^④

恐怖主义军队完全理解这些指示,正如我们从80年代最著名的背叛者身上了解的那样。奥拉西奥·阿尔塞是尼加拉瓜主要的反政府军(FDN)的情报部门领导人,曾化名“梅塞纳里奥”,有关“民主党人”和“自由战士”的说法是出于国内“消费”的需要。白宫和媒体非常渴望利用桑地诺的叛变者们,一般而言,反政府军获得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反政府军的叛变者们则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当 they 与不受欢迎的事情有关的时候。当阿尔塞1988年末叛变的时候,他在美国国内被忽略了。在返回马那瓜接受大赦之前,阿尔塞在墨西哥接受了采访,他描述了他在美国南部一个空军基地接受的非法训练,提到了向反政府军提供支持的中情局特工的名字,这种活动是在美国设在特

古西加尔巴的驻洪都拉斯大使馆的国际开发署的掩护下进行的。他还概括了洪都拉斯军队是如何向反政府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支持的,并讨论了代理人军队中的大规模腐败,以及他们向洪都拉斯的军火市场出售武器的问题,在那里武器最终到了萨尔瓦多游击队手中。美国提供的“非军事目标”的情报特别有用,他解释说,因为:“我们袭击了许多学校、健康中心以及类似的目标。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使尼加拉瓜政府不能向农民提供社会服务,不能发展它的项目……就是这想法。”美国培训的效果在记录中被大量证实。^⑮

反政府战争可以轻易地被归入“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正如前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1985 年 4 月在国会作证的那样。但是有人可能会提出,它应该被直截了当地称之为侵略。那可能是借用了 1986 年国际法院的决定。但是,让我们继续让美国享受模糊所带来的好处,可以继续将对尼加拉瓜的行动归入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名堂之下。

80 年代的国际恐怖主义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场所在中美洲。在尼加拉瓜,美国的代理人军队留下了一路的暴行,包括谋杀、酷刑、强奸、致残、绑架和破坏,但是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阻碍,因为平民有一支保卫他们自己的军队。在美国的附庸国内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在那些国家里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力量正是政府军和其他的国家安全部

队。在萨尔瓦多,成千上万的人在屠杀中丧生,在这些行动变本加厉后不久的1980年10月,大主教将这种屠杀称之为“针对无自卫能力的平民人口的终结战争和种族灭绝”。这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运用是试图“摧毁那些为了保卫基本人权而起来战斗的人民组织”,正如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在他被暗杀前不久所警告的那样。与此同时他还徒劳地呼吁卡特总统,要求他不要向武装力量运送援助。这些武装力量,他继续说,“只知道如何压迫人民和保卫萨尔瓦多寡头集团的利益。”这些目标很大程度上在里根政府时期完成了,里根政府将对当地人口的野蛮攻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美国看上去会被拖入到一场损害到自身利益的侵略中去的时候,精英的圈子内出现了某些忧虑和抗议,但是随着大众组织被“斩首”以及成员被大批杀害,国家恐怖主义似乎获得了成功,这些忧虑和抗议又消退了。当暴力和压迫情况下的大选保证了美国所接受的特权分子的胜利之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被丢到了门槛底下。

很少有人注意到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之后国家恐怖主义大幅增加的情况,或是大赦国际一篇题为《萨尔瓦多:“死刑队”——一项政府战略》的报告(1988年10月),它报告了官方死刑队杀害的人数“在令人惊恐地上升”,而这是政府战略的一部分,通过“以最令人恐怖的方式杀害和重创受害者”——受害者“被致残、斩首、肢解、勒死或是显出遭受酷刑的迹象……被强奸”——胁迫任何潜在的反对派。既然政府战略的目标是“胁迫和强迫平民人口”(也就是美国法律中官方定义的恐怖主义),单

单杀人是足够的。更确切地说,被肢解的身体必须被遗弃在路边,妇女必须被发现用她们的头发吊死在树上,脸被涂成红色,乳房被割掉,而国内的精英们在假装没有看到这一切的同时继续资助、训练和支持这些杀人犯和酷刑实施者。

在同样那几年中,更大规模的屠杀发生在危地马拉,同样也始终得到了美国及其附庸国的支持。在那里,恐怖活动在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之后也增加了,为的是防止那些迈向这些协议所提倡的民主、社会改革和保护人权的步骤。如同在萨尔瓦多一样,这些发展状况基本也被忽略了;被指派的任务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尼加拉瓜,以便在尼加拉瓜偶尔滥用暴力时表达出对尼加拉瓜的极大愤慨,虽然这种滥用暴力比美国附庸国中司空见惯的暴行要轻。鉴于其目的是将尼加拉瓜恢复到“中美洲模式”,并确保它遵守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所满足的“地区标准”。附庸国内的恐怖主义并不让人真正担心,除非它变得过于明显以至于危及向杀人犯输送援助的活动。^{①6}

关键是要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恐怖主义,是华盛顿支持或是直接组织的,并得到由其附庸国组成的国际网络的协助。

正好在萨尔瓦多的1984年选举之后,它被欢呼为是将民主带到了萨尔瓦多,在圣萨尔瓦多大主教的管区庇护下活动的、以教会为基础的人权组织“法律援助”(Socorro Juridico)描述了持续的恐怖主义的结果。这种恐怖主义仍然是“得到官方批准、并受过足够的培训以实施这些造成集体苦难的行为的同一批军队成员”执行的。他们的描

述如下：

在恐怖和惊慌——持续违反基本人权的后果——的影响下，萨尔瓦多社会表现出以下的特点：一方面是集体性的胁迫和普遍的恐惧，另一方面是由于每天和频繁地使用暴力手段而使接受恐怖内在化。总之，社会接受了这种频繁出现的被酷刑折磨过的躯体，这是因为基本的权力，即生命权对这个社会而言不具备绝对的超出一切的价值。^{①7}

同样的评论适用于那些旁观了这些行动，或是仅仅将目光投向另一边的社会。

官方瘟疫之前

国际恐怖主义当然不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创新，在前二十年，它的主要受害者是古巴和黎巴嫩。

反古巴的恐怖主义活动是在一个秘密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该组织建立于 1961 年 11 月，代号为“猫鼬”，包括 400 名美国人，2 000 名古巴人，一支由快艇组成的私人海军，年度预算为 5 000 万美元，部分是由中情局在迈阿密的一个分站管理的，而这违反了《中立法》，并很可能违反了禁止中情局在美国活动的法律。^{①8} 其行动包括轰炸宾馆和工业设施，击沉渔船，对农作物和牲畜下毒，污染出口的糖等等。不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得到了中情局的专门授权，但是这未能免除官方

敌人的苦难。

这些恐怖行动中几次发生在1962年10月至11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几个星期前,加特霍夫报道说,一个得到美国政府授权的从佛罗里达出发的古巴恐怖主义团体实施了“一起可怕的快艇袭击,它扫射了靠近哈瓦那的一家古巴海滨宾馆,那里是苏联军事技术人员著名的聚集地,袭击杀死了数十名俄国人和古巴人”;此后不久,它袭击了英国和古巴的货船,并再次袭击了古巴,此外还有10月初升级的其他几次袭击。在导弹危机的紧张时刻,从美国派出的一支恐怖主义小组在11月8日将古巴的一座工业设施炸飞,而这是在猫鼬行动被官方暂停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声称,在这次由“间谍飞机拍摄的照片”指导下的行动中,400名工人被杀。这次恐怖主义行为可能会触发一场全球核大战,但是当它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却没有引起什么评论。暗杀卡斯特罗的企图和其他的恐怖活动在危机结束之后马上继续进行,并且在1969年被尼克松进一步升级。^⑩

这些行动在尼克松时代之后仍在继续。例如,1976年4月,两艘古巴渔船遭到来自迈阿密的武装船只的袭击,迈阿密是世界范围内的反古巴的恐怖活动中心。几个星期后,古巴驻葡萄牙的大使馆被炸,2人死亡。7月,古巴驻纽约的联合国使团被炸,还有几起针对古巴在加勒比地区和哥伦比亚的目标的爆炸,以及一起针对纽约音乐学院举行的亲古巴会议的未遂爆炸袭击。8月,古巴驻阿根廷大使馆的两名官员被绑架,古巴航空公司驻巴拿马的办公室被炸。10月,古巴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遭受火力袭击,驻马德里大使馆在11月被炸。

10月,中情局训练的古巴流亡分子炸毁了一架古巴民航客机,机上73人全部遇害,包括赢得国际金牌的古巴击剑队。一名实施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的特工,也是猪湾老兵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因为进行爆炸活动被关在委内瑞拉的监狱内,他从监狱中越狱,并逃到萨尔瓦多,在那里他被送往伊罗旁戈军事基地工作,帮助组织美国在尼加拉瓜的恐怖主义行动。中情局认为1969至1979年期间美国和加勒比地区的89起恐怖主义行动是古巴流亡团体所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组织——欧米茄7(OMEGA 7)——被联邦调查局认定是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时期内在美国境内活动的最危险的恐怖主义团体。^②

在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学术著作中,古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代表。沃尔特·拉克尔的权威著作(见本章注释①)包括了很多含沙射影的例子,影射可能存在的古巴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尽管没有什么证据。但是,他对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行动则不置一词。他写道,“最近几十年……更具压迫性的政权不仅仅不受恐怖之害,而且帮助发动对更为宽容社会的恐怖活动。”他的原意是,美国作为“一个宽容的社会”,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牺牲者之一,而古巴作为一个“压迫政权”是恐怖主义的实施者之一。要建立这样一种结论,有必要压制这样一个事实,即毫无疑问是美国对古巴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并相对不受恐怖主义之害。即使存在针对古巴的例子,拉克尔也不会明显地提到它。

转向前里根时期的第二个主要例子,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黎巴嫩南部的人口被扣为人质,为的是实现“理性的前景,即受到影响

的人口会施加压力,以停止敌对活动,而这种前景最终得到了实现”,并接受以色列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安排。(阿巴·埃班语,在他对梅纳赫姆·贝京总理对工党政府在黎巴嫩犯下的暴行所作的解释进行评论时,这些暴行是以“我和贝京先生都不敢提到名字的那些政权”所采取的风格犯下的)。②注意,这种由受人尊敬的工党鸽派提供的合法性理由将这些行动“公正地”置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标题之下(如果不算侵略的话)。

在这些袭击中,数千人被杀,数十万人被赶出家园。这基本不为人所知,因为人们毫无兴趣。同一时期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野蛮,但是规模较小——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并得到了广泛报道。美国广播公司记者查尔斯·格拉斯当时是驻黎巴嫩的一名记者,他发现“美国的编辑对南黎巴嫩人的情况很少有兴趣。以色列对他们的村子进行袭击和炮击,他们逐渐从黎巴嫩南部逃难到贝鲁特郊区越来越多的贫民窟中,这些根本无法与威胁以色列、劫持飞机和占领大使馆的‘恐怖分子’的耸人听闻的故事相比”。他继续写道,当以色列的死刑队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之后在南黎巴嫩活动的时候,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同。人们可以在伦敦《泰晤士报》了解到这些活动,但是美国的编辑们不感兴趣。如果媒体报道“由这些便衣的辛贝特* (秘密警察)特工组成的死刑队(的活动),他们暗杀南黎巴嫩村庄和营地中的嫌疑分子……激起什叶派穆斯林人口的情绪,并帮助他们使

*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译者

美国海军陆战队无法继续呆在当地”，那么可能人们能够对部署在黎巴嫩的美国陆战队的困境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他们似乎对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一无所知，除了“那些应征入伍的黑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说——尽管悲哀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出现在镜头中——他们被派到那里去是保护富人对付穷人”。“他们能够在黎巴嫩认出的只有那些贫穷的什叶派难民，这些难民全都生活在他们靠近贝鲁特机场的基地附近；据说，可能是这些什叶派穷人中的某一个……在1983年10月23日杀害了他们中的241名士兵。”如果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得到报道，那么就有可能避免，或至少可以理解杀死了许多陆战队员的那次爆炸，这些陆战队员是下述政策的牺牲品：“新闻界不能对公众进行解释，新闻官不能对陆战队员本人们进行解释。”^②

1976年，叙利亚在美国同意的情况下进入黎巴嫩，并帮助实施了进一步的屠杀，最主要的一次是在位于特拉-扎塔(Tel Al-Zaater)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的，在那里，叙利亚支持的使用以色列武器的基督教民兵杀害了数千人。^③

不需要再进一步叙述下去了，很明显，国家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早在它被转化为里根政府的“公众外交”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前就已经到处泛滥。

标准：“小恐怖主义”

这里回顾的这种“大恐怖主义”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对“恐怖主义

的邪恶之源”的讨论之外。那么让我们转向处于这种标准之内的较小规模的恐怖行为。

同样的是,这个记录可以回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许久,尽管这种记录选择性太强而没有什么大用。提几个在拉克尔的标准来源中找不到的例子。当他提到官方认定的无赖使用信件炸弹和“原始的书本炸弹”的时候,他对 1956 年以色列情报人员使用先进的书本炸弹在加沙杀害穆斯塔法·哈菲兹将军的事不予提及,当时这名将军负责防止巴勒斯坦游击队员渗透进来袭击以色列目标。^④拉克尔对使用信件炸弹的回顾并不包括雅各布·埃利亚夫的证词,他声称他是第一个使用信件炸弹的人,当时他是现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领导的恐怖主义团体(莱希,“严厉的团伙”)里的一名指挥官。他在 1946 年从巴黎开展工作,将 70 个这样的炸弹装在官方的英国政府信封中,寄给英国内阁的所有成员、反对党保守党的首脑,以及几名军队指挥官。1947 年 6 月,他和一名同伙在试图寄这些信件炸弹的时候被比利时警方抓获,所有的炸弹都被截获了。^⑤

关于劫机和客机爆炸的标准记录也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项目,其中包括美国拒绝共产主义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归还“为了逃跑而劫持飞机、火车和轮船的人”的要求。(所引为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费尔的话,他评论说,这个政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被重新审视,当时美国及其盟友也被当成目标。)中东的第一起劫机事件也处于这个标准之外:以色列在 1954 年劫持了叙利亚的一架民航客机,旨在“获得人质,以释放我们在大马士革的俘虏”,这些俘虏是在叙利

亚进行一项间谍活动的时候被抓获的(所引为以色列总理摩西·沙雷特的话)。同样被排除在外的是以色列空军在1956年10月击落一架无武装的埃及民用飞机的事件,使16人丧生,包括4名记者,这是一起暗杀纳赛尔总统的副手陆军元帅阿卜杜·哈基姆·阿马尔的未遂企图,而当时两国并不处于交战状态。这是个经过预先计划的行动,因此与以色列击落利比亚民航客机、110人遇害的事件不同,当时那架飞机正飞往开罗,但是在离开罗两分钟航程的地方在一场沙暴中迷航。这一事件发生在1973年2月,适逢以色列对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发动空中和两栖袭击的期间,袭击杀死了31人(主要是平民),摧毁了教室、诊所和其他建筑物,这次行动的合法化理由是先发制人。^⑥

这样的事情曾经(现在也如此)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而加以否定,如果竟然被注意到的话。对于阿拉伯恐怖主义的反应则完全不同。

转向20世纪80年代,考虑一下1985年,当时媒体的关注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年主要的单起恐怖主义事件是印度航空公司的一个航班被炸毁,329人遇害。据报道,恐怖分子在阿拉巴马州由弗兰克·坎珀管理的一个准军事营地中受训,在那里雇佣军们接受培训,以在中美洲和其他地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根据一名前雇佣军成员的说法,坎珀与美国情报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本人也卷入到印度航空公司的爆炸案中,据说这是一次失控的“针刺”行动。在对印度的一次访问中,总检察长埃德温·米斯拐弯抹角地承认,这些恐怖主义行动肇起于美国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⑦恐怖分子与利比亚之间的任何

一种联系,不管有多么脆弱,都足以证明卡扎菲是一个必须加以消灭的“疯子”。

中东就是这种标准下的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中心,1985年中东最严重的单起恐怖主义行为是3月8日发生在贝鲁特的一次汽车爆炸,其中80人死亡,256人受伤。“大约250名穿着飘动的黑色长袍的女孩和妇女在爆炸的冲击下,从伊玛目里达清真寺的周五祈祷者中蜂拥而出,”诺拉·布斯塔尼在三年后报道说,“她们中至少有40人遇害,更多人致残。”当这颗炸弹在西贝鲁特郊区“摧毁了人口密集的主要街道”时,它还“将婴儿烧死在床上”,“杀死了一名购买嫁妆的新娘,”并“将3名孩子炸飞,当时他们正从清真寺回家”。爆炸的目标是什叶派领导人法德拉拉,他被指控与恐怖主义有染,但是他逃过一劫。根据鲍勃·伍德沃德在他关于凯西和中情局的一本书中的说明,这次袭击是中情局和它的沙特代理人安排的,并得到了黎巴嫩情报部门和一名英国专家的协助。^⑳

即使是在美国所选择的惯例下,在这种官方瘟疫到达顶峰的一年,美国似乎同样可以赢得国际恐怖主义的大奖。美国的附庸以色列紧随其后。它在黎巴嫩的铁拳行动在中东的恐怖行动持续发生的这年中是无与伦比的,就单起恐怖行动而言,它对突尼斯的轰炸(得到美国的默许支持)赢得了第二名的荣誉,除非我们将它视为事实上的侵略的一个例子,正如联合国安理会所决定的那样。^㉑

在1986年,主要的单起恐怖行动是美国对利比亚的轰炸——再次假设,我们不将它列入侵略的目录之下。^㉒就1986年而言,美国似

乎再次在竞争国际恐怖主义的奖项方面获得不错的排名,即使不包括它在中美洲支持的“大恐怖主义”。在中美洲,在同一年,国会对国际法院关于停止“非法使用武力”的呼吁的回应是投票通过了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提供给美国的代理人军队,这被政府欢喜地称之为实质性的宣战。

恐怖和抵抗

让我们现在转向有关恐怖主义范畴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它们到目前为止是被回避的。

考虑一下恐怖主义和合法抵抗之间的界限。有时候,民族主义团体准备将他们的行动称之为恐怖主义,一些备受尊敬的政治领导人拒绝谴责为了民族事业的恐怖主义。与当前的讨论尤其相关的一个例子是建国之前的锡安主义运动。以色列是80年代“恐怖主义产业”的根源(随后被转移到美国,进行进一步发展),它被当作是反对巴勒斯坦人的一件意识形态武器。^①巴解组织在美国是一个被诅咒的对象。国会的一项特别法令——1987年的《反恐怖主义法》“禁止美国公民接受任何来自巴解组织的援助、资金或是‘任何除了信息资料之外的有价值的东西’”,不允许巴解组织建立办公室或任何扩展其利益的其他设施。^②巴勒斯坦的暴力受到了世界范围的谴责。

建国前的锡安主义运动实施了广泛的恐怖主义活动,杀害了许多平民,主要是阿拉伯人,还谋杀了英国外交官莫因爵士和联合国调

解员福尔克·贝纳多特(谋杀他们的凶手在以色列建国后受到保护)。1943年,现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为他领导的恐怖主义组织(莱希)的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恐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提议“用简单和明显的证据来消除所有对恐怖的恐惧和喋喋不休的空谈”。“不管是犹太道德还是犹太传统都不能用来禁止将恐怖作为战争的一种手段,”他写道,“当关系到民族斗争的时候,我们正远离任何道德上的犹豫不决。”“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恐怖对我们来说是适合今日环境的政治战的一部分,它有一项主要任务:它用最明显的语言展现出来,被全世界所听到,包括那些处于这个国家的国门之外的不幸同胞在内,它就是我们反抗占领者的战争。”正如在以色列被广泛观察到的那样,英国的占领远没有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统治那么具有压迫性,并且还面临着更具暴力的抵抗。

以赛亚·伯林回想起,哈伊姆·魏茨曼——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和民族运动中一名最受尊敬的人物——“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合适的,即或是公开谴责(犹太恐怖主义)的行为,或是公开谴责这些罪行的实施者……他不打算宣称反对这些行为,尽管他认为它们是罪行。它们来自那些被逼到绝境的人的备受折磨的头脑之中,他们准备放弃自己的生命将同胞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和他们同样相信,这种困境是一种背叛和毁灭,是西方大国的外交办公室轻蔑地为他们准备的。”^③

主流锡安主义抵抗团体哈加纳的档案包括梅纳赫姆·贝京的伊尔贡和莱希所杀害的40名犹太人的姓名。伊扎克·沙米尔亲自对莱

希的一名下属实施暗杀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件。官方的伊尔根(Irgun)历史在回顾的时候对许多针对阿拉伯平民的恐怖行为充满赞美,它也引用了对一名犹太成员实施谋杀的例子,因为害怕他一旦被捕会向警方提供信息。被怀疑的通敌者从早期开始就是特定的目标。哈加纳的官方历史在“特殊活动”的分类下,描述了哈加纳暗杀者 1924 年对荷兰的正统派犹太人雅各布·德哈恩的暗杀行动,因为他寻求“建立一个老的伊休夫* (犹太社团) 和阿拉伯高等委员会 (Arab Higher Committee) 的统一阵线,反对新的伊休夫和锡安主义事业”。在以后的岁月中,哈加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对犹太告密者实施了“惩罚性行动”。20 世纪 40 年代哈加纳在海法的一所监狱包括一间刑讯逼供的小间,以对涉嫌与英国人勾结的犹太人进行审讯。在 1988 年的一次采访中,多夫·齐斯将他作为一名哈加纳执法者的工作形容为“服从命令,就像纳粹分子一样”,以“消灭”干扰民族斗争的犹太人,“尤其是告密者。”他还反驳了一项常见的指控,即大卫王饭店的爆炸是由伊尔贡单独完成的,他指证自己是哈加纳指挥官伊扎克·萨迪克授权的特别代表。后来摩西·达扬推荐他取代自己作为一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④

反纳粹的抵抗分子也描述了对通敌者的谋杀活动。伊斯雷尔·沙哈克是以色列最著名的公民自由论者之一,还是华沙犹太居住区

* 伊休夫: Yishuv, 是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也是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译者

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一名幸存者,他回忆说,“在华沙犹太居住区起义之前……犹太地下组织在完全合法的理由下杀害了所有他们能够发现的犹太通敌者。”他回想起1943年2月以来一段儿时的清晰记忆,“当我和其他儿童在(一名被杀的犹太勾结者)的尸体旁边唱边舞的时候,而他的尸体还在流血,我直到现在也不后悔。我的感觉正相反。”在引用华沙犹太居住区起义的领导人伊扎克(安特克)·朱克曼的回忆录时,利娅·埃伯写道,“在华沙犹太居住区起义爆发前9个月,犹太地下组织发起了系统地消灭犹太居民委员会和犹太警察中的通敌者的活动,”有时候是“集体地进行杀害。”“在没有首先结束内部的背叛之前,是不可能与德国人进行斗争的,”朱克曼回忆道。杀死通敌者被普通人认为是合法的报复。与德国勾结的人,有时候是“盖世太保成员”,必须被“消灭到最后一人”,还包括那些人:“他们的行动违反了犹太人利益。”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失败”:在杀死犹太通敌者方面“耽搁太久”,朱克曼补充说:“今天,举个例子,我确信,不管哪里有内部的背叛,战争就必须从消灭内部的背叛开始。在这上面的延误是我们的大失败,我们的耻辱。”^⑤

这些评论出现在第一次西岸起义时期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猛烈批评的一波浪潮期间,批评他们杀害与以色列秘密警察勾结的巴勒斯坦人。

虽然可以偶尔发现沙米尔式的公开承认恐怖主义的例子,但是更为普通的模式是,针对压迫政权和占领军的行动被实施者看作是抵抗,而被当权者当作是恐怖主义,即使它们是非暴力的。西方民主国家所认为的被占领下的欧洲和阿富汗的抵抗,被纳粹和苏联冠之

以恐怖主义——实际上，它们是国外激发的恐怖主义，因此也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美国在对待那些正首当其冲地遭受着它进攻的南越人的时候采取同样的立场。

根据类似的理由，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政权当然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条约的重要例外，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那些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和呼吁所有国家采取行动与这种瘟疫进行斗争的主要决议。其原因是，联合国大会

认为当前的决议决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那些被强力剥夺这种权利的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正如它源自于联合国宪章那样……，尤其是那些处于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外国占领或是其他形式的殖民统治下的人民，也不会损害……这些人民为了这一目的进行斗争和（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其他原则）寻求和接受支持的权利。^⑤

尽管这种规定得到了几乎整个世界的赞同，南非在反对它的方面不是完全孤立的。这一决议以 153 对 2 票获得通过（洪都拉斯一票弃权）。在解释它们的反对票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提到了上述引用的段落，被理解为指的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据官方的华盛顿说法，它是世界上“最为臭名昭著的组织”之一）对他们的南非盟友的抵抗，以及当时已经进入了第三十个年头的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占领。^⑥ 华盛顿拒绝赞成这项最严厉的决议，决议谴责了这种“现代时期向野蛮主义的回归”，将其作为最为关注的一点，美国的拒

绝态度以及它的理由没有引起任何评论。

因为与巴以冲突的联系，这个问题在 1988 年底成为头条。11 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布在以色列旁边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是对联合国关于恐怖主义的决议和其他相关的联合国决议的认可。在随后几个星期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欧洲重申了同样的立场，包括联合国大会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当时他被禁止进入纽约，其根据是他在纽约的存在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一种不可接受的威胁。这是对联合国法律义务的一种违反。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和阿拉法特对联合国关于恐怖主义的决议的反复重申在美国遭到谴责，理由是巴勒斯坦领导层未能满足华盛顿要求它表现良好的条件，包括无条件的“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嘲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的赞成是“老套的阿拉法特的模棱两可伎俩”。安东尼·刘易斯——他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是在可容忍范围内的极限——写道，阿拉法特在进步，但是还不够：“美国正确地表示，在可以成为谈判的一部分之前，巴解组织必须毫不含糊地谴责所有的恐怖主义”，并且这种适当的条件还没有被满足。总体上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处于这些范围之内。

这种推理是直截了当的。巴解组织未能脱离世界舆论的范围，加入到美国、以色列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行列，因此它要么遭到嘲笑（从强硬派那里），要么因为它有限但不足的进步受到鼓励（从持异议者那里）。

当美国在 1988 年 12 月之前在外交上处于孤立之时，华盛顿退却

了,伪称阿拉法特屈服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尽管事实上,他的立场多年来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改变。随着阿拉法特屈服于当前的美国官方要求之下,根据美国的规定,他可以获得奖励,即与美国驻突尼斯大使进行谈判。正如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所强调的那样,美国和巴解之间的谈判旨在转移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外交压力,并给予以色列1年或更多的时间镇压巴勒斯坦起义(第一次西岸起义),通过“严厉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以便“他们被打垮”。^⑳

“恐怖主义”相对“抵抗”的问题马上在美国和巴解组织谈判期间出现了。首次会议的草案被泄露并刊登在《耶路撒冷邮报》上,该报表达了对“美国代表采取以色列立场”的愉悦,宣称巴解组织必须接受两项关键的条件:巴解组织必须放弃西岸起义,并且必须抛弃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想法。关于西岸起义,美国将其立场宣布如下:

毫无疑问,我们所目睹的发生在被占领土上的内部斗争的目标是破坏以色列国的安全和稳定。我们因而要求停止这些动乱,我们将其视为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为。这一点尤其正确,当我们知道你们正在从领土之外指挥这些动乱,有时候它们还是非常暴力的时候。^㉑

一旦这种“恐怖主义”被放弃,并且以前的压迫状况被恢复,美国和以色列能够进而以他们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占领者和它主子的眼里,再一次,被压迫人民对残忍的军事占领的抵抗是“恐怖主义”。

同样的问题在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期间出现了。

这些行动同样是在前面引用过的阿巴·埃班所概括的逻辑指导下进行的。平民在恐怖的威胁下被当作人质,以确保他们接受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和被占领土上主宰的政治安排。这种威胁可以以极端的残忍方式任意实施。^④但是由于其实施者和支持者(是以色列和美国),它并没有被算作是一种恐怖主义,对它甚至连温和的谴责也没有。根据定义,这些行为属于合法的自卫。

采用同样这些概念,在不加评论的情况下报道事实是理所当然的,即在1983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遭到自杀性爆炸袭击之后,国务卿舒尔茨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关注转变为“满腔愤怒”。要见证舒尔茨的“愤怒”,并不需要传唤尼加拉瓜、安哥拉、黎巴嫩、被占领土和其他地区的证人,当时不需要,或是当他再次受到赞扬的时候也不需要,当他在解释他反对允许阿拉法特在联合国讲话的原因的时候,他由于“发自肺腑的对恐怖主义的蔑视”以及他反对恐怖主义的“个人的十字军圣战”而受到赞扬。^⑤

毫无疑问,叙利亚也将那些抵抗其血腥统治的黎巴嫩人称为“恐怖主义”,但是这种观点会招致它应得的嘲笑和蔑视。反应随着角色的不同而转换。

恐怖和报复

报复的概念在意识形态战争中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贯穿一个暴力互动循环的始终,每一方都将自己的行为描述为对对方恐怖主义

的报复。在中东,阿以冲突提供了许多例子。由于以色列是其附庸国,美国不加鉴别地采纳了以色列的准则。

为了证明这一点,考虑一下 1985 年对“阿奇里·劳罗号”游艇的劫持和对利昂·克林霍弗的谋杀事件,毫无疑问这是一起邪恶的恐怖主义行为。但是,劫持者并不将他们的行动当作是恐怖主义,而是作为对一个星期前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轰炸突尼斯的报复,这种轰炸或许是一种“武装侵略行为”(正如安理会所决定的那样),或只是造成伤亡的国际恐怖主义(如果让美国及其附庸享受概念模糊的好处)。但是对于执行者而言,对突尼斯的轰炸既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侵略,而是对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遭到冷血谋杀的三名以色列人这一事件(突尼斯或是轰炸的受害者于此事毫无嫌疑)的合法报复。同样,拉纳卡的杀人犯不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是恐怖主义,而是对以色列多年来在公海上的恐怖主义的一种报复。这些事实并没有受到争论,甚至只是偶尔得到报道,但是根据定义它们并不构成“恐怖主义”,因而正如被声称的那样,拉纳卡罪行并不是报复。以色列的行动很少受到讨论,也不属于这种标准之内。^④

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恐怖主义和报复的概念都是灵活的工具,随时准备适应某一时候的需要。

从文本主义到教义必要性

对国家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这种回顾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它

坚持天真的文本主义,因而与这种对现代瘟疫的当前辩论无关。

此外,这种回顾也远远不是综合性的。即使是对中美洲和中东而言,它也仅仅触及到表面,而国际恐怖主义绝不仅仅限于这些地区。但是提出一些问题就已经足够了。其中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学者和媒体怎么能够保持这样一种论点,即这种现代瘟疫可以被追溯到以苏联为基础的“旨在破坏西方民主社会稳定的世界范围恐怖网络”?如何能够将伊朗、利比亚、巴解组织、古巴和其他官方敌人确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实施者?

答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必须放弃按照字面理解的文本法,并承认,只有当恐怖主义行为是由官方敌人所犯下的时候,它们才在这种标准之内。当美国及其附庸是恐怖主义暴行的实施者的时候,这些行为或是从记录中消失,或是被转化为服务于民主和人权的报复和自卫行为。随后一切都清楚了。

最后转向这种瘟疫的解决办法,标准的文献提供了一些建议。沃尔特·拉克尔敦促说,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进行报复的明显方式”“当然是让那些支持者自食其果”,尽管这样的合法反应可能对西方社会来说是困难的,西方社会所不能理解的是,其他人并不共享它们的“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标准”。然而,在那些被不可救药的文本主义所困扰的人得出错误结论之前,应该强调的是,考虑到恐怖主义的概念被精心炮制出来的小心翼翼的方式,合法的反应并不包括对华盛顿和特拉维夫进行轰炸。

《纽约时报》要求一名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提供他关于对付这种瘟

疫的想法。他的建议建立在长期的经验之上,是直截了当的:“恐怖主义分子,特别是他们的头目必须被消灭。”他给出了三个成功的反恐行动的例子:美国轰炸利比亚,以色列轰炸突尼斯,以及以色列侵略黎巴嫩。他建议采取更多同样的行动,“如果文明世界要占据上风的话。”《时代周刊》的编辑给他的文章的标题是:“粉碎恐怖主义怪兽的时候到了,”他们还强调了这句话:“制止对无辜者进行屠杀的人,”他们注明作者是“以色列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④

作者的名字是阿里埃勒·沙龙,他的恐怖主义生涯可以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在支比亚屠杀69名村民,以及1953年在布略格难民营屠杀20人;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初在加沙和西奈东北部的恐怖主义行动,其中包括将10000农人赶进沙漠,他们的房子被推土机推平,农田被毁,以便为犹太定居点做好准备;包括对黎巴嫩的入侵,采取这一行动——正如现在被广泛承认的那样——是为了克服巴解组织外交所带来的威胁;还包括随后在萨布拉与沙提拉的屠杀;以及其他。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选择沙龙向“文明世界”提供如何“制止对无辜者进行屠杀的人”的教训,这种选择可能有一点古怪,多半是邪恶的,甚至有可能是伪善的。但是那一点并不是这么清楚。这种选择在行动中以及知识界文化——或是通过言语或是在沉默表达出来——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并不是不相符合的。

为了支持这一结论,我们可以观察到,解决国际恐怖主义——至少是其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方法在我们掌握之中,并且是极

其简单的：停止参与其中。然而没有人为了这个目的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这个问题甚至很少被讨论。相反，有人发现，对我们仁慈意愿、高尚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标准”的推崇有时候在实际表现的时候是有缺陷的。基本的事实不能被理解，明显的想法则是不可想象的。当单纯的真理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它们引起的是对它们所表达的事实的失信、恐惧和暴怒。

在与此相似的道德和知识界气氛下，世界最伟大的报纸选择阿里埃勒·沙龙作为我们了解和如何对付恐怖主义魔鬼的导师是很合适的。



第六章

“9·11”事件之后的世界（2001年）

我相信，在过去几个月中，并不是只有我被人提醒要注意极端和平主义者 A·J·马斯特——20 世纪美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某些明智和有预见性的话。当美国六十年前进入二战的时候，他相当准确地预见到将在美国胜利之后出现的世界大势，稍晚一点，他观察到，“战争之后的问题是胜利者的问题。胜利者认为，他刚刚证明了，战争和暴力获得了应得的回报。现在谁能够给他一个教训呢？”

世界各地将有太多的人要认识到这些话的痛苦含义。只有在民间传说、儿童故事和表达知识性观点的杂志中，实力才被明智和恰当地用于摧毁邪恶。真实的世界传授的是极其不同的教训，除非故意地加以忽视，否则不会认识不到这些教训。

不幸的是，这些是历史中的首要主题。在他对欧洲国家形成过程的主要研究中，查尔斯·蒂利相当准确地评论道，在上一个千年中，“战争成为欧洲国家的主导性活动，”原因很不幸：“主要的悲惨事实是

简单的：强迫发挥了作用；那些向他们的伙伴施加了相当大武力的人获得了服从，从服从中获得了多重好处，如金钱、货物、顺从以及获得愉悦的权利，凡此种种皆不为较为弱势的民族所得。”^①这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性，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民学到的是艰难的教训。顺从通常包括受教育阶级的拥戴。诉诸于压倒性的暴力手段以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摧毁没有防御能力的敌人似乎赢得了特别的钦佩，并且（诉诸武力）也变得很自然，它是个人美德的一种展示。它再一次接近于历史-文化的普世性。

轻易赢得对无防御能力敌人的胜利的一个通常的后果是沉迷于这样一种习惯，即偏向于使用武力，而不是追求和平手段。另一个后果是，优先考虑未得到授权的行动。作为“完美的人”降临到大地上，负有消灭世上邪恶的使命的道成肉身的上帝不需要更高的权威。适用于几千年前绝大多数古代印度史诗的东西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剽窃者。偏爱武力，拒绝权威已经成为过去十年的显著特征，过去十年中，惟一的大国占据压倒性和不受挑战的实力，并根据政策建议摧毁大多数较弱的对手。当老布什政府上台之时，它实施了一项对付“第三世界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的一部分在海湾战争期间被泄露给了新闻界。这项报告得出结论，“当美国面对弱小得多的敌人的时候，”——也就是说，美国选择与之作战的惟一一类敌人——“我们的挑战将不仅仅是击败它们，而是决定性地和迅速地击败他们。”任何其他的结果将是“令人难堪的”，可能会“削弱政治支持”，这种支持可以理解为是薄弱的。^②当几个月后惟一的遏制力量崩溃之后，毫不

奇怪的是,这些结论被更为牢固地确立了下来。我认为,当我们思考“9·11”之后的世界的时候,这些是我们应该留意的一些考虑因素。

不管人们对过去几星期的事件是如何判断的,如果我们希望对未来会发生什么有一个合理的评估,那么我们应该小心注意几个关键的因素。它们包括:

1. 作为政策决定基础的前提。

2. 在最眼前的历史中它们在稳定的机构和教条之中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同一批政策制定者。

3. 它们被转化为特定行动的方式。

我想对每一个题目都说几句。

新千年很快产生了两种可怕的新罪行,加入到顽固存在的黑暗的犯罪记录中。第一种是“9·11”式的恐怖主义袭击;第二种是作为对前者的反应,肯定夺走了远远超出前者的无辜生命,他们是阿富汗的平民,他们本身也是犯下“9·11”罪行的嫌疑犯们的受害者。我估计嫌疑犯是乌萨马·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开始的初步判断就是如此,尽管主要大国的情报机构相互协调展开了肯定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调查,但是仍然没有拿出什么可信的证据。^③这种被人们称之为“无领导的抵抗”网络不是容易捏的果子。

一个不祥之兆是,在所有这两种情况下,这些罪行在实施者的教义框架内都被认为是正确和正义的,甚至是高尚的;并且它们事实上几乎被用相同的语句加以合法化。本·拉登声称,暴力可以用自卫加以合法化,即反对侵略和占领穆斯林土地的异教徒和反对他们在那

里维持的残酷和腐败的政府的自卫行为。这些话在这一地区,甚至在那些厌恶和恐惧他的人那里得到了相当大的呼应。布什和布莱尔声称——使用了几乎同等的话——为了将邪恶赶出我们的土地,暴力是合法的。敌对双方的主张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当本·拉登谈到“我们的土地”的时候,他指的是穆斯林土地:沙特、埃及、车臣、波斯尼亚、克什米尔以及其他;被中情局及其随从在整个80年代动员和培育起来的极端的伊斯兰分子敌视俄罗斯,但是在俄国撤军后,停止在俄罗斯发动以阿富汗为基地的恐怖主义行动。相比之下,当布什和布莱尔谈到“我们的土地”的时候,他们指的是整个世界。这种区别反映了敌对双方支配下的实力。即使在他们的记录面前,任何一方仍然在毫无羞耻地谈论消灭邪恶,这应该会使我们惊讶地张大嘴巴,除非我们采取简单的方法,抹去即使是最眼前的历史。

在所有这两种情况中,另一个带有可怕凶兆的事实是,罪犯们坚持强调他们行为的犯罪性。在本·拉登的例子中,不需要进行讨论。美国有针对性地拒绝了联合国宪章中所蕴涵的合法性框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含糊声明中或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是否授权诉诸武力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多的辩论。但是,在我看来,这并没有切中要害。

如果有意结束这种辩论,结束它可能很简单。几乎没有疑问的是,即使不存在很有吸引力的理由,华盛顿本可以毫不含糊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俄罗斯热切希望加入“反恐联盟”,以获得美国对其自身大规模恐怖主义罪行的支持。中国正好出于同样的原因希望被接纳到这个正义联盟之中,并且实际上,全世界各国都马上认识到,

它们现在可以赢得全球超级大国对它们自身暴力和压迫的支持，全球的管理者们也没有错过这一教训。英国的支持是自动的，法国也不会提出任何反对。简而言之，不会有人动用否决权。

但是华盛顿倾向于拒绝安理会的授权，并坚持它独一无二的权利，即违反国际法和庄严的条约义务单方面采取行动，克林顿政府及其历届前任用清楚和明确的语言主张了这种权利，我们和其他人可以选择忽略这种警告，但是后果自负。类似的是，华盛顿轻蔑地拒绝了考虑引渡本·拉登及其助手的权宜之计。我们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少真实性，因为正义的拒绝立场甚至不会考虑它。这种立场符合治国之术的一个首要原则，在外交和学术术语中被称之为“确立信誉”。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一个黑手党首领计划收取保护费，他不会先去请求一个法令，即使他可以拿到这个法令。在国际事务中同样的事情大抵如此。各个主体必须明白自己的位置，必须承认，强权者不需要更高的权威。

修昔底德评论说，“大国按意愿行事，而小国接受它们所必须接受的。”数千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有些事情很大程度上保持原样。

“9·11”的暴行被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是真的，但是遗憾的是不是因为它的程度。它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在除了战争之外的暴力活动的编年史中并不出奇。只需提及一个例子，它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只能在(恐怖主义的)文章中充当一个脚注。一名巴拿马记者在谴责“9·11”罪行的同时观察到，对于巴拿马人来说，这种“邪恶的时

刻”并不陌生。他回想起在“正义事业行动”期间美国对巴里奥-乔里约斯(Barrio Chorrillo)的轰炸,这次轰炸可能杀死了数千人;这是我们的罪行,因此不被认真地当成一回事。^④“9·11”的暴行的确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它的目标。对于美国来说,这是自英国1814年火烧华盛顿以来其领土第一次遭到严重袭击,甚至是领土受到了威胁。但是无需回顾的是,自那之后的两个世纪以来它对其他国家做过些什么。对于欧洲来说,形势的逆转甚至更具有戏剧性。当欧洲人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区,并在身后留下了一路的恐怖和破坏的时候,他们是安全的,免遭受害人的袭击,只有罕见和有限的几个例外。那么,毫不奇怪的是,欧洲及其后代们应该被“9·11”的罪行所震惊,因为它是对数百年来可被接受的行为规范的极大破坏。

同样毫不奇怪的是,对于在此之后甚至更为严重的苦难,他们仍然心安理得,可能只是稍微有些惋惜。毕竟受害者是可怜的阿富汗人——“未开化的部落”,正如八十年前温斯顿·丘吉尔轻蔑地形容的那样,当时他命令使用毒气以在阿富汗人之中“散布活生生的恐怖”,他还谴责那些软心肠的蠢材们的“神经质”,他们无法理解,化学武器恰好是“现代战争中现代科技的应用”,并且必须得到应用“以迅速结束盛行于前线的无序状态”。^⑤

类似的想法今天也可以听到。《新共和》的编辑们不久前呼吁将更多的军事援助给予“拉丁美洲式的法西斯分子……不必顾及有多少人被谋杀”,因为“美国所优先考虑的事情高于萨尔瓦多的人权”,而他们现在解释说,“持久自由行动不是人道主义干预”。从那种准确的

观察中他们得到结论，“如果我们将一个陷于混乱的国家留在身后，以至于它再也不能作为一个对我们发动袭击的基地，那么我们将完成一个必要的目标，”并且应该“放下围绕国家建设的困扰”，即试图修复二十年来我们对阿富汗的破坏，然而我们对此已经不关心了。^⑥

尽管很少有人会后退到那一地步，但是下面一点依然是事实：对阿富汗人犯下的罪行基本不会玷污道德，一个理由是，贯穿整个历史，类似的活动是非常熟悉的，甚至是在除了贪婪和统治之外没有其他借口的时候。报应是无边的，因为有着丰富的历史先例，更不要说在我们被教导去敬畏的最神圣的文本中的权威了。

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暴行的另一方面被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他的一份报道中得到描述，这是关于驱逐切诺基人的报道，它可能是这个大陆上最严重的种族清洗之一。他尤其感兴趣地看到美国人是如何能够不仅在“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之后“灭绝印第安种族”，并且“以非凡的巧妙手段，冷静地、合法地、仁慈地，在不流血和不违反世人眼中任何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要在摧毁民族的同时仍然对人道主义的法则保持很大的尊重是不可能的，”他困惑地评论道。^⑦

这足以描述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事情。例如，在靠近赫拉特的马斯拉克(Maslakh)难民营里，据报道，成百上千的人正在挨饿，每个晚上都有数十人因为寒冷和饥饿而死亡。他们正生活在生存的边缘，即使是在轰炸之前。但是轰炸剥夺了他们极度渴望的援助。当我们在“9·11”之后三个月访问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被遗忘的营地”。资

深记者克里斯蒂娜·兰姆报道说,在“看过亚洲和非洲许多地区的难民营中的死亡和悲惨”之后,这里的景象比她记忆中的任何东西都要“恐怖”。一个月后,报道的死亡人数翻了一番,达到一天100人,救援官员警告说,随着逃到这个营地的难民继续在增加,据估计9月份以来已经达到其人口的四分之三,这个营地处于“埃塞俄比亚式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边缘”。^⑧

对生命的摧毁是静悄悄的,绝大多数是看不见的,而且能够选择将它轻易地忘却。更为遗憾的情景是拒绝——更糟糕的是嘲笑——将这些悲剧带到阳光之下的努力,这种努力希望能够积聚压力以缓解这些悲剧。轻易地容忍兰姆叙述的“鲜活的可怕情景”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强者是如何对付弱者和无力自保者的,因此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没有权利抱任何幻想,幻想那些策划了阿富汗战争的前提和随之而来的评论。这些幻想是建立在一种未受挑战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即以轰炸相威胁并随后将威胁付诸实施会大大增加因遭受饥饿、疾病和冻馁等危险而死亡的阿富汗人的数量。新闻界冷漠地报道说,这个数字预计会增长50%,达到750万人:增加250万人。^⑨有报道称,华盛顿“要求(巴基斯坦)消灭向阿富汗平民提供大部分食品和其他供应的车队”,^⑩他们中的数百万人已经处于饿死的边缘。但是这个报道没有引发任何评论。要求停止轰炸以允许发送食品和其他援助的请求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驳回,绝大多数的请求甚至没有得到报道,这些请求是由来自联合国的高官,主要的救援机

构,以及其他身居高位可以了解到情况的人发出的。阿富汗问题的专家们达成共同的想法,警告说,如果撤离救援人员,极大地减少食品供应,会使“数百万阿富汗人……面临饿死的严重威胁。”在9月之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说,如果当时威胁要进行的军事行动付诸实施的话,超过700万人将面临饥荒。在轰炸开始之后,它又提出忠告,“人道主义灾难”的威胁是“严重的”,并且轰炸中断了提供80%粮食供应的耕作活动,因此对来年的影响将更为严重。^①

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很清楚地了解那些前提假设,计划就是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并据此将计划付诸实施和产生评论。作为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正是这些假设告诉了我们未来世界的轮廓,不管在目前的事情中结果会是怎样。基本的事实偶尔得到报道,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在将食品和其他援助带到难民营和乡村的许多濒死之人方面基本无所作为。尽管供应在很长时间里是可以获得的,但是阻碍发放的主要因素是缺乏兴趣和意愿。

此外,如果历史具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更长期的影响仍然不清楚。这方面报道在今天非常少见,其后果在明天也不会受到调查。可以接受的报道是,轰炸的失误带来了“附带损失”,以及战争产生了不经意和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不可接受的是,有关故意和预有准备地摧毁阿富汗人的报道。阿富汗人在沉默中死亡,人们也看不到——并非存心如此,而是因为这无关紧要,这是种更深的道德沦丧;如果我们在走路时踩上一只蚂蚁,我们并不是要故意杀死它。

人民不会因为饥饿而马上死去,他们能够靠草根树皮生存下去。

如果营养不良的儿童死于疾病,谁会试图去确定背景因素是什么?在未来,这个问题不在议事日程上,这是因为一项关键的原则:我们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去仔细说明官方敌人的罪行,相当确切的是,它们不仅包括那些实际被杀之人,而且包括那些死于他们的政策的后果的人。我们必须同样谨慎小心地避免在对待我们自己罪行时也这么做,我们采取的立场令托克维尔如此地印象深刻。关于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有着数百页的详细文件。如果当前的例子最终表现出不同的话,那么将是一个受欢迎的惊喜。

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我们并不是从火星上观察所有这一切,或是在描述匈奴王阿提拉的罪行。如果我们选择去做的话,我们马上有大量的事可做。

为了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未来可能出现什么,让我们了解一下,除了诉诸毁灭性力量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相距甚远的替代方案。这种毁灭性力量很自然为那些控制着压倒性力量的人所有,外部没有东西能够威慑他们,他们很有信心获得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舆论的顺从。

各种替代方案曾经被重点推出。例如,梵蒂冈就曾提出过,它呼吁依赖那些与罪行相称的措施,不管罪行的程度如何:如果有人抢劫了我的房子,并且我认为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也没有权利拿着一支突击步枪跟在他后面,同时随便杀害邻近他的人。杰出的军事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也提出过建议,他“猛烈抨击”了10月30日对阿富汗的轰炸,不是因为行动的成功或是失败,而是因为它的策划:需要的是“警察和情报部队的耐心行动”,“代表国际社会整体,在联合国荫护下

实施的一次警察行动，它反对的是一个犯罪阴谋，其成员应该被追捕，并带到国际法院前。”^⑫先例当然存在，包括那些比“9·11”更极端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美国反对尼加拉瓜的恐怖主义战争，这里举的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之所以没有争议是因为它是最高的国际权威——国际法院和联合国所做出的裁决。在一个武力统治的世界中，尼加拉瓜寻求法律手段的努力失败了；但是如果美国选择遵循合法途径，没人会阻挠美国。

逮捕和惩罚犯罪者的目标是否能够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实现？可能吧。我们无法知道塔利班提出讨论引渡的建议是不是认真的，因为出于已经提到的原因它被拒绝了。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在轰炸已经开始后才作为“马后炮”所附加的战争目标：推翻塔利班政权。^⑬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是许多阿富汗人优先考虑的问题，就如同世界各地在残酷的政权和凄惨的压迫下受难的不计其数的其他人考虑的一样。只考虑策略和效果，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实现后一个目标。

很明显，调查应该从阿富汗的人民那里开始：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如何？毫无疑问，确定他们的观点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有一些合理的方式可以进行。

我们可以从10月底1000名阿富汗领导人在白沙瓦的聚会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流亡者，一些人从阿富汗内部艰难翻越边界而来，所有人都致力于推翻塔利班政权。这是“一次罕见的团结的展示，部落长老、伊斯兰学者、不听指挥的政治家和前游击队首领之间的团结，”《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们一致“敦促美国停止空袭，”向国际媒体

提出呼吁,要求停止“对无辜人民的轰炸”,并“要求停止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他们迫切要求采取其他手段推翻可恶的塔利班政权,他们相信这个目标可以在没有屠杀和破坏的情况下实现。^⑭

阿富汗反对派领导人阿卜杜·哈克也传递了类似的信息,他曾在华盛顿受到了很高的尊重。就在他进入阿富汗之前——很明显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因而随后被捕和被杀害——他谴责了美国的轰炸,并批评美国拒绝支持他和其他人“在塔利班内部制造叛乱”的努力。他说,这次轰炸是对“这些努力的一次巨大挫折”。他报告了和塔利班中层指挥官以及前圣战者组织的部落长老的接触,并讨论如何将类似的努力进行下去,同时呼吁华盛顿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来协助他们,而不是用炸弹来破坏。

阿卜杜·哈克说:

美国试图展现自己的力量,赢得一场胜利,并吓住世界上所有人。他们并不关心阿富汗人的苦难,或是我们将失去多少人。我们并不喜欢那样,因为阿富汗人现在正在因这些阿拉伯狂热分子而遭殃,但是我们都清楚是谁将这些阿拉伯人在80年代带到阿富汗来的,将他们武装起来,并给了他们一个基地。正是美国人和中情局。做了这一切的那些美国人得到了奖章和好的职业,但是所有这些年来阿富汗人因为这些阿拉伯人和他们的盟友而受苦受难。现在,当美国遭到袭击的时候,他们不去惩罚做下这些事情的美国人,反而惩罚阿富汗人。^⑮

就这些话本身的价值来看,我认为他的评论很有道理。

我们也看看别的地方,以获得关于阿富汗人的观点的启迪。至少,对阿富汗妇女的命运有一些迟到的关注,甚至传到了第一夫人那里。可能在将来的某天,在这种关注之后,是对中亚和南亚妇女的苦难的关注,不幸的是,在许多地方,即使是在最有活力的民主国家,这种苦难与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选择去找的话,在这些问题上有大量高度可靠和专业的根据。并且,这种大大偏离过去做法的行为至少会使美国对塔利班的愤怒具有某些可信度,正好服务于美国的宣传目的。当然,没有一个健全的人会赞成美国或其他国家采取对外军事干预,以纠正这些和那些发生在美国的盟国或是附庸国的可怕罪行。这些问题是严重的,但是应该从内部加以对付,并在外部的协助之下——如果这种协助是具有建设性和诚实的,而不仅仅是伪善和自利的。

但是由于阿富汗妇女所受到的苛刻的待遇至少获得了某些应得的注意,阿富汗妇女对政策选择方案的态度应该是首要的关注对象。毫无疑问,这些态度的变化很大,也不容易进行调查。然而,要决定以下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即马斯拉克的母亲们是否会赞扬这次轰炸,或者是否会赞同那些从家园逃到可怜的难民营的人的做法,他们是在轰炸的威胁下这么做的,并表达了痛苦的希望:“即使是残酷的美国人也会对我们被毁的家园感到一些怜悯”,从而避免实施威胁中的轰炸,而这种威胁已经带来了死亡和灾难。^{①6} 阿富汗妇女绝非在所有地方都是沉默的,有一个由勇敢的妇女组成的组织,她们二十五年来站

在保卫妇女权利斗争的最前沿,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RAWA)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工作。她们的领导人在1987年被与苏联勾结的阿富汗人所暗杀,但是她们冒着死亡的危险继续在阿富汗国内工作,并在周边流亡。她们相当直言不讳。例如,在轰炸开始后一个星期,她们发布了一项公开声明,它在任何真正关心阿富汗妇女而不是将它仅仅作为一项权宜之计的地方都会成为头版新闻。

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10月11日的声明的标题是:“塔利班应该被阿富汗民族的起义所推翻”,声明如下:

再一次,归咎于原教旨主义刽子手的背叛,我们的人民被一个巨大的战争怪兽的魔爪所擒获。美国通过组成一个反对本·拉登和他的塔利班同伙的国际同盟,以及为了报复“9·11”的恐怖袭击,对我们国家发动了大规模入侵……我们在过去七天里所见证到的没有留下任何疑问:这次入侵会使我们国家的许多妇女、男子、儿童、年轻人和老人流血。

这项声明继续呼吁通过阿富汗人民自己的“全体起义”“消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这一瘟疫”,单凭他们自身“就能够防止降临在我们国家上的灾难重复和再现……”

在11月25日的另一项声明中,在“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上,由各个妇女组织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示威活动中,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谴责美国和俄罗斯支持的北方联盟“违反人权的记录与塔利班一样糟糕”,并请求联合国“帮助阿富汗,而不是北方联盟,”这些警告

在同一时期举行的全印度民主妇女协会的全国会议上被重申。^{①7}

可能那些许多年来为自由和妇女权利斗争的阿富汗人对他们的国家并不很了解,并且应该将它对未来的责任让给外国人——他们在几个月前还不能在地图上指出这个国家——以及其他在过去帮助摧毁它的人。这有可能,但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局势是海湾战争的翻版,当时伊拉克的反对派被禁止在媒体和杂志上发表意见,除了那些边缘的持不同政见的杂志之外。他们强烈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行动,并指控美国倾向于军事独裁统治,而不是通过内部起义来推翻萨达姆——正如它被公开承认的那样,当时老布什政府回到了和他过去的朋友合作的政策,与萨达姆结盟来实施主要的暴行,例如萨达姆残酷地粉碎了可能推翻这个杀人的独裁者的南部什叶派起义,这是在完全控制了这个地区的美国军队警惕的目光下进行的,然而华盛顿甚至拒绝允许起义的伊拉克将军获得被缴获的伊拉克武器。布什政府确认,它不会与伊拉克的反对派领导人打交道:“我们感到,与他们举行政治会议……对目前我们的政策是不合适的”,这是国务院发言人理查德·鲍彻在1991年3月14日所宣布的,当时萨达姆正在屠杀南部的起义者。^{①8}那是长期以来的政府政策。同样正确的是,偏爱使用武力而不是追求可能可行的外交选择,这些政策在随后十年继续下去直到今天,并且是相当自然的,基本上是因为阿卜杜·哈克阐述过的理由。

评估未来前景的另一种明智方法是回顾今天的指挥官在他们二十年前发动首次恐怖主义战争时的行动:存在充足的证据证明它们

在中美洲、南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同样高尚的辞藻和热情。这里不需要回顾这项令人羞耻的记录。很明显,它传达着对于可能的未来的教训,正如同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话题在对当前和未来项目的一片赞美声中被小心略去了,尽管——或者可能因为——这个记录是如此明显地与之相关。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可怕的十年结束的时候,限制使用武力的外部威慑力消失了。对于它的牺牲者来说,苏联暴政的崩溃是一个显著的胜利,尽管这种胜利不久就被新的恐怖所玷污了。对于其他人来说,其后果更为复杂。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征很快就被揭示:大部分相同,只是借口和策略被改变了。在柏林墙倒塌几个星期之后,美国入侵巴拿马,杀害了数百甚至数千人,美国否决了两项安理会决议,绑架了一名凶手,将他关进美国监狱,他被指控的罪行绝大多数是在他拿中情局的薪水时犯下的,也是在他犯下惟一一项要紧的罪行——不服从——之前。这些事件的模式是够熟悉的,但是也有一些区别。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指出了其中一点。他曾经因为在担任里根政府国务院官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被判有罪,现在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权专家。在入侵时,他评论说,多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能够在不用担心俄国反应的情况下诉诸武力。于是也有了新的借口:干预是为了对付西半球的毒品走私犯,而不是在马那瓜——离得克萨斯的哈林根两天的路程——进行动员的俄国人。

几个月后,布什政府拿出了新的五角大楼预算,这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第一次不是以“俄国人来了”为借口。^{①9} 政府要

求一项庞大的军事预算,如同以前一样,部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因此有必要增强“国防工业基础”(也叫高科技工业),并保持干预力量,其目标主要针对中东,因为“自由世界的石油供应依赖这个关键地区”。但是也有变化:在这个关键地区,需要直接军事介入对付的“对我们利益的威胁”“不能置于克里姆林宫门口”,这与数十年来的宣传正好相反。这些威胁也不能置于萨达姆门口:这名巴格达屠夫仍然是个有价值的朋友和盟友,还没有犯下不服从的罪行。更确切地说,威胁来自本土民族主义,正如情况一向如此。

这些乌云也同样盘旋在更大的威胁之上,不是俄国人,而是第三世界“技术先进性的发展”要求我们保持世界范围完全的军事主导,即使在缺少“超级大国竞争背景”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冷战的对抗一直是处于这个背景之中,但是更多是作为一种借口而不是理由,正如同俄国人利用美国的威胁来使它在自己范围内的罪行合法化。真正的敌人是南方的独立(被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正如现在被默认的那样,传统的借口已经失去了效用。文献和历史记录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结论。

在对世界的控制中,一个较弱的伙伴的崩溃的另一个后果是,不结盟空间被消灭了,以及它允许的独立是有限的。一个标志是对外援助马上急剧减少,最极端的情况出现在美国,即使我们将最大的一部分援助计算在内,即由于战略原因提供给一个富国*的援助,以及因

* 即以色列。——译者

为埃及在同一项事务中的合作而提供给它的援助,援助的整个目录几乎消失了。美国完全认识到,供选择的对象减少了。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统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说:

矛盾的是,对一直反共产主义的我们来说,最大的灾难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冷战的结束剥夺了我们唯一的优势——改换门庭的可能,现在我们不能转投任何人。^②

这并不真的是一个矛盾,而是真实世界的历史的自然进程。

类似的恐惧也被广泛地表达出来。整个南方猛烈地谴责海湾战争是不必要的展示武力,它回避了外交的选择。当时对这样的解释有相当多的证据,以后就更多了。许多人意识到阿卜杜·哈克今天所描述的事情:美国“试图展现自己的力量,赢得一场胜利,并吓住世界上所有人,”以确立“信誉”。诉诸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是为了证明“我们说到做到,”当炸弹和导弹袭击伊拉克的时候,乔治·布什骄傲地说。当他马上转而支持萨达姆的杀人暴行以确保“稳定”——委婉的说法,稳定意味着对美国的权力利益的服从——的时候,那些当时没有领会到这种意思的人本应该毫无困难地这么做。南方的总体气氛被圣保罗的红衣主教保罗·埃瓦里斯塔·阿恩斯捕捉到:在阿拉伯国家内,他说,“富人站在美国政府一边,而数百万穷人谴责这种军事侵略。”在第三世界各地,他继续说道,“存在着仇恨和恐惧:他们什么时候将侵略我们”,并且以什么为借口?^③

对轰炸塞尔维亚的反应总体上是相似的,这里再一次有相当的

证据表明,和平的方案原来是可以追求的,可以避免许多的悲剧。在这个例子中,官方不断声称,其动机是确立“信誉”和保证“稳定”。很难将这样一个主张当真,即它的次要目标是在将观察员撤出(在未经报道的塞尔维亚的反对下)后防止种族清洗和暴行。也很难将随后马上开始的轰炸当真,轰炸是一个“可以预测的”结果,正如司令官在轰炸开始后告知媒体并且以后不断被重申的那样,他不知道有这样的战争目标。来自美国国务院、经合组织、英国政府和其他西方来源的丰富的文献记录充分地证实了这些结论。可能那就是为什么这些能够说明问题的记录如此持续地在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文献中遭到忽略的原因。即使在最忠实的附庸国内,这次轰炸也被谴责为传统炮舰外交的回归,它以传统的风格被“包装在说教的正义性中。”(有声望的以色列军事分析家阿莫斯·吉勒博阿,这绝非孤立的声音。)^②

在世界舆论和对这些事情的批评性讨论中,美国人被小心地保护起来,但是遵循这些限制,我们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

忽略那些清楚地解释策划者们想法的公开文献同样没给我们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他们相当好地认识到,以经济而言,世界可能会三足鼎立——北美、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大体相当——但是在诉诸暴力和破坏的能力方面,它是极端单极的。关键的是,生活中的这些事实加入到策划过程中,这应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即使是在“9·11”之前,美国用于“防御”^③的开支超过了紧随其后的15个国家总和,事实上,和往常一样,它意味着“进攻”。在尖端军事科技方面,它遥遥领先。“9·11”后,随着政府利用人民的恐惧和

痛苦以推行一整套的措施,其军事预算大幅增加。他们明白,如果不诉诸于“爱国主义”(强者可以不予理会),这些措施会激起大众的反。其他人必须保持被动和服从。这些措施包括强化这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保守主义”深深地献身于它——的权威的各种方法,其中包括急剧增加军事开支,旨在增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其中包括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计划——只有一名竞争者的“竞赛”——它削弱了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以及其他的国际义务。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MD)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即使是它也被理解为是一件进攻型武器:“不单单是一个盾牌,而且是使行动成为可能的能动器,”兰德公司解释说,不仅附和了中国政府的想法,也附合了中国政府的说法,从现实角度出发,中国将其作为一件针对它的武器。战略分析家现实地将这一项目描述为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一种手段,他们重复了他们许多杰出前辈的话,解释说,这种霸权是世界所需要的。

在更高层次的公开文件中,将太空军事化的更大的项目被解释为扩展国家实力的自然而然的下一步。建立陆军和海军是为了保护商业利益和投资利益,为了追求同样的目标,克林顿的太空司令部得到保留,其合乎逻辑的下一个前线是太空。但是目前可能有一种区别。英国的海军可能会被德国海军所抗衡,其结果我们无需讨论。但是美国的强大将是如此恐怖以至于不存在制衡的力量,所以它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出于众所周知的技术原因,压倒性的主导地位是必要的。即使是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也要求使潜在敌手的反卫星武器失效。因此美国

必须实现“全方位的支配”，以确保：即使是这种简单得多的技术也不能被人所得。为了其他的原因需要一只铁拳。美国的军事策划者们与情报界和外面的专家有着同样的评估，即被误导性地称之为“全球化”的东西将导致“有者”和“无者”之间越来越大的分裂。这与教义相反，但是与现实相一致。并且有必要控制无序的要素：通过激发恐惧，或是可能通过实际运用从太空发射的具有高度毁灭性的杀人机器，它很有可能是核动力的，并且自动的控制系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因而增加了在行业中所说的“正常意外”——所有复杂体系都无法幸免的不可预料的错误——的可能性。

人们承认，这些项目大大增加了不可控灾难的危险，但是它在通行的机制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也是完全理性的，这种框架重视霸权甚于生存。大量的先例同样存在于冷战以及很早之前的历史中。今天的区别在于，代价要高得多。绝不夸张地说，人类的生存也处于危险之中。

如果现有的趋势持续存在的话，对我来说，这些似乎就是现实的前景。但是没有理由表明，这些事会发生。好消息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权威体系是脆弱的，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这里正在进行一次重要的努力，试图利用当前的机会之窗，以构建严酷和压迫性的项目计划，压制大规模的大众运动，这些运动已经以空前和高度令人鼓舞的方式在全世界组织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屈服于这些企图之下，相反，每一种理由都反对屈服。大量的选择和方案可供采纳，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始终不渝地追求它们的意愿和奉献精神。

第七章

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 (2001 年 5 月)

最近阶段的巴以冲突开始于 2000 年 9 月 29 日,正值穆斯林的祈祷日。当时埃胡德·巴拉克总理向阿克萨清真寺派遣了大量警察和军队以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胁迫。可以预料的是,当数千人潮水般涌出清真寺时,它导致了冲突的发生,造成数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0 人受伤。^①不管巴拉克本来的意图是什么,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产生这种令人震惊的后果,尤其是在阿里埃勒·沙龙及其武装保镖一天之前访问这个场所之后,这次访问本可以在不引起如此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到此为止。

这一开场事件确立了后续的模式。联合国的一项重要调查发现,“在至关重要的这些日子里,没有证据表明巴勒斯坦人开了火。”^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就调查者能够确定的而言,“以色列国防军在工事后使用先进的武器开展行动,没有因为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而蒙受一起严重伤亡,进一步而言,在这些事件的进行过程中,他们的士兵

似乎没有受到生命威胁，”但他们却杀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并加强了比以往更为残忍的统治，将当地人口置于严厉的集体惩罚和羞辱之下，这是多年以来占领的特征。^③联合国的报告发现，

以色列人的主要伤亡来自定居点的公路上和相对孤立的检查站上发生的事件……是这些定居点以及由此间接引发的愤怒的后果。从这个方面来说，必须将定居者在定居点周围地区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在这种暴力中的勾结行为考虑在内。

当前的这些行动与以前的那些行动一起被国际人权机构以大量的细节予以回顾，并遭到猛烈地抨击。如同联合国的调查报告一样，这些研究基本上在美国被忽视了。

当人权机构的报告可以在教义上而不是其他方面可以被利用时，这些报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方面，阿克萨起义也并没有打破惯例。我引一个最近的例子，2001年4月，“人权观察”组织出版了一项详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在希伯伦地区的暴行上，数万名巴勒斯坦人几个月以来近似于被监禁在那里，而数百名犹太定居者则可以在军事保护下虐待和羞辱他们，摧毁他们的房子，这是许多年来一个模式。这个报告马上被各个通讯社所报道。美国国内对此报告的首次（可能也是惟一一次）提及是在五天后《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的第15段。^④

事件的这种模式强调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使用“以-巴冲突”

这个词是非常误导的,正如我在一开始所使用的:应该被冠之以“美/以-巴”冲突。出于类似的原因,谴责“以色列的暴行”,同样是误导的——尤其是在美国,是不恰当的。正如同它同样不适合于发生在东欧的苏联支持下的罪行,或是发生在中美洲的美国支持下的罪行(同样的操作)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例子。

阿克萨起义最初几天里发生的那些事件生动而准确地说明了这些结论。9月30日,以色列国防军杀死了12岁的穆罕默德·迪拉,这是对发生在内特查里姆(Netzarim)附近的对一个小型以色列定居点的石头袭击(他并没有卷入其中)的反应。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保护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和道路系统的一个借口,它们将加沙分成两半,也是将加沙城和南部(以及埃及)分开的几个关卡之一。“人权观察小组”报告说,“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一个重重保护下的碉堡内反复向试图进行救援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护车开火,”它试图救援这名重伤的男孩和其他受伤的人。“以色列据点内的射击持续了至少45分钟,尽管在此期间,巴勒斯坦示威者和警察没有进行明显的还击。”救护车的努力徒劳无功,未能“撤出大量的巴勒斯坦伤员,他们被从碉堡以及可能从内特查里姆定居点的狙击塔上发出的以色列猛烈火力所伤”;建造了土墙“为那些从内特查里姆定居点的狙击火力下逃出来的人提供某些保护。”大赦国际发现,以色列国防军“显然甚至将那些帮助移走伤员的人作为目标,”它还报道说,当试图撤走伤者的时候,一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护车司机“在被以色列部队打中胸部后死亡”。^⑤

感谢美国的直接支持、容忍和回避,所有这一切得以进行下去。

翌日,也就是10月1日,“以色列特种部队从一个防护良好的屋顶位置及其周围开火,”杀死2名巴勒斯坦人,而他们自身明显没有受到威胁。在同一天,当“一架以色列国防军的武装直升机不计后果地反复向内特查里姆与(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野战医院直接相邻的地区开火,并中断了那里的手术”的时候,以色列将暴力升级,而这个医院离任何冲突点至少有400米远。在埃及和加沙的边界上,直升机发射导弹,杀死了2名巴勒斯坦人,打伤十儿人。第二天的10月2日,直升机向内特查里姆的建筑物和小汽车发射导弹,杀死10名巴勒斯坦人,打伤35人。^⑥

以色列国防军的直升机是以色列人驾驶的美国直升机。美国的供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认为我们可以在以色列制造直升机或者这种类型的主要武器系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以色列国防部报道说。^⑦

10月3日,以色列最有声望的报纸的国防通讯员报道了与克林顿政府达成的一项协议的签字过程,这项协议是“十年里以色列空军最大的一宗军用直升机采购案,”同一批的还有一项9月中旬签订的提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备用部件的协议。同样在9月中旬,以色列的新闻界报道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与以色列国防军在内格夫地区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目标是重新占领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领土。海军陆战队提供了对以色列国防军依然缺乏的武器的培训,并且是按照“美国的战斗技巧”。^⑧

10月4日,一本世界领先的军事杂志报道说,华盛顿批准了提供阿帕奇直升机以及其他更先进的攻击设备的请求。同一天,美国新闻界报道说,阿帕奇正在内特查里姆用火箭攻击公寓区。在回应欧洲记者的询问时,美国的官员说,“美国的武器销售并不包括不能将该武器对付平民的规定。我们不可能预见到,以色列的指挥官会呼叫武装直升机。”白宫的国家安全发言人P·J·克劳利补充说,“我们并不处在能够对任何一方所作出的决定进行裁决的位置上,”他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几个星期后,当针对本土领导人的暗杀运动开始时,一名当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侯赛因·阿巴伊特被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一枚导弹打死(站在旁边的两名妇女也被打死)。^⑨

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将新的军用直升机运到以色列,并且进行如此的授权,这当然具有新闻价值。但是,新闻没有进行报道,社论也没有进行评论。在美国提及此事的惟一一次例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⑩“大赦国际”对美国出售直升机的谴责也在无声无息中过去了。在以后几个月里,情况依然如此,包括2001年2月运送一批价值5亿美元的波音阿帕奇长弓直升机。它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武器,但是这件事在美国只是被当作商业新闻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按照相似的风格,一条重大的新闻(5月17日)报道说,布什总统不愿意更加“直接地卷入”到巴以冲突中,并且他的政府没有能力支持米切尔委员会要求以色列冻结定居点的报告,因为沙龙总理“在哲学上反对这样一个建议。”同一天,在“世界简报”中,有寥寥数行文字报道说,美国的工兵部队开始在内格夫建造一个价值2.66

亿美元的以色列军事基地(由美国出钱),美国大使马丁·因迪克宣称,它是“美国继续承诺保证以色列安全的”一个象征。^①

但是,美国要求巴勒斯坦人结束他们的恐怖行动的严厉告诫得到了很好的报道,因为“我们相信暴力不能得逞”(因迪克大使语);^②定期的官方声明对暴力表示遗憾,并且有节制地对以色列的暗杀的计划表示了不赞同。华盛顿的实际态度通过它的行为表现出来。报道只是报道而已。

这中间没有一件是不同寻常的。特别是在针对以巴冲突的时候,自美国在这一冲突上偏离国际共识之后,三十多年来这种模式已成为例行公事。尽管最重要的事实在主流评论中是缺失的,并且经常遭到忽视或是歪曲,即使在学术著作中也是如此,这些事实仍然是没有争议的。它们为任何想要认真了解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努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

美以关系在1967年以色列的军事胜利后急剧改善。它的背景是,这一地区存在着全世界无法相比的能源资源,只要涉及这一地区人们总是这样想的。作为二战中崛起的压倒性的全球主导力量,美国进行了仔细和复杂的策划,以便按照它的利益组织世界体系。这包括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以前曾被法国和英国所分享的石油。法国已经被赶走了,而英国——用英国外交部官员满腹怨恨的话来说——逐渐衰落到了“小伙伴”的地位。尽管有很多关于俄国人的讨论,并且毫无疑问,全球战争的可能性是战略规划的主要组成因素,但是自始至终的直接问题是独立的民族主义的威胁——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

得到承认,甚至在官方文件中。^⑬

美国基本上接管了英国在一战后建立的控制中东的框架。这一地区的国家曾经处在一个英国人所说的“阿拉伯阵线”的管理之下,该组织力量薄弱、易于摆布;英国“吸收”殖民地是在“宪法编造的条目下伪装成保护国、势力范围、缓冲国等等”方式下进行的,这是比直接统治更具成本效益的手段。当需要的时候,英国随时可以显示力量。美国修改了这一体系,加入了作为第二层次的“步调一致的当地警察”,正如尼克松政府所称的:确保秩序的当地宪兵,最好是非阿拉伯人,而警察总部在华盛顿,美-英军队作为预备队。

在整个这一时期,土耳其被认为是美国的权力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基地。伊朗是另一个,这是在它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府控制伊朗资源的努力在1953年被英美军事政变粉碎之后。到1948年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已经对以色列的军事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将这个新的国家描述为这个地区紧随土耳其之后的一个主要的地区性军事力量。他总结道,以色列能够提供给美国“获取弥补英国在这一地区力量的衰落所导致影响的中东战略优势”的手段。

在1958年,中情局建议说,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逻辑结论”“将是支持以色列作为中东惟一余下的一个可靠的亲西方力量”。这种推理只是到了1967年之后才得以实施,当时,以色列通过摧毁纳赛尔,向美国提供了价值很高的服务。纳赛尔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被当作是可能“传染给其他人”的“病毒”而使人恐惧和厌恶,用谋划者们常用的术语来说,是一个可能会“搞糟整筐苹果”的“烂苹果”,

为了公众的目的通常被重新塑造成“多米诺骨牌理论”。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一个由默认的三方联盟构成的“地区性警察”在美国的庇护下形成:伊朗、沙特和以色列(土耳其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巴基斯坦当时是一个准成员)。由于拥有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石油储备,沙特是这个阵线的中心组成部分;任何严重背离服从的行为毫无疑问会招致严厉的惩罚。这些安排曾经得到美国情报专家的公开解释,也得到了其他政治人物的公开解释,最著名的是亨利·杰克逊,他是参议院的首席中东和石油问题专家。他观察到,受惠于以色列和伊朗的“力量和西方导向”,这两个“美国的可靠朋友”,与沙特一起,“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即约束和遏制某些阿拉伯国家内的不负责任和极端的分子……这些人如果可以自由行事的话,会对海湾地区我们首要的石油来源造成真正的严重威胁”(主要指的是利润的流动和控制世界的一个杠杆;美国并不依赖中东的石油提供其自身的使用)。

美国对海湾地区的支配在 1958 年就已经处于威胁之下,当时伊拉克军队推翻了附庸英国的主要政权。美英的内部记录提供了一份说明,揭示了他们关注的内容和计划,它是理解 1991 年的海湾战争的关键背景。^⑭正如被提到的那样,纳赛尔的埃及直到以色列 1967 年的胜利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主要威胁。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迅速提高,在以色列履行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即阻止了叙利亚对在约旦遭到屠杀的巴勒斯坦人的潜在支持之后,这种援助甚至提高得更快。1979 年伊朗国王的倒台是沉重的一击。卡特总统马上派出了一名北约的将

军,试图调查这起军事政变。当这种努力失败时,仅剩的两个支柱——沙特和以色列——加入了美国的行列,努力通过提供军事援助来推翻这个政权。这是推翻一个文官政府的常用工具,它在印尼和智利的应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以色列利用它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和伊朗的亲密关系时,重新建立起军事上的联系,并在沙特的资助下,将美国的武器输送给伊朗。这项行动的目标一度得到清楚和公开的解释,^⑮但是很大程度上在美国被忽视了。后来,它们被重新加以界定,使用的是更能被人接受的关于“武器换人质”交易的术语,尽管那可能并不是最初的动机,因为那时还没有人质。鉴于这种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美、以、沙的联合项目是对伊朗国王倒台的一种完全自然的反应。华盛顿的朋友和盟友萨达姆·侯赛因因为不守秩序而失宠(他的滔天罪行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实无关紧要,正如美英支持他的记录所显示的那样),美国转而采取“双重遏制政策”,目标是伊朗和伊拉克。

正是在这个总体的背景之内,美以关系的发展演变了许多年,尽管以色列也同样成为华盛顿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开展行动的有价值的贡献者。^⑯冷战一直在背景中出现,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大战的威胁始终存在。但是在更普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第二位的因素,历史和文献记录都揭示了这点。俄罗斯遏制因素消失导致了一些重要的策略性的修改,但是在基本政策上或是美以关系上没有本质的改变。1992年4月,什洛莫·加齐特将军(退役)给出了一个在我看来的现实的评估。他是前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首脑,后来又成为犹太社

(Jewish Agency)的高级官员和本-古里安大学的校长,他是一名非常有声望的战略分析家和谋划家。他写道,随着苏联的崩溃,

以色列的主要任务并没有改变,并且仍然至关重要。它处于阿拉伯穆斯林中东地区的中心位置,这使以色列命里注定成为一个保卫它周围所有国家稳定的忠诚卫士。它的作用是保护现政权:预防或终止极端化进程,阻止原教旨主义分子宗教热情的扩张。^{①7}

尽管华盛顿将以色列在1967年的军事胜利当作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来欢迎,但是这一胜利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后来报告说,当美国的舰队“在地中海迫使一艘苏联船只转向的时候,”“该死,我们差不多要开战了”;他并没有给出细节,但当时很有可能是以色列在停火后占领戈兰高地的时候,这引发了苏联的严重警告,包括动用了不祥的热线通讯。在认识到军事对抗太过危险之后,两个大国提交了一份外交解决方案,于1967年12月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形式确立下来。这项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占领的所有领土,并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条约,承认所有国家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和平和安全的生存权:简而言之,全面的和平换取全面的撤军,进行一些至多是边缘性的调整和相互调整,可能是将弯弯曲曲的边界弄直。^{①8}重要的是要记住,联合国242号决议是严格的拒绝主义的——在这里是中性地使用这个词,指的是否认原巴勒斯坦土地上相互争夺的两个民族群体中一个或是另一个的民族权

利,并不单单是拒绝犹太人的权利,如同传统种族主义的用法所指的那样。242号决议要求的是现存诸国之间的一个解决方案:除了含糊地提到“解决难民问题的公正方案”之外,巴勒斯坦人并没有被提到。

联合国242号决议依然是阿以冲突问题上国际外交的基石,但是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第一个是国际共识上发生的关键转变,到70年代中期它已经放弃了决议的拒绝主义原则,并呼吁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保持了其拒绝主义立场,但是现在处于国际孤立状态。第二个变化与美国对242号决议的阐释有关。这一变化可以追溯到1971年2月,当时埃及新当选的总统萨达特接受了华盛顿的官方政策,实际还有所超越,他提出用全面的和平条约换取以色列仅从埃及的被占领土上撤军。在官方立场上,以色列将其作为一个真诚的和平建议予以欢迎,当时的驻华盛顿大使伊扎克·拉宾是这样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的,它是通向和平道路上的“著名……里程碑”。但在对埃及表达出的“准备开始与以色列和谈”的意愿表示官方欢迎的同时,以色列拒绝了这项建议,声称它“不会撤到1967年6月5日之前的边界线上”,这个立场它坚持到现在。

美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它是否应该保持它的官方立场,从而加入埃及一边对抗以色列?或是它是否应该改变对242号决议的阐释,转而采取基辛格呼吁的“僵局”政策:不和谈,只用武力?基辛格占据了上风。从那之后,美国对242号决议的阐释意味的只是美国和以色列决定的范围内的撤军。早先的阐释仍然继续不断被官方加以重申,直

到克林顿政府时期。在 1993 年 12 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克林顿政府争辩说,根据 1993 年 9 月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的和平协议——我们后文会回到这个协议,过去的联合国决议是“过时和落伍的”。^{①9}

然而,对 242 号决议的官方认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华盛顿继续为以色列逐渐兼并土地的行为提供军事、外交和财政支持。例如,卡特总统着力重申了这个官方立场,^{②0}但是与此同时,作为戴维营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将对以色列的援助提高到美国所有对外援助的一半左右。1971 年的事情被从一般的评论和回顾中割裂出去。^{②1}

在 1971 年被拒绝后,萨达特警告说,如果他追求和平的努力继续遭到拒绝,他可能不得不走向战争。他被人轻蔑地予以回绝。记住,这是一段以色列和美国两个国家国内都处于必胜主义和种族主义傲慢的时期,后来它在以色列国内遭到痛苦的谴责。工党政府继续推行它在西奈东北部建立定居点的计划,包括全犹太人城市耶米特(Yamit),它是在阿里埃勒·沙龙将军(他遭到一个军事调查委员会的训斥)指挥的部队用极端残忍的方式将大约 10 000 名农民和贝都因人赶走之后建立起来的。萨达特警告说,“耶米特意味着战争”,但是他的警告被忽视了。^{②2}

1973 年的战争被证明是接近于一场灾难,不仅对以色列,而且对世界也是如此;核对抗的威胁再一次出现了。甚至基辛格也明白,单靠武力是不够的。他转向自然的替代战略:既然埃及不能被忽略,那么必须将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主要遏制力量从冲突中移走。卡特在戴维营取得了这个结果,将以色列解放出来,以“维持其在黎巴嫩反对巴

解组织的军事行动以及在西岸的定居点活动”(以色列战略分析家阿夫纳·亚尼夫语)^③,在卡特政府及其后任的大规模支持下,以色列就这样继续做下去。

萨达特在1977年成为一个受到极大推崇的“追求和平之人”,尽管他的英雄立场远远没有1971年那么坦率。到1977年之前,他已经加入到呼吁巴勒斯坦权利的国际共识之中。关键的不同在于,到1977年为止,紧随1973年战争(可能应该被称之为基辛格的战争)之后,美国不情愿地采纳了萨达特1971年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被从“净化过”的历史中删去了。

当国际共识抛弃了美国的拒绝主义的时候,美国的孤立变得更为极端。事情在1976年1月达到高潮,当时安理会正在讨论一项决议,它得到了阿拉伯“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支持,并得到了巴解组织的公开支援,它呼吁一项成立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将242号决议包括在内,但是现在补充了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内容。以色列拒绝参加这项议程,取而代之的是对黎巴嫩进行轰炸,杀死50名平民。除了报复联合国外,不可能有其他借口。这项决议得到了欧洲、俄罗斯(自始至终处于外交的主流之内)、不结盟国家的支持,实际上接近于一致通过。美国否决了这项决议,1980年再次进行了否决。^④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经常单独投票(与以色列一起,偶尔与其他一些附庸国一道)以类似的强行方式反对大会决议。就技术问题而言,联合国大会不存在否决权,但是美国的一票反对票,即使是在孤立的情况下(通常如此,在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上),也具有

否决的效果。实际上，它是一个双重否决，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很典型的是，它是来自评论，甚至是来自历史的否决，正如刚才所回顾的那些事件一样。美国还阻止了一系列其他的外交倡议：欧洲、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提出的。新闻界经常甚至都不提到它们。

这个记录具有指导意义。让我们从许多例子中选一个。1986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驻以色列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以色列的“现在就和平”组织“从来没有这么沮丧过，”原因是“缺少任何的阿拉伯谈判伙伴。”几个月后，他引用了西蒙·佩雷斯的话，对“阿拉伯人民之中缺乏像我们犹太人中那样的和平运动”表示遗憾，并且说，“只要巴解组织仍然是一个射击组织，并且拒绝谈判，”巴解组织就不能参加谈判。他说这话是在以色列拒绝了阿拉法特提出的另一项通向相互承认的谈判建议几乎三年之后，而《时代周刊》拒绝报道这项建议。请注意：被拒绝了。在弗里德曼关于“现在就和平”组织的沮丧情绪的文章六天之前，发行量很大的以色列《晚报》的一个标题写道：“阿拉法特向以色列表示，他准备好进入直接谈判。”这个建议是在佩雷斯担任总理期间提出的。佩雷斯的媒体顾问证实了这个报道，评论说，“原则上反对任何与巴解组织的接触，这是来自这样一个信条，即巴解组织不能成为谈判的伙伴。”约西·贝林作为佩雷斯工党联盟中最鸽派的代表，观察到“这项建议……遭到拒绝是因为它看上去是建立直接联系的狡猾尝试，我们这时候还没有做好与任何巴解组织代表进行任何谈判的准备。”其他高官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立场。没有一个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尽管弗里德曼形单影

只地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一篇定期评论,对中东地区惟一的和平力量——缺乏任何阿拉伯的谈判伙伴——的痛苦命运表示哀悼。不久之后,他由于对中东的“平衡的和信息丰富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而这篇文章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例子,他还被任命为《时代周刊》的首席外交记者。^{②5}

有一个常见的术语形容华盛顿在国际孤立的情况下在阻止外交解决方面的成功:“和平进程”,这种术语的选择不会让奥韦尔感到惊讶。这种意义上的和平进程是得到两党支持的。这里有一个错觉,即老布什政府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的立场。^{②6}真相更接近于其反面。1989年12月政府的官方立场(贝克计划)是一个错觉,它毫无保留地支持了1989年5月以色列的佩雷斯-沙米尔联合政府提出的计划。那项计划宣布,不能允许有“另一个巴勒斯坦国……”(约旦已经是一个“巴勒斯坦国”),并且“除了与(以色列)政府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之外,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被占领土)的地位不能有任何改变”。以色列不会与巴解组织举行任何谈判。但是以色列将允许“自由选举”,在以色列的军事统治下举行,而许多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则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关在监狱里或是被驱逐出去。除了最后一条规定——被赞扬为是积极和友善的提议——之外,这项计划在美国没有得到报道。人民确实读到的是,贝克强烈地重申了美国对“为了换取和平的关系而完全从领土上撤军”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他悄悄地为一些计划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这些计划的目的是确保类似的事情没有一件会发生。^{②7}

贯穿第一次西岸起义的最初那几个月(1988年)始终,华盛顿越来越绝望地努力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阿拉法特并不愿意考虑一个外交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努力开始引来国际上的嘲讽。因此,里根政府同意接受阿拉法特长期以来的建议,并开始谈判。标准的阐释是,至少阿拉法特屈服于美国的坚定的和平和外交主张。华盛顿的实际反应——在美国没有得到报道——在谈判的第一议程中被明确表示出来:美国大使罗伯特·佩尔特罗告诉阿拉法特,他必须放弃召开国际会议的任何想法——因为国际共识的存在,这是不可接受的——并取消被占领土上的“叛乱”(西岸起义),“我们将其视为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为”。简而言之,巴解组织必须确保回到西岸起义前的现状,这样以色列能够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它在被占领土上的扩张和压迫。以色列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1989年2月,拉宾总理向“现在就和平”组织的一个代表团保证,谈判只是“低层次上的讨论”,会回避任何重要的问题,并给予以色列“至少一年的时间”通过武力解决问题。“领土的居民将遭受严厉的军事和经济压力”,拉宾解释说,并且“最后,他们会被摧毁”,并将接受以色列的条件。给美国公众的版本则完全不同。^⑧

补充242号决议的联合国大会的定期决议中的最近一项是在1990年12月以144票对2票通过的,它确定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力。几个星期后,美国与伊拉克交战,乔治·布什用四个简单的词胜利地宣告了新的世界秩序:“说到做到”,当然它在中东肯定是这样做了。整个世界理解了,也退缩了。最后,美国处于可以强行推行自己

单边拒绝主义立场的位置之上,它也是这么做的。第一次是在1991年后期的马德里,随后是在从1993年开始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的后续协议上。通过这些措施,“和平进程”开始向美国和以色列打算的班图斯坦式*的协议方向前进,正如它在文献记录中所清楚表现的那样,更为重要的是真实生活中的记录。

当然,这在1993年9月13日就很清楚了。当时拉宾和阿拉法特在嘹亮的喇叭声中在华盛顿正式接受了“原则宣言”(DOP)。在概括将来会发生的时候,原则宣言基本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²⁹自那以后,很少有惊人之事发生。

原则宣言声称,“永久地位”,也就是路的尽头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只建立在242号决议一项决议的基础之上。被压制的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那意味着什么。首先,242号决议在实际操作上意味着执行美国的版本:部分撤军,正如美国和以色列所决定的那样。其次,70年代中期以来外交活动的首要议题是,外交的解决方案是否仅仅建立在242号决议这一条决议的基础上——正如美国所坚持的那样,还是建立在由其他决议补充后的242号决议的基础上,这些补充建议要求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力,代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观点,但是被美国所阻止。原则宣言被明确地限制在华盛顿单边的拒绝主义的范围内。人们可以选择被蒙蔽——许多人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种选择是不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对受害人来说。

*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时期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划定的黑人居住地。——译者

阿拉法特被迫再一次“谴责恐怖主义”。惟一的目的是羞辱,不仅仅是对阿拉法特个人而言,而且是对巴勒斯坦人民而言,对于他们来说,他是民族主义的象征。^⑩

正如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1988 年 12 月告诉里根的那样,阿拉法特曾经结结巴巴地说过“大、大、大”“叔、叔、叔”,但是从来没有用适当的卑躬屈节的语气叫过“大叔”。这种对抵抗的权利作进一步谴责的重要性没有受到注意,因为在美国的教条框架内不存在这样的权利。这在 1989 年美国 and 巴解组织的谈判(没有得到报道)中被明确地表现出来,正如刚才所回顾的那样。在那之前的 1987 年 12 月,当时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它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决议,单单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因为这项决议支持“被武力剥夺了权利的人民的自决权、自由和独立权,正如联合国宪章里所规定的那样……尤其是那些处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指南非)政权之下和外国占领之下或是其他形式的殖民控制(指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下的人民”。^⑪美国成功有效地否决了这个决议,同样,在报道和历史记录中也做到了这点。这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美国终于姗姗来迟地放弃了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

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作出任何让步,以回报阿拉法特的屈服。

在所有的基本上,原则宣言将关于和平进程的美国版本结合在内。没有人能够真正指控以色列违反了奥斯陆协议,除了在一些细枝末节上。^⑫在没有违反原则宣言(或是被小心编写出来的后续决议)的措词的情况下,以色列继续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定居点,并

吞并被占领土。意图并没有被隐藏起来,它们被拉宾和佩雷斯公开宣布出来,并被他们及其继任者加以实施。^③

美以定居点计划的确切规模并不完全清楚,因为使用了掩盖它们的手段。定居者的领导人声称,自奥斯陆协议以来,定居者的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达到21万人(在阿拉伯人的东耶路撒冷的18万人没有被计算在内,东耶路撒冷事实上已经被吞并了,这违反了安理会的命令,但是得到美国的默许支持)。他们进一步报道说,10%的定居者保留了以色列的地址,因此并没有被计算在内。据报道,在2000年,在定居点的建设已经超出特拉维夫三倍多,超出耶路撒冷十倍多,整个来讲,远高于绿线(以色列认定的)之内的人口。人口增长和公共支出也高得多:被占领土上60%的建设是国家资助的,相比而言以色列境内是25%,并且政府所有机构都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鼓励定居点建设。^④

拉宾-佩雷斯方案是,在“冻结定居点”的政策下,定居点将被限制在“自然增长”上,这个方案也被他们的继任者和华盛顿所采纳。但是“有冻结,也有现实,”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还补充道,极右翼“很高兴采纳拉宾方案”——它是拉宾在接受原则宣言后不久启动的,也对巴拉克“大规模批准增加建造定居点”表示感激。以色列最杰出的外交记者阿基瓦·埃尔达写道,“根据官方统计,完全遵守(以色列-美国)方案意味着以色列宣布全面冻结,加上拆毁500套公寓。现在呢,有9844套新的(并且是空的)公寓或是已经完成,或是正在建设中……因此以色列人对美国的协议进行了嘲笑,而美国保持沉默”,并且还支

付现金。他补充说,宗教极端分子(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对希伯伦的计划包括在一个有很大价值的考古场所进行建设,这遭到考古委员会的38名资深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抗议,他们要求巴拉克取消建设计划(实际上在继续进行)。委员会主席谴责这些计划“严重违反了使对我们土地上的古老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和研究成为可能的法律和惯例”,摧毁了“我们祖辈和大卫王的希伯伦,(摧毁了)以色列土地上的历史和考古设施,(摧毁了)我们土地上以色列人民的过去。”并且,当然还继续剥夺和折磨作为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⑤

在2000年后期,当巴拉克的任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建设部长宣布说,在被占领土上有10000个单元的住宅正在兴建中,其中三分之二在城市定居点。住房部宣布,除了4月份宣布的向25条“支路”——一项旨在将定居点人口与以色列连成一体的高速公路体系,而与此同时使巴勒斯坦人口处于看不见和孤立的地位——提供相似金额之外,2001年将对建筑和基础设施提供2500万美元的补贴。“巴拉克政府给沙龙政府留下了一笔惊喜的遗产”,媒体在几个月后政府过渡时报道说,“自奥斯陆协议之前沙龙1992年担任建设和定居点部部长那段时间以来,被占领土上数量最大的住房建设开始了”。巴拉克政府的数字揭示出,从1993年到2000年,新建筑的比例稳步提高,2000年达到了1993年水平的5倍,1994年的3.5倍,在沙龙-佩雷斯政府领导下将进一步增加。^⑥2000年7月,以色列政府授予哈尔霍马地区522套新公寓的合同,这个项目位于从耶路撒冷东南部的一块阿拉伯飞地征用来的土地上,通过“城镇规划”(用犹太人取代阿拉

伯人的委婉说法,是美国的“城市规划”某些用法的残留),这一地区自1967年以色列被接管以来阿拉伯人已经丧失了其90%的土地。

贾巴尔·阿布·格内姆地区的哈尔霍马项目完成了以色列对被大大扩展的“耶路撒冷”地区的包围。这个项目在西蒙·佩雷斯的工党政府的最后几个月里开始启动,在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政府期间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强烈抗议而暂停,在巴拉克时期被积极予以恢复(在没有抗议的情况下)。然而,对以色列极右翼来说,工党的哈尔霍马项目远没有它的E-1项目来得意义重大,而后者很少公开。它包括将大耶路撒冷扩展到东边的马阿莱-奥杜敏(Ma'aleh Adumim)市的新的住房和公路建设,几乎将西岸地区一分为二。以色列议员迈克尔·克莱纳——扩张主义的“以色列土地阵线”的领导人——以非常赞赏的态度欢呼这个项目宣布的消息,他观察说,这个计划——“前住房部部长(沙龙-佩雷斯政府的现任国防部长)本雅明·本-埃利泽提出并得到伊扎克·拉宾批准的倡议”——是该阵线的要求中“最重要的”,更甚于哈尔霍马。^⑦

在沙龙-佩雷斯政府中,掩盖正在进行的项目和抵制国际抗议的任务分配给了佩雷斯。一项关于政府修建规模更大的定居点的项目的报道的标题是“佩雷斯抵制对定居点的国际反对”。佩雷斯重复了“自然增长”论调,目的是平息抗议,这是鸽派的传统贡献。^⑧

在1996年佩雷斯政府的最后几个月里,在宣布哈尔霍马计划和进一步实施向各个方向扩展大耶路撒冷以将马阿莱-奥杜敏(东面)、吉瓦特泽夫(Givat Ze'ev)(北部)、贝塔(Beitar)(南部)和更远的地区

包括在内的拉宾-佩雷斯项目时,住房部部长本-埃利泽阐述了基本原则。工党“做什么事都是悄悄的”,他解释说,在“(佩雷斯)总理的彻底保护下”,使用类似“自然增长”的字眼去取代“新的定居点”。工党的鸽派人物约西·贝林因为即将到任的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煽动性言论对其进行责难。他写道,拉宾政府在奥斯陆协议之后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即西岸)“增加了50%的定居点”,但是“我们安静和聪明地做到这点”,而你愚蠢地“每天早上宣布你的意图,吓唬巴勒斯坦人,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统一首都——所有以色列人都同意这点——这样一个话题转变为全世界辩论的对象”。

贝林的声明只有部分是准确的,“安静的智慧”远远超出耶路撒冷一个问题。^⑳ 风格上的差异可能可以被溯源到两个政治集团的选民之中。作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西方化精英的党,工党更适应于西方的规范,它明白,它的支持者倾向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利库德依靠粗暴的手段来取得基本同样的结果,这对西方的人道主义者而言是一种尴尬,有时候甚至导致冲突和烦恼。(见本章注释^㉑)

在美国的报道中,马阿莱-奥杜敏被称为“耶路撒冷的周边”之一。因此,当克林顿说到“是犹太人的就应该是以色列人的”时,没有什么比克林顿的最后建议更理所当然慷慨大方了。外国媒体评论道,他“没有提到”,“这会使以色列吞并它在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建造的定居点”,实际上在所有方向上都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但是这无关紧要。克林顿的“创造性妥协……”的伟大美德“是,我们现在至少知道,惟一现实的最后方案将会是什么样子,”托马斯·弗里德曼解释道。总统

已经发话了,还能够再说些什么呢?^④

那些仍然固执地坚持不满态度的人将会发现,马阿莱-奥杜敏将以色列规划中的分配给它的50 000德南*中的十六分之一用于“自然增长”,这是一个标准比例。马阿莱-奥杜敏的故事被以色列的人权组织“以色列被占领土人权信息中心”(B'Tselem)加以详细描述(见本章注释^③)。^④这个镇子是在70年代中期工党政府时期建立以来的,在“政府大量资源的帮助下”迅速成长起来,该镇的网页是这样报道的。官方的大耶路撒冷计划预计,从1994到2010年它将扩展285%,达到60 000名居民。它的土地将征用几个阿拉伯村子,包括阿布迪斯。根据鸽派的计划,通过一种语言上的小花招,阿布迪斯将成为巴勒斯坦的圣城(也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土地将被剥夺。与此相比,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将占据西岸相当大的一块地区。政府权威部门发现,那里存在犹太定居者“广泛分布的非法建筑”。“解决方法”很简单,正如在其他定居点那样:“给予事后追认,而不是拆除其结构。”当阿拉伯人非法建房——他们必须努力生存,因为对阿拉伯的建筑施加了苛刻的条件——的时候,解决的方法是拆除,有时候是以很野蛮的方式。

从1993年开始,为了使马阿莱-奥杜敏进一步向外扩张,以色列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将贾赫林(Jahalin)的贝都因人赶了出去。他们向

* 德南(Dunam),土耳其、南斯拉夫和某些近东国家使用的土地丈量单位。

——译者

“最高法院请愿”，努力“避免他们可怕的命运”，的确很可怕，而且显而易见。但是最高法院仍然固守顺从地服从政府权威的传统，虽然它表达了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希望，希望他们“手下留情”，放松这种驱逐行动。1999年11月，最高法院拒绝了巴勒斯坦人反对马阿莱-奥杜敏进一步扩张的另一项请愿，它建议说，这个全犹太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会给周围(巴勒斯坦村庄)的居民带来某些好处”。

以色列人权组织“以色列被占领土人权信息中心”(B'Tselem)得出结论，最终结果是，这里和被占领土各地一样，“无助的当地居民被完全置于占领方的军事力量为了促进其政治利益所设定的规定之下”。在奥斯陆和平进程期间，情况越来越是如此。

马阿莱-奥杜敏市政府解释说，“建立这个城镇的政治目标是在以色列首都东部沿着耶路撒冷-杰里科的地区建立定居点”，从而将拉马拉与伯利恒北部和南部的巴勒斯坦飞地分隔开来。随着“耶路撒冷”向南和向北扩展，美国-以色列的每一项和平计划都包括上述情况的某一形式。和以前一样，2001年1月最终的克林顿-巴拉克方案包括了北部的另一个突出部，将北部地区有效地分隔开来。这三块飞地被从以前的耶路撒冷地区分开，而它曾经是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传统中心。^⑫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被包围起来。这些建设包括“庞大的道路系统，大约400公里长，绕过了巴勒斯坦的人口中心，使定居者和保护他们的军事力量能够迅速和安全地穿越西岸地区”。^⑬迂回的道路系统建造在160000德南被征用的土地上，它还阻止了巴勒斯坦村庄的发展和扩张，阻碍了贸易和人员的流动，尽管阿拉伯人

能够在被官方称之为“巴勒斯坦道路”的道路上来往,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当危险的。拉马拉-伯利恒公路(如果克林顿-巴拉克方案或是类似计划被实施的话,它可能会被完全关闭)就是一个例子。此外,有“引路”通往犹太定居点,在定居点里有游泳池和灌溉良好的花园(巴勒斯坦的村子和城镇只有一点点水,在旱季经常连一点水也没有)。如果一名定居者走在引路上,所有的巴勒斯坦交通都要停止,“引起长时间的延误和许多的怨恨情绪”。以色列定期关闭道路进一步禁锢了巴勒斯坦人口,“经常防止或是大大延误了交通,甚至是在紧急情况下,如救护车”。^④以色列媒体报道了许多这种类型的残忍和故意羞辱的例子,人们可以想象,一支在没有约束情况下行动的占领军会如何行事。

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在美国批准和资助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批准和资助与关键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一起,通过各种渠道输送过来。美国还尽力确保,在当前冲突期间不断升级的国家恐怖主义将不受监督,也免受其禁令的影响。2001年3月27日,美国否决了安理会要求派遣国际观察员的决议。根据以色列媒体引用的欧洲方面的消息,这项建议被华盛顿的“四不政策”所“破坏”,这种政策“震惊了一起提出这项决议的四个欧洲国家的代表——爱尔兰、英国、挪威和法国”。美国反对任何提到“围困”一词,或是土地换和平原则,或是定居点,或是国际法和日内瓦公约的决议。阿拉伯人及其盟友已经放弃了它们自己的决议,希望欧洲能够“就这个方案与美国谈判”。一名美国外交官解释说,“美国相信,联合国应该置身于定居点的辩论之外”,并且“日内瓦公约的问题”应该能够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得到解

决,无需联合国卷入其中进行“预先的裁决”。^{④5}

日内瓦公约的问题特别重要。^{④6}这些条约是在二战之后被采纳的,以禁止纳粹的行为,包括将占领者的人口转移到被占土地上,或是任何伤害平民的行为。^{④7}监督公约遵守情况的责任被分配给国际红十字会,它已经认定,以色列的定居点项目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国际红十字会的立场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决议的支持。美国同样确认,公约适用于以色列占领的土地:由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1971年9月)所确认。而且美国也加入了被一致通过的安理会465号决议(1980年),该决议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是对该公约的“公然违反”。即使克林顿也不愿采取公开支持的立场,支持这种明目张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核心部分的行为。因此当安理会在2000年10月要求以色列“谨守日内瓦第四公约之下的责任”——它正再次公然违反——的时候,美国投了弃权票。(1323号决议,以14票对0票通过)。

按照这些公约,包括欧洲大国和美国在内的缔约方的责任是“在所有情况下”“尊重和确保尊重”公约。国际红十字会决定,他们“应该尽一切能力确保支撑公约的人道主义原则得到普遍适用”。因此,防止建立定居点和征用土地,防止集体惩罚和其他的胁迫、压迫和暴力措施是华盛顿的责任。国际红十字会还决定(2001年2月),以色列的关闭和封锁行为是对公约义务的违反,更不用说它滥用武力以及非法使用武力的行为。这些行为反复遭到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地方每一个重要的人权组织的谴责,联合国也在一项欧洲提出的决议中加

以谴责,它得到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一致通过。⁴⁸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也明确违反了作为缔约方的义务。它非但没有像要求它履行的那样确保他人对公约的尊重,而且还积极地参加了违反它的活动。所有在被占领土上的重大的美以联合活动都绝对地违反了国际法。克林顿和巴拉克提出的让步被确认为是惟一“现实的”计划,并由于他们的宽宏大量和慷慨精神而获得了这么多的赞扬,但是这些让步并不存在,不会比俄罗斯人和德国人的情况好到哪里去:俄国在撤出阿富汗的时候,能够作出“慷慨的让步”,而德国人在被从占领下的法国赶出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即使讨论特定的安排也几乎是不必要的,尽管它们所处的基本的道德基础不同。

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华盛顿要压制任何提及日内瓦公约的问题,为什么媒体如此全面地进行合作——甚至达到这种地步,即告诉读者“有争议的领土”应该被认为是被巴勒斯坦人占领的土地?对于巴勒斯坦人和除了以色列及其超级大国保护人之外的所有人而言,这个理由是足够正确的。

在以色列国内存在着几股相当重要的力量,他们长期赞成在被占领土上建立某种形式的巴勒斯坦国。最突出的力量是以色列的企业家,他们甚至在奥斯陆协议之前就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企业家协会主席多夫·洛特曼建议采取当时正处于谈判中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从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转变”,工党杂志的一名工人记者评论说,“情况类似于法国和它在非洲的许多前殖民地的关系”。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行动协调员解释说,他的工作的目

标是“将该领土的经济与以色列的经济一体化”。^④一种班图斯坦式的小国家将允许以色列的公司将装配工厂设在边界的巴勒斯坦一边，它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而无需担心环境和其他因素对获取利润的制约，它还缓解了那些被讥笑为“美丽心灵”的人的担心，他们可能会调查对待工人的方式，并呼吁最低限度的体面条件和工资。

再回到北美自由贸易区模式，一个分开独立的国家会为反对以色列工人阶级提供一件有用的武器，提供限制他们工资和福利并且削弱工会的途径。很多方面与美国一样，美国的制造商在海外发展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它们可以被用来破坏罢工，通过威胁向墨西哥“转移”以瓦解工会的组织活动。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项重要结果，很可能给以色列的制造商留下了深刻印象。^⑤“发展城镇”和阿拉伯地区的贫穷以色列工人会受到特别的影响，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期间，以色列的码头工人开展斗争，反对港口私有化，反对取消集体谈判协议，这种协议支持他们已赢得的权利。雇主协会试图通过将货船转向埃及和塞浦路斯来打破罢工，但是付出了巨大的运输代价。一个位于加沙的港口将是理想的。在标准的新殖民主义的当地政府的合作下，港口操作可以转移到那里，罢工就会被打破，并且以色列的港口会被转交到不负责任的私人手中。^⑥

随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贫困水平、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以及过去运转良好的社会体系遭到侵蚀等情况的出现，以色列开始显示出与美国相似的地方，这毫不奇怪。如同在美国

一样,经济严重依赖于富有活力的国有部门,有时候隐藏在军工企业的名义之下。同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是,美国应该赞成那些使它的前哨基地非常类似于保护者自身的安排。

反对领土扩张也有民族主义的原因。对“人口危机”的担忧在增长,它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同的出生率所造成的(在犹太人口中,世俗和宗教人口的出生率也有不同)。人口预测显示,无需经过太长时间,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极端宗教的犹太人——许多是非锡安主义者——将成为人口中的主要部分。研究这个问题的著名人士于2001年3月召开了一次会议,它受到了媒体相当大的关注。同样,媒体也相当关注受人尊敬的分析家什洛莫·加齐特的呼吁。他呼吁建立临时的独裁统治,以实施严厉的内部措施来处理“人口危险”,他认为这是“以色列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出了一个强烈的呼吁,要求彻底撤出被占领土,这与克林顿-巴拉克方案或是其他计划有所不同。^②

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根本含义得到以色列鸽派的杰出人士的充分理解。就在作为内政部长加入巴拉克政府之前,历史学家什洛莫·本-阿米在一家学术研究刊物上发表评论道,“实际上,奥斯陆协议建立在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方的生活永远依赖于另一方的基础上。”为了这些目标,克林顿-拉宾-佩雷斯协议旨在将“对以色列几乎完全的依赖”强加给巴勒斯坦人,创造出“一个扩展出来的殖民状况,”这种状况预计将成为“一种依附状况”的“永久基础”。本-阿米随后成为首席谈判代表和巴拉克方案的设计者。^③

一步接着一步,美国和以色列努力了三十年建立起一个永久的新殖民依附体系。当“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后,这项工程采取了新的形式,原则宣言中提出了它所依据的路线,并且在后续的各项临时过渡协议中被非常详细地列出。这些计划都在定居点和建设项目中得到贯彻,不管谁当政,这些项目都获得了实施。在工党鸽派当政时期,执行经常是最有效的,他们更少受到批评。自始至终,这些计划及其实施情况至关重要地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外交和财政支持,而可以表达意见的受过教育的舆论的支持也并不是不重要的。



1986年初版序言

- ① “Origins and Fundamental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 UN Secretariat, reprinted in M. Cherif Bassiouni, ed. ,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Crimes* (Charles Thomas, 1975).
- ② Claire Sterling, Walter Laqueur; see chapter 5. For references and discussion, see m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TNCW)* (Pantheon, 1982), 47f. , and my chapter in Chomsky, Jonathan Steele and John Gittings, *Superpowers in Collision* (Penguin, 1982, revised edition, 1984). For extensive discussion and documentation on the topic, see Edward S. Herman, *The Real Terror Network* (South End Press, 1982).
- ③ 更为严重的侵略罪行属于另一个不同的范围,如美国对南越以及随后对整个中南半岛的袭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在美国的支持下,其代理人印尼和以色列分别对帝汶和黎巴嫩的入侵等。有时候这些范围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们随后将谈到某些个案。
- ④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1985; *Time*, October 11, 1982; Goodma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1984.
- ⑤ See references of note 3, and chapter 5, pp. 130 - 2.
- ⑥ *Economist*, June 14; Victoria Brittain, *Guardian*, June 6; Anthony Robinson, *Financial Times*, June 7, 1986, 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这一报道也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报道中播出。这艘沉船是一艘古巴的食品船。还可参见 *Israeli Foreign*

Affairs, July 1986.

- ⑦ *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以及列在杂志索引中的各新闻周刊和其他报刊对此一点都没有提及。*Washington Post* 6月8日从莫斯科发回了一条120字的小条目,报道了苏联对南非袭击的谴责。
- ⑧ 该事件的背景是,1976年10月一架古巴客机在飞行中被一颗炸弹炸毁,73人遇难,包括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古巴击剑队全体队员(可以与“慕尼黑惨案”的真实事件相比较,它是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顶峰之一)。这次恐怖主义行动可被追溯到奥兰多·博什(Orlando Bosch)身上,他可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分子之一,在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战争方面,他与他的亲密随从曾经受过中央情报局的培训,他“与智利和委内瑞拉的秘密警察有密切关系,并领取他们的薪水。”同样,这些秘密警察“曾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指导,并在今天仍然与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Herman, *Real Terror Network*, 63)美国的反应会如何呢?这个问题是学术上的,因为出现在委内瑞拉附近的第一个古巴士兵就可能会引发对哈瓦那的大规模袭击。关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见第二章和引用的参考文献。在(未经挑衅和出乎意料的)以色列对驻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部队发动袭击期间,200名“在叙利亚防空部队的地域中执行任务的”俄国人被杀,这一数字是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1983年12月12日给出的。叙利亚部队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同意的情况下进入黎巴嫩的,并预定于1986年的夏末结束6

年的驻扎。关于这些事件,见我的 *Fateful Triangle* (South End Press, 1983)。

⑨ 关于现实世界,见 Gabriel Kolko, *Politics of War* (Random House, 1968)。它是经典的,并且依然是无法超越的阐释,尽管之后有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见 TNCW; 以及我著的 *Turning the Tide* (South End Press, 1985) 和引用的资料。更多的最新资料见 Melvyn Leffler, “Adherence to Agreements: Yalta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arly Cold War”, 载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6 年夏季号。莱弗勒的结论是,“实际上,苏联遵守(雅尔塔、波茨坦和其他战时协议)的模式与美国的模式并没有质的差别”。应该指出的是,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在希腊和南朝鲜,美国组织了大屠杀行动,作为摧毁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全球项目的一部分,这经常有利于与纳粹和日本人狼狈为奸者。

⑩ 公开的苏联档案显示,“在对德胜利很早之前,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就曾经支持乌克兰和波兰针对苏联军队的地下叛乱活动”,束缚住了数十万苏军部队的手脚,杀害了数千名军官,因而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将欧洲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进程,其严重的后果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无须进行讨论。这种支持在战后仍然在继续,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见 Jeffrey Burds, “The Early Cold War in Soviet West Ukraine, 1944—1948”, *The Carl Beck Papers* No. 1505, January 2001, 匹兹堡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这些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在公布和至少是已知的俄罗斯档案中最重要

的发现。

- ⑪ See *TNCW*, chapter 3, and my introduction to Morris Morley and James Petras,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Nicaragua* (Monograph Series No. 1, Institute for Media Analysis, New York, 1987).
- ⑫ 在美国和在由以色列为未来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所组织的一系列会议中,其基础已经被奠定下来,以色列对这种宣传运动有着明显的兴趣。第二届由以色列组织的关于恐怖主义的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在对此次会议进行评论时,Wolf Blitzer 观察到,会议集中于阿拉伯的恐怖主义,许多著名的演讲者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和侵略(特别是它 1982 年对黎巴嫩的人侵)的热情支持,以上两点为“以色列自己在美国的哈斯巴拉(*Hasbara*)运动明显(提供了)主要的推动力,正如它被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所承认的那样”(Blitzer, *Jerusalem Post*, June 29, 1984);“哈斯巴拉”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解释”,是描述以色列宣传的一个术语,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既然以色列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都是如此明白和正确,只需要解释就够了。宣传是为那些需要隐藏某些东西的人所需要的。更多关于会议上表达出来的看法,见第三章的第 20 条注释。
- ⑬ 肯尼迪的计划只限于里根的日程上的第二和第三条;第一条在国会的民主党人的支持下成为法律,明显违反了公众的意愿,反映了两届政府之间的岁月中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追求“国内的伟大社会和国外的宏伟计划”不再现实,这是肯尼迪的顾问沃尔特·海

勒的话,所以前者必须加以抛弃。在公众态度上,见 *Turning the Tide* 第五章,以及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 *Atlantic Monthly*, May 1986。关于里根的计划与卡特政府后几个阶段的那些计划——里根分子所扩展的——的关系,见 *TNCW* 第七章和 *Turning the Tide* 第四和第五章。也见 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 *Inequity and Intervention* (South End Press, 1986)。

- ⑭ 有关这些问题,见 *TNCW*, 特别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人权项目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公众意识发生变化的一项国会倡议,尽管出于宣传的目的和伪善的应用——它始终回避附庸国的暴行,而这恰好与标准指控相对立——被加以利用。见 Chomsky and Herman,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特别是第一卷。

- ⑮ *World Press Review*, February 1986.

2002 年版导言

- ① Technical study cited by Charles Glaser and Steve Fetter,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nd the Future of U. S. Nuclear Weapons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1, Summer 2001.
- ② See Strobe Talbott and Nayan Chanda, *The Age of Terror* (Basic Books and Yale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2001).
- ③ 见下,以资鉴别。更多这里未曾引用的细节和来源,见下面几章。

关于更早一段时期的国际恐怖主义,见 Chomsky and Her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South End Press, 1979, 两卷本)。对于第一阶段“反恐战争”的总体评论,见 Alexander George 编,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Polity/Blackwell 1991)。

- ④ Andrew Bounds, “How the Land of Maize [Guatemala] became a Land of Starvation,” *Financial Times*, June 11, 2002.
- ⑤ Carothers, “The Reagan Years,” in Abraham Lowenthal, ed., *Exporting Democrac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ovember 15, 1998.
- ⑥ 2002年5月,我倾听了农业工人和当地居民数小时有关他们痛苦经历的个人证词。由于化学杀虫剂摧毁了他们丰富和多种多样的农作物,毒害了他们的孩子,污染了土地,杀害了他们的动物;跨国公司随意掠夺土地上的资源,他们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最终,在生物多样性和成功的农民农业的悠久传统被摧毁后,可能成为由孟山都公司提供种子的出口农业。这是在考卡(Cauca),那里穷困的人民成功地选出了自己的州长,他是一个自豪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本地领导人,可能是西半球的第一位这样的领导人。这一社会集团的成功导致了准军事武装的恐怖活动和对游击队的镇压行动的急剧增加,以及被杀虫剂毒化的地区的急剧增加,这些地区甚至没有被调查过,不知道是否有古柯叶和罂粟在咖啡和其他作物

丛中生长,所有作物都被摧毁了。2001年,考卡地区在违反人权方面赢得了第一的位置,在这个恐怖主义国家内这不是一个小成就。正是这种想法——美国有权摧毁在某个其他国家中它所不喜欢的作物——在这个恐怖主义的超级大国内被想当然地予以接受,但是这种想法是如此稀奇以至于评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没有人有权利摧毁在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生产的更为致命的物品。

- ⑦ 2002年2月,我曾经有机会在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库尔德人的准官方首府的城市——目睹了一些直接的影响。正如在哥伦比亚一样,令人鼓舞的是看到了受害者们和那些城市知识分子们的勇气,这些知识分子支持受害者,并坚持不懈地与那些严酷的法令与实践进行对抗,他们面临着可能是极端严厉的惩罚。
- ⑧ 关于评论,可见我的 *New Military Humanism* (Common Courage, 1999),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Verso, 2000) 和 *Rogue States* (South End Press, 2000)。见人权观察组织 (HRW), *The Sixth Division: Military-paramilitary Ties and U. S. Policy in Colombia* (September 2001)。也见 *Crisis in Colombia*, 由人权观察组织、大赦国际以及华盛顿拉丁美洲事务办公室为国会的证明听证会所准备的,它是一份关于哥伦比亚军队的罪行及其免受罪责情况的极其详细的回顾。这份记录再次被国务院所忽略,它肯定了哥伦比亚,其根据是人权情况的“改善”,政府经常性地看到这种改善,虽然在这个附庸国内任何其他

人都没有看到。

- ⑨ Judith Miller,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0, 第一页的文章在不进行评论的情况下报道了国务院关于恐怖主义的最新报告, 报告还因为在反恐方面的成就而特别指出了其他两个首要的恐怖主义国家(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Steven Cook, “U. S. -Turkey Relations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分析报告见第9篇论文, *America's Response to Terrorism*, November 6, 2001, Brookings.
- ⑩ 见注释⑧的说明。对当前阶段的“反恐战争”的更多广泛评论, 见我的著作 *9 - 11 (Seven Stories)*, 2001) 以及我在 Ken Booth and Tim Dunne 编的 *Worlds in Collision* (Palgrave, 2002) 和 James Sterba 编的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Oxford, 2002) 两书中的文章。
- ⑪ Yossi Beilin, *Mehiro shel Ihud* (Revivim, 1985), 42; 工党主持的一份对内阁记录的重要回顾。对于下文的更多细节, 见我的 *Fateful Triangle* (South End Press, 1983; updated edition, 1999), 以下章节: 4, 5. 1, 3, 5。
- ⑫ Justin Huggler and Phil Reeves, *Independent*, April 25, 2002.
- ⑬ Beilin, *Mehiro shel Ihud*, 147.
- ⑭ 关于取自以色列国内的希伯来语媒体的报道, 即对由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以及这种罪行几乎不受惩罚的报道, 见我的 *Necessary Illusions* (South End Press, 1989), 附录4. 1。也见 *Fateful Triangle* 第八章, 包括刊登在希伯来语媒体上的某

些个人的观察。有关反应的情况,开始的时候是有些不相信,直到他最终在一份基布兹的杂志上发现了更为可怕的确凿证据,见 Boaz Evron, *Yediot Ahronot*, August 26, 1988。至于广泛的讨论和分析,见 Zachary Lockman and Joel Beinin 编, *Intifada* (South End Press, 1989); Joost Hiltermann, *Behind the Intifada* (Princeton, 1991); Patricia Strum, *The Women are Marching* (Lawrence Hill, 1992)。

- ⑮ See essays by Mouin Rabbani, Sara Roy, and others in Roane Carey, ed., *The New Intifada* (Verso, 2001); and Roy,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2001.
- ⑯ Brian Whitaker, *Guardian*, May 22, 2002.
- ⑰ Armev, CNBC, "Hardball," May 1, 2002. Lewis, "Solving the Insolubl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98. 执政的时候和佩雷斯一样,拉宾也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
- ⑱ Clive Ponting, *Churchill* (Sinclair-Stevenson 1994), 132;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Houghton Mifflin, 1951), 382.
- ⑲ Piero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2), 16, 22, 26, 从解密的档案中引述了肯尼迪、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63*, vol. VIII, American Republics, 13ff.
- ⑳ Patrick Tyler,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John Donnelly,

Boston Globe, April 28, 2002.

- ② David Johnston, Don Van Natta Jr. and Judith Miller, “Qaeda’s New Links Increase Threats From Far-Flung Sites,”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02. Chapter 6, note 3, below.

第一章

- ① 关于这里讨论的问题,见 *TNCW*,特别是第一和第二章。
- ② Cited by Richard Fox, *Reinhold Niebuhr* (Pantheon,1985), 138.
- ③ John Dill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2, 1986.
- ④ “全体美国人中的大多数赞成沙特的和平计划”(Mark Sappenfield 对民意调查结果的报道,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15, 2002)。这项计划于 2002 年 3 月被阿拉伯国家所采纳,重申了对两个国家政治解决方案的呼吁,这个方案根据的是 1976 年以来占据主流的国际共识,而华盛顿则继续加以反对。
- ⑤ *New York Times*, June 2, 1985.
- ⑥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85.
- ⑦ See *TNCW*,267, 300, 461; *FT*, 67, 189.
- ⑧ Rabin, *The Rabin Memoirs* (Little, Brown,1979,332)。与他的温和立场保持一致的是,拉宾相信,“来自加沙地带和西岸的难民”应该被迁往约旦的东部。有代表性的引用,可见 *TNCW*,234。有一种概念长期存在,即将“转移”当地人口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对于这个概念以及它目前的各种不同版本,见 *FT*;例如,这些版本

中包括种族主义者卡亨(Rabbi Kahane)提出的,或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提出的,他建议说,那些“国家的边缘人”——也就是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应该被帮助“离开”。“国家的边缘人”这一措辞掀开了遮在标准的民主原则和主流锡安主义及其在以色列的实现方式之间矛盾上的遮羞布。见 TNCW 和 FT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这在美国基本上是无人在意的。

- ⑨ 弗里德曼(Friedman)在 1982 年战争期间从黎巴嫩以及有时候也从以色列提供了严肃和专业的报道,例如,可见他于 1986 年 4 月 5 日关于加沙地带的报道。
- ⑩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7, 1984,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85;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85.
- ⑪ 细节见第二章注释⑤⑧和正文。关于对非奥威尔主义意义上——也就是说,在真实的世界中——的“和平进程”和“拒绝主义”的更广泛讨论,以及对教条主义体系成功地将事实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的更广泛讨论,见 FT。
- ⑫ 更广泛的讨论见我对基辛格回忆录的评论,重印于 TNCW。
- ⑬ 萨达特的提议是对他所接受的联合国特使雅林(Gunnar Jarring)的建议的回应。以色列在官方上承认这是一项认真的和平提议,但是更倾向于领土扩张而非和平。当雅林于 2002 年 5 月 29 日逝世的时候,美国主要报纸都刊登了讣告,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被忽略了。只有一家报纸是例外,*Los Angeles Times* 错误

地声称,双方都拒绝接受雅林的建议(Dennis Mclellan, June 1, 2002,重印于 *Boston Globe*)。

- ⑭ Eric Pac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1981.
- ⑮ 讨论见 TTT 和我的刊登在 *U. S.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New Righ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sychohistory Review* 15. 2, 1987 年冬季号(Lawrence Friedman 编), 以及 Thomas Walker 编 *Reagan vs. The Sandinistas* (Westview, 1987) 上的文章。也见我对 Morley and Petras 所著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一书的介绍。在这些问题上的欺骗记录令人印象深刻。
- ⑯ 关于这些问题,包括“战略资产”概念的起源、导致 1979 年戴维营协议的 1973 年后的数次谈判以及削弱 1982 年 9 月的“里根计划”和数月之后关于黎巴嫩的“舒尔茨计划”的美国的直接行动等,见 *FT*。这一现实——当时非常地清楚——与媒体和大多数的学术作品反复阐述的版本相当不同,尽管数年之后有时候得到了部分的承认;例如,见第二章,注释④⑦及其文字说明。
- ⑰ Rubinstein, *Davar*,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Labor Party, August 5, 1983.
- ⑱ General (ret.) Mattityahu Peled, “American Jewry: ‘More Israeli than Israelis’,” *New Outlook*, May-June 1975.
- ⑲ Pail, “Zionism in Danger of Cancer,” *New Outlook*, October-December 1983, January 1984.

- ⑳ 细节见 *TNCW*, 247f.。关于新的立法, 见 Aryeh Rubinstein, *Jerusalem Post*, 1985 年 11 月 14 日。关于比较以色列的法律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些以色列方面的评论, 见 Ori Shohet, “没有人应该种番茄……”, *Ha'aretz* 增刊(1985 年 9 月 27 日, 翻译自 *News From Within*(耶路撒冷), 1986 年 6 月 23 日), 它讨论了那些用于保证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和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在土地和其他权利上受到歧视的方法。文章的题目指的是一种军事规定, 它要求西岸的阿拉伯人在种植水果树或蔬菜时要获得许可证, 这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使得以色列人在缺少足够名义的情况下接管被占领土上的土地。
- ㉑ Pual Berman, “The Anti-imperialism of Fools,” *Village Voice*, 1986 年 4 月 22 日, 引用了伯纳德·刘易斯在 *New York Review* 上“一篇有灵感的文章”, 它详细阐明了这项方便的教条。关于反犹主义概念其他的本土应用, 见 *FT*, 14f.。关于杜阿玛 (Doueimah) 大屠杀, 见 *TTT*, 第 76 页。
- ㉒ Analyst, *Pentagon Papers* (Gravel edition, Beacon Press 1971, II. 22.)。美国的军事威胁——正如被承认的那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使得美国的创造阻止了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准备的政治解决方案。
- ㉓ For discussion, see *TNCW* and my *For Reasons of State* (Pantheon, 1973).
- ㉔ Julia Preston, *Boston Globe*, February 9, 1986.

- ②⑤ 关于这些问题上的讨论,见注释①⑤的参考文献。争论点在于国家级论坛上可许可的表达范围问题,而不是个人的贡献问题,后者应该根据自身的功过加以判断。
- ②⑥ 例如,见 Timothy Garton Ash, “New Orthodoxies”, *Spectator* (London), 1986年7月19日。令人发笑的“围绕美国的‘道德等值’的辩论”(只有一方能够进行公开表达,尽管它努力地假称事情并非如此)值得进行单独的讨论。
- ②⑦ Shaul Bakhas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4, 1986.
- ②⑧ “Non-Orwellian Propaganda Systems,” *Thoreau Quarterly* 1984年冬/春季号。更多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见此处重版的我对一群记者的谈话以及随后的讨论。
- ②⑨ Reich, *New York Times*, July 24; Heller,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86.
- ③⑩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86.

第二章

- ①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18, 1985.
- ② *Ha'aretz*, March 22, 1985; for other sources, see *FT*, 54, 75, 202.
- ③ Herzog, Yossi Beilin, *Mechiro Shel Ihud* (Tel Aviv, 1985), 147. Gazit, *Hamakel Vehagezer* (Tel Aviv, 1985), 引自 *Al Hamishmar*, 1985年11月7日。Rabin, *Washington Post*, 12月6

日; *Newsweek* 1975年12月15日; *TNCW*, 267-268。当我提到里根的时候,我说的并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而是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们和公共关系专家们。

- ④ *Yediot Ahronot*, November 15, 1985.
- ⑤ Ze'ev Schiff, *Ha'aretz*, 1985年2月8日;有关信息见 *FT*, 包括参与者的证词,它们未在得到美国报道;为以色列恐怖行为辩护的人对事实的否认,其根据是媒体是反犹太主义和“亲巴解组织”的,当时“阿拉伯人夸大了”和“没有丝毫责任归于”“阿拉伯文化”。(Martin Peretz;后一种观点出现在1983年8月29日的 *New Republic*。)
- ⑥ See note 48, below.
- ⑦ Godfrey Jansen,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October 11, 1985, citing *LAT*, October 3.
- ⑧ 见 *Against the Current*, January 1986。
- ⑨ Cf. *FT*, 127, 176.
- ⑩ Bernard Gwertzma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7, 1985.
- ⑪ Beverly Beyette, *Los Angeles Time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rrorism,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9, 1986.
- ⑫ Edward Schumach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2, 1985.
- ⑬ *New Republic*, October 21, 1985, January 20, 1986; Associated Press, April 4, 1986.
- ⑭ Robert McFadden, “Terror in 1985: Brutal Attacks, Tough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1985.

- ⑮ 合众社、LAT, 1985年12月28日; McFadden, “Terror in 1985”, Dershowitz, *New York Times*, 1985年10月17日; Alexander Cockburn, *Nation*, 1985年11月2日, 据我所知, 这是提到这种可耻的伪善的惟一一次。
- ⑯ Ross Gelbspan, *Boston Globe*, 1985年12月16日。关于反政府军的暴行, 见美洲观察组织的定期报道和大量其他仔细和详细的调查。其中包括, *Report of Donald T. Fox, Esq. and Prof. Michael J. Glennon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Group and the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n*, 1985年4月。它们引用了国务院一名高官的话, 他将美国的立场称之为“国际无知”的一种。这种广泛和令人恐惧的记录也基本上被媒体和其他人所漠视, 甚至被西方暴行的辩护者简单地加以否认(在没有证据的借口下)。例如, Robert Conquest, “Laying Propaganda on Thick,” *Daily Telegraph* (London), 1986年4月19日, 他使我们确信, Oxfam 和其他人提出的指控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是“愚蠢的”。康圭斯特(Conquest)以他对共产主义罪行的曝光以及对那些拒绝承认这些罪行的辩护者的尖刻谴责而闻名于世。也见 Gary Moore, *National Interest* 1986年夏季号, 传递的是相似的信息。或是 Jeane Kirkpatrick (*Boston Globe*, March 16, 1986), 她告诉我们, “反政府军在努力避免伤害平民方面记录良好。他们的作为根本无法和桑地诺政府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方面的

系统化的野蛮行径相比”；类似的谎言和为苏联暴行所作的辩护在媒体上可能一刻也不会得到容忍。同样见注释⑭以及第三章注释⑭。通常的步骤不是去否认，而仅仅是忽略由西方代理人或是附庸所犯下的罪行。为了达到喜剧性的解脱，人们可以转向致力于编造以下说法的大型产业的产品，这些说法是，美国暴力的批评者们拒绝或是忽视了对官方敌人所犯下暴行的报告。举一些例子，包括那些相当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见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 第二卷；我的文章“Decade of Genocide in Review,” *Inside Asia* (London) 1985年2月—3月（再版于 James Peck 所编 *The Chomsky Reader* (Pantheon, 1987)，以及“Visions of Righteousness,” *Cultural Critique*, 1986年春季号；Christopher Hitchens, “The Chorus and Cassandra,” *Grand Street*, 1985年秋季号。

⑰ *New York Times*, June 29, 1985.

⑱ 同样也在以色列。在他掌权之后，监狱中动用酷刑、行政拘留，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驱逐和查封房屋等事件在上升，这些行为在前任工党政府之下也司空见惯，并且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左翼自由派的美国舆论的赞赏，但是在梅纳赫姆·贝京政府下被减少或是中止了。Danny Rubinstein, *Davar*, February 4, 1986; Eti Ronel, *Al Hamishmar*, June 11, 1986。关于酷刑，见 *Ha'aretz*, February 24, 1986；以及 Ghadda Abu Jaber, *1985 Policy of Torture Renewed*,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Center, Jerusalem,

February, 1986; *Koteret Rashit*, May 7, 1986。也参见 Amnesty International, "Town Arrest Orders in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October 2, 1984。

- ①⑨ Curtis Wilkie, *Boston Globe*, March 10; Julie Flint, *Guardian* (London), March 13; Jim Muir,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March 22; Breindel, *New York Times* Op-Ed, March 28; Nora Boustan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2, 1985. A photo of the wall graffiti appears in Joseph Schechia, *The Iron Fist* (ADC, Washington, 1985).
- ②⑩ *Guardian* (London), March 2, 6, 1985.
- ②① Ilya,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7, 1985; Magnus Linklater, Isabel Hilton and Neal Ascherson, *The Fourth Reich*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84, 111); *Der Spiegel*, April 21, 1986 (see chapter 3);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85.
- ②② Ihsan Hijazi,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86.
- ②③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30, 1986.
- ②④ 详细的考察见 FT。或进行比较,例如,比较出现在 *Newsweek* 的报道与 Tony Clifton 局长在他的 *God Cried* (Clifton and Catherine Leroy, Quartet, 1983, London) 一书中所描述的情况。或是考虑一下 Dov Yermiya 上校的 *My War Diary* 一书,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创立者之一,这本书是在违反以色列的审查制度的情况下出版的(参见 FT,书内进行了大量的引述),随后被翻译成英语(South

End Press, 1983), 但是它在媒体中完全被忽略了, 尽管它明显是一本很重要的作品。还有大量的其他例子。

- ②⑤ Landrum Bolling 编, *Reporters Under Fire* (Westview, 1985)。举例而言, 包括在其中的有对反诽谤联盟的媒体的批评, 以及其他的指控, 它们很难说是荒唐的(见 *FT* 对这些文件的分析), 但是没有包括美国阿拉伯人反歧视委员会的一项研究, 它提供了在对战争进行媒体报道过程中的“前后一致的亲以色列偏见”的证据。
- ②⑥ Kifner,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Muir,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February 22, 1985; Mary Curtiu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22; Jim Yami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5; Yamin, interview, *MERIP Reports*, June 1985; David Hirst, *Guardian* (London), April 2; Robert Fisk, *Times* (London), April 26, 27; *Philadelphia Inquirer*, April 28, 1985. On Israeli efforts to fuel hostilities in the Chouf region from mid-1982, see *FT*, 418f.
- ②⑦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March 22, 1985.
- ②⑧ UPI, *Boston Globe*, September 22, 1984; Olmert, interview, *Al Hamishmar*, January 27, 1984; Hirsh Goodman,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10, 1984; Wieseltier, *New Republic*, April 8, 1985; on Hasbara, see preface, note 15.
- ②⑨ Don Oberdorder, “The Mind of George Schultz,” *Washington Post Weekly*, February 17, 1986; Rubin, *New Republic*, June 2,

1986;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86,还有许多其他报道。像 Wieseltier 一样, Rubin 断言,这种叙利亚支持的“恐怖主义……不是对西方无力追求和平的义愤填膺,而是完全阻止外交努力的企图”,因为“几乎任何可以想象的解决方案都是对叙利亚政府的一种诅咒”。Rubin 知道,叙利亚支持接近于国际共识的外交解决方案,但是因为这些方案远离了美国的拒绝主义,它们是“不可想象的”,并且不能被当作是“外交选择”;见第一章;关于黎巴嫩人的想法,见第五章注释②。

③⑩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8, 1985.

③⑪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1985.

③⑫ Ze'ev Schiff, "The Terror of Rabin and Berri," *Ha'aretz*, March 8, 1985; also General Ori Or, commander of the IDF northern command, IDF radio; FBIS, 15 April, 1985.

③⑬ Gershom Schocken, editor of *Ha'aretz*,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4.

③⑭ Shimon Peres,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83. On the atrocities in Khiam, see *TNCW*, 396 - 7; *FT*, 191; Yoram Hamizrahi, *Davar*, June 7, 1984; press reports cited in the Israeli Democratic Front publication *Nisayon Leretsach-Am Bilvanon: 1982* (Tel Aviv, 1983).

③⑮ Jim Muir, *Sunday Times* (London), April 14, 198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15, 1985; Joel Greenberg, *Christian*

-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30, 1986; Sonia Dayan, Paul Kessler and Géraud de la Pradelle, *Le Monde diplomatique*, April 1986; Menachem Horowitz, *Ha'aretz*, June 30, 1986.
- ③⑥ *Information Bulletin 21*, 1985, 关于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囚犯、流放者和失踪人员的国际信息中心, 巴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巴黎, 1986年7月)。关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管理的囚犯, 见 *FT*, 23ff.。
- ③⑦ Benny Morris and David Bernstein, *Jerusalem Post*, July 23, 1982 以色列记者对巴解组织管理下的生活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基督教盟友管理下的生活之间进行了比较, 他们给出的图景与美国的标准图景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比较可参见 *FT*, 186f.。特别有意义的是以色列记者 Attallah Mansour 从黎巴嫩发回的关于马龙派地区的报道。更多关于奈巴提亚 (Nabatiya) 的说明, 见 *FT*, 第 70, 187 页。
- ③⑧ *Economist*, November 19, 1977.
- ③⑨ John Cooley, in Edward Haley and Lewis Snider, eds, *Lebanon in Crisis* (Syracuse, 1979). See *TNCW*, 321; *FT*, 70, 84.
- ④⑩ Edward Haley, *Qaddafi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9* (Praeger, 1984), 74.
- ④⑪ James Markham,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75.
- ④⑫ AP,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Julie Flint, *Guardian* (London), February 24; Ihsan Hijazi,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AP, February 20, 1986. 据我所知,美国国内惟一的详细叙述是由 Nora Boustany 所写, *Washington Post*, 3月1日, 尽管很大程度上略去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作用, 可能是编辑所为, 因为现场报道者相当清楚发生了什么, 包括以色列的武装直升机杀害逃跑中的村民, 在以色列军官在场的情况下的殴打和折磨等等, 正如某些人私下里指出的那样。

④③ Ihsan Hijazi,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Dan Fisher,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8; Associated Press, April 7; Hijazi, *New York Times*, April 8, 1986.

④④ 例如, 见 Robert Leiken, “Who Says the Contras Cannot Succeed?,” *Washington Post*, June 27, 1986, 他在没有争辩的情况下否认了他所支持的恐怖分子所犯下罪行的大量记录, 采用的是辩护者通常采取的方式(见注释①⑦)以及他的写作中类似的废话。见我对 Morley and Petras 所著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的介绍, 以及第三章注释③, 和我的 *Culture of Terrorism* (South End Press, 1988) 一书, 205 - 206, 213。

④⑤ Peres,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83; Breindel, *New York Times*, Op-Ed, March 28;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1983, June 3, 1985; Kamm,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85;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February 20, February 18, 1985; Brzezinski,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1983; Reagan, press conferenc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84,

October 28, 1983. 也可参见 Rabbi Alexander Schindler, 美洲希伯来会众协进会主席(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改革派)的评论:巴解组织“威胁摧毁贝鲁特尚存的地方,而不是投降”;在海军陆战队曾经分配到的任务之中,这项任务——被派遣去监督以色列军队离开,而不是允许他们完成任务——“肯定是最不光彩的”(UPI, *Boston Globe*, October 28, 1984)。对该地区的这些令人迷惑的描述为国家的暴力行为服务,但是在《时代周刊》同一天的叙述中它们都被省略了。

④⑥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83.

④⑦ Quandt, *American-Arab Affairs*, Fall, 1985; Hillel Schenker, Interview with David Shipler, *New Outlook* (Tel Aviv), May 1984.

④⑧ 反对党工党支持这场战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利库德集团 98%的支持者和工党 91%的支持者认为它是合法的。当战争随着 8 月中旬对贝鲁特的恐怖轰炸结束之时,对贝京和沙龙的支持达到了顶峰,分别为 82%和 78%。在萨布拉与沙提拉屠杀发生之后,分别降到了 72%和 64%。见 *FT*, 251 - 62, 394; 378f.。

④⑨ Philip Weiss, *New Republic*, February 10, 1986.

④⑩ Schiff and Ya'ari, *Israel's Lebanon War* (Simon & Schuster, 1984), 35; John Kifner, *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81. Schiff and Ya'ari 声称,“尽管尽了很大努力去准确定位目标和实现直接

击中,但是仍然有超过 100 人被杀”,“包括 30 名恐怖分子”,这本书是其希伯来语原著的节译本;根据 Ya'ari 的说法(*Kol Hair*, February 2, 1984),原著的 20%被以色列的审查员所删除,而按照美国学者 Augustus Norton 的说法,50%被删除,他援引的是一名“与作者没有联系的有声望的记者”的说法(*Middle East Journal*, Summer, 1985)。尼加拉瓜——处于美国的雇佣军的攻击下——的审查制度在美国激起了很大的义愤。最为极端的以色列的审查制度当然是针对阿拉伯人的,包括那些以色列的公民。见 *FT*, 139f., 以及 *TTT*, 73f., 这仅仅是一个小例子。关于以色列和尼加拉瓜的审查制度之间更为详细的比较,以及在面临更小威胁下——正如最高法院大法官 Brennan 评论的那样——更为糟糕的美国纪录,见我的 *Necessary Illusions* (South End Press, 1989) 一书,第五章和附录;同样还有附录 II. 2。

⑤① Walsh, *Washington Post Weekly*, March 4, 1985; Wilkie, *Boston Globe*, February 18, 1985.

⑤② *FT*, 448, 440, citing Israeli press; *News from Within* (Tel Aviv), October 1, 1985; *Yediot Ahronot*, November 4, 1983.

⑤③ *Ha'aretz*, June 25, 1982; see *FT*, 200f.

⑤④ B. Michael, *Ha'aretz*, November 13, 1983; Bachar, *Yediot Ahronot*, November 11, 1983; Morris, *Jerusalem Post*, June 5, 1984.

⑤⑤ *New Republic* 向来时刻警惕着在“许多媒体人员”面前保卫以色列

列,那些媒体人员“准备着相信反映这个犹太国家的任何坏事(并且几乎是作为一个必然的结论,任何反映它的敌人的好事)”,它谴责 *Washington Post* “在最严重的诽谤事件之一中的勾结行为”,因为它观察到,沙龙试图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他所谓的“新秩序”(使用了希特勒的术语)(Martin Peretz, *New Republic*, March 18, 1985)。这个术语的确是希特勒的,并且沙龙使用了它,正如以色列的评论界所普遍使用的那样。在 Peretz 谴责《邮报》准确地报道了这一事实之前一个月,右派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 *Yediot Ahronot* 的一条标题写道:“‘沙龙宣布他的“新秩序”计划获得进展’”,引用了美国大使 Morris Draper 的话,他援引了沙龙在犹太联盟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关门会议(1984年2月23日)上的话。这种运用方式是常规的;其他例子见 *FT*,书中还有其他的个案,在那些个案中,*New Republic* 小心地避免使用以色列的消息来源,以避免偏离官方路线。(例如,215f., 258f.)

- ⑤⑥ Olmert, *Ma'ariv*, November 22, 1983; Milson, *Koteret Rashit*, November 9, 1983; Sharon, cited by Ze'ev Schiff, *Ha'aretz*, May 23, 1982; Milshtein, *Hadashot*, September 26, 1984; Rubinstein, *Ha'olam Haze*, June 8, 1983. On Ben-Gurion's aspi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state was established, see *FT*, 51, 160f.; Shabtai Tevet, *Ben-Gurion and the Palestinian Arabs* (Oxford, 1985) and the review by Benny Morri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1, 1985.

- ⑤⑦ *FT*, 199, citing an interview in *Ha'aretz*, June 4, 1982; *FT*, 117, 263.
- ⑤⑧ *Nouvel Observateur*, May 4; *Observer* (London), April 29; *Jerusalem Post*, May 16; *San Francisco Examiner*, May 5; *Washington Post*, July 8, 1984. See my "Manufacture of Consent," December 1984, published by the Community Church, Boston, and my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ENDpapers* (UK), Summer 1985, for further details. On earlier Israeli determination to evade a political settlement, with regular U. S. support, see *FT* and Beilin, *Mehiro shel Ihud*.
- ⑤⑨ *Ha'aretz*, September 29, 1985 (cited by Amnon Kapeliouk, *Le Monde diplomatique*, November 1985); *Koteret Rashit*, October 9, 1985.
- ⑥⑩ Julie Flint, *Guardian Weekly*, January 19, 1986.
- ⑥⑪ 《邮报》并没有将它形容为由“恐怖主义指挥官”梅纳赫姆·贝京实施的一次“恐怖主义行动”。哈加纳也似乎参加了；见第五章注释③④。
- ⑥⑫ Christian Williams, Bob Woodward and Richard Harwodd, "Who Are They?"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0, 1984; *New York Times* 社论, 1976年5月19日。关于现实, 见 *TNCW, FT*。在这方面, 某些特定的人权组织的作为值得注意。因而为了保证没有令人不愉快的信息, 国际人权联盟暂停了其在以色列的分支机构,

惟一的理由是,工党政府试图摧毁它,工党政府使用了如此粗野的手段以至于以色列法院很快地加以阻止;见我的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Pantheon, 1974, 196 - 197), *FT*, 第 142, 178 页,以及引用的参考文献。在其他任何国家的类似举动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义愤,但是它不会影响这个国际联盟的名声。类似的是,人权信息杂志 *Human Rights Internet*——它仅仅在不加评论的情况下报道对违反人权情况的指控——允许反诽谤联盟对有关以色列的指控进行回应,这种做法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因此,理所当然的是,共产党——作为一个人权组织,它的国内声誉可以与反诽谤联盟相提并论——不能被允许获得一定的空间以回应针对苏联的指控。

- ⑥③ *New Outlook* (Tel Aviv), October 1985; *Davar*, July 18, 1985。军事史学家 Uri Milshtein 写道,与标准的解释相反的是,以色列首先发动了导致“消耗战”的冲突,它使用坦克对埃及军队阵地开火,杀死了数十名士兵; *Monitin*, August 1984。
- ⑥④ Thomas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1986。
- ⑥⑤ Hirst,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April 20, 1986; Harkabi, quoted by Amnon Kapeliouk, *Le Monde diplomatique*, February 1986。
- ⑥⑥ 巴解组织声称,3名被杀的以色列人曾经卷入到了这些行动之中。这是个极为不可信的指控,正如以色列记者 David Shaham 评论的那样。(John Bulloch, “PLO Victims were Mossad Agents, ”

Daily Telegraph (London), October 3, 1985; Shaham, *Al Fajr*, November 29, 1985)。

⑥7 *Ha'aretz*, June 12, 1986。这份报道没有指出这次审判是否举行了。

⑥8 *FT*, 77; David Shipl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1983;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1984。1989年, *Washington Post* 刊载了一条关于释放行政拘留下的巴勒斯坦犯人的新闻故事, 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关在“富有争议的内格夫 Ketziot 地区的市立帐篷监狱之中”, 它是另一个酷刑场所。这个故事偶尔提到, “与此同时, 在破晓之前, 以色列海军制止了一艘从黎巴嫩开往塞浦路斯的小船, 并抓了被称之为恐怖分子嫌疑犯的 14 人”, 将他们带回以色列接受“审讯”。以色列的和平组织 Dai l'Kibbush 报道说, 1986 至 1987 年, 以色列军事法庭将数十名在海上或是从黎巴嫩绑架的人定罪为“被查禁组织的成员”, 当时它们并没有反以色列的行动或是计划。以色列人声称, 被绑架的巴勒斯坦人从属于巴解组织, 而黎巴嫩人则属于真主党, 或是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属于什叶派组织阿迈勒运动, 这两个组织在黎巴嫩都是合法的。Linda Gradstein, *Washington Post*, April 6, 1989; “Political Trails,” Dai l'Kibbush, Jerusalem, August 1988, *News From Within*, December 14, 1988。

⑥9 *New York Times*, June 30, July 1; *Boston Globe*, July 1, 4, 12; *Middle East Reporter* (Beirut), June 30; *Observer* (London),

July 1; Jansen,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uly 13, 1984.

- ⑦⑩ Thomas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the U. S. “refrained from making a judgment on the Israeli act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also Norman Kempster,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5, 1986.
- ⑦⑪ *News from Within* (Jerusalem), November 1, 1985.
- ⑦⑫ *Los Angeles Times-Boston Globe*, June 29, 1984. 关于在戈兰高地上的严厉镇压, 见 FT, 132f.。
- ⑦⑬ See Uri Milshtein, *Monitin*, August 1984, for a recent account.
- ⑦⑭ See preface.
- ⑦⑮ FT, 188f.
- ⑦⑯ *Rabin Memoirs*, 280 - 1.
- ⑦⑰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1985. 同时 *Times* 谴责伊朗, “它至今仍没有引渡或是惩罚那些在 1984 年 12 月劫持一架科威特客机和杀害两名美国人的嫌疑犯”, 并要求西方抵制卡扎菲, 如果他继续“庇护劫机者”的话。 *New York Times* 社论, May 14, 1986。关于那些为苏联客机的劫持者提供庇护的人, 或是在华盛顿的以色列代理人的冗长的劫持和海盗记录的问题上, 它至今一言不发, 也未说过类似上述的话。
- ⑦⑱ Abraham Sofaer,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6.
- ⑦⑲ Livia Rokach, *Israel's Sacred Terrorism*, a study based on Moshe Sharett's personal diary (AAUG, 1980, 20f.); “Sixty

Minutes, " CBS, 7 p. m., January 19, 1986.

- ⑧ Sune Persson, *Mediation and Assassination* (London, 1979);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a Biography* (Delacorte, 1978), 180—181; Stephen Green, *Taking Sides* (Morrow, 1984), 38f.; Kimche, *Seven Fallen Pillars* (Secker & Warburg, 1953), 272—273. 类似的是,暗杀莫因(Moyne)爵士的人来自于同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他们与其他恐怖分子一起获得了国家发行纪念邮票的荣誉; *FT*, 166.
- ⑨ *Globe & Mail* (Toronto), October 9, 1985.
- ⑩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85, 一个图片标题,没有新闻故事;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2, 由 Alexander Cockburn 所引用,载 *Nation*, September 2, 1985; Housego,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ly 20, 1986. 在法国(另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对于法国为了“报复”新西兰对被抓获的恐怖分子进行的审判而针对新西兰的暴行或是惩罚性行动,几乎没有抗议活动发生。相反,在与新西兰达成协议之后一份发自巴黎的报道评论说,“引起的行动并非自我批评而是爱国主义。根据法国的观点,新西兰及其总理兰格(David Lange)很快成为了扣押两名特工的恶棍,根据这里的普遍观点,这两名特工的罪行是由于服务于国家利益而导致的,因此是被不正当地扣留了。在美国,媒体很少报道绿色和平组织船员之死,也没有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新西兰的主权受到了损害。”尽管社会党政府许诺采取“合法行动”,如果“犯罪行

为”曾经被犯下的话,但是“采取的惟一合法行动所针对的是法国政府内数名要求向媒体公开信息的成员”,并且“没有进行公开调查”(New York Times, July 30, 1986)。在船被炸沉后,巴黎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聚集了 150 人和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雷诺·迪蒙。尽管媒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但是这一事件没有被允许在电视和媒体上进行报道,包括社会党的报刊和 *Liberation*。 *Le Monde* 将它关于集会的四行字声明保持到集会举行后才刊登。法国的绿党与和平组织“不愿意挑战由于绿色和平组织事件而在法国引发的大众沙文主义”,而社会党大会给予正式负责这起罪行的部长埃尔尼(Hernu)以“英雄般的欢迎”(Diana Johnstone and Elizabeth Schilling, *In These Times*, October 23, 1985)。法国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恐怖主义起始于 1972 年,当时它第一次对法国在其太平洋殖民地上的核试验进行抗议,法国的一艘扫雷舰撞击并差点击沉了它的小船,并且突击部队“蜂拥而上,用橡皮棍野蛮地殴打了绿色和平组织的领导人麦克塔格特(David McTaggart)和另外一名男船员,差点打瞎了他们的眼睛”(James Ridgeway, *Village Voice*, October 8, 1985, 它还提到了苏联对绿色和平组织的骚扰)。

- ⑧ See my articles “Watergate: A Skeptical View,” *New York Review*, September 20, 1973; editorial, *More*, December 1975; and introduction to N. Blackstock, ed., *COINTELPRO* (Vintage, 1976). Extended version of the introduction,

“Domestic Terrorism,” *New Political Science* 21. 3, 1999.

- ⑧ Shultz, *Boston Globe*, June 25, 1984;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84, December 30, 1983; AP, *Boston Globe*, April 23, 1984, *New York Times*, April 1, 198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5, 1986; Colin Nickerson, *Boston Globe*, February 3, 1986,都是关于这个大会。关于被抓获的南非突击队的细节,见 *Africasia*, July 1985,这个插曲很大程度上在美国被忽略了。关于客机,见 *Boston Globe*、*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1983; *Boston Globe*, February 21, 1984。这些基本上未被提到的事件发生在大众对苏联击落韩国航空公司 KAL007 航班的事件正歇斯底里大发作之时,这一事件仅仅在版面紧凑的《时代周刊》索引上就占据了整整七个版面。随后,特别是在 9/11 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由中央情报局及其附庸为了进行他们针对俄罗斯的战斗(并不是为了帮助阿富汗,那样倒是合法的)而招募、组织和培训的武装力量的形象发生了改变。本·拉登和他的扈从不再是“在道德上可以与国父们相提并论的人物”(Ronald Reagan; 见 Samina Am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5, 2001/2 冬季号)。他们在俄罗斯国内的恐怖主义行为严重到足以预示俄罗斯—巴基斯坦战争的迫近(John Cooley, *Global Dialogue* 2. 4, 2000 年秋季号)。
- ⑨ Barry Munslow and Phil O’Keefe, *Third World Quarterly*, January 1984。在里根政府时期,南非对邻国的劫掠造成 150 万人被杀,导致了 600 多亿美元的损失,与此同时华盛顿继续支持

南非,并谴责纳尔逊·曼德拉的非国大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组织”。Joseba Zulaika and William Douglass, *Terror and Taboo* (Routledge, 1996), 12. 1980 - 88 记录, Merle Bowen, *Fletcher Forum*, 1991 年冬季号。关于国会于 1985 年授权制裁(不顾里根的否决)后美国和南非的贸易增长情况,见 Gay McDougall, Richard Knight, 载 Robert Edgar 编 *Sanctioning Apartheid* (Africa World Press, 1990)。

- ⑧⑥ Dan Fisher, *LAT*, June 21; McGrory, *Boston Globe*, June 21; David Adams, *New Statesman*, April 19;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85. 关于安萨尔, 见 *FT*, 231f.; interview, *Hotam*, April 11, 1986, April 18, 1984, 关于扣押从南黎巴嫩转来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问题, 以及将他们单独收监、不提供给他们与家庭或是红十字会进行通讯的手段、拒绝他们见律师或是提供有关他们被扣押和非法转移到以色列的证据等问题, 也参见大赦国际, “The Detention of Palestinians and Lebanese in the military prison of Atlit”(位于以色列)。

⑧⑦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 1985.

⑧⑧ David Ignatiu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8, 1985.

⑧⑨ *New York Times*, June 21, June 18, July 1, 1985.

⑨⑩ Bernard Lewis, *New York Review*, August 15; *New Republic*, July 8; Reagan,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uly 8 (*Boston Globe*, July 9); Podhoretz,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6;

New York Times, July 2, 1985.

- ⑨① Thomas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June 23;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85.
- ⑨② Associated Press, *Boston Globe*, July 4; Friedman, *New York Times*, July 4; *Boston Globe*, July 4, 1985.
- ⑨③ John Cooley, *Green March, Black September* (Frank Cass, London, 1973), 197; see *FT* and Beilin, *Mehiro shel Ihud*, for many similar statements.
- ⑨④ *FT*, 181 - 2.
- ⑨⑤ Rabin 对以色列议会的讲话, 载 *Hadashot*, March 27, 1985; Tamari 的采访, 载 *Monitin*, October 1985。关于士兵们的看法, 见 *FT* 中翻译的以色列媒体的节选, 它们与在这里运作的哈斯巴拉所提供的材料不同(见序言, 注释⑮)。或是伞兵 Ari Shavit 对 1978 年入侵黎巴嫩的评论, 发表在 *Koteret Rashit* (1986 年 5 月 13 日), 作为对司令部关于行动的讨论的对应物, 它重新唤起“那种疯狂”, 重武装部队正是在这种疯狂之下向村庄或是其他任何地点倾泻火力, 在这之前, “事情开始变得很明白, 即这里不会有战争”, 而更多是“类似于一次远足”。毫无疑问, 关于其他军队的真相是类似的, 但是他们有关“军队纯洁性”的神话并没有被认真对待。
- ⑨⑥ Rokach, *Israel's Sacred Terrorism*; Uri Milshtein, *Al Hamishmar*, September 21, 1983; Kennett Love, *Suez* (McGraw-Hill, 1969),

10f. 61 - 2.

⑨⑦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84. On the scholarly record, see *TNCW*, 331.

⑨⑧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4; *Boston Globe*, December 19;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Boston Globe*, December 20, 1983.

⑨⑨ *Globe & Mail* (Toronto), July 11; *Boston Globe*, July 24; *New York Times*, July 24; *Boston Herald*, July 25, 1985;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6; *Boston Globe*, January 5, 6, 1984.

⑩⑩ 见第一章。James Markham,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1975, 根据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消息来源报道说, 57 人被杀。见注释④①的正文。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85;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75。

⑩⑪ *Time*, March 5, 1973;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1973, 给出的数字是 15 人被杀。

⑩⑫ 在利比亚喷气机这个事件中, 并不存在支持性的证据, 但是苏联的指控可能是正确的, 尽管很明显它无法为这种暴行提供合法性依据; 见 R. W. Johnson, *Shoot-Down* (Viking, 1986), 这项研究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对美国政府谎言的剖析。美国国内对此书的驳斥性评论是有启发意义的。Joel Brinkley 写道, 这本书是“有缺陷的”, 因为它对里根政府的主要人物采取了“尖刻的语气”, 它的“厌恶接近于蔑视”, 并错误地声称, 它的资料主要来自于美国的媒体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ly 20, 1986)。费弗(Douglas Feaver)声称,约翰逊“使他自己的计划失去了信誉,因为他在容易被人核对的地方提供了他自己的虚假信息”,要注意的是,他在第2页上只是部分引用了国际民航组织的报告(*Book World, Washington Post Weekly*, July 7, 1986)。同样能被轻易核对出来的是,约翰逊引用了费弗在第234页上完整引用的句子,在那页上整句话都具有相关性,但是约翰逊在第2页上只引用了句子中与该页相关的一部分。

- ⑩③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3; editorial, February 23; February 25, 26, 1973. Amiram Cohen, *Hotam*, February 10, 1984. Michael Curtis, lett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Martin Peretz, *New Republic*, October 24, 1983.
- ⑩④ For comparison of the reaction to the two events, see Robert Scheer, *Guardian Weekly*, September 25, 1983; for discussion of other similar incidents, also passed over lightly given the agent of the atrocity, see my “1984: Orwell’s and Ours,” *Thoreau Quarterly*, Winter/Spring 1984 and “Notes on Orwell’s Problem” in *Knowledge of Language* (Praeger, 1986).
- ⑩⑤ 关于发生在利达(Lyddā)和赖姆莱(Ramle)的驱逐事件,见 Benny Morri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1986年冬季号。关于其他事件,见 FT 和 TTT 以及引用的材料。Shocken, *Foreign Affairs*, 1984年秋季号。关于在1948年由摩西·达扬组织的对巴勒斯坦

政治领导层的暗杀努力,见 Uri Milshtein, *Al Hamishmar*, September 21, 1983; *Hadashot*, January 11, 1985。一份最近发现的 1948 年 6 月 30 日的以色列情报报告曾得出结论,在 39.1 万名阿拉伯难民(15.2 万来自联合国分治方案中分配给以色列的地区之外)中,至少有 70% 的人之所以逃离家园是包括直接驱逐行动在内的以色列军事行动(主要是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结果。根据 Benny Morris 在他分析中所观察到的,这个百分比明显被低估了。这项报告还提到,这是在阿拉伯领导人作出大量努力去阻止难民流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他还评论说,从 7 月到 9 月间“本次大逃难下半部分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故事”;“1948 年 6 月之后,有许多次计划好的驱逐行动”(*Middle Eastern Studies* (London), January 1986; 对 Haim Bar'am 的采访, *Kol Ha'ir*, May 9, 1986)。

- ⑩ 关于对以色列几个版本(包括出现在美国的惟一一次说明,它是 Ze'ev Schiff 和 Hirsh Goodman 在 *Atlantic Monthly* 上所作的可耻的掩盖)的评论,见 James Ennes, “The USS Liberty: Back in the News,” *American-Arab Affairs*, 1985 - 1986 年冬季号。可能最令人迷惑的是伊扎克·拉宾的版本,他当时是总参谋长,他将对船只的袭击描述为“整场战役中最令人担忧的一种局势发展”,他在其中体验到的是“纯粹的恐怖”。他将它放在了 6 月 7 日(实际上是 6 月 8 日),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错误,可能可以将这个错误理解为混淆导致这次袭击的明显理由的一种努力:对美国隐瞒其在停火后对叙利亚的预谋入侵。Rabin, *Memoirs*, 108f.。在他

的回忆录中,备受尊敬的学者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他与情报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亲身经历——写道,“我们的军队和情报部门一致发现,它是一次蓄意和未经挑衅的以色列海空进攻,但是约翰逊总统决定接受以色列的相关辩解和声明,即它是对美国船只识别错误所导致的结果,不管这些借口是多么地缺少可信度。”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1),第 214 页。

⑩⑦ 对于南黎巴嫩事件,见 Mark Bruzonsky,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May 16, 1986; 也见 *Boston Globe*, April 15; David Shipler,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1986。关于新墨西哥商人 Mike Mansour 事件,见 *Houston Chronicle* (美联社), May 18, (合众社) May 21, 1984。他被监禁了 22 天,他声称,他受到了虐待,并被迫签署了一份他拒绝接受的供认状。

⑩⑧ Robert, Tucker, *Commentary*, October 1982.

⑩⑨ Dario Fernandez-Morera,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 6, no. 4, 1985.

第三章

①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1985* (London, 1985); *Political Killings by Governments* (AI Report, London, 1983).

② William Beecher, *Boston Globe*, April 15, 1986.

③ 美国政府声称,从 1980 年 9 月开始,尼加拉瓜开始向游击队输送

武器,这些游击队很大程度上是被卡特—杜阿尔特针对人民的恐怖主义战争动员起来的。即使我们接受表面的文献证据,这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1981年早期开始的武器流动的证据几乎为零(比较 TTT,以及中央情报局分析员 David MacMichael 在国际法院的证词;UN A/40/907,S/17639,1985年11月19日)。毫无疑问,可以这样认为,向那些试图保卫自己反对美国支持下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民提供武器是一种罪过,不然它就是试图征服这个半球的一种证明。国际法院在1986年6月作出裁决,武器供应有可能继续到“1981年初的几个月为止”,然而进一步的指控“并没有被坚实地加以证明”,并裁决说,就法律而言,这种武器供应,即使它存在,也不像华盛顿声称的那样构成一种可以使美国的反击合法化的“武装进攻”。它发现,美国的行动以及其他的罪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在国际事务中)诉诸于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的原则”。华盛顿对于法院的裁决不予理睬,它已经宣称,它不受法院的司法管辖,并将曾经遭到法院谴责的“非法使用武力”行为——包括首次命令其雇佣军攻击不设防的平民目标——升级,作为对此的反应。与此同时,世界秩序的那些尊敬的支持者们达成一致意见,美国不应该受国际法院的司法管辖因为美国“依然需要自由去保护自由”,正如在尼加拉瓜一样(Thomas Franck, *New York Times*, July 17, 1986)。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内反政府军的支持者 Robert Leiken“指责国际法院,他说法院由于和苏联的紧密关系而受到了‘日益增长中的观念’的不利影响”(Jonathan

Karp, *Washington Post*, June 28, 1986), 当同样一个法院在伊朗的问题上作出有利于美国的判决后, 这种关系神秘地出现了。

- ④ Editorial, *Washington Post* (*Guardian Weekly*, February 22, 1981); Alan Riding,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81. See TTT for references not given here or below.
- ⑤ Ambrose Evans-Pritchard, *Spectator*, May 10, 1986; 随着斩首的任务大部分完成, 他继续写到, 尸体的数目“下降了, 并且被悄悄地在晚上丢到了伊洛潘戈湖的中央, 只有极少数会被冲到岸边, 提醒冲浪者镇压行动仍然在继续”。*New Republic* 社论, April 2, 1984, April 7, 1986。关于最近的暴行, 见 *Americas Watch*, *Settling into Routine* (May 1986), 它报道说, 政治谋杀和失踪——90%出自杜阿尔特武装部队之手——仍然在继续, 每天超过四起, 在这个首要的恐怖主义国度内, 这是一种真正的改善, 而数不清的其他政府暴行也在继续。从事后看来, 现实有时候被击败了, 例如被美洲学校所击败的那样。它训练美洲的军官们完成那些它们在萨尔瓦多完成的任务, 并骄傲地宣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解放神学……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被击败了”。引自 Adam Isacson and Joy Olson, *Just The Facts* (Washington: Latin America Working Group an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1999), ix。
- ⑥ Chris Krueger and Kjell Eng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 the Guatemalan Highlands* (Washington Office on Latin America, 1985); Alan Nairn, “The Guatemala Connection,”

Progressive, May 1986; Benjamin Beit-Hallahmi, *The Israeli Connection* (Pantheon, 1987).

- ⑦ Herman and Brodhead, *Demonstration Elections* (South End Press, 1984)。他们定义这样一个术语是指这样一些选举：“由外国组织和举行,主要是为了平息国内难以控制的民众”,他们讨论了其他几个例子,并详细地显示出,这些选举并不比苏联政府组织的选举更不滑稽可笑。他们的术语“示威选举”被 Robert Leiken 在尼加拉瓜问题上所借用,并极端地加以错误运用(*New York Review*, December 5, 1985)。见 Broadhead and Herman 的信以及其他英国议会观察员的信件(June 26, 1986),以及 Leiken 的回应,默认了(通过回避)他们批评的正确性,同时声称,他们将他们的概念设计为“将注意力集中到西方帝国主义身上同时分散对苏联帝国主义注意力的一种方法……与他们显而易见的信仰相符合,即只有一个超级大国无赖”;这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们的一种标准的反映,在这个事例上,它要求压制 Brodhead and Herman 对波兰和许多其他地方的选举的严厉批评。见 Alexander Cockburn(*Nation*, December 29, 1985, May 10, 1986)以及 Leiken 的回应(*New York Review*, June 26);还有我对 Morley and Petras 的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一书的介绍。
- ⑧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 *Washington Report on the Hemisphere*, April 16, 1986。从塞雷佐(Cerezo)总统1月份就职到6月份,凶杀案估计为700起,比上一年上升了10%,其中多少

是政治谋杀,或者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仍然是个未知数(Edward Cody, *Washington Post*, July 6, 1986)。Alan Nairn and Jean-Marie Simon 估计,每月的政治谋杀超过 60 起,他们都是危地马拉军方运作的“一个有效的政治恐怖主义体系”的牺牲品,军方使用了诸如“关于记者、学生、领导人、左派人士、政治家等人的电脑文档”等工具(*New Republic*, June 30, 1986)。他们得出结论,“危地马拉的死亡国家机器似乎比 60 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舒服地确立下来,”评论说,“塞雷佐至今尚未谴责任何一起的军队谋杀事件”,并且“他的内政部长说,政治谋杀不再是一个问题”。

- ⑨ John Haiman and Anna Meigs, “Khaddafy: Man and Myth”, *Africa Events*, February 1986.
- ⑩ See *TTT* for an ample selection; also chapter 2, notes 16, 44, and references of note 7 above.
- ⑪ Michael Ledeen,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86. See note 4 and text.
- ⑫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85;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1, 1986; Rabin, *Boston Globe*, January 25, 1986; *El Pais* (Madrid), April 25, 1986.
- ⑬ E. J. Dionne, “Syria Terror Link Cited by Italian,” June 25, 1986; *Times* 的编辑们肯定意识到,他们所称赞的美国政府的这个例子中的剩余部分仍然缺少确切证据。

⑭ *New York Times*, June 17, 198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25, 1986。见 Leslie Cockburn, *Out of Control*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7), 26。与进攻尼加拉瓜的美国代理人军队作战的古巴雇佣军声称,他们是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准军事基地接受的培训; Stephen Kinzer, *New York Times*, June 26, 1986。但是,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逮捕了试图推翻苏里南的独裁政权的阴谋策划者(被美国的检察官形容为是“一个寻求卷入中美和南美的雇佣军的‘跳板’”),指控他们违反了美国的中立法案(*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30, 1986),正如它此前阻止了推翻它在地支持杜瓦利埃杀人政权的努力一样。反政府军主力的情报首脑阿尔塞(Horacio Arce)在1988年叛逃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他描述了他在萨尔瓦多接受美国教官训练的情况,从以色列输入武器的情况,他在洪都拉斯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以及其他的细节,包括将袭击平民目标作为目的以削弱社会改革计划。见第五章,注释⑮。

⑮ Bob Woodward and Charles Babcock, *Washington Post*, May 12, 1985; see chapter 5, at note 28.

⑯ Ihsan Hijazi,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86。仔细阅读 *Times* 的读者将会发现,埋藏在卡姆(Henry Kamm)发自雅典的报道(1986年5月29日)之下的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恐怖主义的谴责,特别是144名叙利亚人在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行动”中被害,很可能指的是叙利亚公共汽车上的爆炸。

- ⑰ Philip Shenon, *New York Times*, May 14, 1985; Lou Cannon, Bob Woodward, et al., *Washington Post*, April 28, 1986.
- ⑱ *New Republic*, January 20, 1986; Edwin Meese, Associated Press, April 4, 1986; see chapter 2.
- ⑲ Frank Greve, *Philadelphia Inquirer*, May 18, 1986.
- ⑳ Nef,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London), April 4, 1986; Johnson, *Sunday Telegraph* (London) June 1. 在其他地方,在华盛顿召开的由以色列组织的一次关于恐怖主义的宣传大会上(见序言,注释⑮),约翰逊赞扬以色列采取“断然措施”与“恐怖主义癌瘤”做斗争,犹如其在 1982 年入侵黎巴嫩期间所做的那样:“真相是,凭借着道德和物质上的勇气去违反所谓的主权界限,并且通过将道德法则置于国家权利的形式之上,以色列第一次能够打中这个癌瘤的要害,阻止它的生长,使其溃败”(Wolf Blitzer 引用, *Jerusalem Post*, June 29, 1984),这是以色列目的的另一面,正如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那样,但是除了目的之外,它是一种对道德和物质勇气的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并且是透视约翰逊的“道德法则”概念的一种有趣的洞察力。
- ㉑ Haley, *Qaddafi and the U. S.*, 271f.。关于利比亚对里根分子的困扰以及他们杀害卡扎菲的计划的细节,见 Seymour Hersh,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27, 1987。赫什(Hersh)的重要文章出现在一般是由某种丑闻的曝光而提供的机会之窗期间,在这个事情上是伊朗门事件,它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但是避免

掉了最关键的一些方面。见第四章,关于背景和细节,见 Jonathan Marshall, Peter Dale Scott, and Jane Hunter, *The Iran-Contra Connection* (South End Press, 1987) 和 *Culture of Terrorism*。

②② Larry Speakes, national TV, 7:30 p. m., April 14;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4;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Lewis,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Bernard Weinraub,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Jeff Sallot, *Globe & Mail* (Toronto), April 24, 1986.

②③ Haley, *Qaddafi and the U. S.*, 8, 264.

②④ *New Statesman* August 16, 1985.

②⑤ See *FT*, 210; Haley, *Qaddafi and the U. S.*

②⑥ “美国中央情报局——被禁止向尼加拉瓜的反叛分子提供军事援助——在去年秘密地将数百万美元漏给了反叛分子用于政治计划,据美国官员说”,它还允许“中情局维持对这些反叛运动的影响力,甚至是在一项国会的禁令从 1984 年 10 月到 1985 年 9 月期间存在的情况下,这项禁令禁止中情局花费金钱在‘可能会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产生直接或是间接的支持性影响的地方’,这名官员说”。被美国官员称之为“一个大规模计划”的行动的目的一是“创造出这样一个光环,即(反政府军)是与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并肩的一个实际的政治实体”。国会议员 Sam Gejdenson 宣称,“我们怀疑,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个地区撤出过,但是中情局直接卷入反政府军的程度可能会使甚至是最迟钝的旁观者

也感到震惊。”美联社获得的 UNO(反政府军)文件“显示, UNO 的许多政治金钱流到了与(美国建立的)保护伞组织结盟的军事组织那里”,而部分资金被用于收买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官员以“使得反叛者能够在这些国家活动”。这笔钱的大部分漏入了位于巴哈马的一家以伦敦为基地的银行中。美联社,4月14日; *Boston Globe*, April 14, 1986。这次曝光当时在无人评论的情况下就过去了,此后也基本没有评论。随后, *Miami Herald* 报道说,国会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2700万美元中有超过200万美元被用于收买洪都拉斯官员,“让他们对反政府军在洪都拉斯土地上的非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Boston Globe* 社论, May 13, 1986),还有许多其他的腐败证据,但是只是得到了一些有限的注意。

②7 Hersh,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27, 1987.

②8 Associated Press, March 27, 1986, citing *El Pais* (Madrid).

②9 R. C. Longwoth, *Chicago Tribune*, March 30, 1986.

③0 Richard Higgins, *Boston Globe*, March 25, 1986.

③1 Fred Kaplan, *Boston Globe*, March 26, 1986.

③2 London *Sunday Times*, April 6, 1986.

③3 Cockbur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7; also *Nation*, April 26, 1986. Lelyveld,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86.

③4 另一名受伤的美国黑人大兵死于数月之后。

③5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1986.

③6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1984; *Times* 宣称,在晚上7点, F -

111 战斗机轰炸了“靠近班加西”和“靠近的黎波里”的军事目标，并且在晚上 7:06，它们轰炸了“的黎波里军用机场，最终的目标”。正如已经被报道的那样，F-111 轰炸了的黎波里的居住区。

- ③⑦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4, 1986.
- ③⑧ James Markham,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86.
- ③⑨ *Der Spiegel*, April 21, 1986; 封面特写是“以恐怖反恐怖”，这是个著名的盖世太保的口号，大概并不是凑巧选出来的。也见 Norman Birnbaum 的文章，载同一期。
- ④⑩ Text of interview provided by an American journalist with *Stars and Stripes* in Germany. See also Hers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1987.
- ④⑪ 例如，见 James Markham, *New York Times*, May 31, 引用了“一名柏林的警方调查者”的话，他“说他相信利比亚在东柏林的大使馆‘猜测到了’这次袭击”——和以前所声称的“确定”差远了，他还引用了 Manfred Ganschow 的话，但是不是关于他否认存在任何证据的那段；有关叙利亚和反阿拉法特的阿布·尼达尔恐怖分子卷入迪斯科舞厅爆炸案的情况，见 Robert Suro, *New York Times*, July 3, 他提到了关于利比亚卷入其中的“被反复出示的证据”（斜体是我所加表示强调）；或是 Bernard Weinraub, *New York Times*, June 9, 提到了叙利亚可能卷入其中，并且政府官员所“说”的有关他们所了解的截获利比亚电报的情况。在随后几年，按照美国和德国的官员、法院和情报部门的说法，与叙利亚的联系被强

调,再次显示出最初的说法没有坚实的基础。特别见 Robert McCartney, *Washington Post*, 1988 年 1 月 11 日, 12 日。Ganschow 和德国官员对美国说法的否认,以及内部所承认的情况:那些证据最多只能算是很单薄的证据,也见 Hers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1987。在以后的几年中,利比亚被牵连其中。显然,不管随后有什么样的发现或是说法,它们都与我们这里谈论的任何事无关。

- ④② Shaul Bakhas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4, 1986.
- ④③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2, 1986; see chapter, 1, at note 3.
- ④④ *Toronto Globe & Mail*, editorials, March 28, 18, 5, 1986, referring specifically to Nicaragua.
- ④⑤ See Associated Pres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6, for extensive discussion; *New York Times*, May 6, 1986, a briefer mention, and the text of the statement against terrorism.
- ④⑥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4; survey of world press reaction,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5; survey of U. S. editorial reaction, April 16;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April 15; Peres,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1986.
- ④⑦ 在轰炸利比亚之后,杰斐逊对柏柏尔海盗的惩罚性远征被无数次地提到。似乎无人往历史深处再多走几步去描述一下过去的那段岁月,当时“纽约已经成为了一个盗贼市场,海盗们在那里将从公

海上掠夺来的东西出手”，海盗活动使北美殖民地富裕了起来，正如在它们之前的英国那样（Nathan Miller, *The Founding Finaglers* (David Mckay, 1976), 第 25 - 26 页)。海盗活动并不完全是北非的发明。

- ④⑧ 美联社, 4 月 21 日;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对宗教界反应的调查, 美联社, 4 月 17 日; 也见 4 月 19 日, 报道了西雅图 14 个宗教和社会团体的一次新闻发布会, 它谴责了这次轰炸, 与之相反的是, 西华盛顿州的拉比委员会支持了轰炸; Nye, *Boston Globe*, April 16; Rostow,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86.
- ④⑨ Glass, *Spectator* (London), May 3; Cockburn, *In These Times*, July 23, 1986.
- ⑤⑩ *Dissent*, 1986 年夏季号。在现场进行观察的时候, Ramsey Clark 从轰炸的方式中得出结论, 平民伤亡最为惨重的富裕的市郊地区似乎是一个特定的目标; *Nation*, July 5, 1986。这个问题与恐怖主义问题完全没有关系。(否则 Clark 不会这么说)
- ⑤⑪ *New Republic*, September 6, 1982; 随着实施者的不同, 他对国家暴力的解释也不同, 关于这一点的其他例子, 见上文第一和第二章以及 FT。
- ⑤⑫ *Washington Post* weekly edition, August 4, 1986.
- ⑤⑬ Ignatius, *Washington Post Weekly*, July 28, 1986.
- ⑤⑭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5, July 16, 1986.
- ⑤⑮ *Economist*, July 26, 1986;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24, 1986.

⑤⑥ 考虑到将一种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中的意识形态的考虑成分,人们可能会有保留地接受这些数字。因而某一时期会将从事流产的诊所的爆炸袭击排除在“恐怖主义”的目录之外,可能现在依然如故。根据专栏专家 Cal Thomas(他属于道德多数派)的说法,从 1982 年到 1984 年后期,有 300 起爆炸发生在“从事流产的场所”,他认为爆炸“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不管是在策略上还是政治上”,尽管在道德上完全是好的;*Boston Globe*, November 30, 1984.

⑤⑦ AP, *Globe & Mail* (Toronto), July 4; Stephen Engelberg, “Official Says F. B. I. Has Suspects in Blasts Laid to Extremist Jews,” *New York Times*, July 17; Peyman Pejman, *Washington Post*, July, 5, 17, 1986.

⑤⑧ 见注释①⑧和第二章。回想一下,锡安主义分子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记录可以回溯到很多年之前,在以色列国成立很早之前;见 FT, 164f.。

⑤⑨ June 7, 1982.

⑥⑩ *Business Week*, August 10, 1981. Haley, *Qaddafi and the U. S.*, 98.

第四章

① 见导言部分的注释。

② 尽管其目标不同,但是因为艾布拉姆斯受到了此种罪恶如此大的

冒犯,甚至是书籍和关于语言学的专业文章也包括在内。

- ③ 在英国泄露的事实,见 Alexander Cockburn, *Nation*, November 22, 1986。某些卷入其中的人声称,他们并不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内容,而只是认为允许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讨论“思想控制”是不合适的,这样一个社会“在不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方面是不同寻常的,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话”(我的开幕词)。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即使人们接受隐藏在它背后的非凡的原则。这本杂志刊登了这种性质的文章,但却没有引起歇斯底里的反应,没有引起取消订阅的威胁,没有来自国务院的信件等等。例如,见 Carole and Paul Bass, “Censorship American-style”, 涉及的问题是富有争议的故事是如何被“市场力量和软骨头的出版商”所扼杀的(*Index on Censorship*, 3/85)。区别在于,在目前的这个例子中,这篇文章涉及的是媒体如何对待应该受到崇拜的国家,而不是按照适用于他人的标准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讨论。

- ④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83, *Foreign Affairs*, 1983 年冬季号。在后来几年,瓦茨所描述的趋势在美国同样成为了精英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杰出的政治分析家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绝大多数,他暗示——来说,美国正在“成为超级无赖大国”,被认为是“对于他们社会来说最大的单一外部威胁”。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国家间同盟会崛起以制衡这个无赖的超级大国。因此,他争辩说,这种立场应该在现实的基础上被重新加以考虑。他是在美国和英国轰炸塞尔

维亚之前写的,而这次轰炸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和关注。随后,在对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进行评论的时候,另一名杰出的政治科学家杰维斯(Robert Jervis)(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再次重申了亨廷顿的结论,他写道,“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眼中,实际上,今天主要的无赖国家是美国”。*Foreign Affairs*,1999年3月/4月号;2001年7月/8月号。

- ⑤ *Boston Globe*, October 28, 1986; November 4, 1986. Robert C. Johanse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 N.: The Costs of Unilateralism,”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1986.
- ⑥ Richard Bernstein, “The UN versus the United Stat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 1984. 在他想当然的前提下,并非“美国对联合国”。
- ⑦ Michael White, *Guardian Weekly*, November 9, 1986. 并没有证据说明,如美国的右翼所幻想的那样,世界正在“芬兰化”或是“被共产主义接管”;同样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人当然对苏联持非常批判的态度。
- ⑧ 见第三章注释④。
- ⑨ Jeffrey Smith,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9, 1986.
- ⑩ 这项计划显然是在1983年1月14日的一份秘密的国家安全计划中启动的(*Management of Public Diplomacy Relative to National Security*, No. 77)。Alfonso Chardy, “有消息称,泄露的秘密损害尼加拉瓜”, *Miami Herald*, October 13, 1986.

- ⑪ *Newsweek*, August 3, 1981. 关于与利比亚有关的虚假信息计划, 见第三章。关于其他的虚假信息计划和媒体的配合, 见我的 *Turning the Tide* 一书; Edward S. Herman and Frank Brodhead, *The Bulgarian Connection* (Sheridan Square, 1986)。
- ⑫ Alfonso Chardy, Knight-Ridder Service, *Boston Globe*, October 28, 1986.
- ⑬ Robert Reinhold, “Ex-General Hints at Big Role as U. S. Champion of Contra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1986. Chris Horrie, *New Statesman*, October 31, 1986, 对 WACL 的年度大会进行了报道, 特别提到了 RENAMO(南非支持的在莫桑比克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游击队)的突出作用以及他们和 Singlaub 以及可能与美国的暧昧关系。Scott Anderson and John Lee Anderson, *Inside the League* (Dodd, Mead & Co., 1986); 他们报道说, 只有反诽谤联盟和美国政府隐瞒了文件, 并拒绝配合他们的研究。关于里根-老布什政府与新纳粹和相关分子之间更多的联系, 见 *Necessary Illusions*, App. V. 4, 与支持两个国家方案的国际共识的那些真正的反犹主义分子相比, 他们只不过犯下了“过时的和没有活力的”反犹主义罪行而已 (*New Republic*)。
- ⑭ 关于这些问题, 见 *TTT* 和引用的材料。关于在纳粹国防军将军们的协助下依赖纳粹的手册发展美国战后的反暴乱文件的问题, 见 Michael McClintock,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Patheon, 1992)。有关西方在战争期间对希特勒的游击队的支持——为了延缓苏军

击败纳粹的速度,也见 Jerrey Burds, “The Early Cold War in Soviet West Ukraine, 1944 - 1948,” *The Carl Beck Papers* No. 1505, 2001 年 1 月,匹兹堡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

⑮ 对伊朗的人权关注时起时伏,与伊朗服务于还是挑战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见 Mansour Farhang and William Dorman, *The U. S. Press and Ir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进一步的讨论见 *Necessary Illusions* 第五章以及附录 5.2 - 5.3。

⑯ On these matters, see my *FT*, 457f.

⑰ Michael Widlanski, “The Israel/U. S. -Iran Connection,” *Tel Aviv, 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 May 2, 1986.

⑱ 见 William C. Rempel and Dan Fisher, “Arms Sales Case Putting Focus on Israel’s Policies,” *Los Angeles Times*, May 5, 1986, 报道提到,“美国的调查老手们”说“以色列被长期看作是秘密军售的一个管道”,并且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的是,以色列的武器流向伊朗至少(在过去五年里)还在继续”,报道援引了西德的估计,即 5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Douglas Frantz, “Israel Tied to Iranian Arms Plot,” *Chicago Tribune*, April 24, 1986; Reuven Padhatzur, *Ha’aretz*, April 28, 1986。Jane Hunter 传出了许多此类材料,他是一流杂志 *Israeli Foreign Affairs* 的编辑。

⑲ Leslie H. Gelb, “Iran Said to Get Large-Scale Arms from Israel, Soviet and Europeans,”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82.

⑳ Patrick Seale, “Arms Dealers Cash in on Iran’s Despair,”

Observer (London), May 4, 1986.

- ②① Miles Wolpin, *Military Aid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Lexington Books, 1972), 第 8, 128 页, 引用了国会听证会的内容; 关于巴西,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1970。更多有关公众对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愉悦反应及其背景的材料, 见我的 *Year 501* (South End Press, 1993); 关于 1958 年, 见 Audrey and George Kahi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New Press, 1995)。
- ②②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Towards a New Cold War*; Laird cited by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 *Right Turn* (Hill & Wang, 1986), 97, an important discussion of factors in domestic affairs.
- ②③ For more on these matters, see *Towards a New Cold War*, *Fateful Triangle*, and references of chapter 3, note 6.
- ②④ See chapter 1.
- ②⑤ See my books cited earlier; also Allan Nairn, *Progressive*, May, September 1986.
- ②⑥ Haley, *Qaddafi and the U. S.*, 31.
- ②⑦ See chapter 3.

第五章

- ① Among other sources, see Edward S. Herman, *The Real Terror Network* (South End Press, 1982); Herman and Frank Brodhea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ulgarian Connection (Sheridan Square Publications, 1986); Alexander George, “The Discipline of Terrorology,” in George, ed.,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Polity/Blackwell, 1991). Also the discussion of Walter Laqueur’s *The Age of Terrorism* (Little, Brown and Co., 1987), in my *Necessary Illusions*, 278ff.; see this book for references, where not cited here.

- ② “States, Terrorism and State Terrorism”, 载 Robert Slater and Michael Stohl,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Macmillan, 1988)。Stohl 得出结论,“在恐怖主义的强制外交上, 美国……在第三世界远比苏联活跃得多”。其他的研究显示出类似的模式。在对二战以来的军事冲突进行回顾的时候, Ruth Sivard 发现, 其中的 95% 发生在第三世界,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外国军队都卷入其中, 其中“西方国家占了干预行动的 79%, 共产主义国家占了 6%”;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1981* (World Priorities, 1981), 8。
- ③ United States Code Congr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News, 98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1984, October 19, volume 2; par. 3077, 98 STAT. 2707 (West Publishing Co., St. Paul, Minn.).
- ④ *US Army Operational Concept for Terrorism Counteraction* (TRADOC Pamphlet No. 525 - 37, 1984); Robert Kupperman Associates, *Low Intensity Conflict*, July 30, 1983. Both cited in

Michael Klare and Peter Kornbluh, eds, *Low Intensity Warfare* (Pantheon, 1988), 69, 147. The actual quote from Kupperman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threat of force”; its use is also plainly intended.

- ⑤ *Jerusalem Post*, August 4, 1988. See also Mark Heller, p. 36.
- ⑥ General John Galvin, commander of the Southern Command (SOUTHCOM); Fred Kaplan, *Boston Globe*, May 20, 1987. Kinsley,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6, 1987. See below, note 15. For further details, see *Culture of Terrorism*, 43, 77.
- ⑦ 关于这项极其成功的破坏工作的细节, 见 *Culture of Terrorism* 和 *Necessary Illusions*。白宫和国会鸽派在媒体的配合下马上破坏了 1989 年 2 月的第四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 关于这第一点见我载于 *Z Magazine* 的文章, 重印于我的 *Deterring Democracy* 一书中 (Verso, 1991, Hill & Wang 1992, Extended Edition)。
- ⑧ Richard Boudreaux and Marjorie Miller,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5, 1988;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21, 1987; Witness for Peace, *Civilian Victims of the U. S. Contra War*, February - July 1987, p. 5. The Civilian Toll 1986 - 1987, *Americas Watch*, August 30, 1987; *Americas Watch* Petition to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 May 29, 1987.
- ⑨ *Boston Globe*, November 9, 1984, 也引用了民主党鸽派人士 Christopher Dodd 的类似评论。

- ⑩ 自由派的 *Boston Globe* 的一项研究,可能是美国的主要报刊中对桑地诺分子敌意最少的,揭示出社论中提到的一处事实,即尼加拉瓜需要空中力量“以击退中情局运作下的反政府军的进攻,停止或是遏制空运供应”(1986年11月9日)。
- ⑪ Stohl 所引,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不幸的是,从前或是此后,那都不是法庭上的做法。
- ⑫ Kirkpatrick, *Commentary*, January 1981; Kristol,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1, 1986; December 13, 1973.
- ⑬ See *Necessary Illusions*, 60.
- ⑭ Julia Preston, *Boston Globe*, February 9, 1986; MacMichael, see *Culture of Terrorism*; Doyle McManus, *Los Angeles Times*, May 28, 1988; Vaky, see *Necessary Illusions*.
- ⑮ 同上, 204—205。当这些策略最终奏效的时候,它们都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得到了相当坦白地描述,并被赞之为“美国式公平竞赛的胜利”,它使美国人“团结在欢乐之中”(*New York Times* Headlines), 显示出“我们正生活在浪漫时代”(Anthony Lewis)。关于引诉和背景,见 *Deterring Democracy* 第十章。
- ⑯ For documentation on these matters, see *Necessary Illusions*.
- ⑰ *Torture in Latin America*, LADOC (Latin American Documentation), Lima, 1987, 第一届关于拉美酷刑的国际研讨会的报告(布宜诺斯艾利斯, 1985年12月), 专门讨论“这种镇压的体系”; 这种体系“可以随意支配在专门的中心里发展出来的知识和一种恐怖主义的多

国技术,这些中心的目的是完善剥削、镇压和迫使个人和全体人民依附的各种手段”,通过使用“由国家安全教条所引发的国家恐怖主义”达到其目的。这种教条可以追溯到肯尼迪政府的历史性决定,他决定将拉丁美洲军队的使命转移到“内部安全”上来,其后果影响深远。

⑱ Raymond Garthoff,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17.

⑲ Ibid., 16f., 78f., 89f., 98. See the references of note 1. Also Bradley Earl Ayers, *The War that Never Was* (Bobbs-Merrill, 1976); Warren Hinckle and William Turner, *The Fish is Red* (Harper & Row, 1981); William Blum, *The CIA* (Zed, 1986); Morris Morley, *Imperial State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1987); Taylor Branch and George Crile, “The Kennedy Vendetta: Our Secret War on Cuba,” *Harper’s*, August 1975.

⑳ See *Towards a New Cold War*, 48 – 9; *Culture of Terrorism*, 40; Stohl,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㉑ *Jerusalem Post*, August 16, 1981; see *FT*, chapter 5, sections 1, 3, 4, for further quotes, background, and description. See chapter 2, at note 92.

㉒ Glass, *Index on Censorship* (London), January 1989.

㉓ See *FT*, 184f., and sources cited.

㉔ Ehud Ya’ari, *Egypt and the Fedayeen* (Hebrew) (Givat Haviva,

1975), 27f. ;它是建立在被缴获的埃及和约旦文件基础上的一份很有价值的研究。与此同时, Salah Mustapha(埃及驻约旦武官)被发自东耶路撒冷的一份邮件炸弹严重炸伤,很有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上。

- ②⑤ Israeli military historian Uri Milshstein, *Hadashot*, December 31, 1987, referring to Eliav's 1983 book *Hamevukash*.
- ②⑥ See chapter 2. *Ha'aretz*, April 5, 1989.
- ②⑦ See chapter 3, at note 14.
- ②⑧ Boustany, *Washington Post Weekly*, March 14, 1988; Woodward, *Veil* (Simon & Schuster, 1987), 396f.
- ②⑨ On the Iron Fist operations and the Tunis bombing, see chapter 2.
- ③⑩ See chapter 3.
- ③⑪ See Edward Herman, *The Terrorism Industry* (Pantheon, 1990); Herman and Gerry O'Sullivan, "'Terrorism' as Ideology and Cultural Industry," George, ed., *Western State Terrorism*.
- ③⑫ Lawrence Harke, *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vol. 43, 1989, 667f.
- ③⑬ Bernadotte, see chapter 2, at note 80. Shamir, "Terror," *Hazit*, August 1943; parts reprinted in *Al Hamishmar*, December 24, 1987. Berlin, *Personal Impressions* (Viking, 1981), 50.
- ③⑭ See *FT*, 164 - 5n. ; Gafi Amir, *Yediot Ahronot Supplement*, August 14, 1988. De Haan, see *Towards a New Cold War*, 461 - 2.

- ⑳ Israel Shahak, "Distortion of the Holocaust," *Kol Ha'ir*, May 19, 1989. Enbal, *Yediot Ahronot*, August 3, 1990. See now Zuckerman, *A Surplus of Mem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ranslation of 1990 Hebrew original).
- ㉑ 联合国大会决议 42/159(1987 年 12 月 7 日),显然没有在美国得到报道。文本作为附件 3 出现在 *State Terrorism ay Sea*, EAFORD Paper No. 44, Chicago, 1988。
- ㉒ See chapter 2, note 85.
- ㉓ For details, see *Necessary Illusions*. Also my articles in *Z Magazine*, March, September 1989, parts reprinted in the 1999 updated edition of *FT*.
- ㉔ *Jerusalem Post* 的强调。见此前注释的说明。一个不受华盛顿控制的国际会议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因为它反对一项几乎获得普遍的国际共识的政治解决方案。
- ㉕ See chapter 2.
- ㉖ See chapter 2, note 29.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1988.
- ㉗ See chapter 2.
- ㉘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1986.

第六章

- ①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Blackwell, 1990).

- ② Maureen Dow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1991.
- ③ 8个月后,联邦调查局能够说的只不过是“调查者相信,9月11日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进行袭击的想法来自阿富汗的基地领导人,”尽管他们相信,行动的策划和资助的线索可以追寻到德国和阿联酋。“我们认为它的主要策划者在阿富汗,在基地组织领导层中处于高位”,在某些他对“9·11”“袭击的起源的最详细的公开评论”中,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缪勒如是说。Walter Pincus, *Washington Post*, June 6, 2002。如果在8个月后对其起源仍然只是揣测,它怎么可能在当时就被知道呢?10月5日,英国公开了它所声称的确定证据,布莱尔首相声称,可以“绝对毫无疑问地”认定本·拉登和塔利班有罪。考虑到这个案子的似是而非性以及调查的强度,这些证据极其薄弱。较为认真的媒体对它持否定态度。*Wall Street Journal* 形容这些文件“更像指控的清单而非详细的证据”(Mark Champio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5, p. 12)。但是一篇附属的文章指出,它并没有造成任何区别,文章引用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他解释说,“这项罪案无关紧要。计划是要消灭本·拉登先生和他的组织”,只要挡在路上,不管是谁(都会被消灭)。有些意思的是,按照知识界的文化规范,这一切都和所采取行动的完美正义无关。
- ④ Ricardo Stevens, NACLA 的 *Report on the Americas*, 2001年11/12月。他评论说,“不管是男孩、女孩还是那些无法在(1989)年12月20日——他们将这一天强加给生活在乔里罗(Chorrillo)的我

们——出生的人,这些受害者是多么地相似啊;不管是母亲、爷爷还是可怜的老奶奶,他们看上去是多么地相似。他们全都是无辜和无名的死难者,这些恐怖主义被称之为正义事业,而恐怖分子被称为解放者”。乔里罗镇“首当其冲地”遭到了美国的人侵,编辑们评论道,并且补充说,“短暂的美国入侵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是个未知数;但是按照可信的估计,可能高达7 000”。

- ⑤ Andy Thomas, *Effects of Chemical Warfare: A Selective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State Paper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aylor & Francis, 1985), chapter 2. 1919年入侵期间的目标是“未开化的部落”(阿富汗人),但也有俄罗斯人,这次入侵被军事指挥部认为是极其成功的。见 *Turning the Tide*, 126; *Deterring Democracy*, 181f.。也见 Thomas Whiteside, *New Yorker*, February 11, 1991。也见 Robin Young, *The Times* (London), 1997年1月3日,将这些称之为“新公布的文件”。然而,丘吉尔的建议的后果可能无法知道。在1992年,约翰·梅杰总理宣布一项“公开政府”倡议。它的首个举动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文件从公开记录办公室搬走。George Robertson, *Freedo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Law* (Penguin, 7th Edition, 1993), 198。

⑥ *New Republic*, 2, 1984; November 5, 2001.

⑦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veryman's Library, 1994), Vol. I, 355.

- ⑧ Christina Lamb, *London Daily Telegraph*, December 9, 2001. Doug McKinlay, *Guardian*, January 3; Kim Sengupta, *Independent*, January 4, 2002.
- ⑨ Elisabeth Bumiller and Elizabeth Beck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2001。到2002年3月,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说,需要粮食援助的人口数量已经上升到了900万。Barbara Crossette,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Ahmed Rashid,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6, 2002。
- ⑩ John Bur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6, 2001.
- ⑪ Samina Am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3, 2001—2年冬季号。“联合国粮食署警告说阿富汗会出现大规模饥荒”,法新社,9月28日;Edith Lederer,“美国的轰炸中断了提供阿富汗年度谷物的农作物种植”,美联社,2001年10月18日。8个月后,世界粮食计划署报道说,“小麦的储备已经见底,缺少更新储备的资金”。Rashid, *Wall Street Journal*。在AFSC会议——这次谈话就是在会议上作出的——的当天,各国际粮食机构正在维也纳开会以评估战争结束时的情况,他们的结论是,一百万以上的人口因为战争的破坏正“超出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并且“面临着饥荒和疾病所带来的死亡”(Imre Karacs, *Independent on Sunday*, December 9, 2001)。
- ⑫ Tania Branigan, *Guardian*, October 30, 2001。Howard, *Foreign Affairs*, 2002年1/2月号。联合国首席战争罪检控官 Carla Del

Ponte 敦促说,一个国际法庭将是起诉乌萨马·本·拉登的最佳途径(美联社, *Boston Globe*, December 20, 2001)。

- ⑬ 当轰炸开始之时,布什警告阿富汗人说,除非阿富汗当局交出本·拉登及其随从,否则他们将遭到轰炸。几个星期之后,英国国防部长官博伊斯(Michael Boyce)将军(爵士)宣布说,轰炸将持续到“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认识到,这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们改变领导层为止”,显然这是战争的这一新目标第一次被宣布出来。Patrick Tyler and Elisabeth Bumiller, 10月12日,引自布什的话; Michael Gordo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01,引自 Boyce 的话。
- ⑭ Barry Bearak,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John Thornhill and Farhan Bokhari,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5, October 26; John Burn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Indira Laskhmanan, *Boston Globe*, October 25, 26, 2001.
- ⑮ Anatol Lieven *Guardian*, November 2, 2001.
- ⑯ Colin Nickerson and Indira Lakshmanan, *Boston Globe*, September 27, 2001.
- ⑰ *News*, Islamabad, November 27;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6, 2001.
- ⑱ Boucher, *Mideast Mirror* (London), March 15, 1991. For more on the topic, see my essay in Cynthia Peters, ed., *Collateral Damage* (South End Press, 1992), and “Afterword,” in

Deterring Democracy (1992 extended edition).

- ⑲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March 1990). For excerpts see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1.
- ⑳ 在1999年2月于牙买加举行的15国首脑峰会上。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但在美国国内基本被忽略掉了。Dina Izzat, *Al-Ahram Weekly*, 1999年2月11—17日。一些讨论见我的 *New Military Humanism* (Common Courage, 1999)一书,第六章。
- ㉑ Quoted by Thomas Fox, *Iraq* (Sheed & Ward, 1991), ix; see my article in Peters, ed., *Collateral Damage*, for this and many other examples.
- ㉒ *New Military Humanism*。更多关于官方的战争目标和来自西方官方途径的有关轰炸之前的丰富文献记录的信息,也见我的 *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 (Verso, 2000)一书。
- ㉓ Christopher Hellman, *Defense Monitor* (Washington), August 2001. For more extensive discussion and sources on what follows, see my *Peering into the Abyss of the Future* (Lakdawala Memorial Lecture, New Delhi, November 3, 2001;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New Delhi.

第七章

- ① Graham Usher, “The al-Aqsa Intifada,”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13 October 2000.

- ② John Dugard (South Africa), Kamal Hossain (Bangladesh), and Richard Falk (USA), 《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违反人权问题》,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人权委员会, E/CN. 4/2001/121, 2001年3月16日。在调查过程中, 以色列拒绝合作, 但是查阅了大量的以色列资料来源。某些关于阿克萨起义的早期报道, 见 Human Rights Watch, *Israel, the Occupied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Territories*, vol. 1. 3(E), October 2000; 大赦国际,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Excessive Use of Lethal Force,” October 19, 2000。见 Adam Leigh, “Human Rights Groups Condemn the Use of ‘Excessive and Deadly Force’,” *Independent* (London), October 18, 2000。
- ③ For many examples, see *Fateful Triangle* (FT; particularly chapter 4, section 5), *World Order, Old and New* (1996, Epilogue). Also introductory notes.
- ④ HRW, *Center of the Storm*, April 11, 2001。Daniel William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6, 2001。关于发生在希伯伦的一些早些时候的例子, 见前面注释的说明。即使是短暂的个人经历也足以令人震惊。
- ⑤ HRW, *Center of the Storm*。在发自涅茨瑞姆的一份目击报道中, 一名优秀的以色列记者 Amira Hass 描述了新闻报道的失实之处, 它们没有报道定居点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机关枪的开火情况, 火力

来自于“远处的监视塔……针对的是成千上万没有武装的示威者”，以防止他们接近严密守卫的阵地，士兵们呆在里面并不会有什么危险。Hass, “Media Omissions, Army Lies,” *Le Monde Diplomatique*, November 2000.

- ⑥ HRW, *Center of the Storm.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Washington DC), 2000年11—12月,提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摩西·亚龙(Moshe Ya'alon)所作的证实。
- ⑦ 亚龙将军, *Globes* (以色列的商业期刊)副主任, 2000年12月21日。如果一个塞尔维亚的将军有着亚龙的记录,他会在海牙受到审判,亚龙的记录甚至在 Kahan 委员会对萨布拉与沙提拉的大屠杀所作的含糊不清的报道中都表现得很明白。
- ⑧ Amnon Barzilai, *Ha'aretz*, October 3, 2000; also Avi Hoffmann,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8. Uri Blau, *Kol Ha'ir*, 26 January 2001, with a photograph of “Marine forces in an exercise in the Negev.”
- ⑨ Robin Hughes, *Jane's Defence Weekly*, October 4; Charles Sennott, *Boston Globe*, October 4; Dave McIntyre (Washington), 德新社, 2000年10月3日。关于11月9日发生在 Beit Sahur 的谋杀, Gideon Levy, *Ha'aretz*, December 24, Graham Usher, *Middle East Report*, 2000年冬季号。到2002年2月为止,以色列媒体报道了48起暗杀,其中26名受害者是“连带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声称是21起,死于意外是18人。在许多事件中,包括那些

将暴力循环急剧升级的事件中,美制直升机和导弹都用上了。最高法院驳回了一项要求禁止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蓄意谋杀的请求。Gideon Levy, *Ha'aret*, February 3;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权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的一份报告(2002年4月)得出结论,“这种由国家认可和策划的蓄意和冷血屠杀是对基本人权和人道主义规范最根本的明显的违反。”

⑩ Ann Thompson Cary, “Arming Israel . . . ,” *News and Observer* (Raleigh NC), October 12, 2000. Data-base searches here and below by David Peterson.

⑪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Calls for Cessation of all Attack Helicopter Transfers to Israel,” AI release, October 19, 2000.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February 26, *Jane's Defence Weekly*, February 28, 2001, and other military journal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April 1, 2001. Reuters, AFP, February 19;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0, financial page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0, 2001, a sentence in section B, p. 10, in business announcements. *America*, March 5, 2001. See also Robert Fisk, “Death in Bethlehem, Made in America,” *Sunday Independent*, April 15, 2001. Jane Perlez, “U. S. Gingerly Discusses Taking More Active Role,” *New York Times*, May 17; William Orme, *World Briefing*, May 17, 2001.

⑫ Laurie Copans, *Boston Globe*, March 3, 2001.

- ⑬ See chapter 6, note 19;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1. For sources not given below, see *World Orders*.
- ⑭ For a review of these records, see *Deterring Democracy*, chapter 6.
- ⑮ See chapter 4.
- ⑯ See Israel Shahak, *Israel's Global Role* (Association of Arab-American University Graduates(AAUG), 1982); Benjamin Beit-Hallahmi, *The Israeli Connection* (Pantheon 1987); Jane Hunter, *Israel's Foreign Policy* (South End Press, 1987). More generally, Jonathan Marshall, Peter Dale Scott, and Jane Hunter, *The Iran-Contra Connection: Secret Teams and Covert Operations in the Reagan Era* (South End Press, 1987).
- ⑰ *Yediot Ahronot*, April 1992, Cited by Israel Shahak,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March 19, 1993.
- ⑱ 242号决议的措辞上的不精确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希望能够至少保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一项正式协议。根据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美国也是如此),“撤军”意味着回到1967年6月之前的边界,可以有一些细小的和相互的调整。它依然是美国的官方政策,尽管到1971年为止并非实际的运作中的政策。见下。
- ⑲ 克林顿政府也呼吁废除关于巴勒斯坦权利的特别委员会,称它为“有偏见的、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并拒绝谴责以色列的定居点行为,因为“辩论这个问题的合法性是徒劳的”。克林顿还转变了美

国长时期以来对联合国 194 号决议的官方支持政策,1948 年 12 月 11 日的这项决议确定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Jules Kagian,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7, 1993; *Middle East Justice Network*, 1994 年 2 月—3 月。见 *World Orders*, 第三章。

⑳ 见吉米·卡特,他回顾了 1991 年以来的官方声明,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6, 2000。

㉑ See chapter 1.

㉒ See *FT*, 105f.

㉓ Yaniv, *Dilemmas of Security* (Oxford 1987), 70.

㉔ 见第一章以色列的解释和反应。

㉕ For extensive review, see *Necessary Illusions*, Appendix 5. 2.

㉖ 其基础是美国对伊扎克·沙米尔政府期间定居点的无耻行径的不满。当其方式回归正常之后,但是其实质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友好的关系恢复了。

㉗ 卡特引用贝克的话,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6, 2000。注意,贝克使用“领土”一词时用的是泛指和单数。在 1971 年以来的美国外交中,对联合国 242 号决议的英语版中限定条款的忽略(在具有同等效力的法语版中没有忽略)已经成为一种工具,用于声称联合国 242 号决议只意味着部分撤军,与国际社会(以及 1971 年之前的美国)的解释正相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法律辩论。这些辩论毫无意义,因为一项声明的含义是由最有实力的成员的决定所决定的,这些决定在教义体系内是被认可的,即使它们与实

际的措辞截然相反。这里有很多的例证。关于对几个涉及的和平条约的回顾,见 *New Military Humanism*, 114—28。

⑳ See chapter 5.

㉑ 关于什么是有价值的,我并不是在事后才这么说的。见我载于 *Z Magazine* 的文章,1993年10月(日期为9月2日),它讨论了“原则宣言”的草案。关于这个文件,见 *World Orders*, 第三章。

㉒ 主人们显然发现这种游戏很有趣。他们再玩了一遍,例如,2002年4月当阿拉法特被困在他位于拉马拉的官邸内,被以色列的坦克所包围,被严厉地命令对恐怖主义进行谴责的时候。正如所有人都理解的那样,这种被迫的谴责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作为羞辱巴勒斯坦人的目的来说,却是起到了作用。与此相反,沙龙则被布什总统命名为“追求和平的人”。在布什的安排下,阿拉法特从牢笼中释放出来,以获取美国和英国对暗杀以色列部长泽维的嫌疑犯的监管,布什因为做出了这种安排而受到赞扬。泽维的被杀是一种预料之中的反应,是对以色列将暴力循环升级的反应,因为以色列首先暗杀了一名政治领导人,在美制直升机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中,阿布·阿里·穆斯塔法——他没有受到指控——被杀。暗杀穆斯塔法的事件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一些评论除外,这些评论提到,在以色列国防军的凶手们攻击的公寓之内有美国的公民在场)。但是,当泽维由于报复被杀后,对此的反应则完全不同。无法想象这样一种情况,即应该做出努力惩罚那些对杀害穆斯塔法负责的人。对这两个案例的仔细研究,见 Mouin Rabbani, Znet

(www.zmag.org), June 19, 2002。

③① See chapter 5.

③② 这些协议被以色列的谈判者仔细地进行了处理(在美国的支持下),包含了不清楚的以及有时候相互矛盾的规定,用于逃避责任的“漏洞”,含糊的互惠条件等等。这样的处理使得支持占领的人能够声称,以色列并没有违反协议。相反,巴勒斯坦的让步要大得多,并且由于权力关系的缘故,也要有效得多。对关键的奥斯陆 2 号临时协议的回顾,见 *World Orders* (1996 年版,后记)。

③③ Ibid.

③④ Shlomo Tsezna, “the building in the territories was frozen, and continues at full speed,” *Ma’ariv*, August 18, 2000; Akiva Eldar, *Ha’aretz*, May 1, 2001. See also *Economist*, April 26, 2001, and innumerable reports in the foreign and particularly the mainstream Israeli press, many reviewed in *World Orders* and the updated 1999 edition of *FT*.

③⑤ Tsezna, *Ma’ariv*, August 18, 2000; Eldar, *Ha’aretz*, May 1, 2001.

③⑥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2000 年 11—12 月。Shlomo Tsezna, *Ma’ariv*, February 27, 2001。沙龙经常被谴责为一名战争罪犯;佩雷斯也是如此。他的成就包括 80 年代中期在黎巴嫩造成大量伤亡的铁拳行动以及 1996 年对黎巴嫩的入侵。在 1996 年的入侵中,以色列轰炸了卡纳(Qana)的联合国难民营,杀死了逃离那里

的 100 多名平民。在国际上抗议这种轰炸之前,这次入侵得到了克林顿的支持。这种抗议是如此强烈的以至于克林顿不得不撤回支持,并命令以色列停止侵略。以色列照办了。

③⑦ Baruch Kra, *Ha'aretz*, February 6, 2000, translated in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March - April 2000. On all of these matters, see again *World Orders*. On Har Homa, see my article in Haim Gordon, ed., *Looking Back at the June 1967 War* (Praeger, 1999), papers from a 1997 conference at Ben Gurion university, Beersheva; excerpts in the extended 1999 edition of *FT*.

③⑧ Ziv Maor and Aluf Benn, *Ha'aretz*, April 10, 2001.

③⑨ 以色列人权组织“以色列被占领土人权信息中心”(B' Tselem)于 2002 年 5 月报告说,定居者控制了西岸 42% 的土地。Nagav Shragai, *Ha'aretz*, 5 月 13 日; Dan Izener, *Jerusalem Post*, May 14, 2002; 并没有在全国性的美国媒体上得到报道。在引用了 B'Tselem 和其他消息来源的时候, *Economist* (June 22, 2002) 估计,以色列控制了西岸 80% 以上的土地,其中包括 20% 被“非法宣布为”“国有土地”的部分——巴勒斯坦人也被禁止入内,以及另外 20% 由以色列国防军控制的部分。这些获取土地的政策使巴勒斯坦的村庄处于“位于犹太人定居点之间的分散的和孤立的状态”,按照 B' Tselem 的说法,犹太定居点之所以如此分布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结果。“巴勒斯坦的各个社区已经成为以色列西岸中的定居点”,一名巴勒斯坦的分析家这样评论道。在沙龙政府期间,这

些计划正在进行扩张。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的默许支持和间接资助下进行的。

- ④⑩ Jane Perlez,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2000. Perlez, *New York Times*, January 8; Judy Dempsey,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9; Friedman, January 2, 2001.
- ④⑪ Nadav Shragai, *Ha'aretz*, February 16, 2000. Yuval Ginbar, *On the Way to Annexati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Ma'aleh Adumim Settlement* (B'Tselem, July 1999).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January - February 2000.
- ④⑫ 关于行政区划政策的进一步细节, 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美国和以色列实行的, 见 Sara Roy, 载 Roane Carey 编, *The New Intifada*, 以及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2002。2001 年 1 月塔巴的非正式谈判曾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欧盟特使米盖尔·莫拉蒂诺斯准备的文件中可以找到有关细节, 这些细节被双方认为是合法的而予以接受, 以色列顶尖的外交记者埃尔达 (Akiva Eldar) 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评论 (*Ha'aretz*, 2002 年 2 月 15 日, 18 日)。这些谈判被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取消了, 他还“命令他的首席谈判代表谢尔 (Gilad Sher) 告诉巴勒斯坦人, 由当时的外交部长什洛莫·本-阿米提出的地图——将定居点集团的区域 (包括马阿莱-奥杜敏和吉瓦特泽夫区域) 减少到只占西岸的 5%——是无效的”。那块实际上将西岸一分为二的区域的地位与在戴维营会谈时一样, 仍然是

一个重要的争议点。巴勒斯坦人提出了一份明确的地图(与许多宣传的说法正相反),其中以色列保有西岸的3%,和“一块交换的土地,在面积和价值上保证公平,位于靠近巴勒斯坦边界的地区,与那些被以色列并入的土地在地理上一样的邻近”。以色列拒绝了,只在西奈的边界上提供一块面积小得多的孤立的土地。许多分歧依然存在,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谈判不是被取消的话,谈判本可以达成协议。

④③ Dugard et al., *Questions of the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④④ Ibid.

④⑤ Amira Hass, “美国的四次反对破坏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Ha'aretz*, April 13, 2001。此后不久,瑞典、法国和奥地利而不是美国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三个西方代表,华盛顿对人权委员会的经常反对(它的敌人除外)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许多其他假设也被提出; Barbara Crossette, Christopher Marquis, *New York Times*, 2001年5月4日。根据报纸引诉,国务卿鲍威尔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投票激怒了意图报复的国家; David Sanger, *New York Times*, 2001年5月9日。鲍威尔可能指的是在安理会上的否决票,或是可能是4月18日欧盟提出的决议; 见以下的注释④⑦。2001年12月14日,美国再次否决了安理会要求派遣观察员去监督暴力减少状况的决议。10天前,美国抵制了——因而削弱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再次重申,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因此绝大多数的美以行动是战争罪——

当发生“严重违反”的情况时(许多行动都犯下了)——是战争重罪。包括修建定居点,“任意杀人、动用酷刑、非法驱逐,任意剥夺接受公正和正常审讯的权利,大量摧毁和没收财产……都是在非法和肆意妄为的情况下作出的”。见缔约国大会,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 2002年1—2月。

- ④⑥ For review, see Human Rights Watch, *Center of the Storm*. Also Francis Boyle.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Link* 35. 1, January - March 2002, and Allegra Pacheco’s article in Carey, ed., *The New Intifada*.
- ④⑦ 关于军事必要性的问题存在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并不适用于当前这个事例。
- ④⑧ 法新社,“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以色列三条罪状”,2001年4月18日。投票结果是50票对1票;哥斯达黎加弃权,还有一个国家缺席。在美国的媒体中对此有零散的提及,但都不是在全国性的媒体上。
- ④⑨ Asher Davidi, *Davar*, February 17, 1993; translated by Zachary Lockman in *Middle East Report* (MERIP), September - October 1993.
- ⑤⑩ 见 Kate Bronfenbrenner, *Uneasy Terrain: The Impact of Capital Mobility on Workers, Wages, and Union Organizing* (Cornell, 2000年9月6日),它是根据与美国贸易赤字评估委员会的一份合同完成的,是对1997年一项研究的更新,同样也是在北美自由贸

易区的规则下完成的。此类研究在公众的评论中经常被忽略,但是不会被工人们(或者可能是雇主们)所忽略。

- ⑤① See economic correspondent Efraim Davidi,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y in the Middle East,”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II. 1 and 2, 2000.
- ⑤② Ya'ir Sheleg, *Ha'aretz*, March 24, 2001, on the conference and reactions. Shlomo Gazit, Amir Rappoport, *Yediot Ahronot*, March 26, 2001; also Reuven Weiss, reviewing Gazit's distinguished background.
- ⑤③ Ben-Ami, *A Place for All* (Hebrew) (Hakibbutz Hameuchad, 1998). Cited by Efraim Davidi,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y”.

